



五四运动亲历

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五四运动亲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四运动亲历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4

ISBN 7-5034-0996-7

I.五… II.全… III.五·四运动(1919)-史料
IV.K2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222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东华印刷厂

装 订: 北京东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125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2

前 言

发生在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将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为了处置战败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权益，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以战胜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在大战期间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收回被德国夺占的山东权益等正义要求。巴黎和会在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的代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立即在中国人民中，首先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愤慨。5 月 4 日，北京大学等学校 3000 多名学生，汇集天安门集会演讲，后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要求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北洋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逮捕了 30 多名学生。为此北京学生实行罢课，同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

影响迅速扩大。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城市和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上海、南京等地工人也先后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北京政府为之震惊，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章、陆，并拒签和约。中国人民以不屈不挠的斗争赢得了胜利。

五四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文化运动。自19世纪中期以来，西学东渐，西方近代思想引起人们的关注。1915年，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新思潮从此风起云涌，旧的传统观念受到猛烈冲击。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李大钊等宣传马克思主义，产生了空前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今天，当我们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回首80年前这段震惊中外的历史，更加令人振奋和鼓舞。为了帮助人们重温五四前后的历史，编者从文史资料的未刊稿和《文史资料选辑》中撷取部分重要文章，并收录了多篇反映当年各地活动的史料，结成专辑，以作为对五四运动80周年的纪念。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9年3月22日

目 录

前言	(1)
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约的经过	顾毓琇(1)
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	叶景莘(5)
回忆五四运动	许德珩(14)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罗章龙(44)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罗家伦(54)
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	梁敬惇(78)
五四运动回忆	何思源(90)
我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	屈 武(98)
天安门前的爱国斗争	黄助志(105)
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	俞 劲(111)
回忆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	方 豪(114)
五四时期参加赴京请愿活动的回忆	管易文(119)
我参加了五四运动	梁实秋(122)
五四运动中的北京女学生	吕云章(124)
回忆天津五四运动及“觉悟社”	谌小岑(130)
天津五四运动的回忆	孙越崎(153)

回忆五四时期的天津学生演讲队·····	魏士如(159)
天津各界联合会与跪哭团·····	吴子铭(162)
上海学生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经过·····	李五阶(166)
在上海参加五四运动的回忆·····	张廷灏(174)
五四运动中的上海商界·····	严诤声(178)
回忆五四运动前后在安徽的活动·····	朱蕴山(182)
湘江的怒吼·····	周世钊(189)
回忆长沙五四反帝斗争的一幕·····	舒新城(195)
对五四时期济南学生运动的回忆·····	石惠山(201)
“五四”在山东农村·····	陶 钝(211)
广州学生五四运动记·····	邓曾稼(224)
五四运动在桂林·····	李文钊(233)
五四运动在绍兴·····	李士豪 金鸣盛(239)
五四运动中的湖州学生·····	湖州市政协文史工作组(242)
五四时代的成都·····	范朴斋(245)
闽垣五四别记·····	赵效沂(254)
记五四运动前后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	胡 俊(257)
孙中山支持五四运动·····	朱仲华(261)
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	高一涵(272)
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顾颉刚(277)
五四运动时周恩来二三事·····	凌勉之(284)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朱 復(288)
回想北大当年·····	张中府(303)
五四时期的自由辩论·····	周谷城(312)
新中学会纪要·····	杨扶青 李 峰 张芥尘 于树德(317)

回忆《新潮》.....	俞平伯(326)
五四运动中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潘世纶(329)
《浙江新潮》的回忆.....	倪维熊(338)
五四时期温州的《救国讲演周刊》.....	王希逸(343)
五四运动时期成都的进步刊物《半月刊》.....	舒君实(346)

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约的经过

顾毓球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告终。1919年1月,战胜国在法国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也派代表参加。当时由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派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代表团委员长,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为代表,同时请孙中山先生主持的广州革命政府也派代表。孙中山派王正廷为代表,派我的岳父曹霖生为代表团秘书长。曹霖生是宋庆龄的表舅,1917年毕业于美国西点陆军学校,在广州参加革命政府工作,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在他旧存的资料中,有述及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的一些情况,兹略加整理,公之于世。

主持巴黎和会的有一个协约国最高议会,由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任主席,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国务卿兰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外交大臣贝尔福,意大利首相欧兰都和外交大臣沙巴诺,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望任副主席。1919年1月28日,和会讨论中国和德国的关系时,中国代表团被邀参加,陈述中国政府的主张大致如下:
(1)德国放弃1901年由八国联军同中国清政府签订的条约中所得的特权和赔款,以及在天津、汉口德租界和中国其他地方(除胶州外)所有的房屋、码头、营房、炮台、军火、船只、无线电台及其他产业(使署领署不在其内),并将1900年和1901年所夺取的天文仪器一律归还中国。(2)中国非经署名于1901年条约各国的同意,

不处分北京使馆界内德国人的产业。(3)德国承认放弃汉口、天津租界,中国允准两处租界辟为各国公用。(4)德国对于中国或任何与会国政府,不得因在华德人被幽禁或被遣回及因德人利益于1917年8月14日被没收或被清理之故,而有所要求。(5)德国放弃在广州英租界的产业,让与英国;并放弃上海法租界内德人学校产业,让与中法两国。

关于山东问题,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望向和会要求继承德国的权利,提出:(1)德国在山东胶州的各项权利、所有权、特别权利,以及各国于1895年3月6日及其他年份与中国签订有关山东的条约中所得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线等权利都让与日本。(2)德国在青岛至济南铁路所得的各项权利,连同用矿权、开采权,一并让与日本。(3)青岛至上海及烟台的海底电线,无偿让与日本。(4)德国在胶州的一切动产与不动产,无偿归日本所有。

胶州是中国的胶州,青岛是中国的青岛。清光绪二十四年,德国借口有一德国教士在山东曹州遇害,即派兵占领胶州。旋清政府将胶州租与德国,定期99年。此后德国人在此筑铁路、开矿,竭力经营。至欧战开始,中国先宣告中立(至1917年8月对德宣战),日本不顾国际公法和中国的中立国立场,悍然出兵攻占胶州,且接管所有德产,并声明以后交还中国。中国政府一再抗议,均归无效。后来,袁世凯醉心复辟帝制,乞援于日本,竟然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就在这二十一条中,也言明欧战结束后交还胶州。但1919年欧战结束,日本却提出要把胶州让与日本,纯属无理要求。陆征祥在和会上严重抗议,并提出一份长篇说帖,说明理由。主持和会的美、法、英、意等国对此均作壁上观,说帖终被搁置。

在和会进行期间,陆征祥随时电报北京徐世昌请示,王正廷、曹霖生随时电报孙中山请示。孙中山指示王正廷:这样丧权辱国

的条件,中国无法接受,应强烈抗议。王正廷、曹霖生得到指示后,即说服顾维钧、施肇基。由于曹霖生同顾维钧私交甚深,早年去美国入小学、中学、大学读书,都得到顾的帮助,他的夫人施美珍又是施肇基的侄女,于是顾维钧、施肇基都站到孙中山的一边。他们会同王正廷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促使陆征祥再向和会主席、副主席提出强烈的抗议。

中国驻日本公使章宗祥与陆征祥是老友,当时正在日本谈判山东铁路合同。为使其经手进行的卖国勾当顺利进行,他力图影响陆征祥迁就日本在和会所提的条件,于是回北京,与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密商,拟把顾维钧、王正廷调回,由章任代表,并面见徐世昌,主张照签巴黎和约。徐世昌初步同意,准备电告陆征祥。5月3日,报纸报道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全国人民无比愤慨,5月4日,北京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后游行示威,每人手执小旗,上书“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随之漫卷全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转变态度。

与此同时,孙中山根据各界人民爱国运动的形势,指示王正廷、曹霖生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王正廷、曹霖生先说服顾维钧、施肇基同意拒签,后来魏宸组也主张拒绝签约,向陆征祥进言不应在这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以免遗臭万年。

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团以陆征祥为首,包括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发出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辞去代表职务的电报给徐世昌,并通电各参战国家,说明拒绝签约的理由。巴黎和约在凡尔赛宫签字时,中国代表拒绝出席。他们给徐世昌的电文是:“和约保留签字,我国对山东问题,自5月26日正式通知大会,依据5月6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之后,迭向各

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提请重议。岂知时直至今午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留一线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断至此,竟不稍顾我国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可言。内省既觉不安,即征诸外人论调,亦群谓中国决无可以轻于签字之理,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当即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留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利等语,姑留余地。窃惟祥等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来欧半载,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自此以往利害得失殊难逆睹。要皆征祥等奉职无状,致贻我政府及全国之忧,乞即明令开去祥外交总长、委员长及廷、钧等差缺,一并交付惩戒,并一面迅即另简大员,筹办对于德奥和约补救事宜,不胜待罪之至。”

1919年7月2日,陆征祥又电北京政府:“巴黎和约既未签字,中国德国的战争状态按照国际法可认为继续存在。拟请迅咨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争状态告终,用政府大总统明令发表,愈速愈好。”9月15日,中国宣布对德战争状态终止。

此后,王正廷、曹霖生由法国回到广州,孙中山主持的革命政府在广州大街上搭建牌楼欢迎。王正廷还到上海南洋大学(现交通大学前身)、圣约翰大学等校演讲,介绍巴黎和会上外交斗争的经过,当时我在南洋大学听过他的演讲。

巴黎和会期间 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

叶景莘

一、外交委员会的产生和结束

北洋政府时期有过三个外交委员会：第一个是巴黎和会将开时于1918年12月中旬成立的，设于徐世昌总统府里。这个会因为反对签凡尔赛和约而于1919年5月3日自行结束。第二个大约是在1923年初黎元洪任张绍曾组阁时设立的，委员长为黄郛，我是委员。但这个委员会并未开过会，我不知会址何在，会的存在时期亦很短。第三个大约是在1925年段祺瑞执政时或较早些时设立的，委员长为汪大燮。他的唯一任务是邀集几个通晓国际法和熟悉条约的委员编一部不平等条约类编，将不平等的条件分类编列，以供修改不平等条约时的参考。这是他的宿愿。类编印出后，会即结束。我未参加这个委员会。

现在我要叙述的是第一个外交委员会的事情。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总统，11月11日欧战停止，12月1日外交部总长陆征祥出国赴巴黎和会。他先到日本与日首相商谈，离日上船时就发现丢了一个公事箱。国内舆论本认为陆非外交人才，且为签订《民

四条约》者^①，颇为不满。陆出国后，外交次长陈篆代行部务。他资历甚浅，声望不高，一般人都认为不足以应付局势。于是梁启超、林长民二人向徐世昌建议在总统府设一个外交委员会，任外交元老汪大燮为委员长。徐采纳了，并以孙宝琦、熊希龄、陆宗舆、李盛铎、林长民、王宠惠、沈瑞麟、陈篆为委员，林长民兼事务长，我是管秘书事务的事务员。徐世昌原是个极圆滑的老官僚，他虽被段祺瑞拥上台而自己并无实力，所以要拉拢各党派以增加他的势力。那时他已聘林长民为他的顾问。林劝他请梁启超赴欧洲游历，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为中国游说，徐也采纳了。这个外交委员会设在紫光阁西南角旁边的几间小房子里，虽在总统府内，但与府的办公处隔离较远。除汪、林二人及事务员们每日到会外，委员常来并对会务关心的只有熊希龄一人，王宠惠亦有时来，其他委员来开会时都采取敷衍的态度。当时我天真地以为对和会的政策都是由委员会决定的，专使来电都是由外交部送委员会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重要的来电确是抄送给委员会看的，但未必是全部。

外交委员会成立后，汪、熊二人即联合提出对巴黎和会的提案。共五大纲，首列破除势力范围，分目为收回租借地和铁路附属地、统一管理铁路、撤销外国邮电机关。其他大纲为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梁启超出国前，亦来会与汪、熊、林、王等讨论了这个提案，以便在外接洽。提案经委员会开会讨论审查，于1919年1月6日一致决议通过，由汪、林二人亲呈徐世昌，奉命交院发。次日由林长民亲交代总理钱能训，于8

^① 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5月7日午后3时，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对二十一条究竟是否承认。9日，外交总长陆征祥奉袁世凯命照会日使馆，对最后通牒要求各节概予承认。25日，陆征祥与日本全权代表日置益签订《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关于山东省之条约》，承认日本关于确定在南满与东蒙之权益和继承德国在山东之一切权益的要求。

日电致各专使，正在陆征祥抵法之日。18日和会开幕。但以后我们才知道国务院电专使只将这个提案作为希望条件。^①

另有一事徐却完全接受了委员会的提议：陆征祥赴法途中与广州政府所派代表王正廷相遇，到法后陆即来电报告代表五人及名次，为陆、王、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驻荷公使魏宸组。汪看了这个名次甚为踌躇，因为和会只给中国三个席位，如五人轮流出席，怕有时对于和会情形有不接洽处；如由三人出席，则应为前三人，但陆无甚能力，王亦尚无外交经验，且对和会须南北一致，不知他的主张究竟如何，施则为怕多事的官僚，向不活动，这三人恐不足以应付局势。汪、林相商不决，我建议只好把顾提升到第二位，使他当冲。因为顾来电最多，与美国代表方面的接洽报告都是他这个驻英公使打来的，施并无一电；且二十一条交涉后顾所写的英文声明书颇为得体，他亦熟悉那个交涉的经过。汪采纳了，即将名次照改，与林同去请徐核定。徐同意了。汪、林回会，通知陈篆到会将新名单交他电发。陈拿这个名单出门时，低声说：“这是要捣乱了。”果然，新名单到专使处，王、施大哗，陆窘极。他到瑞士去躲避，此事即为一原因。但以后在和会上为中国辩论，确以顾为最力，并最能说。

委员会所提“破除势力范围”大纲里“统一铁路管理”一项引起了大争论。提案原文为：

丙、凡以外资外债建造已成未成、或已订合同而尚未开工

^① 据刘彦著《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说，外交委员会所拟提案虽经政府于1月8日致电陆征祥令其照办，然被日本探悉提案有铁路统一案，百计图谋设法由中国人自动取消。不久，果有交通部总长曹汝霖、铁路协会梁士诒等忽然积极反对铁路统一案。后竟由国务院再致陆征祥，令其勿庸提出该项。陆征祥等遂依国务院前后训令，仅作成我国提出和会之希望条件，并将外交委员会所拟提案中铁路统一一项删除（见该书下卷169—170页）。

之各铁路概统一之，其资本及债务合为一总债，以各路为共同抵押品，由中国政府延用外国专门家辅助中国人员经理之，俟中国还清该总债之日为止。各路行政及运输事宜仍须遵守中国法律，概由交通部指挥之。

这个提案的主要目标原是为收回以外资建筑、为势力范围骨干的东清、南满、安奉、胶济、滇越各路。因为国家无此实力，故欲统一管理之，又因无赎回之财力，故欲将其资本及债务合为一总债而以铁路收入还清。但以外债建筑的如津浦、沪杭、京汉等各路亦与势力范围有关，如不包括于统一管理之内一律待遇，既不易得据有以外资建筑各路的各国同意，且恐收入不足以早日偿清总债而亦难于举一总债，因此欲将外资、外债建造各路一概统一之。

外交委员会提案于1月8日电各专使。约一个月后，因中国代表在巴黎要发表包括西原借款合同的中日秘密协定，日使小幡于2月2日到外交部抗议，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登出反对铁路统一的社论。而交通总长曹汝霖声明对于统一铁路案尚待研究，外交委员会委员陆宗輿亦称彼在会本不赞成。先是，称为旧交通系领袖的梁士诒已有反对统一铁路的言论，至是乃与称为新交通系领袖的曹汝霖一齐反对，认为统一即是共管。那时交通部顾问贝克和中英公司经理梅尔思各拟有“万国铁路团”私案，是共管性质，反对者即以此种拟案与外交委员会提案并论。

2月18日钱能训约赞否两方集会于春藕斋。汪、熊声明提案与贝克、梅尔思拟案无关，最后梁亦表示赞成之意。钱声明双方无根本不同之意见，办法应再详议。汪推曹、梁拟案。3月7日国务院召集春藕斋第二次会议，曹、梁提出破坏原提案的草案，林长民因双方争持才拟了一个妥协办法。汪不同意，会后即辞职不复到外交委员会。

平心论之，委员会提案中所举借总债及延用外国专家辅助经

理的条件,是因为当时情形不能避免,并非共管性质,但以后是否会流于共管,确应考虑。举总债时如何方可不受新银行团的压迫,更是问题。熊希龄以为此等皆系商订条件时所当注意,但政局多变,商订条件者为谁,亦难保证。另一方面,破除势力范围单靠要求,无此实力;但不破除则势将引入瓜分,提案人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理由。要之,原提案人的用意在破除势力范围,并非为私,他们提出由交通部指挥,而当时他们在交通界并无一个立足之点。梁士诒提出已成外债各路不在统一计划之内,有保持他由于管理和调运铁路收入而来的“财神”头衔之嫌疑。曹汝霖在《顺天时报》反对后出场,陆宗輿在第一次春藕斋会议时,竟为高徐、济顺两路辩护是商业性质而非政治性质,则简直的与日本“一鼻孔出气”了。这是赞否两方主要不同之点。徐、钱则以圆滑手段依违两可于其间,而终偏向亲日派。曹、陆被称为亲日派,汪、熊、林等则被称为亲英美派。

亲英美派是一班无拳无勇的知识分子,在国力太弱时,过分寄望于和会,尤其是对于威尔逊的和平条件 14 条,以为公理或可战胜强权而欲借他人之力来保持自己的国土,这只可说是可怜。但外交战术本当利用形势和对方面的矛盾。在欧战中,英无力东顾,日本已几乎大嚼“狮子”的一份肥肉,战后美国在海军方面又与英并驾齐驱,纽约还要夺取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以势力平衡为传统外交政策的英国,本已利用后来的美国所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以保持他所夺取的中国权利,战后他更得以“血浓于水”的甜言,利用日美间的矛盾以联美抗日。所以英美方面对于外交委员会所提破除势力范围一项,曾由两国公使表示赞成。美使芮恩施、英使朱尔典都曾宴请争论铁路统一政策的当事人而于宴后畅谈这个问题,并都声明贝克与梅尔思的私案与使署无关,他们二人亦不能向和会提出。与美使会谈时,汪大燮提出三点:(1)

债权国权限只能及于投资确实，本利有着，其他不能过问；(2)执行之权完全归中国政府，他国不得过问；(3)为使资本家安心起见，可设立评议部，以便稽核或建议改良。其中第三点是因为当时铁路收入常被任意挪用亏欠而提出的。林长民曾刊印一本《铁路统一问题》，以披露全案的原委。梁士诒曾表示应当保存势力范围而“赖均势以求存”，他的机关报也发出了这种言论。当时我曾写了一本《撤废势力范围论》小册子送各处以辟之。

汪大燮辞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徐世昌屡次慰留，亦不肯回会。以后和会对中国形势日恶，日本原已在1917年2月至3月与英、法、俄、意订立了继承德国在山东所夺取的权力的秘密协定，至是日本代表声明如不照日本提案解决，日本将拒绝签和约。英代表劳合乔治亦宣称日本如不参加国联，英国亦不参加。意大利代表则已因阜姆港问题不遂意而退出。于是威尔逊亦对日本让了步。中国代表团急电纷来，林长民乃亲到汤山昼汪回会视事。

4月30日，英、美、法三巨头决定了凡尔赛和约156、157、158三条，将德在山东所夺取的权利都让与日本。5月1日，陆征祥来电称如不签和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将来中德直接交涉，是否较有把握，亦是问题。他怕将来与战败的德国直接交涉失败，因而就主张签字，对日本屈服。这实在是太可笑了。外交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由汪、林将致专使拒签电稿亲呈徐世昌，徐令国务院拍发。但2日国务院又密电专使签约，院里电报处一个林长民的同乡当晚潜去报告他。3日侵晨，汪、林到会，汪命即刻结束会务，并自草自缮辞呈送徐处而去。我将档案整理了，亲自送交外交部条约司长钱泰接收。林密电梁启超并请他通知巴黎中国留学生，他另又通知国民外交协会煽发电反对。我回会收拾杂务后，打了一个英文电与上海复旦公学李登辉校长，说“政府主签，我们在此已尽其所能反对，请上

海响应”，这个电的署名是随便写了三个英文字母。这个电文曾经登在英文大陆报面页第二行一个方格里，日期不记得了。傍晚我到汪处报告，汪问还有什么办法可想。我说：“北大学生本要游行，何不去告蔡先生。”汪即坐马车从东单二条东口赶到东堂子胡同西口蔡宅。蔡即电召北大学生代表于当晚9点在他家开会商议。北大学生原定于5月7日（即1915年日本发出关于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之国耻纪念日）游行，于是决议将日期提早三日，因而就变为五四运动了。

二、国民外交协会的活动

外交委员会成立时，我们早已感觉到政府的亲日倾向，就组织了一个国民外交协会，以备与外交委员会互相呼应。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有会员几十人，以后逐渐增加至百余人，其中有不少各大学学生和几个湖南、贵州等西南省份的代表。协会会所系借用西单石虎胡同私立松坡图书馆西文部。协会成立时，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廉、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蘊宽10人为理事；并推干事六人，为：总务陈介、外交叶景莘、文牍寿洙邻、法律王文豹、交际魏斯炅、庶务郑舜钦。以后因警察常去麻烦，郑不能应付，又请《英文导报》经理梁秋水任秘书。理事常到会的只熊、林、王三人，干事经常办事的只寿、郑、王三人。

5月4日当天，学生被捕32人，各校长和汪、熊、王等都请警厅释放，未允。协会决定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开国民大会。那天清晨，梁秋水从煤渣胡同东口《导报》馆（今《人民日报》宿舍）到石虎胡同，路过公园，见园门关闭，门外有武装警察10余人，并架起机关枪。他到会不久，即有武装军警30余人进来，在院中站满。梁问何事，答谓由卫戍司令部警察总厅派

来,禁止在公园开会,不遵命即逮捕会员,封闭会所。梁问:“司令部和警察厅是日本机关,还是中国机关?”答谓:“是中国机关。”梁又问:“诸位薪饷是日本的钱,还是中国的钱?”答谓:“是中国的钱。”梁三问:“诸位知道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去公园开会?”众答:“不知道。”梁告以是为反对签和约,又说:“不料当局反来禁止我们开会,这明明是帮助日本压迫我们,……诸位都是中国人,如果都是好汉,请快快与我们同去公园开会。”众皆无言,梁请他们进厅休息,饷以茶烟。有一个卫戍司令部人员说:“我告诉你真话,会员可不逮捕,会所可不封闭,但公园万不可去,如去一定死人如麻。”梁答谓:“俗语说,‘来者不怕,怕者不来’。”那时会员陆续到了100多人,梁指道:“自来送死的愈来愈多了。”双方相持许久,那个卫戍司令部人员请梁想个办法。梁沉吟些时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去公园开会,今天必须先把被捕的学生释放。”那人打了多次电话,最后说,“长官同意梁先生的办法”,但问谁负责。梁说:“我姓梁的负完全责任。”于是军警散后,会员们整队向天安门进行,在新华门前与被释放的学生相遇。大家一齐转向前门,沿路高呼“反对巴黎和约”,散发传单,熊、林二人亦赶到了。会员们一部分到商会开会,一部分到先农坛去开会,下午四五点钟回石虎胡同而散。

5月8日,北洋政府又颁布弹压学生命令。6月3日北京学生讲演,被捕的为数更多。但各地民众已相继起来,罢课罢市,抵制日货,遍及全国,北洋政府被迫罢免曹、陆、章等。6月10日,徐世昌咨两院辞职,但仍通电各省主张签约。6月23日,国务院电各专使签约。28日签约之日,巴黎中国留学生包围了代表团寓所,周鲠生先生也是前往者之一。本来各专使并非无爱国思想,更非亲日派,未必愿签约。陆征祥实是个好好先生,我们常批评他不过是个“大礼官的材料”。他也许会迫于政府命令去签,如袁世凯命他签《民四条约》一样,但亦不能与曹、陆一概而论。其他专使都是

精明机警之人,即使专为个人着想,亦未必肯负这个签约的责任,来蹈曹、章的覆辙。当时各处电专使拒签的电文有极严厉的。那时陆原是欧美同学会会长,蔡元培是总干事,王宠惠和我是副总干事,我们于3日以三人名义电陆勿签。我起的电稿最末说“如签,回国不利”,蔡以为不应恫吓他而删去了。但国民外交协会连去三电,第三电全文为“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此外各处去电必有更激烈的,专使们敢犯众怒吗?专使寓所既被包围,于是不去凡尔赛签约而对巴黎各报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历述中国代表团的苦心:如4月4日对和会的抗议,5月6日关于山东条文保留的提议,5月26日在保留条件下签约的正式通知,并举出1815年6月9日维也纳条约签字时瑞典代表保留三个条文而签约的前例,以驳斥保留无前例之说;以后中国代表又提出将保留条件作为和约附件,不被接受;又提出在赴凡尔赛签约前送一保留山东条文的声明,而和会主席只允在签字后送去;代表团以签字后的声明效力可疑,又提出修改声明字句,亦不被接受。因此,声明最后说,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不签约,以待世界舆论之裁判。^①这个声明是否预先拟好的,不得而知。

拒签凡尔赛和约,是全国人民,包括群众、学生、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统治者或曾充过统治者的一些人的爱国思想和力量联合起来所造成的结果。

^① 见麦克莫雷:《与中国订立的和有关中国的条约协定汇编》,1496页。

回忆五四运动

许德珩

一、五四运动预备时期

五四运动的远因

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发生，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孕育起来的。五四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国人民革命从此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不再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性质从此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五四运动虽然发生于1919年5月，但究其远因，却要追溯到五四以前的中国社会情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先谈当时中国社会的情况。1916年6月，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袁死后，因反袁而流亡在国外的各方面人士纷纷归国，国内政治、思想、教育界的一潭死水由此动荡起来。可是一个袁世凯虽死，而众多的“袁世凯”出来了，中华民国依然如旧，武装还是军阀的武装，政权还是军阀的政权，并由此还引起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封建余孽辫子兵张勋还曾在1917年7月，挟清朝废帝溥仪宣告复辟，虽然不久即被消灭，但国脉又多受了一次摧残。孙中山先生想在黑暗中打开一个局面，曾于1917年8月下旬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于广州。孙中山本人被选为大元帅，组织护法军政府，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终因缺乏正确的革命方针，以致南方也发生了分裂，从人民所

遭受的痛苦来说,南北完全一样。孙中山先生也只好在 1918 年 5 月去职赴沪,开始写他的《孙文学说》去了。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候,独自侵略中国,曾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以此作为交易,帮助袁世凯做皇帝。袁贼称帝心切,二十一条亡国条约,除其中的第五款以后商量外,其余均接受了。袁世凯死后,张勋复辟,北洋军阀段祺瑞打败了张勋。为了攫取中国政权,段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继续承认了二十一条,获得了日本的大借款。日本帝国主义参加了欧战,站在协约国一边;我国也参了战,也是站在协约国一边。日本借口德国为敌对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同盟国,日本和我国都是协约国,协约国与同盟国为敌对国),自行出兵我山东,将辛丑条约中规定的德国在我山东的权益,据为己有。事为我留日学生所知,极端反对,1918 年 5 月 7 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开会,抗议中日秘密协定,被日本警察拘捕多人。全体留日学生对日抗议,罢课回国。

学生爱国运动力量的兴起

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倍受压迫,在为国家生存而斗争的历史过程中,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经常站在斗争的前列,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中华民族又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革命力量的推动下,国内外学生都不能安心求学,于是他们行动起来了。这次学生运动的主力在北京大学。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五四以前的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创建于 1898 年戊戌变法之际,前清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一所最老的大学,到五四运动时已经有 21 年的历史了。它有文、法、理、工、商五科和预科,学生约一千八九百人。1916 年以前,校风很腐败,学生年纪大的相当多,做了举人秀才的学生也还

有,校内工友称呼他们是“老爷”,以后也称他们为“先生”。学生宿舍只有马神庙西斋、沙滩东斋和北河沿八旗先贤祠(以后为译学馆,最后改为北大预科)三处,大部分学生在外面寄宿,住公寓。学生不穿制服,也没有制服,一般是长袍马褂,时髦一点的穿长衫和西服裤。整个学校没有图书馆,只是马神庙理科有一座古老的藏书楼。学生中除少数死读书之外,打麻将、捧戏子、逛八大胡同,成为风气。当时北京社会上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就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生活自由散漫,谁也不管谁,偶一发生问题,就写出大字报一样的揭帖贴出来,赞成的,反对的,你唱我和,花花绿绿,贴满墙壁。这是当时北大的一般情况。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1916年冬^①,蔡元培来到北大。蔡是清末的一位翰林,辛亥革命时,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南京临时政府,做教育总长,国民党反袁失败后流亡海外,袁死后回国。蔡到校不久,宣布他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思想自由”,等等,这在当时发生过一些进步作用。他所谓“兼容并包”,并不是新旧一揽子全包,而主要是罗致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对那些腐败守旧人物则尽量排除。由于他的“兼容并包”,北大在他来以后,就包括了几种类型的人物:

第一是《新青年》方面的人物,即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1917年初,蔡元培聘请了陈独秀来做北大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也聘请了鲁迅、钱玄同、王星拱、刘半农、徐宝璜以及以后的李四光、顾任光等这些当时所谓“新人”来校任教。还扩建藏书楼为图书馆,聘请了章士钊做图书馆主任。章不久即辞职,推副主任李

^① 1916年12月26日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次年1月4日蔡到任。

大钊代替。李大钊是日本留学生,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办反袁的《甲寅杂志》(即“老虎报”),李大钊和陈独秀都经常在《甲寅》上面写文章。陈独秀以后又在上海办《青年杂志》,到北大不久,就把《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主张白话作文,鼓吹文学革命。李大钊、鲁迅当时经常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大概在1917年秋,胡适由美国回来,到北大任教。《新青年》里面一方面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文章,同时也有胡适、王星拱、刘半农、周作人诸人之稿。他们虽然都是在《新青年》里面的新文化运动人物,可是从政治见解上彼此却有着很大的分歧。

陈独秀尽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但其实质依然没有超出文学改良的范围。虽然这种文学改良运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有它一定限度的进步意义,尤其白话作文方面。可是这种文学改良运动,如果离开了政治思想上的民主方向,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做基础,那就决不会有什么真正的革命意义。这种现象只有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也只有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驱者李大钊,在1918年10月所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五号上面,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卓越的文章之后,才引起本质上的变化,才真正开辟出一条中国新民主启蒙运动的康庄大道。不过,当时社会上介绍这一方面的材料还不够多,报纸上报道的也不翔实,反动派常把“布尔什维克”译成“过激派”。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11月),协约国胜利了,德国失败了,中国因为参加了协约国,有些人竟然把自己也看成是什么“胜利国”,一时“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高唱入云。受美英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人,大肆宣扬美国的“民主”,美国总统威尔逊骗人的“和平十四条”,被宣扬成“民主的象征”。留美归国的杜威的学生蒋梦麟曾把它翻译出来。北大学生傅斯年为讨好胡适,自夸说可以把“和平十四条”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

胡适与李大钊在政治立场、观点上就有很多冲突,如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胡适就讲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李大钊讲马克思主义,胡适就讲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同时他自己又宣扬杜威的实用主义。李大钊站在学生一边,参与学生运动;胡适则站得远远的,并主张20年不谈政治。过去曾有过“胡适领导五四运动”的荒谬说法。必须指出,当五四运动发动时,胡适因母丧回安徽原籍,不在北京,根本没有参加五四运动,更谈不到什么“领导五四运动”。可是五四运动的怒潮,却真是把胡适吓倒了。当胡适由家里回到北京的时候,北大和其他各校学生还正在罢课,胡适曾出面劝说学生复课,结果被学生严正地拒绝了。胡适想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发动师生自愿去者签名,追随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马叙伦、刘文典对此大不以为然,刘还把傅、罗签名的事告诉了陈独秀。陈把傅、罗叫去训了一顿。胡适的如意妙算没有成功。这时胡适还想方设法用蔡元培、陈独秀的名气来抬高自己。他说北大是由三个兔子而成名的,一个老兔子是蔡元培(蔡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按十二属相,卯是属兔的),一个是中兔子陈独秀(陈生于清光绪五年己卯,也是属兔的);一个是小兔子即胡适自己(胡生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也是属兔的)。一时传为笑谈。在胡适影响之下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俞平伯、徐彦之、毛子水等,办了一个《新潮》杂志,后来参加的还有汪敬熙等。《新潮》杂志在出版时自吹自擂,刊登广告自称是“北京大学之新潮”。由于胡适的关系,北京大学每月出大洋400元作为《新潮》的津贴费用。这个刊物主张白话作文,偏重于文字改革运动,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之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于反侵略、反卖国的运动却起了不少的反作用。

第二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北大也很活跃。蔡元培校长到校后,聘请了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煜瀛)来北大教生物

学,聘请了吴稚晖(敬恒)当学监。李石曾只来了很短的时间,吴稚晖来到学校尚未正式就职,无政府主义思想就由他们传播到了北大。李、吴这帮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巴黎开豆腐店,办了一个刊物叫《旅欧周刊》,褚民谊做编辑(以后当汉奸),经常介绍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思想,鼓吹无政府主义。同时也有人翻译了克鲁泡特金、蒲鲁东的著作。蔡元培本人当时也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这就助长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宣传。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腐败,学生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水平低,又有社会上这些“名流”来鼓吹提倡,所以北大在最初一个时期,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学生还不少。记得其中最活跃的有(黄)凌霜、(区)声白、(赵)太侔等人。他们在当时都是主张不要国家、不要家庭的人,所以他们的名字上多半不冠姓。那时有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家,看不起学生爱国运动,以为爱国是落后的思想(我们组织的学生爱国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改为学生救国会)。1918年5月21日的示威请愿运动,北大学生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的人是不参加的。

第三是“国故”派的人物。学生中有张暄、伍一比、罗常培等。教员方面原有拖着一条大辫子的辜鸿铭,年轻的英文教员、“探艳团”团长徐佩铤,当时的文科学长夏锡祺等。蔡元培来校后就因为他们排除出去了。当然,蔡之排除顽固守旧派,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可能彻底的,他也把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申叔)聘来当文科教员,条件是不谈政治。他还把清朝遗老、投什刹海“殉节”而死的梁巨川之子、投考北大未录取、年仅二十二三岁的梁漱溟,找来教印度哲学。以黄侃(季刚)、刘师培等人为首的“卫道派”,反对白话文,于1919年1月刊行了《国故月刊》。

在“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成立了很多社团。像哲学会、雄辩会、音乐传习所、体育会、数理研究会、新剧研究会、书法研究会、

画法研究会、图书报社、学生储蓄银行等。同学集股办的消费公社，在马神庙路北，后来“未名社”还用那个房子。还有新闻研究会，由校长秘书徐宝璜主持。《京报》的邵飘萍在五四前一段期间，每星期日来给我们讲他的新闻采访经验。这个会与五四运动很有关系。毛泽东也参加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对它特别重视。当时国内著名的书画家陈师曾（衡恪）、音乐家萧友梅、刘天华都网罗在这些学会之中。21岁的画家徐悲鸿则担任画法研究会主任，后来并资助他往法国学画。还有些活动，今天的青年听来是要好笑的，如静坐会，每个人带一个蒲垫，去听蒋维乔（竹庄）的讲演。一时学校的空气甚为活跃。

此外，蔡元培还发起了进德会。这个组织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戒条。遵守这三个戒条而入会的称甲种会员；加上不做官、不做议员为乙种会员；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条为丙种会员。它以消极的“不参加”的办法来抗议旧社会，尤其是针对北大学生的恶习，表现了蔡元培的“道德救国”和知识分子超政治的资产阶级幻想。

这是五四运动以前，在蔡元培校长的“兼容并包”和“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北京大学形形色色的各派政治思想的一个概况。

学生救国会的形成

1918年5月，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举行集会，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酷镇压，全体留日学生反抗这种暴行，罢课回国。这件事立即引起北京学生的积极响应。5月中旬，归国学生代表李达、龚德柏等到了北京，与我们见面。经过几天的奔走酝酿，北京学生于5月21日发动了向统治当局示威请愿运动。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运动，参加这次运动的有北大、高师、高工等学校2000多人。当时推出向公府（即总统府）请愿的代表8人，其中

北大3人：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但是，这次运动出于仓促，准备不够，又因学生从来不问政治，因而没有发生所希望达到的影响。同时，北京大学思想不一致，内部有一帮学生如傅斯年、范恺、吴澄、杨济华、曾劭勋等人破坏此次学生爱国运动。他们事前跑到公府告密，说我们“要纠众造反，向政府请愿示威”，“这运动只是少数人的运动，不能代表全体学生”，云云。傅斯年等人这种卑劣无耻行为，受到了蔡校长的斥责，也受到了许多学生的鄙视，同时也给了我们以教训，使我们深感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

这次的游行请愿运动，虽然没有结果，但是北京和天津的学生却因之组织起来了。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最初名称是学生爱国会）。参加的不限于北京大学，有北京各学校的学生。暑假中，派出了许德珩、易克嶷两人代表学生救国会南下联络，以通声气。我们先到天津，那里学生已经有了组织，开会欢迎我们。到会的人很多，我记得有：马骏（工专学生）、郭隆真（女）、谌志笃、马千里、张传琦、张泰来（北洋大学学生，后改名叫张太雷）等人。正当欢迎会开得很热烈的时候，张传琦忽然拿把菜刀把自己的一个小指头砍掉了，以此来激励国人。他们以后还组织了一个觉悟社。周恩来由日本归国以后，觉悟社就更加发展了。邓颖超这时也出来了。我们由天津到济南，找到了康生，他当时名张绍卿，又名张三洗，我们同他谈了发展组织的事，没有开会。由济南转武汉，见到了恽代英，他们组织了文化书社。我和恽代英同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虽是初次见面，但仿佛很熟，真是一见如故。由武汉到九江，找到了同文书院的学生方志敏以及邓毅生。到南京找到了金陵大学学生黄仲苏，也找到了湖南林祖烈（林伯渠之弟），以及其他多人。最后到上海。上海学生方面有复旦的狄侃、

程学瑜(以后改名为程天放),华侨学生何葆仁,圣约翰的墨宜颖,河海工程学校的张闻天、沈策民,以及南洋公学的恽震、留日归国学生黄介民等人。还找到了为我们奔走的“上海通”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上海妇女方面的人特多,我们会见了留日归国的女学生李果、程孝福,神州女学舒惠贞,黄兴夫人黄宗汉,女子救国会的朱剑霞,还有从天津去的刘清扬。她们成立了上海女子联合会,宣传爱国,抵制日货。女界联合会五四以后也参加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还拜会了同情学生运动的孙中山先生以及廖仲恺、朱执信先生。他们到上海以后还办了一个周刊《星期评论》和月刊《建设》,与北大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南北呼应。我们还联系了《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叶楚伦,《时报》的戈公振,《申报》的史量才,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沈恩孚,商会的虞洽卿、荣宗敬。这时毛泽东往来于京沪,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他团结了男女青年数十人,其中有蔡和森、罗章龙、张昆弟、李维汉,女会员有向警予、李思安、周敦祥、劳君展、蔡畅、杨润予等。这时,留日归国学生在上海办了一个《救国日报》。我们有事就互相商量,于工作便利不少。同时,上海的学生会也组织起来了,7月的某一天,在西门外体育场召开大会,并欢迎我们,到会的有几千,有工商各方面的代表,会开得甚为热烈。还邀请了北京学生代表报告学生运动情况。我们在上海停留了20多天。这样总算联系好了。我们还派人到广州联系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会非常会议员。也派人到湖南岳州联系了湘西镇守使冯玉祥将军,因为他同情学生爱国运动。由于我们联络的结果,各地学生因之也都加入了学生救国会,这个学生救国会就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学生团体了。我们于9月初返回北京。

1919年春,北大学生会成立,北大的学生救国会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新潮社的成员以前是不参加学生救国会的,五

四后,在李大钊的促进说服下,他们参加了运动,并派罗家伦、康白情为代表,参加了北大学生会。无所属的陈公博、狄庸(福鼎)也参加了北大学生会。

《国民》杂志的问世

为了加强联系,做好宣传工作,学生救国会筹备出版一个刊物《国民》杂志,经费由南北各地学生自己凑集,每人出五块大洋,共凑了1500余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可见大家热情之高。因为办这个杂志的目的是宣传爱国、反帝、反军阀,不是谈文学革命,参加的人又不限于北大的学生,所以北大当局不让我们在北大校内挂牌子(虽然北大的同学参加的很多)。我们只好在北池子骑河楼路南一所房子里租了一大间房子,通信、开会、讨论问题都在这里。原定于1918年10月杂志正式出版,但在筹备就绪之际发生了问题。学生救国会管理费的学生鲁学祺,竟挪用了会费五六百元,使刊物的出版受到了影响,只得推迟于1919年1月1日出版。

据我所能记忆,担任编辑的有邓中夏(康)、黄日葵、高尚德(君宇)、陈宝镛(剑修)、陈钟凡、马骏、许德珩以及张国焘、段锡朋、孟寿椿、易克嶷等。还约请了李大钊做我们的指导,约《京报》主笔邵飘萍和画家徐悲鸿做我们的顾问,并约杨昌济(怀中)为我们写文章。尤其是李大钊经常给《国民》写稿,他有两篇批判胡适的文章就是在《国民》杂志上发表的。邓康(中夏)同学用“大鏊”的笔名每期都为杂志撰述“国内外大事”,介绍国际新闻。《国民》杂志第五期上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这是《共产党宣言》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译本。译者为李泽彰,全书已经译完,因限于《国民》杂志的篇幅,只能陆续发表。前半部出版后胡适特地把李泽彰找去,说:“你快毕业了,毕业后你还做不做事?你要做事就不要再

登下去(指《共产党宣言》译文连载);如要出风头,那你就登下去!”由于胡适的威胁利诱,李泽彰抽出译稿的下半部不敢登下去了,所以《共产党宣言》在《国民》上没有全部登完。李泽彰后来由胡适介绍给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成为王云五的亲信了。

《国民》杂志最初是用文言发表文章,因为它是全国性刊物,当时社会上对于白话文还不容易接受。五四以后的《国民》杂志就改为白话文了。

走上街头讲演和大学开放女禁

这里首先要介绍的是平民教育讲演团和所提倡的妇女解放运动。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学生救国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于1919年3月成立。事先酝酿很久,先是北大学生有“校役夜班”(即工人夜校)之设立,目的是为校内工友补习文化,讲解时事,效果良好。以后改成讲演团并扩大到校外,成为平民教育讲演团。讲演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北大学生以及他校学生有很多人都参加了。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在成立会上推选了职员,邓康(中夏)同学被选为总干事。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后,就经常到街头群众中间讲演。出发时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一组,事前拟好题目,选定地点(有时也不事先选地点),打着讲演团的白布小旗,仿照基督教救世军的宣讲办法,携带一面小铜锣,到人多而适当的地方,主讲人站得高一点,另一个人打起锣来,于是就开讲起来。庙会是我们最好的讲演场所,可是常常被警察干涉。这个讲演团到五四运动时就成了学生会的一个组织,参加的人多了,几乎每天都要到街头去讲演,或贩卖国货和书报。

学生救国会本身这时也有了发展。上次的示威请愿运动只有男学生参加,没有女学生,也没有工人,于是大家讨论,认为这应归咎于受了孔子的思想影响的结果。孔子说“唯女子与小入(劳动民

众)为难养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君子莫治小人，无小人莫养君子”。由于孔子轻视妇女与劳动人民，提出劳动人民应当养活贵族老爷而贵族老爷应当统治劳动人民的这种言论，因而使大家提出“打倒孔家店”、“打倒礼教”的口号，并要求北大开女禁，招收女学生，实行男女同校，以求达到中国妇女的真正解放。在1918年至1919年之间，为此事北大校长蔡元培还同林琴南(纾)打了一场笔墨官司。此时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女生，可是中国妇女因为受旧礼教的束缚压迫已久，初次招收女生录取的并不多。

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

还要谈一谈与五四运动有关系的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是由李大钊等于1918年联合各方面的青年有志之士组织起来的。当时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全体回国，国内各学校学生请愿受到反动军阀压迫而失败，因此感到有组织一个带学术性的政治团体之必要。这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定名为少年中国学会，于1918年6月30日开会筹建(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李大钊和王光祈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会员最后发展到108人，主要有以下几种人：(一)向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人；(二)因反对日本侵占山东而归国的一小部分留日学生；(三)从事爱国运动的国内各学校少数学生。就我记忆所及，如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高君宇、李达(鹤鸣)、黄日葵、缪伯英、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沈泽民等都参加了这个组织，而且他们当中有好些都是起领导作用的。参加的人还有杨钟健、许德珩、章廷谦(号川岛)，以及周炳琳、孟寿椿、周太玄等。后来堕落成为国家主义分子青年党的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也进了这个组织。还有参加新潮社的新诗人康白情，陕西文人郑伯奇等。这个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

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还有四条信约:(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但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纳妾的人、做官的人不能充作会员,即使已经做了会员的,也要请他退会。写《中国佛教史》的黄忏华和讨了小老婆的罗季则,就是被请退出会的。它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由李大钊任主编;出版了《少年世界》,邓中夏是负责人之一。这个学会分散在国内各大城市,都同情或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以后虽因立场观点不同走向分裂,但在当时对于五四运动是起了很大的联系作用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当时曾说过:“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的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见《蔡子民先生言行录》169页)

少年中国学会在成立一年之后,不但和别的社团联合起来,形成了统一战线,在任务和工作方面也渐渐地由朦胧而显明,比先前更实际更具体了。在学会中李大钊又提出“主义”来。学会中的最高领导机构是评议会,李大钊、恽代英、杨贤江、黄日葵四位都是评议员。现在看来,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虽然相当复杂,思想也极不相同,但是在当时会员中有这许多共产主义者,而且领导着这个学会,对五四运动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之所以不惜笔墨叙述早已不存在的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因为它对于五四运动起了帮助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五四运动之所以能成为战斗的力量,是因为各方面的团结,首先是北京大学内部的团结,以及全国青年的团结,而把大家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的则是李大钊。由于这样的广泛的团结,才有力地打击了凶恶的敌人北洋军阀,赢得了胜利。

上述情况表明,五四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而是做了充分准备的,所以一经爆发,就能很快地成为全国普遍的运动。

二、五四的行动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德国的失败与俄国革命的成功,一时“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呼喊得很响亮,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地翻身了。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这一期间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了。庚子(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对德国屈服赔罪而建立在北京东单牌楼最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除了,改建为“公理战胜”的牌楼,竖立到中央公园去了(现在的中山公园。解放后改为“保卫和平”牌楼)。名流们也勤于讲演,今天你讲一套“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的理论,明天他又讲一套“公理战胜强权”。蔡元培在中央公园搭起台来,讲演“劳工神圣”。李大钊高呼“庶民的胜利”(《庶民的胜利》一文,原是李大钊讲演稿),欢欣鼓舞地庆祝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在听众中有很好的反映。

五四前夕的决定

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哪晓得奢望的结果是失望。4月底,巴黎和会这个强盗分赃的会议决定,要把德国强占我国山东的“权利”,判给日本帝国主义继承。同时还拒绝了关于取消袁世凯与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提议。5月2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

校学生代表参加,计有:北京大学全体学生,清华、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法学院、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汇文学校(燕大前身)、高师附中、铁路管理学校等校学生代表。到会的人极为踊跃。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推定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二人做记录,推许德珩起草宣言。发言的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大会共议决办法四条:(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会开得很紧张的时候,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同学刘仁静,拿出一把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嚼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于是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早上全体游行示威。大家掌声如雷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当晚,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的做上大旗子,短的做上小旗。我于宣言写好后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条幅,书写标语,一直搞到天亮。有的同学咬破手指,血书标语。那时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集会的主要目的在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反抗日本,反对列强以及惩办卖国贼和军阀官僚,所有标语大都是写着“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等句子,各校写法大同小异。

五四的集会游行

1919年5月4日早晨,北京各校学生按计划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集会,约计有3000余人。那天到天安门最早的是高师、汇文两校。

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来劝阻,耽误了时间,所以到天安门最迟。天安门前,金水桥南,竖起大小白旗数十面,写的都是反对列强、惩办卖国贼的口号,谢绍敏的“还我青岛”的血书,也悬挂在内。我们在天安门停了好久,向群众说明游行示威的意义,群众因之也就参加的多了,游行示威的人数因之也就增加了。有人提议往东交民巷示威,于是游行队伍到了东交民巷西口的美国使馆。当时的东交民巷是使馆区,一向不许中国人成群结队进出。我们在军警林立的情况下,先到美国使馆递了英文声明(说帖),说明游行示威的目的,群呼口号之后过去了。再到日本使馆,军警围了三四层,其中还有许多日本军警,真是如临大敌。我们在这里待了很久,大家不想同日方正面冲突,高呼口号后,有人提议“我们找卖国贼算账去!”于是出东交民巷,经御河桥、东单牌楼,直奔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家。因为交通总长曹汝霖是二十一条的签字人(那时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国外,不负实际责任),正是爱国群众斗争的目标。

痛打卖国贼 火烧赵家楼

队伍到达赵家楼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数百名军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队伍不得进去。我们于是变计,向军警和和气气的讲明来意说:“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我们做了很多说服教育工作,果然有效,军警让我们进了胡同。可是曹汝霖的住宅朱门紧闭,怎么办呢?我们还是用说服军警的办法,包围他们。我们进一步用三四个人包围一个军警的方式,向他们说服,几乎等于缴械。学生之中有两个身材很高的同学,其中一个是高师的学生名叫匡日休,他的个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两个窗户底下。我们趁军警不备之际,踩上匡日休的肩

膀，登上窗台把临街的窗户打开跳进去，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的学生蜂拥而入。原来曹汝霖正在同另两个卖国贼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以及日本新闻记者中江丑吉在开会。他们以为有重兵把守，学生不会进来。一见学生拥入，曹、陆二贼从后门溜走，只剩下章宗祥、丁士源和中江丑吉三人在客厅里被包围起来，不得脱身。大家见到章宗祥，以为是曹汝霖，就都上去打，把他打得头脸出血，倒在地上装死。有细心的同学，先切断了电话线，取下客厅里挂的曹汝霖的照片来一对，原来被打的不是曹汝霖，人就散开了。中江丑吉因掩护章宗祥，也被群众痛打一顿。丁士源则乘混乱之际逃出。随后我们来到曹汝霖的卧室，卧室里还有日本女人，由大家保护出去未挨打。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燃起大火，房子也就烧起来了。

学生和市民被捕

由于丁士源逃出求救，半小时后，军阀政府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李长泰率领大队军警赶到，用武力把群众驱散。我们这时正在要整队出去，军警说我们杀人放火，随即开始捕人。大批的人都早已撤离，剩下我们少数想维持秩序整队而行的同学，被他们逮捕了。我和易克嶷被捕后，他们故意侮辱我们，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在前门内公安街，当年叫户部街）。记得在板车上，易克嶷还在说：“20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这时已经是午后5时了，陆续到监狱来的有各校学生31人，市民1人，共32人。此外，还有北大学生郭钦光。他是预科一年级学生，广东海南岛文昌县人，患有肺病，游行前劝他不要去，他不听，因游行劳累又受军警的追打，第二天死于北大宿舍。郭钦光之死，引起北京学生的总罢课，表示严重抗议，并通告上海、天津、

广东各地于5月9日与北京同时召开郭钦光烈士追悼大会，以激励国人展开反军阀的运动。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郭钦光的家属未能参加追悼会。我们遂由学生会筹募了一笔抚恤金，寄给了他的家里。我们32人被囚禁在步军统领衙门的一间监房里，极其拥挤肮脏，只有一个大炕，东西两边各摆着一个大尿桶，臭气满屋。每半小时还要听他们的命令抬一下头，翻一个身，以证明“犯人”还活着。到中午“放风”才能大便，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看守的人每天提一桶开水，每人发一个大窝头。当晚我极为愤怒，口占了两首诗以表心意：

(一)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

(二)

山东我国土，寸草何能让？工农兵学商，人民四万万。
为何寡欺众，散沙无力量；团结今日始，一往无前千。

这天因劳累顾不得吃喝也就睡了。对看守牢房的，我们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他对我们的态度较好。最令人气恼的是那个狱吏，我们当时编了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牢头来训话。”这个军阀官僚卖国贼的忠实走狗，每天在我们放风之后，要来训一次话，讲些服从长官、不许扰乱社会秩序等等的话。我们听了既好气又好笑，气的是他浅薄无知，笑的是他那副奴才相。而看守牢房的狱卒则不然，他接受我们的说服教育，很同情我们，有时还把外边的情况偷偷告诉我们。

五四运动如火燎原

从狱卒的讲话中和以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在五四的第二天北京的全体学生都发动起来了，清华学堂的学生（年龄都不大）从

城外赶来参加,共同商量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北京女高师学生因校长陈宝泉顽固,不准她们游行,五四当晚全体都聚在步军统领衙门门口吵闹,要进来一同坐牢。这时北大的学生救国会也改为北大学生会。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二院。“学联”的名词,从这一天起就开始存在了。“学联”开会,经常出席的各校代表计有:北大的黄日葵、段锡朋、许德珩、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陈宝畴等(轮流出席);清华的罗隆基、陆梅增;法专的祁大鹏;俄专的瞿秋白;汇文的瞿世英;工专的夏秀峰;高师的熊梦飞;高师附中的赵世炎;农专的顾文萃;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五四运动如火燎原般地发展起来了。

北洋军阀对五四游行示威的处理意见和办法,分为死硬和怀柔两派: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后台的段祺瑞和王怀庆等,主张严厉镇压,并主张以屠杀政策来对付示威的民众,准备严办被捕学生,以儆效尤;另一派徐世昌、冯国璋等则认为民众力量不可轻视,且有燎原扩大之势,如果政府再加以高压屠杀,恰如火上加油,恐怕运动扩大起来,更不好收拾,因此主张采取怀柔政策,释放被捕学生,责成各校严加管束,借以缓和民众的愤慨情绪。两派意见貌似冲突,实则都是要消灭学生爱国运动,不过对于民众力量估计不同而已,所以提的对策有所区别。

被捕学生的全部释放

5月5日,当时北京军阀政府曾令司法部和教育部“查明肇祸诸人,依法讯办”,并命军警“维持地方秩序,严防学生扰乱”。又令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大卖国贼,说他们三人“公忠体国,有裨大局”。可见学生爱国有罪,军阀官僚卖国则“有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大局”,这是从段祺瑞到蒋介石等统治阶级的一贯逻辑。

但另一方面,由于五四运动的正义性,不仅青年学生热烈参加,并且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社会名流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到民社党的林长民,都通电呼吁学生无罪。自从学生被捕后,政局一直严重,而临时国会的参众两院在广州的议员,且有趁此倒阁之势。段祺瑞亲日派势单力薄,若坚持镇压学生,势将引起更大的风潮,而导致全部的失败。在此形势下,他们于5月7日将被捕的31名学生和1名市民全部释放了。

我们是在5月7日上午11时许被释放的。北大全体学生都在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上等候我们的归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借来了三辆小汽车,我们就是分别坐着这三辆小汽车回来的。广场各放着五张方桌,我们被捕的北大同学大约十二三人,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学们见面。蔡校长也在场。大家的情绪都万分激动,被捕同学没有一人说话,蔡元培校长讲了几句安慰并勉励的话,大家激动得热泪交流。有人说:“还是快去休息一下罢!”我们从桌上跳下来,走到红楼返回各自的宿舍,接着就参加《五七周刊》的发行工作去了。因为5月7日是北洋军阀签订二十一条条约的国耻纪念日。

蔡元培校长被迫辞职

学生释放后,斗争并没有结束,第一,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并没有不签字的表示;第二,曹汝霖以学生烧了他的房子,打了他们,向为首的学生起诉,要求赔偿损失;第三,尤其紧要的,段祺瑞指使安福系阁员提出整顿学风,进行反扑。首先就是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派胡仁源代北大校长。蔡果然于学生出狱的第三天被迫辞职,出京时留了一封信,说:“‘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迄可少休。’我愿少休矣!”当时我们正在举行郭钦光的追悼会,一看见这封信,心情沉重。对这个谜一般的声明,大家揣测

纷纭,后来蔡解释说是讽刺当局的。蔡元培校长一走,胡仁源的任命,加上曹汝霖的反攻,对学生运动如同火上添油。学生们于“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收回山东权利”之外,又加上了“蔡校长复职,反对胡仁源来校”这一强烈要求了。9日,北大学生议决“停课待罪”,表示坚决挽留蔡校长。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继蔡元培之后,也都全体提出辞职。我们被释放的当天就出版了《五七周刊》,并在街头出售。北京各校学生都组成了宣传小组,分别作街头讲演,与军警几乎是短兵相接。他们又开始捕人。学生一面讲演,警察一面捕人,讲的愈多,捕的愈众。

继五四之后的斗争——罢课

关于曹汝霖卖国集团所提出的对为首滋事学生“依法制裁”的问题,参加五四游行的全体学生于5月13日联名上书检察厅说:如爱国有罪,人人愿意自首,不能由少数同学负责;如果法院票传学生,愿意集体受传,少数同学决不出庭。这一表示使北京政府按照“法律”手续处理学潮的企图终于破灭。17日,北京中等以上13校学生,以政府镇压爱国运动,集会议决自19日起再行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一)向巴黎和会我国代表表示坚决拒绝山东问题签字;(二)惩办卖国贼曹、章、陆;(三)挽留傅增湘(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四)维持上海和议等四条。19日,北京学联宣布中等以上学校全体罢课,并发出罢课宣言。这是继五四游行之后,北京学生对卖国集团所进行的又一次斗争。北京军阀政府指学生此种行动为“纠众滋事、扰及治安”,限令三天之内一律上课。学生表示拒绝,各校代表在北大三院开会,商讨对策,被军警重重包围。会议决定扩大运动,推出代表许德珩、黄日葵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呼吁援助,扩大声势。因三院会场被包围,我们就跳墙出来,化装出京。北京学生会发出宣言,大意说:外交紧急,国贼未除,日

本逮捕中国留学生，政府毫无表示，反而禁止学生游行示威，拘捕和杀害爱国同胞，故一致罢课，表示抗议，希望全国同胞采取一致行动。

我们赴天津、济南、南京等处宣传，最后到达上海，各地都成立了学生会，上海的学生会也已经成立。5月31日在西门外体育场召开大会，要北京代表作报告，报告后游行，并成立了各马路联络会，以南洋商业专门学校为会址，各地方来上海的学生代表即居住食宿于此。先后来上海的学生代表百余人，加上上海的学生、留日归国学生，人数就更多了，势力也更大了。但是我们反对的主要对象只是日本军阀，在上海只把外滩公园侮辱中国人民的“狗与华人不许入内”的牌子拔掉打碎了。这时开会提出的口号仍是：(一)严惩卖国贼；(二)收复山东和青岛的主权；(三)释放被捕学生并向学生道歉；(四)恢复北大校长蔡元培职务等较低的要求。

六三运动的爆发

北京军阀政府对学生继续采取严厉镇压手段，学生仍然坚强不屈，运动日益扩大。在众志成城的气氛下，北京学生决定从6月3日起，所有出发讲演的学生都挺起胸膛，放大声音，站在通衢大道上堂堂皇皇地举行讲演。如果军警来捕，就让他们逮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体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出发讲演。如果第二天发生同样情形，第三天再加上一倍，直到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2.5万人全体被捕而止。6月1日至3日间，北京被捕的学生达两三千人，监狱容纳不下，竟把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4日，学生用加倍的人数出发，军警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逮捕，当天被捕者竟达700余人。北大三院也收容不下，只得又把理科作为临时监狱的扩充部分。北京学生示威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天津学生首先响应，接着南京、上海、武汉、浙江、山西、湖南、福建、两广等处

学生,也都纷纷起来响应。6月3日,上海各界举行民众大会,号召全国罢工罢市来援助学生。上海自来水公司也罢工,弄得全市没有水用。这样,五四运动就从知识分子的范围,扩大到工商各界都来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5日,北京军阀政府在全国各方面的强烈抗议下,再加上上海罢市的消息传来,只得改变方针,下令撤退北大军警,释放被捕学生。这时,学生中有提议组织学生政府者。经考虑,学生内部的思想不一致,恐因此引起同情者的不同情,反而不好。民族资本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捐款10万两银子,给我们作活动费,被我们退回了;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也给我们10多万元的巨款,我们也立即退回。从此规定,学生会不接受任何人的捐款,以示纯洁。

全国学联的诞生

全国各大城市罢工、罢市之举,这是中国从来没有的事。国家已进入混乱状态,而北洋军阀内部也互相倾轧,段祺瑞政府也感到事态严重,被迫于6月10日下令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京津学生万余人包围怀仁堂总统府。当时北京军阀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在群众威力之下,不得不去电巴黎,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字,同时让北大校长蔡元培复职。但学生对北京军阀政府的让步并不满意,因此进一步要求段祺瑞辞职,要求向全国学生道歉。上海这时已成为政治中心。6月16日先拟在寰球中国学生会召开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后因寰球学生会负责人朱少屏面有难色,我们遂改在大东旅馆六层楼召开,各地学联代表30余单位,及来宾黄炎培等共数百人参加,选出执行委员会、评议委员会及日刊编辑委员会。这样,全国学生联合会就诞生了。是日,孙中山先生被邀请未到,改于次日在寰球学生会讲

演。^①9月初,各学校开学,北大校长蔡元培也答应返校复职。全国学联选出7人组成的理事会继续进行学生运动。理事会设在上海。这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三、五四运动以后

大批青年向往十月革命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虽然表示了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使亲日卖国的安福系政权遭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整个政治局面依然为黑暗势力所笼罩,北洋军阀集团仍旧是北京反动政府的骨干,人民依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社会究竟怎么办?“中国往何处去”这一问题,也就提到了每一个爱国青年的面前。大批青年向往俄国的十月革命,认识到解决中国问题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这时,北京大学有人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我在未出国之前也曾参加过一次这个小组会。后来,在北京、上海等地就陆续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起初不过是学术研究性质,但是当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时候,它便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指导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了。五四运动是以进步学生发端的群众运动,五四运动中建设中国的重要口号是“科学”与“民主”。我们是要建设科学的新中国,更要建设民主的新中国,因之科学思想的指导,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群众运动的实践,则日益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科学思想和民主思想相结合的结果,涌现出大批突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也唤醒了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五四运动一经结束,在这些具有革命觉悟的知识分子中就分

^① 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载:1919年10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表《救国之急务》的演说。

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留在国内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如毛泽东、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等，他们都是在国内坚持深入地研究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在他们的引导和组织下，无数爱国青年团结起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则是大批爱国的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分赴法国、德国、比利时勤工俭学，进一步寻求革命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他们当中的好多人后来又去苏联学习深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赴法勤工俭学

这里有必要着重叙述一下勤工俭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帝国主义曾在中国招募了10几万人去作战争勤务。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谓的招募“华工”。此事由当时段祺瑞政府财政部部长梁士诒的惠民公司经手，梁因此发了大财。这时在法国留学的吴玉章和蔡元培等人，深知此事，他们就创办了一个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并组织华法教育会派送学生出国留学。他们回国后，便在北京、上海等地宣传勤工俭学的主张，号召青年到法国用“半工半读”的方法求学。

十月革命以后，“劳工神圣”思想已为我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景仰。但当时不可能直接到苏联留学，东欧德、奥、捷各国无产阶级又正在进行革命，因此到靠近革命高潮地区的法国去。这种既做了工，又可求得学问的勤工俭学办法，对一般有志青年自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918年至1920年间，毛泽东热心帮助人们到国外去勤工俭学。当时全国各地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约有1000多人，而以湖南和四川两省青年最为踊跃。特别引起社会震动的，便是在教育

界工作了一二十年的已经 43 岁的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和年已 50 多岁的蔡母(蔡和森、蔡畅的母亲),也到法国“半工半读”当“老学生”。

我是在 1919 年 12 月赴法勤工俭学的。当时由北京华法教育会给了我一张赴法勤工俭学的四等舱船票,国史馆元史编译部送了我 400 元稿费离京赴法。离京前数日,天津学生会开展驱逐军阀曹锐运动,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来京请愿。北京学生会要我接待天津代表团,我从这时开始认识周恩来。我离京后,回到家乡看望老母,伴随她住了两天,即往上海乘船赴法。12 月 15 日启程,船行一个月,1920 年 1 月 15 日抵达马赛。

无妨简略地说一下这一个月的旅途生活。勤工俭学生坐的一律都是四等舱,四等舱无一定的铺位。上船之初,茶房就逐一点名,报到后,他发给每人一个洋磁铁盘子、一个洋磁铁碗、一副刀叉,作为吃饭的用具。叮咛大家要好自保存,丢了不补发。由于没有固定铺位,就把我们安置在船的顶篷一个角落里。同行约 30 多人,大家组织起来,将所带的行李中油布一类东西联扎起来,以蔽风雨。哪晓得海上的狂风巨浪来势之猛,非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有时夜睡正浓,突然间一个巨浪从头上浇来,衣被尽为湿透。好在船离海防以后,一直到地中海岸,都是在热带中航行,衣被湿了,易为海风吹干。每顿饭都要等头、二、三等舱客人吃完,才呼唤四等舱客人持盘碗到厨房前小窗口来领。每人给一块面包、一瓢汤,有时给一点剩菜。我们大家苦笑着说:“这真正是‘要饭’了。”不过,想起徐特立与蔡母偌大年纪都从这种生活过来了,所以大家对此景况也就不谈了,并认为这对我们也是个很好的锻炼。

船抵马赛,就有华法教育会的人在等候迎接,经其介绍法国的一般情况和习惯后,当天即乘火车到一个小城市梅兰 Menan 中学。华法教育会原想把我们留在那里学习法语,但由于此地偏僻,

许多中国人又聚在一起,于学习法文法语很不方便。我在梅兰住了两天,便一个人到了巴黎。在巴黎看到了许多熟友,于是在巴黎第五区离巴黎大学不远的一条街,名叫“多利也饭店”(Hotel de Toliye)里面找到了一间小房子,房租每月 70 法郎(合当时中国银元 6 块钱)。饭店的主人告诉我,列宁流亡在法国时曾在这里住过一年多,我听了引为荣幸。我来巴黎不到两天,在蒙达尔尼(Mondargie)居住的蔡和森等知道了,遂来信约我去他们那里报告国内时事。我次日即赴蒙达尔尼,拜见了徐特立老人和蔡母,还见到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陈毅、李隆郅(立三)、熊季光、郭名忠(春涛)、李富春等 30 多人。我住了一晚,报告了一个月前国内的形势。在一天多的聚谈中,看到他们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那样的刻苦学习,使我这个初到法国的人深受感动和鼓舞,同时也感到国内自己人聚在一起太多了,对于学习法语会有妨碍。次日,我即转回巴黎。

那时,国内陆续来的人更多了。当年 6 月,赵世炎等也到了巴黎。以后,周恩来也来到法国。他们的到来不仅把在法国的学生组织起来,并且把在比国的聂荣臻、何长工、刘伯坚等,在德国的朱德、孙炳文、邢西萍(徐冰)等也都联络组织起来了。从 1 月到暑假我在巴黎居住,半年的时间里,很多到巴黎的人都来找我,终日人来人往,应接不暇,从而使我无法解决法文法语的学习问题。从 1918 年春留日学生归国到五四运动期间,我一直从事救国运动,学业荒芜已两年有余,又想到在蒙达尔尼的朋友们努力攻关的精神,促使我下决心离开巴黎,到法国南方名叫地雄 Dijon 的城市居住,这是我解决法文法语问题的绝好的地方。我在这里一直住到 1922 年冬,约两年半的时间。

资产阶级资送学生出洋

在赴欧勤工俭学学生之外,还应当提一下当时国内资产阶级资送学生出洋留学的情况:

第一,北京大学用重资派送学生赴美留学。1919年下半年,在蒋梦麟的活动下,北京大学当局接受了学生会曾经拒绝的穆藕初捐助的10多万元,经过胡适的精心策划,用这笔钱资送了5个学生留美。他们是: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汪敬熙。当时教育界人士讥之为“五大臣出洋”。从此,这些人除康白情消极无为外,其余的都为政府所罗致。其中最为明显的如段锡朋,回国以后甘心依附蒋介石。蒋介石向共产党发动第一次“围剿”时,段锡朋与程天放(五四时上海复旦代表)组织反共的“AB团”,正面与人民为敌。

第二,各省也都利用庚子赔款为基金,仿效北大选送“五大臣出洋”的办法,选派学生到欧美留学。如山东省,由于胡适的关系,选派北大的傅斯年、杨振声、何思源、徐彦之、赵太侔等人留学英美。其他各省也大都以此选派留学生。

第三,研究系的林长民、梁启超也选送了10多人分赴欧美、苏联留学,为其政治集团培植私人。我还记得赴英的有刘秉麟、陈博生,赴法的有刘文岛、毛以亨,赴德的有宗白华、魏嗣鸾(时珍)等人,赴美的有张闻天,赴苏的有瞿秋白、耿济之。

第四,最为严重的是吴稚晖和褚民谊在法国办的所谓海外中国大学(即里昂中国大学)。本来里昂中国大学创办时,我国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已经很多,有的已经来法国一两年以上,很可以在其中挑选学生入学,不必在国内另招学生。即使要在国内招生,已经在法的勤工俭学学生亦应同时入学。谁知吴稚晖等别有用心,竟然勾结法国军警将已经进驻里昂中国大学的1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

押解到马赛，船送回国。此次押解回国的有蔡和森、陈毅等 108 人，其中 1 人中途投海而死。向警予不久也回国了。勤工俭学生回国后几乎都参加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的成为中国革命杰出的领导人。而吴稚晖在里昂中国大学培养的学生以后纷纷成了国民党政权中的骨干分子。

勤工俭学生中的光辉榜样

在勤工俭学生当中，最值得令人怀念的是周恩来。从 1920 年 11 月到 1924 年暑假，在将近 4 年的旅欧期间，周恩来为革命往来于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莫斯科之间，不仅成为一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周恩来领导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为进驻里昂中国大学，同吴稚晖、陈篆（中国驻法公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记得李和林同学为此事曾气愤地痛打了陈篆。周恩来经常在巴黎近郊的大学城、工厂区、华工区、勤工俭学生集中地的小咖啡馆里演说。他每次富有说服力的感人的演说，都传遍巴黎每个华工区与勤工俭学生集中地，争取了进步人士。记得有一次，我在里昂中国大学附近的一个中国饭馆里，就听过周恩来的讲演。还有一次在巴黎的哲人厅听过他就临城匪案（孙美瑤劫车事件）所作的讲演，十分精辟深刻。

留法勤工俭学生中主要的人物还有：蔡和森、向警予、陈毅、邓小平、赵世炎、陈乔年、王若飞、李富春等人；在德国的先后有：朱德、孙炳文、邢西萍（徐冰）等人；在比国的有：聂荣臻、何长工等人。1921 年，一批革命青年经过了重重困难，到苏联学习去了。从 1923 年开始，在周恩来的选送下，旅欧的勤工俭学生中大批人去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这些人回国之后，绝大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最重要的骨干。他们忠诚于党的事业，有的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人则一直担任着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成为

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鞠躬尽瘁,为党的事业贡献了一生;有的人至今仍然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任,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夜以继日地操劳。这些人回国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全国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结合,艰苦奋斗,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对内对外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与资产阶级政客资送的“五大臣出洋”,以及里昂中国大学所教育出来的学生真是有着天壤之别。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罗章龙

我是1918年暑假的时候,跟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一些会员,从湖南到北京,一路共20多人。

1918年的下半年,第一批勤工俭学的学生放洋到法国去,蔡和森就是这批走的。勤工俭学告一段落后,毛泽东则留下,在北大工作。我在北大上学,是文科预科的学生。

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时,参加了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当时毛泽东通过杨昌济先生的关系,认识了蔡元培、李大钊先生及其他一些教授。在同学中,我这时认识的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一些人。

毛泽东积极参加了北大的一些学会工作,如哲学会、进德会、新闻学会等。这些学会在当时来讲,也是空前的。

蔡元培很想把北大从旧式学校变成一所新型的学校,所以组织和赞助一些学会的成立。毛泽东参加了这些活动。关于这些活动,当时报纸多有记载。《北大日刊》上还刊登有名单。学会中有进步教师参加,如李大钊就是其中之一,他一度是北大校长办公室

* 1978年秋,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就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邀请罗章龙教授座谈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本文即是经本人审阅过的有关五四运动的座谈记录。

的秘书,长期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学会的领导人,在当年,思想都是比较开明、进步的。这些学会中的不少成员,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或共青团。

哲学会的领导人是蔡元培先生自己。蔡先生刚到北大时,还组织了一个进德会,提倡不做官、不纳妾、不赌不嫖,想把北大腐败风气革掉。为了提倡新生活,进步职员李辛白办了一个《新生活周刊》。

新闻学会领导人是邵飘萍,又名邵振青,浙江金华人。他是北方新闻界最早和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的,后来成为共产党员。邵因宣传“赤化”,1926年4月26日被奉系军阀枪杀了。

杨怀中先生参加了哲学会,可以说他也是意识形态的启蒙者。

当时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主办《新青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写了很多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

北大原是很落后的,是封建礼教、孔孟思想等等的集中地。这些学会组织起来,对旧北大是一种冲击,是一种革新。

不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时,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共青团也没有,但后来的党团员中,有许多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

在关于五四运动的书中,我看过一本日文书《昭和八年年鉴》,书上写道,五四运动的指导者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书附有年表,我认为他的话是有根据的。

参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酝酿、筹备、组织的经过历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在五四前夕已形成一种组织力量,这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前身。由他们从思想上,同时也从组织上

领导和发动了五四运动。

首先从思想上说吧。1917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东方，引起北京青年和学术、思想界的震动。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经过了一年半时间。这个思想在中国汹涌澎湃，不可抵抗，犹如江河决口，沛然莫御！因此爆发五四运动是不难理解的。

从青年界的革命思想转化到革命行动方面，就当时领导五四运动的核心组织的历史事实来说，以前还没有见到可靠的文献记载。我当时是北大预科二年级的学生。五四运动的大学生中心力量不在高年级，他们是应届毕业生，多忙于论文考试和就业问题。所以学生会中坚力量都在一二年级。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还没有正式的全校学生会，但各班、各系、各院都有学生会组织存在，班有班会，系有系学生会，院有院学生会。这些组织虽然不十分严密，但其中文学院、理学院的组织情况比较整齐、坚强一些。除此之外，国立八校如高师、工专、医专、法政、俄文专修科、法文专修科、农科等都有一系列的学生组织。有的带有浓厚的政治性，例如当时的工读互助团、曦园，还有同乡会、辅社等。有些同乡会在政治活动中是很有力量的。这些组织以北大为中心，在议论当时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和各种活动中，渐渐形成了一个核心。起初虽然人数并不很多，但具有代表性，他们具有组织力量，可以发动各校的运动。他们中间各省的人都有，也有少数民族和女同学，分属于国立八校，起初十余人，后增加到二三十人。他们形成一个小组。小组主要成员为：纵宇（罗章龙）、弥耕（李梅羹）、无坚、庚甫（易克巖）、海潮（罗汉）、互孙（匡互生）、隐沧（张隐沧）、树荣（张树荣）、德荣（陈德荣）、天放（宋天放）、雨溟（吴汝铭）、澄宇（刘澄宇）、百英（缪伯英，女）等。但没有正式的委员会或书记，对外也没有名称。小组的人常常碰头议论些当前的重大政治问题，平时则分散到各校学生会各团体中活动，有事就集中，推定临时负责人纵宇、

庚甫、海潮等研究方略。

青岛事件发生,巴黎噩耗传来,广大学生群众非常愤慨。小组成员曾集中在高师讨论这个问题。议论一番后,大家认为静等政府制裁卖国贼是没有希望的。必须发挥国民外交作用,采用民众的力量来制裁。于是,当场就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并一致认为,一般的搞搞游行,想达到政府罢免曹、章、陆是根本不可能的。要采取暴力的行动,制裁卖国贼,才能达到收回胶济铁路的目的。为了有效地推动运动,我们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推定了负责人互孙、海潮、纵宇等具体部署工作。这个小组成员以国立八校为主。小组行动方案决定后,个个奋勇当先,斗志昂扬。

经小组研究,确定天放、雨溟等人去探查卖国贼的住宅,查明行动的门路、进出的路线。庚甫、澄宇等人则想办法认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的面貌。为了认识曹、陆、章等人,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北京有个廊房头条胡同,是几家照相馆的集中地,当时政府的一些官员为了显耀自己,将各人的照片都陈列出来,我们就到照相馆去对认。这些准备工作都是事先完成的。

到了5月1、2日,最先是北京大学内部从下而上地进行了动员,学生组织主要掌握在中年级学生手里。我们就从班到系,从系到院一层层地推上去。决定在天安门召开大会,联络八校共同行动。行动小组在大会举行前一天安排了几个工作:第一,控制主席台,掌握大会方向,派一个组员去掌握喇叭筒。第二,控制几个大学前排带队掌旗的,我们派人到队列的前排打旗(过去游行是由校警掌旗的,这次由我们自行掌旗)。第三,组织交通队和口号队,口号队分为国语和英语的,标语、传单也分中西两种文字,目的是让外国人也懂得大会的意义。第四,预防可能发生冲突时的救护准备。

五四那天,在天安门开大会时,我们果真掌握了主席团,当时虞甫等是主席团成员,拿到了传声筒,大会记录等等都掌握在手了。

我们在大会进行了宣传鼓动以后,群情激奋,接着就宣布出发游行。游行开始时没有公布详细路线,按过去的习惯,游行是在东西长安街、东单、西单、前门一带。这次游行群众跟随校旗浩浩荡荡呼口号前进,出发时有人提议到使馆界去。除了小组外,谁也不知道这次游行主要去打赵家楼。队伍最终带到东城猪市北边的一个较大的胡同(赵家楼就在这里)。领队的人见胡同里外已有了军警的队伍,铁门紧闭,没法打开。我们临时决定走后门进去,但经研究又觉不行,怕调动中让队伍走散了,最后决定派几个人搭人梯从事先探明的窗子里爬进去。我们陆续爬进去一二十人。其中有互孙、纵宇、海潮、无坚等,进去时见院子里有一排军警,都上了刺刀。此时门外一片喊口号声,有的用砖头砸门,其势甚为汹涌。警察没有得到上面的命令不敢擅自开枪。我们进去的人有的给警察作解释,宣传爱国反日,尽量地把我们的行动说得温和些,乘其不备,其余的人将大铁门打开了,人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当时曹汝霖不在,有同学首先发现了章宗祥,一涌而上,痛打了一顿。我们事先已约定,不要打死人,因为打死了人就不好办了;不准侵犯妇女;不准乘机抢掠财物,这些群众都自觉做到了。章宗祥被打时,有一个日本人扑在章的身上连声喊叫:“不要打了。”还有一个时髦年轻的女子吓得了不得,大家叫她离开,护送她到另外一个地方暂避。后来有的同学首先将屋子里一些易燃物和挂画都扯下,集中起来点火烧了。火一起,外面的军警就包围进来了。小组决定开始撤退,有些负责掩护的同学被捕了,大部分是核心小组的人(虞甫、雨溟等)。

这次行动在社会上立即产生了效果,卖国贼的气焰低落下去

了,政府也着了慌。徐世昌害怕自己的总统做不成,赶紧出来调解。我们运动的目的基本上都达到了。第二次大批抓去的人全部都关在北大第三院,号称文治派的徐世昌不主张杀人,关的人随后也都陆续释放了。段祺瑞的一个参谋长徐树铮则主张镇压学生运动,他要将在景山上对准北大,扬言要将北大轰平。后来全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六三运动,北洋军阀政府才软化了。

这次行动的效果,一是卖国政府公开声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二是发动了全国性的运动。值得一提的是,长辛店的铁路工人所组织的“救国十人团”,也到北京参加了学生运动。

我们小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北方小组成员、青年团的骨干。这次运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革命的演习,也是很好的锻炼。对革命思想与实践都有所提高。

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我记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早发起的那 19 个成员,大都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且是运动中的中坚分子。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酝酿组织有一个过程,在 1921 年 11 月 7 日才公开。这 19 个人都是北大的学生,我把他们的情况简单地讲一下:

高崇焕:直隶人,北大法学院法律系学生;王有德:云南人,德文班学生;邓中夏:湖南人,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吴汝明:湖南人,法学院学生,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的教师;罗章龙:文学院本科一年级学生;黄绍谷:湖南人,文学院学生;王复生:云南人,法文班学生;黄日葵:广西人,中文系学生;李骏:湖北人,英文系学生;杨人杞:湖南人,文学院学生;李梅羹:湖南浏阳人,德文班学生;吴淞沧:浙江人,中文班学生;刘仁静:物理系学生;范鸿劼:湖北人,英文系学生;宋天放:文学院学生;高尚德:山西人,英文系学生;何孟

雄：湖南人；朱务善：法学院学生；范齐韩：法学院学生。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于1920年3月开始酝酿组成。有一次，上述19个人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了一个会。大家谈来谈去，不少人想把组织公开出来，有人反对，认为若公开，问题还很多。但是最后还是决定在北大校刊上登一个启事，把牌子打出去。启事是我写的，写好了以后，由我和另一个同志去找蔡元培先生，要他同意把启事刊登在《北大日刊》上。我向蔡元培宣传一番我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道理。蔡看了一下启事和名单，沉默了一会，最后同意登了。为了公开招收会员，启事上登有联系通讯处，第一院是王有德，西斋是我。

蔡先生是浙江绍兴人，他周围的师爷们很有谋略，很能办事，但很顽固、保守。我们找蔡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这件事，就没让他的师爷们知道。等到《北大日刊》将启事登出来以后，这些师爷们对蔡说：“今后学校不得太平了。”以后，我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想在北大会议厅开一个成立会，因蔡上次已经批准我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成立，并在《北大日刊》上登了启事，所以这次他不能翻悔，答应我们在北大会议室开成立大会。同时，蔡还应我们的邀请，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了几句话。开完成立会后，我们还拍了一张照片。这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正式成立了。成立以后，我们要活动，没有地方，于是又去找蔡要房子，他同意给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馆。办这些事并不是很顺利的，因为蔡元培左右的人反对我们，公开同我们作对，不肯拨房子给我们，认为这样做，学校会不太平。而蔡元培先生则对他们说：“给他们房子，把他们安置好，学校才会太平。”所以，从这件事情上讲，蔡元培先生当时确实很有勇气。

研究会有了办公室、图书馆。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小室），我们的图书上都盖有“亢慕义斋”戳记

(现在北大还保存有亢慕义斋戳记的图书)。研究会成立后,我们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翻译出版马克思学说有关的书籍。

研究会的活动时间是比较长的。第一次开会时,我们的会员只有四五十人,后又大量征求会员,北京国立八校和北京以外的,也可以通信加入,还征求了工厂方面的同志参加。我记得第一次统计时,有会员 118 人。那时我们还注意在工人中发展会员,其中工人就有 23 人,即:李宝成(津浦路工人)、梁鹏万(京奉路工人)、邓培(京奉路工人)、史文彬(京汉路工人)、张太清(京绥路工人)、姚佑唐(津浦路工人)、王壁(徐州铁路工人)、许鸿儒(津浦路工人)、葛树贵(长辛店工人)、王荷波(浦镇工人)、沈干城(沪杭路工人)、孙云鹏(正太路工人)、孙津川(沪宁路工人)、李青山(胶济路工人)等;主要是长辛店、唐山、石家庄、郑州等大厂的工人。第二次又扩大到二三百人。这个会开始是我负责,后来我离开北京,就交给北方区委了。这个会活动时间达七八年之久。在现存文件中,有初期成立时的文件,其中也有反映该会派人到唐山去组织工会,援助唐山开滦五矿工人罢工的情况。

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以后,搞工会需要人,就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找人。这个研究会为革命输送了百把人,培养了一批干部。另外,翻译了一二十本书,有的出版,有的没有出版。如《共产党宣言》是从德文译出来的,有油印本。那时,我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译出的书,有康慕尼斯特丛书、列宁丛书、马克思全书。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设立了一个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与法文三组。我们这个组有七八个人是学习德文的,我们曾译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 1920 年到北京时,大概已有一个《共产党宣言》的油印本子了。我记得《共产党宣言》很难翻,译出的文字不易传神,所以进度很慢。如《共产党宣言》中,第一句话,“有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大家就议论说,“幽灵”这两

个字不太好,但又没有办法,最后还是不能解决。有个同志说,直译,然后把意思作一个说明。在那时,我们认为“幽灵”是一个贬义词,在德文中“幽灵”这个词的原意是“鬼怪”,“徘徊”也认为不好,没有指出方向。所以后来加说明,“欧洲那时有一股思潮,像洪水在欧洲泛滥,这就是共产主义”。这样的说明,大约有七八处之多。

研究会一面组织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一面组织会员搞翻译,同时还组织讲演活动。李大钊常常参加讲演活动。李大钊还编了一本油印讲义《唯物史观》。马克思研究会成立以后,他就开始讲。他的英文、日文都很好,能用日语讲话,能看英文书,他作了多次讲演,如《唯物史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等。他还号召我们翻译《资本论》。我们大家觉得很难,啃不动,我们请德文老师帮着讲。德文老师也说:我认得文字,但不懂得意思。但我们还是坚持啃下去,曾译了《资本论》的第一卷。我们当时是硬啃,实在不懂的地方,就把困难绕过去。后来我们把《资本论》第一卷译稿交给了一个教经济学的老师,名叫陈启修。他说日本人译的《资本论》,有些地方译得不是很合适,再从日本文译成汉文,更走神了。那时我们要结束这项工作,就由这位老师参照我们的本子,直接从德文译了出来,当时也印出来了,但不流行,这个本子在王亚南本子之前。

蔡元培先前留学德国,是学习美学教育的。他是中国第一个学习美学教育的。他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他认为宗教是个偶像。如果一个人崇拜偶像(宗教),那这个人的思想就受到阻塞。他说,提倡美育,翻阅古代的书画雕塑,人们的思想就会超脱,所以用不着宗教,如耶稣教就用不着。所以蔡是积极主张反宗教的。他找我们给他做帮手,帮他记录,整理讲美学的稿子。他说我们记录得好,能表达意思。蔡对反宗教运动的意义谈得很深奥,而我们反宗教,政治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合作得很好。

我们成立非宗教同盟时,请蔡元培参加,他同意了。我们出了一本《非宗教论》丛书,写文章的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吴虞、李石曾、萧子昇、周太玄、朱执信、罗章龙等,共写了 31 篇文章。这样就出了一部内容充实的批判宗教的文集。正当准备出此书时,萧子昇从法国回来了,向我说愿参加我们的非宗教同盟,他还找了李石曾、汪精卫一块儿来参加。这本论文集出来了,它是反映当时思想战线上的重要革命文献。

后来,我们又组织了反基督教同盟,这个同盟参加的人,除北京大学外,还包括清华大学的。梁启超当时是清华大学的教师,他给我们扣帽子,说:“宗教信仰有自由。”那时他在清华大学有讲座,和我们作对。北大、清华中有不少人赞成、同情反基督教同盟。后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织了共产党支部。

后来又组织了民权运动大同盟,是邓中夏参加组织的,学生有几百人,工人也不少。民权运动大同盟主要负责人有邓飞黄、郭春涛、李国喧等 30 人。除了上述活动外,我们还组织了工人运动。那时我们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发现工人中天主教的思想很盛行,我们就组织工会,吸收反宗教的工人参加我们的工会。再一个就是搞平民教育,张国焘也参加了这一活动。

再一个,我们还组织了妇女协会,是与党团组织同时并列的。开放吸收女学生最早的是北京大学,女学生先来校旁听,北大采取默认态度。1920 年左右各学校才先后正式招收女生。缪伯英是共产党员,妇女组织是她主持的。

(1978 年 9 月)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罗家伦

以一个大学来转移一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子民时代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最初是京师大学堂,里面分进士馆、仕学馆、医学馆等,无一馆的学生不是官气十足的。据最初一班的人说:差不多一个学生要用一个听差,上课的时候,有听差来通知“老爷上课了!”于是这些学生老爷,才由鸦片床上爬起来,睡眼朦胧地带着一个听差到课堂去。医学馆比较多些洋气,但是和进士馆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别而已。等到辛亥革命以后,称为国立北京大学,最初一些做过短期校长的人,对于这个学校,也没有什么改革。到了袁世凯时代,由胡仁源代理校长。胡仁源为人,一切都是不足道,但是听说当时不曾列名于筹安会,上劝进表,倒也算是庸中佼佼者。蔡子民做北京大学校长这件事,是范源濂发动的,因为他对于蔡子民极其推重,同时国民党的人,分为两派,一派是赞成蔡去的,一派是反对蔡去的。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反对派之态度才改变过来。

蔡到北大的一年,适巧是我去进北大的一年,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暮气沉沉,真是腐败极了。教员之中,没有一点学术兴趣的

* 本文原题《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由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本书转载时略有删节。

表现。学生在各部挂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窑子个个都是健将，所以当时北京窑子里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者参议院众议院，一堂者京师大学堂也）。当时蔡初去时，本科分为四科，有四个学长，蔡接事后，重聘四科的学长——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琛、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并决定工科按期结束以后，并入北洋大学，而将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大。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的反对，只是教员也很不高兴。文科方面，则生气较多，胡适之是新从美国回来，章行严也到学堂来教几点钟逻辑。国文方面，则蔡挑了一批章太炎的学生如黄侃（季刚）、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更有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还有一位刘半农，本来是在上海做无聊小说的，后来陈独秀请他到预科教国文。当时大家很看他不上，不过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英文方面，则有辜鸿铭，担任外国诗。从前有几个英国人——英国下等流氓——在里面教英文，蔡到以后，一气把他们辞退了。这件事闹到英国公使馆出来干涉，而蔡不为之动，所以把无聊的外国教员肃清一下，但是以后所添的外国教员，也并不高明，除了一位地质系的葛利普是一位特出的学者，替中国在地质学上打下一个很坚固的基础。理科方面，则有秦汾、何育杰、王烈、王星拱一般人。法科则以官僚任教为多，如余荣昌、张孝箴等都是大理院厅长一流的官。法科一直等到民国9年下半年王世杰、周鲠生等加入北京大学以后才日见起色。最初实在没有什么大的整顿。所谓文化运动的出发点，还是文科。我方才说过，文科的人物，很有趣味，因为蔡对于聘请教授是主张兼容并包的，凡是一种学说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在学术上是说得过去的，他总让他在大学中有机会去发展。所以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急进的陈独秀，都能熔化在一炉，而北京大学遂有百派争鸣之势（蔡之取兼容并包主义，有时候也有太过度的地方。从前有一位

刘少少，做了一部《新改老》，可笑极了，蔡先生也让他北大开一门功课，可笑得很)。各派之中，势力最大，而且最易号召者便是所谓新旧文学两派，当陈独秀没有进北京大学以前，他就上海亚东书局办了一个杂志叫做《青年》，胡适之不过是一个投稿的人，而易白沙这些人，都是这个杂志的主干，胡适之发表《改良中国文学刍议》一文，以八事相号召，此文发表以后，陈独秀就做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其主张较胡适之更为激烈。故“文学革命”四字乃是陈独秀提出来的。胡适之接上又做了一篇《建设新文学革命》。因为胡适之本来于革命二字，有点害怕，所以于文学革命之前面，戴了一个“建设”的帽子。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我曾去看他，他的胆子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适之的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当时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时候，大家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了，而钱玄同更加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所以许多人更目之为怪诞。他们因为要找一个反对的人做骂的对象，所以钱玄同便写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轩”的假名字，这封信是特地用旧派口吻，反对文学革命的，当时刘半农就做了一篇什么连刁刘氏鲜灵芝都包括进去的一封复信，狗血喷头地把这位钱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轩骂一顿。这封信措辞轻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后来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丧。刘半农还有一篇《作揖主义》也是同样的轻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当时新青年社是由六个人轮流编辑的，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他的毛病是聪明远过于学问，所以只宜于做批评社会的文字而不宜于做学术研究的文字。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国第一年的功夫，拼命的在写着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他自己亲手抄了两遍，的确下过一番苦功。但是这是依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作骨干而以中

文写成的，所以写起来比较快，一年就完事了。当时他所做的《建设(新)文学革命论》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做了一些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所谓白话诗，虽然失之于浅薄，但是在过渡的时代里是很适合于一般人口味的。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是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是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他的哥哥钱洵，做过意大利公使的，钱玄同很怕他的哥哥，他在外面一向主张很激的人，然而见到了哥哥却一点也不激烈了。他当时主张废姓主张废汉字，因此大家更觉得这种主张可怕，而更觉得钱玄同是同疯子一样。沈尹默也是一个编辑，但是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会做，但是他常做的白话诗，而胡适之赞赏他的诗做得好，所以也就成为新青年六编辑之一。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之能得简，且没有综括之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为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为一位编辑了。第六位编辑是刘半农，他的地位和工作，我以前已经说过一点了，当时大家对于他不很重视，乃是一种实在情形。以后北京大学派他到法国研究音韵学对于他乃是一种很大的帮助。《新青年》除了六位编辑以外，更有许多投稿的人，如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人也很朴素。周作人是极注意于写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园地》等一类稿件，都是那个时候写成的。鲁迅即周树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当时在教育部做一个科长，还是蔡子民做教育总长时代找他进部的。以后他宦隐

于教育部者多年,这时候也出来打边鼓,做《狂人日记》、《药》等很传诵一时的小说。至于旧派方面,刘师培在学问方面是公认为泰斗的,他赋性柔弱,对于此类问题不去计较。黄季刚则天天诗酒谩骂,在课堂里面不教书,只是骂人,尤其是对于钱玄同,开口便是说玄同是什么东西,他哪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呢?他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主张,见人便提出来骂,他有时在课堂中大声地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这种村夫骂座的话,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学生从而和之,以后遂成为国故派。还有一个人,读书很多,自命不凡并太息痛恨于新文学运动的,便是陈汉章。陈汉章乃是前清一位举人,京师大学堂时代,本要请他来做教习,他因为自己没有得到翰林,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以后可得翰林,故不愿为教师而自愿为学生。他有一个兄弟,乃是一个进士。当年他兄弟中进士时候,要在他家祠堂中央挂一个表,他坚决的反对,他说你的表不能挂在祠堂中央,中央地方要留给我中了翰林时候才可以挂的。哪知道他在当年十二月可以得翰林的,八月间便是辛亥革命,所以到了现在,他到祠堂里面尚不敢抬头仰视。他所读的书确是很多,《十三经注疏》中三礼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个个字背出,他一上讲堂,便写黑板,写完以后一大蓬黑胡子变成白胡子。他博闻强记而不能消化。有一次我问他中国的弹词起于何时?他说,我等一会再告诉你。我问他是上午9时,到11时接到他一封信,上面写了27条都是关于弹词起源的东西,但是没有有一个结论,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记而已。他自负不凡,以为自己了不得,只有黄季刚、刘申叔还可以和他谈谈,这位先生也是当时北大一个特色。还有朱希祖、马叙伦等人,则游移于新旧之间,讲不到什么立场的。从《新青年》出来以后,学生方面,也

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流人,本来中国诗做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最近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马上要辞职)。当时我们除了读书以外实在有一种自由讨论的空气,在那时我们几个人读外国书的风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个人,尤其以喜买外国书。大学的图书馆,对于新书的设备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见面时候,便讨论着自己所读的书籍,而回去的时候便去看书或写信给日本丸善书社去定买外国书。除了早晚在宿舍里面常常争一个不平以外,还有两个地方是我们聚合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如钱玄同等人,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房子),这是一个另外的聚合场所。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3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所以当时大家称二层楼这个房子为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语),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层楼那座房子,则称之为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而在这个房子中则以北方人为主体的。李大钊本人是北方人;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顾亭林批评北方人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是他批评南方人的话。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饱无堂还有一种好处,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时,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之资料。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的人物,虽然以教授为主体,但是

也有许多学生时常光临,至于天天在那里的,恐怕只有我和傅孟真(斯年)两个人,因为我们的新潮社和饱无堂只隔着两个房间。当时学生界的思想也有一个剧烈的变动。最初的北大学生看外国书的很少,到了我们的时候,看外国书的便比较多起来了。傅孟真和我两个人,是每月都要向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代收西书的书店)报效一点款子。傅孟真是抛弃了黄季刚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叛了他的老师来谈文学革命。他的中国文学,很有根柢,尤其是于六朝时代的文学,他从前最喜欢读李义山的诗,后来骂李义山是妖。我说:当时你自己也高兴着李义山的时候呢?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顾颉刚。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间里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还有一位狄君武(膺)是和傅孟真同房子的,但是他一天到晚唧唧唔唔在做中国小品文字,以斗方名士自命。大家群起而骂他,且当面骂他为“赤犬公”(因狄字为火及犬构成),他也无可如何。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可见北大当时各种分子杂居一处的情形及大家有一种学术自由的空气。因为大家谈天的结果,并且因为不甚满意于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当时大家便说:若是我们也来办一个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杂志便应运而产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为 The Renaissance,也可以看见当时大家自命不凡的态度。这个杂志第一期出来以后,忽然大大的风行,初版只印1000份,不到10天要再版了,再版印了3000份,不到一个月又是三版了,三版又印了3000份。以后亚东书局拿去印成合订本又是3000份。以一部学生所做的杂志,陡然有这样大的销数,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最初大家办这个杂志的时候,还抱着好玩的心理,等到社会看重了,销数一多,大家一方面有一种高兴的心理,一方面有一种害怕的心理,因为害怕,所以研究的空气愈加紧张,而《新潮》第二、三、四、五各期从客观方面看来,却比第一期要进步一

些。当时负责编辑的是我和孟真两个，经理人是徐彦之和康白情两个，社员不过 20 多人，其中有顾颉刚、汪敬熙、俞平伯、江绍原、王星拱、周作人、孙伏园、叶绍钧等几位。孟真当时喜欢谈哲学，谈人生观，他还做了几个古书新评，是很有趣味的；我着重于谈文学和思想问题，对于当时的出版界常常加以暴烈的批评。有些文字，现在看过去是太幼稚了，但是在当时于破坏方面的效力，确是有一点的。比较起来，我那篇《什么是文学》在当时很有相当的影响，《驳胡先骕文学改良论》也很受当时的注意。颉刚的文字，多半是关于抨击旧家庭制度和旧社会制度，关于妇女问题，也有许多篇文章加以讨论，在当时大家以为是骇人听闻的话，有妇女人格问题一篇，主张女子应当有独立的人格。这篇东西，被江瀚看见了，拿去给徐世昌看，说是近代的青年思想至此，那还得了。于是徐世昌拿这本《新潮》交给傅增湘，傅示意于蔡子民，要他辞退了两个教员，开除了两个学生，就是当时所谓四凶，这两个是《新青年》的编辑，两个是《新潮》的编辑。蔡子民先生当时坚持不肯，他复林琴南的那一封信，不只是对林琴南说话，并且是对徐世昌而发的。林琴南的背后是徐树铮，也就是段祺瑞，是代表当时军人派之意见；而徐世昌也是所谓北洋文治派的领袖，当时北大同时受北洋文武两派之反对，其情形之危险也可想而知了。但是蔡子民这一封信，得到了绝大舆论上之胜利，反因而学术界对他非常敬仰，这真是蔡先生有道德勇气(Moral Courage)的地方。于是所谓新文化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其势遂不可遏抑。还有一个《每周评论》，也是很值得注意的。这是陈独秀、李大钊和新潮社几个人合办的，是一个短小精悍的小报。不料这个刊物遂成为以后一切小报的祖宗。不过它的性质是完全谈文艺、讲思想和批评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的。这个杂志，当时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进步党讨论系的《国民公报》(蓝公武、孙洪伊为主笔)和研究系的《晨报》(蒲殿俊、张梓芳、陈溥生

为主笔)也先后在北京响应,在上海方面,则戴季陶奉中山先生的命令,办《星期评论》,同《每周评论》几乎是两个姊妹报纸。关于文学政治社会等问题也加以猛烈的批评。而上海的进步党所办的《时事新报》,也闻风景从,张东荪和张君勱等还办了一个《解放与改造》,虽然谈社会问题比较多些,却也是响应文学革命的刊物,自此以后所谓新文化运动几乎布满全国了。但是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布满全国,中间还有两个政治运动在里面,第一个运动是比五四运动早一年,因为反对对日的参战借款和中日密约而起的。那时候还是冯国璋做总统,段祺瑞做内阁总理,这个反日运动,是从日本留学生发动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两个留日学生的代表,其中一个叫阮湘,在北大西斋饭厅慷慨激昂的在演说,大家莫不义愤填膺,但终觉束手无策。最后我跑上讲堂对着大家说,这个事体,徒然气愤也没有用处,我们如果是有胆量的,明天便结队到新华门围总统府去,逼迫冯国璋取消成约,若是他用军警来干涉,我们要抱有流血之决心。这句话出来以后,大家受了一个极大的刺激,当场表决,第二天去闹新华门。到了那时候,果然北大学生还同其他几校的学生,集合在新华门口,一直围到下午5点多钟大家才散。哪知道回来以后,蔡先生提出辞呈。蔡先生之辞职是会使北大发生根本危险的,这件事我们是很不愿意的。我自己是不愿意北大坍台。而顾颉刚反把我痛骂一顿。后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叫冯国璋把蔡先生的辞呈退回,我们自己也去对蔡先生说,这件事体,完全是同学为着国家大问题而出此,不是不顾北大。经过了一再解释,蔡先生也就答应下来。这场风波也就结束。这是学生运动的第一次,也是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而有所表示的第一次,这是五四运动的先声,然而这件事却很少有人提起(说句没出息的话,这也是民众请愿的第一次)。有了这件事做引子,再加上所谓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五四运动的产生,几乎是事有必至。自从

这次请愿以后，北大有一部分学生，组织一个《国民》杂志社，其中重要的人物是易克嶷、段锡朋、许德珩、周长宪、孟寿椿等。当时，他们也要我加入这个组织，但是我对于这种比较狭义国家观的刊物不很热心，而且自己还要专心去办《新潮》，对于《国民》杂志，只算是一个赞助者吧！

《国民》杂志里面的人，多半是实行的人；《新潮》杂志社的人，多半是偏重于学术方面的人，所以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学生会里面组织分为七股，各股的主任几乎是《国民》杂志和《新潮》杂志二社的人平分的，这两个杂志，所以也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基础。

在此地附带说几句话以结束新文化运动的叙述。当时还有一派北大学生和教员办了一个杂志叫做《国故》，其目的在于和《新潮》对抗的，这一派的主干，在教员之中，便是黄侃，学生之中，便是张煊（后来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们关于文艺的理论，是非常薄弱的，其抨击新文学的地方，也不能自圆其说。其中登了许多文艺的文字，也多半是故国斜阳的吟呻而已。所以《国故》杂志出来，很不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和重视。而且有许多人很轻视它，办了不久也就停止了。毛子水在《新潮》上做了一篇《怎样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国故》一文，倒惹起许多旧学家的称许。当时对于新文学的抵抗力不外三种，一种是林琴南派，一种是东南大学的胡先骕和他所办的《学衡》杂志，一种是北京大学内部的《国故》杂志。但是综合起来，抵抗力还是很薄弱的。

现在讲到五四运动了。五四运动产生的重要原因，不外乎下列几种：

第一，是前次新华门事件的连续。第二，是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变化的结果。第三，是大家受了蔡子民的影响，一变从前羡慕官僚的心理而为鄙视官僚军阀的心理，并且大家有一种以气节相标准的态度，有意去掣官僚军阀之锋。第四，是正当巴黎和会的

时候,感觉到中国受人支配和帝国主义国家协以谋我的痛苦。正是那一年的三四月里,朝鲜发生徒手革命,也给大家以深刻刺激(当时我到北大图书馆里面去看报,注意到大家都在抢着关于登载朝鲜徒手革命的报纸看)。第五,因为受欧战以后各国革命潮流的激荡(特别是当时蔡子民所提倡所谓德国是军国主义,战败是应当的,并且当时国际联盟的论调甚高,北大也常常有这一类的讲演)。以上是这个事件的原因,至于这件事体具体的酿成,都完全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在4月里,日本要求中国撤换两个专使的消息纷纷传来,北大学生开了一个会,并且捐了几百块钱打电报,一方面打电报给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一方面通电全国,反对因为外国压迫而撤换本国专使的事。这两个电报打出以后,所捐的电报费还存300元左右,于是用四个干事的姓名,共同负责,存在学生银行里面。到5月1、2日的时候,外交消息,一天恶似一天,傅孟真、许德珩、周炳琳、周长宪和我等几个人,商量要在北京取一种积极反抗的举动,但是我们当时一方面想对于国事有所主张,一方面对于北大又要保存,所以当时我们有一种非正式的成议,要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外率领一班群众暴动,因为这样一来,北大的责任可以减轻。5月3日那一天,清华大学举行纪念典礼,许多北大的人,都到清华去参观,那天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不料3日那一天,邵飘萍到北大来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在校的一班同学,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当时还不过18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即5月4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20个委员负责召集,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他们到各

学校联络进行。我们9点钟由清华回来,看见他们会也要开完了,什么决议都已经定好了,当时我们还在埋怨许德珩,说是我们说好在5月7日发动,而现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可是埋怨尽管埋怨,大家的决议还是大家决议,是不能更改的。于是他们叫我连带签了字,把前存学生银行的300元拿出来买竹布,费了一夜功夫,请北大的书法研究会及画法研究会的同学来帮忙,做了3000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学生个个有旗子外,其余还可以送给旁的学校。所以当时大家疑心五四运动以为有金钱作背景,不然为什么以北大穷学生临时有这许多钱去做旗子呢?其实这个钱是打电报省下来的。各代表当夜分途至各学校接洽,约定了在第二天下午1点钟在天安门会齐。当夜11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当时推我写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5万份,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到下午1点钟,大家便齐集在天安门了。我们三个所谓总代表,因为预备各种文件,一直到1点10分才到天安门,当时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都已经先我们而到,对大家讲了一番话,劝大家解散。当时众怒难犯,哪一个肯听?于是大家从天安门出发,一直走到东交民巷口,便被警察挡住了。只有我和江绍原两个人进去到使馆界内去找美国公使。那一天,芮恩施到西山去了,由他的参赞出来见我们,他对于我们很表示同情,说了一番很漂亮的话,并且说,由他去和使馆界的警察交涉,让他放我们通过,我们从美国公使馆出来以后,又到了别的几个使馆,告诉他,我们示威的意思。回转身来到美使馆去问美参赞,同使馆界警察交涉允许我们通过的结果怎样。他说,使馆界的警察是答应可以的,但是刚才警察总监有电话来,说是不可以让学生们通过,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办。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大家

更是愤怒,当我们报告交涉经过的时候,大家便要求我们硬挤进去,后来想硬撞不成事体,反而给别的国家以不好的印象,于是大家便高呼口号“我们去除国贼吧!”于是掉转大旗向曹汝霖家前进(曹家在赵家楼)。曹汝霖的房子,是一座很大的满洲王府式的平房,我们到他家门前,大门已经关了,门口站着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大家到门口了便大骂国贼,最初拿旗子向屋顶丢去,后来打破了一个短墙的窗子,大家便爬进去。首先进去的人,据我眼睛所看见的,乃是北大的蔡镇瀛,一个预理科的学生,和高等工业学校一个姓水的。大家看他们进去了,于是接上爬进去的几十个人,把大门打开,而曹宅的院子里还站着许多警察,因为学生向他们极力宣传,所以他们已没有什么抵抗。适巧那一天曹汝霖同章宗祥、陆宗舆和一个日本资本家在那里商议事情,他们以为有着警察保护是不要紧的,我们打进去的时候,曹汝霖便换了警察的衣服混在警察堆里,从后墙跳出去。陆宗舆怎样逃走,我们却不知道,听说他也来喊口号,喊打倒卖国贼,混在群众里面逃走的,是否确实,却不知道了。章宗祥比较老实,他和那个日本人一道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群众跑进去的时候,日本人还掩护着他,于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要人。群众便把他们围起来了。不久一个北大的校工进来,他说自己是认识章宗祥的,并且说这就是章宗祥,于是大家便动手打起来,打了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于是这个日本人和曹家的佣人,便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间杂货店里面,这个日本人也去了,于是群众中忽然有人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大家便去找章宗祥,在他后门杂货店中找着了。当时这个日本人还掩护着他,群众们便用杂货店中鸡蛋来丢这个日本人,重新把章宗祥拖进曹宅来,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所以当时章宗祥确是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曹家的装饰品、古玩……简直是打得干干净净,他的姨太太和他女儿的房子

里许多香水,都一捶一捶的打碎在地上,当时香气四溢,不可响迕。我还亲眼看见江绍原拿了一床红绸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块红绸,拿在手里,乱晃几下,说是“胜利了!胜利了!”至于放火的举动,乃是高等师范的学生开始的,我看见有两个学生,自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来,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结果,曹宅烧起来了,徐世昌便下了紧急命令,叫军警捉人。那时候,傅孟真把他一本日记簿,上面写着许多代表名字的,往火里一丢,马上烧掉了。我们还是从前门出来的,当时街上救火队和水夫,已经拥挤不堪,很难通行。在曹宅里面还没有出来的,还有几十个人,于是便当场被捕。我从赵家楼出来以后,便向北大东斋(即第一宿舍)去,当时自己实在疲倦极了,从5点钟睡到6点钟,6点钟以后,重新振作精神开始活动。当时派定了多少代表,向各学校联络,预备在第二天,全北京的高等以上学校,自大清早起,一律罢课。那天晚上适派我到各报馆去解释这件事体,等到十几家重要报馆都跑完以后,时候已经是半夜3点多钟了,所以那一晚便没有睡。第二天早上,果然全北京专门以上的学校,一律罢课,并且各校代表齐集北大一院第三十六课堂开会。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也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当时各学校的中心,自然是北京大学,至于北大主持这个运动的躯干,要算是新潮社及国民杂志社里面的人。在五四那天,曾经开了一个会,大家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学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因为他是一个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我当时因为在各处接洽的事太多,所以不愿意做会场上固定的事,经大家一想再想,最后推出段锡朋来,由他做北大学生会的代表,结果就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段锡朋在五四以前,北大学生,很少有知道他的。他总是穿一件蓝竹布大衫,扇一把大折

扇,开口就是我们庐陵欧阳公的文章气节,所以大家都当他有几分迂气,哪知道被选举出来以后,他处理事务非常灵敏,运用群众,大有特长,于是段锡朋的名气陡然间闻于全北京。这一次,蔡子民先生确是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就是五四事情出来以后,他不和前次一样的辞职,反而联合各大学的校长,负责的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到了5月6日那一天,他们接洽好了,听说吴炳湘竭力奔走,要求各校校长于5月7日命令全体学生复课,以此为条件,可以赦放在捕的学生。徐世昌也有这样主张,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长久的罢课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5月7日是国耻日,更容易出事。我们全体罢课的决议,乃是5月5日通过的,5月6日的晚上10点多钟,蔡子民及汤尔和(医专校长)以及其他专门以上学校的校长,到北大的校长室里面,把我们找去,说是现在同吴炳湘已经有这样一种了解,只要明天全体复课,他明天就立刻可以放人。当时去见这几位校长的,有我及方豪(做新)等四五个人,他们都说:“昨天才决议罢课,明天便要复课,乃是办不到的,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我说:“现在如果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也不成事,况且我们这一次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当时章宗祥还没有离危险境界,有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了。适巧政府又捉去我们几个人,用这几个人去抵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此我便问他们几位校长说:“若是我们明天复课,他们不放人,怎样办?”他们说:“我们可以用生命人格为担保,而且吴炳湘也曾发誓过‘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于是我以为既然如此,我们明天复课好了。但是我这句话说出来,许多人便反对,以为我们答应下来乃是越权,许多同去的人,也是反对我意见的。我说:“现在为减少被捕同学之危险,这件事非如此办不可,我们只有从权办理了。”于是当夜我们分成五队,去通知全体同学,明天复课,除每个宿舍派一队外,其他两队,是负责通知宿舍附近公

寓里面的同学的。大家出发时候,已经是12点钟,同学们完全睡着了,一个一个房间敲起门来,把睡熟的人叫醒了,告诉他们这件事,他们还不相信,还要费许多心血去解释,解释不明白的时候,还要受大家的责骂。半夜醒转过来的人,相对讲话,口中臭气是最令人受不了的。这可以说是在那一晚上特别记得深刻的一种感觉。幸而能得大多数同学之了解,谢谢大家对于我们还有最低限度的信任,所以第二天北京各大学亦先后复课了,到了10点钟,全部被捕同学从警察所送回学校来,大家都列队在门口迎接,当时那种痛哭流涕的情形,真是有家人父子于乱离巨劫以后相遇时之同样感觉。当时章宗祥的病还没有离危险期,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间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之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在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郭君那一天因为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的,这是我们应该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等到被捕的全放出来了,章宗祥也被打了,曹汝霖的房子也被烧了,照常理说,这件事情可以告一个段落。但是当时有两种情形,是决不能使这件事告一个段落的,一件是山东问题还没有了结,而且一天比一天的失败下去;一件便是蔡子民先生于5月7日学生出狱以后,便当夜出京,没有一个人知道的跑了。跑的时候,他留下一封信,就是那最出名的“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这封信的头两句话如此)。这封信出来,许多人很费推测,于是大家去询问国文教授,请他们去查这个典故的来源。因为这些国文教授见大家

纷纷请教,当时也得意了一下。蔡先生去了以后,北京大学自然是第一个恐慌,为维持北京大学,北大学生不得不继续闹下去,而且不能不联合旁的学校学生一同的闹下去,于是五四运动又重新紧张起来了。

经过这次事变以后,北京大学遂成为政府的眼中钉,这是不可讳言的事实。为铲除外交上的障碍,政府方面,也很想对于北京的学生界下一番毒手,这个情形,学生界也是完全知道的。但是在北京方面,学生运动已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于是便遣派代表到上海去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一批南下的就是段锡朋、陈剑翁、许德珩、黄日葵、祁大鹏(中国大学)、瞿世英(燕京大学)等。他们到了上海以后,就联合上海及各省学生代表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到了5月底,各处的布置已经有点头绪了,于是我们在北京接到段锡朋的密电,说是可以相机发难。到6月3日那一天,于全北京的学生里面,挑了500多人,分队出发演讲,那一天被捕的有100多人。第二天,继续派人出去演讲,大家都带好了毯子在身上,是预备被捕的。当天被捕的大概有400多人,第三天,被捕的达900人之多,监狱关不下去,于是把北大的第三院改为临时拘留所,外面用密密层层刺刀和机关枪守着,如临大敌一般。到了6月4日,我们想把恐怖的新闻电打出去,我就带了40几块钱去打电报,哪知道我一出去,侦探便跟着我,于是跑到日本邮局去拿一本丸善株式会社寄来的书。侦探在前面守着,哪知道那个日本邮局有个后门,我就从后门走了。结果,居然被我把那个电报拍到上海去。上海方面接到这个电报以后,全体学生便出发,除分散传单外,并向各家店铺,要求他们罢市,甚至于要求不遂,向商店老板面跪下去。到了6月4日,全上海罢市了,别的地方跟着罢市的也有好几处,而天津方面,因为一个南开学生马骏在商会代表的前面,用一只碗向自己脑壳一打,表示他要求的决绝,商会方面的人大为感动,也

罢市了。因此,这个北京学生与政府正在短兵相接的时候,学生方面,正是无可奈何的时候,忽而得到了这种有力的声援,一刹那间,个个悲欢交集、哀痛淋漓,而声势遂大振。当时上海、天津方面所提出要求政府的条件,第一,就是释放被捕学生。第二,就是罢免卖国贼曹、陆、章。第三,就是不签巴黎和约。而三个条件之中,以释放学生为先决条件,所以5日那天晚上,北大三院方面军警的帐幕在半夜三更便悄悄地撤去了,当时拘禁在里面的学生还不肯出来,因为他们一出来要减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紧张空气。到了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却派人来道歉,他们才肯出来,还有拘禁在警察所和步兵衙门里面的,他们请他们出来,而却不肯,以后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他们出狱,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总务处长连连向他们作揖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至于罢免曹、陆、章的命令也随着下来,以由学生运动扩大成的民众运动,使内阁局部改组,在当时看来,也算是一件可以诧异的事情了。不过山东问题还没有拒绝签字,北京教育界还有受摧残的危险,这两件事是大家最不安心的。到7月和约要签字的时候,北京大学联合各校学生又会在新华门一次,在新华门口,睡了两天两夜。同时巴黎方面的学生同华侨,也就闻风兴起,逼迫中国专使,不许他签字,拒约运动,因为内外夹攻,所以终能实现原来的主张,而为后来华盛顿会议留下一个争回山东的余地。至于北京各大学被摧残的问题,也是使大家寝不安枕的。政府的目的是要逼走蔡子民先生,所以他们会胡仁源来买通一批投考的学生,来占据北大学生会,硬把学生会的图章抢去,以学生会的名义,欢迎胡仁源到校。同时教育部方面,胡仁源已预备好上任的汽车。谁知此谋不密,被北大学生会中人知道了,当时便召集紧张会议,每一个人发一个特别符号,集合在第三院,时三院的被买及投考学生,正议“夺帅印”的事,还没有完结,哪知这边去了两三百个人,一个个的把他们擒

住了,并且带了纱麻绳把他们捆将起来,便在法科大礼堂设立公案,推举出了五个审判官,来审判这些人的罪状,他们也陆续的把被买经过供将出来,大家又逼他们写悔过书,写了悔过书还要他们在悔过书上盖手印,再拍了一个相,然后把他们放了。这幕滑稽,遂因此終了,而他们抢北大的计划因而失败,但是他们却继续进行向法庭控诉北大学生会的职员,以为私设法庭和逼迫人行使无义务之行为(这条法律怕是永久没有人用过的)。于是法庭拿了学生会里面 20 余人下狱,其中有孟寿椿、鲁士毅等。在打官司的时候,学生会要我去做代表,我几乎天天晚上要和律师刘崇祐接洽。许多上诉状都是我写的,这场官司打完了,我倒因此得到了许多关于法律的知识。这一幕取成都的戏没有唱成功,而胡仁源也知道北大不容易占据,他们的野心,亦因此而减少一点。那时候蔡子民先生派蒋梦麟先生到北大来,以总务长的资格,做他私人的代表。到双十节左右,学生会派我到杭州去接蔡先生回校,蔡先生遂既然答应回来。在蔡先生到校时候,刚巧是双十节,各学生便捐了一批钱,教员也捐了一些钱,共几百块钱去买了几万个馒头,上面盖着红戳子是“劳工神圣”四个字及其他成语,在那天便分发于北京各平民,都由北大学生去发,这真是面包运动,也是一件值得回忆的事。当时北大的学生,生活是很苦的,一间房子中住着七八个人,最小的房子才只住三个人,说起饭来,包饭只有四块五毛办一月,两块钱是现洋,两块五是中交票(当时中国交通银行的票一块只合四毛),所以吃一月的饭只合三块钱。当时学生在吃饭时候,除了五个菜以外,每人还分两个馒头,大家抢着吃,吃饭是先打锣的,故有“锣声动地,碗底朝天”之谣。这是北大生活的一点回忆,是附带记载于此的。

五四运动到了这个地方,似乎应该告一段落了,但是到了那年年底,因为要逼迫政府取消军事协定,学生和政府又起了一个大冲

突,这个冲突,使北京大学的第二院和第三院又重重的被围。当时政府有命令通缉我和方豪等几个人,我当时住在嵩祝寺八号,到吃饭的时候,忽而来了八个马队,把我前门围住了。我从后门走到黄振玉(现是南京中央饭店的经理)的家里,由他家里带了一副黑眼镜和一顶风帽,逃到北大一院,因为他们正派我做代表,叫我和张国焘一同去。在傍晚时分,我便由一院后门逃出,经过铁狮子胡同,想到永定门上车(只有普通快车是在永定门停的)。哪知道到了永定门,车已开了,于是跑到李光宇家里坐了半夜。半夜时候,又到永定门去上车,车又开了,于是我只得和张国焘坐待城门开门,当时很怕守城的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因为城门上有自鸣钟,总有鸡鸣狗盗也一律不济事的,我们等他开城门,总是不开,到城门开了,火车又走了,于是我们两个人只得直接沿着火车轨道走去,到了丰台,登车南下。南下过了一个多月,又回到北京来。这段故事虽然是我自己的经历,写在此地,也算是五四运动的余波吧!

——民国 20 年 8 月 26 日晚上整理毕于北太平洋舟中

《传记文学》编者按:本文系罗家伦先生于民国 20 年口述,马星野先生(原单名伟)笔记,因涉及当时人物甚多,一直未公开发表。顷承罗先生长女公子久芳女士整理先人遗稿,特检出自美国航寄本刊发表。罗女士为旅美经济学家张桂生教授夫人,孝思不匮,编者谨致谢忱。

(转载自台湾《传记文学》第 54 卷第 5 期,1978 年 5 月)

附录：

关于罗家伦口述五四运动文(书简)

陶美惠

绍唐社长：顷在“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拜读罗家伦先生口述(马星野先生笔记之“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至感兴趣。罗先生为北大人，且为“五四”领导人之一，以当事人的身份，口述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的史实，多为前人所未言，极富史料价值。惟偶有误记之处。为免以讹传讹，仅分别摘录如下，并稍作补充，供作参考。

①“蔡子民做北京大学校长这件事，是范源濂发动的”。范源濂的名字，很多人都写作范源“濂”，是错误的，这可由他自己的签名为证，如民国5年8月26日范源濂拍给蔡先生的宥电请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及任命蔡先生为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状上的署名，即知应为“濂”。

②“工科学长温宗宇”乃“温宗禹”之误。温氏广东台山人，美国麻省艺术大学校矿科学士、冶金科硕士。

③胡适之发表“改良中国文学刍议”及“建设新文学革命”两文，的正确篇名，分别为“文学改良刍议”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④谓“新青年”是下列六个人轮流编辑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沈尹默、陶孟和、刘半农。事实上李大钊和高一涵也都曾参与编辑工作，陶孟和似不在轮流编辑之列。

⑤关于徐世昌、傅增湘对“新潮”杂志不满之事，兹录奉傅增湘与蔡元培为此事往返函件(附件一)，作为参考。值得一提的是，由蔡复傅的原函墨迹来看，这封信竟然是傅斯年拟的稿。北京政府对北大学生所办的“新潮”杂志不满，致函北大校长纠正，这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可是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却令“新潮”的编辑傅斯年拟稿答复，实在出人意料！由此，也可看出蔡先生支持“新潮”和兼容并包的风度。

⑥谓蔡元培于“五四”后辞职赴杭州，学生会派罗先生去接他回校，“在蔡先生到校时候，刚巧是双十节。”事实上，民国8年9月20日，蔡先生就在北大全体学生、全体教职员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了。而且北大就在同一天举行第二十二年开学式，蔡先生也在典礼中致训词。所以，他返回北大的时间，绝对不是双十节那一天。

专此，敬请

编安

弟 陶英惠 敬启 七十八年五月十日

附件一：傅增湘与蔡元培关于“新潮”杂志往返函件

傅增湘致蔡元培函

子民先生执事：

自“新潮”出版，挈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比承过从，获念尊旨，良用释然。

国学靡敝，士之秀且杰者，谋所以改弦而更张之。笃旧之伦，疾首疚心，为匡掖废坠之计，趋涂虽殊，用心则一。异同切劘，互资进行，尊闻行知，无妨殊轨。近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辨难，因辨

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

吾国伦理道义，人群纪纲，铸于人心，濡于学说，阅数百千年。其间节目条教，习惯蜕衍，或不适于现代，亦属在所不免。然而改革救正，自有其道。以积渐整理之功，行平实通利之策，斯乃为适。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时论纠纷，喜为抨击，设有悠悠之辞，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甚冀执事与在校诸君一扬摧之，则学子之幸也。

鄙意多识蓄德，事属一贯。校内员生，类多闲达，周知海内外名物之故与群治之原。诚能朝益暮习，与时偕行，修养既充，信仰渐著，遵循轨道，发为言论，自足以翕服群伦。若其以仓卒之议，悬于群众，义有未安，辄以激病，殆有未可。至于学说流膏，如长江大河，支派涸湫，无可壅阏，利而导之，疏而淪之，毋使溃溢横决，是在经世之大君子如我公者矣。专肃布臆，并颂道祺

傅增湘启(1919年)3月26日

(据傅增湘致蔡元培函原件)

蔡元培复傅增湘函

沅叔先生左右：

奉读尊札，敬悉壹是。情长意殷，感荷无量。此中原委，昨已面陈左右。兹再述其涯略。

敝校一部分学生所组之“新潮”出版以后，又有“国故”之发行，新旧共张，无所缺畸。在学生则随其好尚，各尊所闻。当事之员，亦甚愿百虑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纳之。局外人每于大学内情有误会之处，然若持“新潮”、“国故”两相比拟，则知大学中笃念往旧，为匡掖废坠之计者，实亦不弱于外间耆贤也。

尊示大旨谓“新潮”宜注意者二事：一则因批评而涉意气，二则张新说而悖旧谊。如于二者不加检点，未必不以违背习俗之故，为

新机演进之累。明言说论，甚幸甚幸。元培当即以此旨喻于在事诸生，嘱其于词气持论之间，加以检约。

据“新潮”编辑诸生言，办此杂志之初心，原以介绍西洋近代有益之学说为本。批评之事，仅属末节。但批评原无可虑，所虑乃在出乎其位，牵及感情之言。“新潮”既以介绍新说为旨，自不必专徇末节之流波，而朴实求学之学生杂志，又为元培对于诸生所要求者。故关于此点，自当如尊示所云，由当事诸生加之意也。

至于持论，间有殊于旧贯者，容为外间误会之所集。然苟能守学理范围内之研究，为细密平心之讨议，不涉意气之论，少为逆俗之言，当亦有益而无弊。“新潮”持论，或有易致骇怪之处。元培自必勉以敬慎将事，以副盛情。

事之方始，真相未明，辗转相传，易滋误解。历日稍久，情实自见。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正赖大德如公，为之消弭局外失实之言。元培亦必勉励诸生，为学问之竞进，不为逾越轨物之行也。谨布区区，并达谢悃。敬请
道安

蔡元培谨启 4月2日

(傅斯年代撰)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手稿)

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

梁敬铎

一、点火工作的经过

北京四五月天气，多半燥热。那年五七国耻纪念大会，正由北大《新潮》杂志社、《国民》杂志社各同学，积极筹备；而巴黎和会中的山东消息，则日见紧张^①。我那时虽已毕业北大，但因留校担任讲师，及供职外交委员会的关系^②，对于同学焦灼的情绪，和外交消息恶化的情形，都能了解。4月25日，国民外交协会接到梁任公巴黎来电，报告德国前在山东的权益，将由日本继承，希望同人警告政府国民，勿签对德和约^③。5月1日傍晚，林长民先生，交来一条新闻，托我便道送到《晨报》馆发表。我晚上9时左右，走进了丞相胡同《晨报》馆，找到了陈博生总编辑，请他将这条新闻，明早

① 巴黎和会1919年1月18日开幕。日本根据其1917年与英、法、帝俄所私订的密约，要求接收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美国威尔逊总统反对。日本以中国已与订立济顺（济南至顺德）、高徐（高密至徐州）两铁路秘密协定为言；二月以后，我国要求归还山东青岛之消息，日见不利。

② 外交委员会，系徐世昌临时创设，职在审议巴黎和会中之外交事件。汪大燮为委员长，林长民为委员兼事务主任。作者与外交部政务司长王述勳、秘书朱鹤翔等四人，同为事务员。

③ 国民外交协会，系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范源康等诸名流所组织，梁任公时受政府央请，赴欧视察，张君勱、丁文江等为随员。梁电云：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日本。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让此，不啻引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

见报。博生对这新闻，虽然欢迎，但因虑到报馆，或会受到封禁之厄，坚持必须外交委员会负责人，汪大燮先生，或林长民先生署名，才可发表；我和林先生通过电话，得到他署名许可，这条新闻，就在5月2日（星期五）《晨报》，以左列方式披露了！

山东亡矣 林长民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处置，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遽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1915年之廿一条条约，及1918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廿一条条约，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新闻披露之第二日（5月3日），北大壁报，就贴出13校学生代表，要在第三院礼堂，召开紧急会议的通告。当晚紧急会议，定出5月4号（星期日）正午，天安门开会游行示威的路线。第三日（5月4日）午间，3000余学生，13校单位^①就在天安门扬旗开会；五四运动，就此开始。今日读者，检看这条新闻，既没特别骇人听闻的内容，又没特别使人刺激的辞语，或会疑到这新闻何以会有偌大

^① 参加五四运动天安门游行之学校，为数13。但其校名或已不甚为人所全忆，特举之如下：

一、国立北京大学；二、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三、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四、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五、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六、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七、内务部警官学校；八、交通部铁路管理学校；九、税务处北京税务学堂；十、私立民国大学；十一、私立汇文大学；十二、私立中国大学；十三、私立朝阳大学。

按学潮扩大后，清华学校、俄文专修馆、法文专修馆、陆军测量学校、军医学校、军需学校、航空学校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始加入，故皆不在13学校之内。

的魔力；然而当年五四事件的爆发，确是如此。更有一点：这条《晨报》新闻，不但激起 3000 学生的运动，并且还引起日本小幡酉吉公使的抗议；不但断送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终身政治生涯，并且还撤了外交委员会的机关招牌，断了徐世昌总统和林长民先生的两代交谊！

小幡抗议文书系 5 月 20 日夜间以紧急字样，向我外交部提出。其原文如下：

连日中国商学各界，以山东问题，群起抵制日货，本公使深致不怍！5 月 2 日，《晨报》及《国民公报》载有林长民君外交问题，警告国人一文：内有“山东亡矣，国不国矣，联合我四万万民众，合力图之”等语。此次学潮，自与此文不无关系，应请贵国政府警告林君，加以取缔，请限期答复！

外交使节，干涉驻在国私人之爱国言论，已是失态；况又指名惩处，要求限期答复，尤见蛮横。如在平等国家，这抗议至少也应退回，而那时北京政府，则将日使抗议，转呈总统府，于是林先生具呈辞职^①。汪先生亦一再求去，徐世昌均不批准，但也疑这次学潮，是林先生鼓动出来！汪先生尝命我将外交委员会门匾摘下，但外交委员会设在公府，遂又为总统府庶务挂起。一场新闻公案，虽到此结局，然而这新闻所以会激起五四运动，自还有其时代与思潮的背景。

五四运动发生在广东七总裁就选，孙中山先生避位上海的时候。其时北政府虽是徐世昌当国，而政治外交的实权，犹操在安福系之手^②。安福系后台老板徐树铮，利用西原借款，伸张皖系军

^① 林长民辞职文中，附摘当时东京朝日新闻，及建部通吉教授，攻击我国之文字，要求日政府亦予取缔，并将呈文登报，学生益愤。

^② 安福系系民国 7 年 3 月，成立。

权,又和日本订立中日军事协定,久为学生界所痛恶。五四运动前一年(民七),留日学生,为此全体罢学回国;北京 2000 学生,为此游行请愿,包围了冯国璋的总统府。西原借款,是曹汝霖、陆宗舆经手;中日军事协定,是章宗祥签订。曹、陆、章三人早为众矢之的,而巴黎和会中,山东问题之棘手,又种因于胶济铁路换文与济顺、高徐两铁路之垫款合同。换文与合同,政府初犹秘密,因为威尔逊要求,顾维钧快诺^①,才于当年(民 8)2 月,中日双方提付公布。公布之后,大家看到又是曹汝霖、章宗祥所经手,已经火上添油,而胶济铁路换文中“欣然同意”的字眼,又使专使嗾声,美方叹惜^②;青年怨愤,悉集于曹、陆、章,是可以想见的。这是一面。

那时北京教育界的思潮,正似万花齐放,百鸟共鸣!陈独秀的《新青年》,胡适之的白话文学,傅斯年、康白情、罗家伦的《新潮》杂志和《国民》杂志,都正在鼓舞思想,解放人生。曾琦的少年中国学会正在酝酿,毛泽东刚到北大图书馆,张国焘、周恩来、邓颖超,都还是二十零岁的平津学生^③。易克嶷、段锡朋、许德珩,也正是北大推出来的代表^④。青年对于国家,正有热情,对于国事,正有抱

① 日本代表在巴黎和会十人会议中,透出中日两国,业有秘密换文。威尔逊请将此协定,送由和会审阅,日使允向国内请示,顾使立于同意。日本大怒,指顾使不于事前预商日本,与陆征祥外长、内田康哉外相间之了解有违。由小幡向我外交部抗议,此系当年 2 月初之事,外间均知之。

② 胶济铁路换文,系民国 7 年 9 月 24 日订立。日本先作提议,我方复称:“业已阅悉,中国政府对于贵政府之提议,欣然同意。”换文中,中国复文,既无月日,亦未云曾奉政府之训令或授权,与其他外交文件之体裁有异,为众论所指摘。美国东方股长在是年 1 月 27 日夜,曾叩陆征祥以实情,陆征祥始以实告之,美方太息云:“此犹自抽吊板,自断深渊,我们如何能帮忙。”此事当时外间亦知之。

③ 毛泽东系长沙第一师范学生,民 7 夏间,始来北京,经李大钊之推荐,在北大图书馆为助理员,月薪 18 元。李大钊曾任汤化龙内务部秘书,副主编《晨报》副刊,民国 7 年 2 月,受聘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④ 民国 7 年,北京学生,因中日军事协定事,游行请愿。易克嶷、段锡朋、许德珩,皆被推为代表。冯国璋总统接见之,三人亦皆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有力代表。

负，怎肯对于媚外丧权的对象，轻加宽恕。这又是一面。

社会名流方面，也反对安福系。那年二月，国际联盟同志会在太平湖熊秉三（希龄）先生宅中，开创立会。安福系国会议长王揖唐强行参加，我和叶景莘，临时约集北大同学数十人，参加选举，卒将其挤出理事会^①。外交委员会统一铁路案，也就是汪大燮、林长民诸名流，要想打破日本独吞满蒙和山东路权的策略。他们方想借着威尔逊十四条原则的号召，能够收回中国鸦片战争以后所失的利权，今看威尔逊正义外交，又将被日本与安福系之勾结，破坏渐灭，他们又怎能不向青年民众报警高呼？这是第三面。

因为有此三方面的郁愤与伏澜，所以“山东亡矣”的新闻一出；天安门之五四运动便开；而曹、陆、章卖国贼之声名，亦由此流传于青史。他们三人，究竟是否有心卖国，虽都可自辩^②，但这场运动，乃中华整个民族意识——抗日复权的意识——的觉醒，怒火的爆发；私人是非，乃至政治生命，都不过是意识觉醒中的微波，或怒火中的燃料而已，不足影响这运动在历史上之评价与地位。

五四运动，动机纯洁，目的对外（表示民意），手段平和（演讲与游行），这都可由5月3日晚决议案中，可以看出。赵家楼曹宅，毁屋伤人，手段已经变化，其后政府一再高压，学生亦一再反抗，双方

^① 王揖唐落选后，始自组国际联盟协会，自为会长，与同志会相对立。此为当年中国有两个民间国联同志团体的原因。国联协会，不久消灭；国联同志会则成立迄今，工作数十年未断，且尝每届派遣代表，出席世界国联同志总会，努力国际和平，为当时有力团体。周策纵先生著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一书，征引颇博，极足参考；惟只及协会而不及同志会，又以协会为有力团体（周书，页九〇）有误。同志会现改称联合国同志会，何敬之先生主持之。

^② 章宗祥著“东京之三年”，王芸生“六十年之中国与日本”第七卷：“曹汝回忆录”，见香港春秋杂志。

激荡,酿出6月中,学生大批被捕(数达1000余人),上海罢市(时经5日,自6月5日至9日),曹、陆、章解职,钱内阁改组,徐总统辞职之绝大波澜,转使其原来之对外目的,反见冲淡。凡此因已都有专述,不必再说,今且把我所经办的保释工作,写出如下。

二、保释工作之经过

五四晚上,学生被捕,达数十人。我寻蔡校长不着,闻人说:他正在外面,设法保释学生。那时学生都送在京师警察厅禁押,而警察厅的司法处处长蒲志中,恰是我的亲戚;我到蒲家坐待,志中忙到半夜才回,我由伊处得到名单,才知被捕学生,共为32人,其姓名及所属学校如下:

北大:20人

梁颖文	熊天祉	梁彬文	李良骏	胡振飞
杨振声	曹永	郝祖宁	陈树声	萧济时
许德珩	孙德中	何作霖	邱彬	潘淑
易克巖	鲁其昌	林君损	易敬泉	江绍原

高师:8人

杨荃峻	向大光	陈宏勋	薛荣周	赵允刚
唐国英	王德润	祁铭晋		

工业专门:2人

李更新 董绍舒

中国大学:1人

刘国干

汇文大学:1人

张德

我问:学生曾否受过刑讯或虐待?蒲先生答:吴总监(炳湘)同

情学生，只有优待，绝无虐待，更无刑讯。又说：警厅准备将案件移送地方检察厅依法办理。我问：天气如此炎热，学生又只是嫌疑犯，可否准予保释？蒲先生答：保释照章须有铺结，但如有较为体面之人，出名具保，伊当向总监请予通融。我于翌晨分谒汪、林二公，他们都愿具保，我访着蔡校长，校长鼓励我去做；并说：王亮畴先生也愿出名。我访亮畴先生，持所拟保状与商，亮老因状中有随传随到字样，须加斟酌，后经汪先生亲改，由我缮正，在汪宅（东单二条）会签后，已至夜晚，我送到蒲家，面交志中先生，他答应明早即为设法，这是5月5日之事。保状原文如下：

窃本月4日，北京各校学生，为外交问题，奔走呼吁，聚众之下，致酿事端，在喧扰场中，学生被捕者30余人，大燮等特先呈恳交保释放，以后如有审问，即由大燮等担保送案不误。……谨呈

警察总监

具呈人 汪大燮 王亮惠 林长民

5月5日

6日下午，讹传学生业已释放，虽不实在，而待遇显有改良。7日是预定的国耻纪念会期，中央公园董事会，因政府干涉，临时谢绝会所，公园门口，军警荷枪包围，驱逐行人，我们都不得入。有人提议，改在天坛或先农坛，露天集会，仍被军警拦阻。我们在炎日热尘，骇汗奔驰中，闹了一日，迨至天晚，始以少数同人，在石虎胡同蔡松坡图书馆内，勉强开会，《英文导报》总编辑梁秋水，临时被推为主席，一声铃响，哀怨欲绝！盖觉得国尚未亡，而求一纪念国耻之地，都不可得也。会散回家，已得蒲宅电话，始知学生是日全体保释，本案已移地检厅处理。

5月10日，许德珩等32人，全体同到地检厅投案，检察官开讯，先问何人主使，许答：“身心驱使。”检察官问何人动手殴人，何

人纵火焚屋，学生同答：“不知。”检厅未能指出动手行凶之人，只得退庭，未予羁押。13日，各校学生，以全体3000人名义，具状自行检举，承认公愤肇事，静候法庭处分，检察厅无以应之。我经手之保释工作，乃告段落。

三、外交秘辛之参与

总统府外交委员会，是审议有关巴黎和会事务的机关，我因资浅年轻，纪录撰拟，以及文件保管，都得参与。第一次徐总统交接之案，就是陆征祥外长在巴黎电荐全权专使的名单。陆外长电保四人，即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王系陆外长在广州约去，有代表南政府的色彩，顾系驻美公使，施系驻英公使，魏系驻比公使，且皆已同在巴黎，陆以外长自充首席。这种安排，本甚妥当，但外委会因陆外长时常须赴瑞士养病，次席全权，有管理代表团行政责任，王正廷与北政府不通气，对于近年北政府外交事务，亦不熟悉，恐陆外长养病去后，政府与代表团之指臂相使，易欠灵活，乃建议将王、顾席次，改为顾、王；余悉照陆使电请办理。建议签奉总统核准后，即由印铸局明令公布，电知陆使遵照。不料陆外长事先已与王正廷有过次席全权之口约。正廷以违约相诘，即欲束装返粤，陆外长无奈，只得仍照王正廷次席、顾维钧第三席之名次，正式送致和会秘书厅，而国内命令之专使次序，与和会秘书厅中之中国专使名次，遂不相符。陆外长面慰顾使，顾尚唯唯，而王仍介介。巴黎和会开幕至第九日（1月27日），五国会议（美、英、法、日、意各派全权二人与会，故又称十人会议）忽于下午1时，通知中国代表于3时到会，说明德国在山东之权益，应否交由日本接受之意见。其时陆使卧病，依照名次，王、顾当往，但时间既促，事又棘手，王虽愿往，而推顾发言，两人赶到会场，各国代表已集，顾使要求翌

日答复，会中允之^①。1月28日，王、顾仍往，法总理主席，美总统、英首相及日本西园寺公爵，牧野伸显均到，顾使指出山东是孔孟诞生圣地，正如回教之耶路撒冷。如果耶路撒冷为外来权力所侵犯，世界即不能太平，所以山东权益，必须交还中国，始能莫立远东和平基础。顾使时年甫过三十，欧洲外交界，本未重视，忽闻此论，惊佩欲绝。法总理、美总统张臂拥抱，争向道贺。日本代表，相形见绌，愤怒之余，至由驻华日使，要求政府，限制顾使发言！外委会得顾使演讲大旨，及世界赞誉消息，皆大喜。汪大燮先生笑口大开，尝对我说：“倘非我将顾使席次排在次席岂不误及国事！”然顾使遂不免为人所忌嫉。

上海不久传出路透社电讯，说顾维钧将与曹汝霖三小姐结婚，并说顾某将变为亲日派。此消息经各方追究，路透社只得暗示：来源是出自巴黎中国专使。自是王、顾失和，终王之世，未能回复。

胶济路换文与济顺、高徐两铁路垫款合同之订立经过，在巴黎各全权中，只有陆外长明白究竟。1月27日夜，美国东方股人员来叩虚实，陆外长不得不以实告。美国东方股人员，摇头叹息而去。陆外长亟电国内，请徐总统将合同换文，均交国会议驳，以为外交转圜余地。徐总统也曾商过国会，而安福系之国会议长，须问过段祺瑞及徐树铮之同意，遂至搁起不办。2月15日，此换文及合同，都提出和会发表，3月、4月，顾使与陆外长都曾迭向美总统恳请斡旋，威尔逊初拟将德国在我山东之权益，交五国暂时共管，再由五国交还中国。陆使同意，而日本坚持不允。是时意大利因阜姆问题，全体使团退出会席。日本乘机以1917年之密约，箝制

^① 顾少川先生“巴黎和会的回忆”一文，谓奉召出席十人会之日子在2月下旬，又谓：“当日发言。”我疑回忆之日子有误。因据我资料：顾先生奉召赴会，是1月27日，正式答复之发言，是1月28日。

英、法，以不参加国联及提出人种平等要求案，窘吓美国。美国务卿蓝辛，劝请日本：“贵国既允将山东完全主权，交还中国，何妨将此辞句，订入德约条款”，日本不允。4月28日，美、英、法三国密定对日让步。4月29日对德和约条款，通过10人会议，日本要求，全部胜利。英、美于会议后，都曾对我声明苦衷，然当案在辩论期中，竟不能使中国有参与讨论与旁听之机会，当年五强把持会务之情形，大都如此。

就上史实检讨，五四运动发动之日，中国收回山东权益之案，早受死刑之判决。故五四运动，对此已无补救可能。五四运动之有神于当年外交者，就在于鼓起民意压力，迫使政府外交当局，不敢签字之一点。我当时在外委会中，亲知中国代表团中，关于对德和约应否签字，曾有正负两种意见。主张签字者，驻法公使胡惟德，代表团参议伍朝枢，驻意公使王广圻。主张不签字者，王全权正廷，顾全权维钧，施全权肇基，至陆外长与魏全权，则未表示意见^①。主张不签字之理由有二：（一）为尊重民意，（二）为免使南北分裂。主张签字之理由有三：（一）对德和约，如不签字，则对奥和约，许我签字与否，尚不可知。（二）如德奥和约，都不签字，则德奥租界不能收回，德奥关税不能自主，德奥领事裁判权，与德奥赔款，亦不能撤销及停止，为害甚大。（三）将来中国与日本直接商洽山东问题，其结果能否比今日三国所商定者，更有利益，亦无把握。至南北分裂，为时已久，纵不签约，亦不能使南北统一。胡惟德并谓吾人宜以国事之利害为重，不能顾及个人之毁誉。伍、王（广圻）二人同声和之，然此三人，都非全权，本无签字资格。故其发言效力，不能与王、顾、施各全权相比。

在5月底以前，代表团之意见，似偏于拒签方面。但此情形，

^① 参考巴黎中国专使5月28日议事纪录。

至6月7日以后,则见动摇。盖三国(英、美、法)会议决定对日让步之时,原有一秘密记录,此记录辄经我代表分头觅取,直至6月7日,始得觅到。根据该纪录,日本所得承受者,只以德国已行使之权益及中日已订定之权益为限。即在中日已订定之权益中,亦尚有减轻及补正之点,日本此际又正以山东完全主权,仍属中国,向世界自作声明,陆外长因此又电政府,再加考虑。

政府方面,初令陆外长向大会声明,对于三国决定草案,不能满意。旋令专使在保留山东条款之条件下,签字和约(5月13日)。迨知保留不能办到,则曾经一度,密令专使签字(5月23日)。嗣因国内风潮激烈,又令专使相机办理。

全权方面,对于保留签字,曾作种种掣划;皆无成就。此可由陆外长6月28日未签字之报告电中见之。此电为重要文献,特将全文列出:

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将保留字样,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为另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分函声明,不因签字而妨及将来再议声请之权,竟至完全被拒。……大会专断至此,不稍顾我些微体面,曷胜愤慨。……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可言。内省既觉不安……详细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当即备函会长,声明保存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

电文既无奉令之语,又有“内省不安”之辞,则此约不签,出自陆征祥之自决,不由于北政府之指示,自甚明了。英使团尝诘施使,谓我们听说中国政府曾令签字,何以不签?亦可为陆外长自决之证明。陆氏入天主教苦修后,于1943年,重写此事,谓:“这是我平生初次感到违背命令,是我义务。”尤可见当时政府最后命令,必是签字,否则无违背命令可言。至于不签字之后,巴黎忽奉到北京25日所发“勿签和约”之电令,则事属离奇,有人疑此是中枢自占地

位,准备委过行人之一种陷阱,亦太可笑矣。

陆征祥在清光绪庚子辛丑年间,曾充过驻俄钦差杨子通(儒)之参赞。杨子通于交涉帝俄东三省撤兵时,李鸿章劝其从权签字,子通不肯,百端受逼,卒歿任所。今事隔未 20 年,而征祥竟亦受“相机办理”之密令,其感慨为何如!然征祥究是签过廿一条条约之人,平日服从上官,性格柔和,此次独敢违反政府意旨,自作主张,不签和约,自是深受五四运动爱国精诚所感召。五四运动之成就,殆以此为最大。五四运动中,学生团体之组织方法,及组织力量,均大有表现(全国学生联合会 6 月成立)。

(1966 年 4 月于纽约)

(转载自台湾《传记文学》第 8 卷第 5 期)

五四运动回忆

何思源

我于1915年考进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转文科哲学系，并担任一个班的学生班长。当时各班学生很少，我那个班16人，算是较大的班了。五四运动时，我参加了游行示威。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戊戌变法之际，前清称京师大学堂。1916年以前，学校风气很腐败。学生年龄大，一般地穿长袍马褂，也有穿西装的。学生宿舍只有马神庙西斋、沙滩东斋和北河沿八旗先贤祠三处，大部分学生在外面寄宿，住公寓。除少数用功读书以外，打麻将、捧戏子、逛八大胡同成为风气。

1916年冬，蔡元培来当校长。蔡是前清的翰林，参加辛亥革命，当过孙中山先生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国民党反袁失败后，流亡海外，袁死后回国。他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到校后不久，宣布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提倡思想自由，人各发挥所长，提倡自由讨论。在他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各种学派都可开课，各种思潮可以自由宣传，自由辩论。他所聘请的教授，包括各种倾向的人物，既有激进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也有美国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者的信徒胡适；有讲佛教哲学的梁漱溟；有穿着清朝袍褂、拖着长辫子的封建遗老辜鸿铭。我在北大时，听过李大钊讲《唯物史观》的课，何炳松讲西洋史。我曾向李大钊建议把何的讲稿印成讲义，向听课的同学分发。

在“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像哲学会、雄辩会、音乐传习所、体育会、武术会、数理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等。各种刊物也纷纷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有《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国民杂志》等;也有坚持守旧的刊物,如《国故》、《论衡》。各种社团、刊物风起云涌,蓬勃发展,对全国思想界发生极大影响。1918年10月,红楼盖好,我们搬过去,出版了《北京大学日刊》。有一天,《日刊》上登载两篇文章;一篇是蔡元培的改用白话文、提倡新文学的文章;一篇是林琴南坚持用文言、反对白话文的文章。这是蔡元培用行动贯彻他的自由讨论主张的表现。我记得该期《日刊》出版时,北大红楼前院挤满了人,争相购买,有的一人购买几十份,以至上百份,霎时间几千张报纸就被抢购一空,后来者只好向隅。

这样,就为新思想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1918年5月7日,中国留日学生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举行集会,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酷镇压,全体留日学生罢课回国。5月中旬,归国学生代表李达、龚德柏等到了北京,和北京学生会晤。经过几天奔走酝酿,北京学生于5月21日发动了向反动统治当局请愿运动。当时推出向公府(即总统府)请愿的代表八人,其中北大三人: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五四爱国运动是由山东问题直接引起的。1897年德国强占我胶州湾,辟青岛(初称胶澳)为商埠。1914年欧战开始,日本乘机占领青岛,企图独吞中国。袁世凯想在日本支持下当皇帝,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并将修筑高徐、顺济两铁路的权利让给日本。

1918年欧战结束后,各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参

战的战胜国,要求废除对德条约,收回青岛和山东主权。但日本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勾结,要把德国强占山东的权益让与日本继承。那时的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妥协退让,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因而在1919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

北京学生原定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示威游行。5月2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我参加了这次会,听了他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5月3日晚上,学生会在法科大礼堂举行了1000多人的大会,也有外校学生代表参加,决定提前于5月4日(星期日)举行游行示威。第二天上午又经各校代表在法政专科学校商议了游行步骤。下午,北京13所大专学校学生、教师及其他群众不下5000人,齐集天安门前。我和同学们走在游行队伍行列中,高举“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旗帜,群情激昂。队伍浩浩荡荡地向东交民巷使馆界进发,准备向各国使馆抗议示威,沿途并散发传单,高呼口号。游行队伍走到东交民巷西口,受到外国兵的阻拦,乃派代表向各国使馆递交《说帖》。队伍折向外交部,又转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到达曹宅时,大门紧闭。一位高个子同学在学生人梯支撑下爬过墙,跳进院内,打开了大门,群众一拥进入。我冲进院里时,抬头看到大厅前沿挂着“大总统颁”字样的横匾一方,匾上题的什么字,我没顾得看。进入厅堂,看到铺陈非常豪奢,更增添了心中的愤怒。群众在极度愤怒下,冲破军警防卫,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放火烧了曹宅。起火时我就跟多数学生一道,跑出曹宅,回到学校。在段祺瑞政府警察总监吴炳湘的指挥下,军警逮捕了还没走散的学生30余人,其中有北大的易克巛、许德珩、杨振声等。

由于游行学生被捕,又展开了罢课斗争。5月6日成立了北

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二院。这个组织在此后的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的学生运动，北大站在最前列，北京和全国的学校都唯北大马首是瞻，所以有一个口号：“罢不罢，看北大。”

6月3日，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大举逮捕学生，关押在北大文、理、法三院，这就更加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引起了更大规模的罢课。

北京学生示威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天津学生首先响应，接着南京、上海、武汉、浙江、山西、湖南、福建、两广等处学生，也都纷纷起来响应。6月3日，上海各界举行民众大会，号召全国罢工罢市来援助学生。这样，五四运动就从知识分子的范围，扩大到工商各界，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高潮，犹如烈火燎原，不可遏止。

至此，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被迫不得不释放全部被捕学生，下令免去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并去电巴黎，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字。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五四运动时，我出于爱国热情，特别由于我是山东人，五四运动直接由山东问题引起，所以我曾积极地参加了游行、宣传等活动。在运动前后写过九篇文章，分别刊登在《新青年》、《新文学》、《新潮》等刊物上。现在还能记起的：在《新青年》上我写的是《金钱的崇拜》，在《新潮》上我写的是《如何思维？》，在《新文学》上我写过一篇《新唯实主义》。

在当时，我对于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影响，还没有清醒的认识。1919年冬我留学美国，11月间到芝加哥大学报到注册。该大学教务处的员工知道我是中国北京大学来的，都大吃一惊。他们说：“北京大学校长是国民党人，推倒清朝专制王朝，现在又打伤了

北京政府的三个部长,真是了不起。”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当时的美国文化界有很高的威信。那时一般人在中国出版一本书,版税每元抽一角五分,独蔡元培的著作,每元抽版税三角,因为他的著作一出版,外国人马上就会翻译过去。芝加哥大学一位教“比较政治”课的教授查理·莱利安有一次对我说:“美国人没有你们中国水平高。在美国虽有一些重大的罢工运动,但都是经济性的,为了自己加一点工资,不问国家,不问政治。中国人的知识、生活水平虽低,但为的是国家、民族。如五四,北京大学一些为数不多的人,居然能号召全国,推倒政府,夺回土地,是我们美国远远不及的。”五四运动在美国反应的强烈,在国内是体会不到的。

1921年冬,我在法国留学。1922年太平洋九国会议讨论中国与日本的问题时,要中国与日本在会外单独协商,中国与日本各派代表七人。国内打电报叫我代表山东学生,力争不准中、日会外单独协商,要由大会通过。我和段锡朋、童冠贤、罗家伦、吴之椿等在华盛顿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向中国出席九国会议的代表团的请愿游行。学生们堵住中国公使馆的门口。我向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施肇基及代表顾维钧等说:“你不答应我们的要求,今天就不许你出这个门。”施肇基说:“你来参加当一个代表好不好?”我当时一只手插入衣袋,美国警探疑心我要掏武器,就立即把我包围起来。施肇基对警探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你们散开吧。”

我在欧美留学七年,1926年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二年。当时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傅斯年任哲学系主任兼文科主任。我代理经济学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经常出席由鲁迅主持的教务会议。1927年夏,中山大学的领导权已被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朱家骅等窃夺。作为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在中山大学同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代表朱家骅、傅斯年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那时，鲁迅支持中山大学学生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开展学习马列主义的活动。但朱家骅对学生组织这样的学习活动采取抵制态度，为此事曾有过一场辩论。鲁迅在教务会议上讲话说：“我是主张学生要有研究自由、活动自由、组织自由的，这是北京大学五四运动的传统。”鲁迅的意思是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火烧赵家楼，提倡科学和民主；当时北大有《新青年》、《新潮》派，也有《国故》、《学衡》派，学术空气很浓，学生运动活跃，难道我们现在办中山大学还不如那时的北京大学么？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还要中大倒退十几年吗？朱家骅却说：现在国共合作，和那时候不同，那时是反对北洋军阀，现在的教育就要有领导地进行。鲁迅反驳说：我们按照三大政策办教育，又和三大政策有什么冲突呢？五四时代的学生活动是反对北洋军阀，现在学生的进步活动，则防止新的封建统治。三大政策就是防备军阀统治的再起。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4月15日广州国民党反动当局抓走了好几百中山大学学生。鲁迅在当天下午召开了紧急会议，朱家骅知道后也参加了，校长戴季陶没有参加。到会的不一定是主任，也有教授。我参加了这个会。鲁迅坐在主席座位上，朱家骅坐在鲁迅的正对面。鲁迅说：“学生被抓走了，学校有责任，校长不出来，现在我来召开会，请大家来说话，我们应当是学生的家长，要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出面担保他们出来。”朱家骅说：“关于学生被捕，这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对立。”鲁迅驳斥说：“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罢市。那时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都参加过，我们都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人，现在成百成千个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为什么不营救他们呢？”朱家骅强词夺理地说：“那时候是反对北洋军阀。”鲁迅坚决地说：“现在根据三大政策的活动，就是要防止新的封建统治。”在那样情形下，公开支持鲁迅的人不多，会议没有得到预期的结

果。鲁迅有办好中山大学的愿望，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形势突变，他的愿望不能实现，就决定辞职了。

1928年，我回到山东任省教育厅长。1929年，正是五四运动十周年的时候，发生了省立第二师范公演《子见南子》话剧的事件。第二师范所在地曲阜，是孔丘的家乡，有孔林和“衍圣公府”。孔氏家族在当地势力很大。第二师范于这年6月排演了鲁迅主编的《奔流》月刊上刊载的林语堂所编话剧《子见南子》，引起轩然大波。孔氏家族认为是亵渎了他们的“宗祖”，向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控告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国民党教育部派参事朱葆勤来山东查办。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为维护其封建法西斯统治，尊崇孔丘，明令规定每年孔丘诞辰要举行纪念。那时，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极右分子张继陪同帝国主义分子、日本前首相犬养毅到曲阜参观，受到孔府的隆重款待和珍贵馈赠，他们也给孔府撑腰打气。这时适逢孔祥熙陪同蒋介石路过济南，孔叫嚷“要严办公演《子见南子》事件”，因此这一事件特别复杂，很难处理。那时蔡元培当国民党的监察院长，我请他到青岛商议此事。他同教育部长蒋梦麟来到青岛。蔡先生对我说：“斗争一时还完不了。”蔡先生反对让孔府势力过大，就非正式地对孔府进行批评，定下调子，并在上面大力周旋。在他的支持下，这一案件，以“查无实据”而了案。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调任教育厅督学，后任高中校长。鲁迅曾将此案始末辑入《集外集》中。当时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阶段，《子见南子》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反动势力对五四革命精神的反扑。

1948年，我当国民党北平市长时，曾到赵家楼去看了一下，原来的曹宅已成为一块空地，尚未盖房。回忆五四时的情景，我的感情是复杂的。当时，北平的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学生运动的

对立面了。许多小报的记者问我作何感想,我说:“我当学生时曾参加过三次游行示威运动。学生运动是青年人的事,我现在年纪大了游不动了,但是不要怕学生游行。学生们的热情发挥出来了,回家吃饭,就自然平息了。”从那时起,我已觉悟,我的前半生弯路不应再走下去了,决定辞职不干。1948年冬,我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运动。解放后我在共产党的教育和指导下,才真正给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我曾对台湾广播14次;经中国新闻社向国外发稿约4万字;编中法字典、编德语文法400页;出版了《天文学与天体照像学》(从俄文版译的)、《卡尔·马克思》(译自德文青年读物)、《保罗·郎之万》(译自德文本)、《西藏纪行》等译著。共写、译文章48篇。

(尚转道笔录)

1979年5月

我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

屈 武

五四运动的怒潮激荡着西北的古城

五四那一年，我正在西安私立成德中学读书。西安僻处西北，一向是比较闭塞的。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使西安的一般学生感到国亡无日，于是纷纷自动集合，要求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接着，各中等以上学校开了学生代表联席会议，我代表成德中学参加会议。这个会议决定：西安市各中等学校学生全体罢课；举行抗议示威游行；组织讲演团，向商人和市民宣传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等等。西安学生就这样离开了书斋，走上了街头。5月下旬，学生们举着“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和“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旗子，举行了西安市空前未有的示威游行，并且在街头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讲演的学生慷慨激昂，声泪俱下，讲到最痛切的地方，还有人撕下竹布大褂下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等字。西安学生这种高涨的爱国情绪，受到当地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使这个死气沉沉的古城苏醒了。

在示威游行之后，为了使学生运动组织化、经常化，我们又在西安学生代表联席会议的基础上，组成了陕西省学生联合会，我被选为会长，邹遵（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牺牲）被选为评议长。学生联合会还出了会刊，经常报道陕西各地和全国学运情形，提出陕西省学生的行动口号，对当时陕西学运起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

与此同时,由北京学生发起的爱国运动,日益扩大和深入。全国 20 几个省的学生以及海外留学生,都先后行动起来,举行示威游行,通电抗议,查禁日货。6月3日以后,运动又进入新阶段,首先是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其他各地纷纷响应,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全国性的革命运动。为了表达陕西省学生的决心和意志,并和全国各地学生运动取得直接联系,陕西省学生联合会推选我和李伍亭为代表到北京请愿。我们俩便在6月初联袂北上。

新华门前的怒吼

当我们来到北京的时候,正是北京学生运动继续高涨之时。原来,北洋军阀政府自5月4日后,曾连发两道命令,声称“遇有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依法严惩”;“其有不率训诫、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在6月4日和6月5日,逮捕了在街头讲演的学生1000余人。统治者妄想用高压的手段来扑灭革命的火焰,结果适得其反。统治者的种种倒行逆施,有如火上添油一般,使得斗争的火焰愈烧愈旺了。当时北京各校代表曾在北京大学红楼开会,并邀请各省市已经到京的学生代表参加,决定到总统府请愿,坚决和反动政府斗争。

大概是在6月5日以后,10日以前吧,确实的日期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时间大约在下午3点钟左右,北京各大学的学生和一部分中学生,集中到新华门前,人数有一两万之多,把西长安街围得水泄不通,要求当时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亲自出来接见学生。徐世昌避而不见。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说:“总统不在,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时间已经很晚,希望学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复。”但是,学生们不肯上当,坚决表示不见徐世昌,不得明确答复,誓死不回

校。这样一直僵持到晚上 10 点多钟，人愈聚愈多，有些过往行人，也参加进请愿行列。特别是一些洋车工人，把一天拉车得来的血汗钱，买了烧饼、茶水送给学生。这种真诚的支持，使学生们受到极大的感动。徐世昌看到不见学生不行，才派了他的两位秘书出来传话说：学生可以推派 10 个代表，到里面受接见。

我被推为十个学生代表之一，由北大学生代表领头，一道进了新华门，到中南海。徐世昌接见的地方，大约就是现在的勤政殿。当时警卫森严，如临大敌。首先讲话的是北大学生代表，他代表请愿群众要求：（一）政府下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二）惩办卖国贼；（三）释放被捕学生。徐世昌对学生的这些正义的要求，采取敷衍的态度。他说话的大意是：你们年纪太轻，没有政治经验，容易受别人利用。我们国家多年积弱，不能操之过急。学生们爱国心切，陈述意见，情有可原，如果聚众滋事，那就不对了。希望你们安心读书，国家大事政府自有权衡云云。代表们对徐世昌的答复一致不满，相继发言和他辩驳。我激于一时气愤，说：“现在国家都快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就可能丢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不答应学生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说罢就以头碰地，血流如注。但是徐世昌毫不动心，反而一扭身回里面去了。消息传到外面，激起请愿群众的更大愤怒，要冲进新华门和徐世昌当面讲理，并且和军警发生了冲突。

直到夜半 1 点钟，徐世昌又派了一位代表（据说是内务总长）匆匆出来，说刚才内阁阁员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同意学生的要求，即日打电报给出席巴黎和会的我国代表，命其拒绝签字。我们还怕这是徐世昌的缓兵之计，所以又要他代表徐世昌一方，我们 10 个人代表请愿学生一方，立了一个协议书，正式签字画押，请愿队伍才解散回校。

请愿回来以后,我进医院养伤,同伴们不断带来令人兴奋的消息:“被捕的同学已经释放了!”“卖国贼曹、陆、章已经被免职了!”我虽然躺在病床上,但也得到莫大的安慰。

黄浦江畔全国学生大会师

五四运动的初步胜利,使中国学生切身感受到团结的力量,感到建立一个全国学生联合组织的必要,而这个组织的地点最好在上海,因为上海交通便利,一举一动可以影响全国。于是,从6月起,学运重心便转移到上海去了。6月中旬,北京八校学生代表离京赴沪,开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我也接到陕西学生联合会的电报,派我代表陕西学生前去参加,我便出了医院离京南下了。

我到了上海以后,京、津、宁、杭各校代表已先后抵达。代表们借住在静安寺路南洋商业专门学校里,并以该校学生组织的戊午学会会址作为全国学生联合会筹备会事务所。全国学联筹备会打电报给各地学生联合会和各省省议会,农、商、工会,教育会,各报馆,表达了学生“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主张,提出“除恶务尽,再接再厉”的号召。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大东旅社开成立会,到会的有各省学生代表、留日学生代表和各界来宾 200 多人。教育界、商界、工界的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17日开会通过了全国学联章程;18日正式选举了全国学联领导机构。中国学生自己的组织,就这样诞生了。

在全国学联开会期间,孙中山先生正避居上海。自从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果实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所篡夺了。孙中山先生在 1913 年发动了赣宁之役,1916 年发动了倒袁战争,1917 年发动了护法战争,他一次又一次地奋斗着,在黑暗中摸索前进。

他从1917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中才看到了希望的闪光。当时学联曾经请他到会讲演^①，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五四运动抱着深切的同情。他的讲话大意是：宋代有太学生陈东等伏阙上书，今日有北京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学生不能安心读书，挺身而出干预政治，总是由于政治太坏之故。从五四运动以来，不一月间，学潮弥漫全国，人人激发爱国良知，誓死为爱国的运动，整个社会蒙受绝大的影响，使顽劣的北京政府也不敢摆其锋。此一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收效一定更为伟大而且久远。他在1920年1月间“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当时听讲的学生，大多数同意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有少数人认为学生运动应该是“纯洁”的，不应牵连到政治漩涡中去；更有个别无政府主义分子乘机捣乱。据我记忆所及，就有龔世琳、华林，在会上发言反对孙中山先生，说什么“过去你利用我们给你抬轿子，抬来抬去没有什么结果，国事愈闹愈糟，就是你们这些人搞坏的，无党派的学生，今后要干自己干，再不会上你们的当”。他的这种谬论，被大多数学生噙下去了。

会后，经别人介绍，我到莫里哀路孙中山先生的私宅去拜见他，他很高兴地接见我，谈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话。他鼓励我回到陕西以后，要多在有志青年中宣传三民主义的道理，做救国的事业。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些青年人的身上。”

^① 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载：孙中山到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讲演为1919年10月18日。

重返西安

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之后,已到七八月间,天气渐渐热了,我整装重返西安。回到西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西安中等以上学校的同学,报告了到北京请愿和上海开会的经过,同时也宣传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主张,同学们听了都非常兴奋。

转眼暑假结束了,开学以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当时陕西在反动军阀的统治之下,军阀一天忙于争权夺利打内战,哪有心思办什么教育,因此各校教员长期欠薪,生活无着,只得实行罢教,表示抗议。

当时我所上的成德中学,是陕西督军陈树藩私人掏腰包办的,他为了装璜门面,所以教薪照发,照常开学。我们知道了别校同学不能开学,也决定采取一致行动,不愿单独上课,并且根据省学生联合会的决定,联合各校学生,一道到省长衙门向省长刘镇华请愿,要求补发欠薪,使学生早日上课。由于军警的阻拦,学生们在气愤之下,把大堂上的桌椅器物都打烂了。因为领头的是成德中学的学生,刘镇华和陈树藩一向有矛盾,便根据以往的经验,以为陈树藩有意支使学生给他难堪。刘镇华找陈树藩,问陈为什么利用学生跟他过不去。当然,我们罢课是为了反对军阀官僚的黑暗统治,与陈树藩毫不相干。陈树藩听到了这个消息,也认为是学生给他“眼睛里插棒槌”,给他难堪,便在当天下午带了几百名马弁,包围了成德中学。他把所有的学生集合起来,把他平素认为调皮捣蛋的20多个学生叫出来,要我们承认错误,保证以后永不再犯。20几个人都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分子,没有一个肯承认错误,气得他又吹胡子又瞪眼。他下命令要马弁用军棍打手掌。他一向认为我是其中最坏的捣乱分子,所以打得特别厉害。最后还把我和

陈振荣、陈树屏两位同学扣押起来,关在禁闭室里。两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一点动静,后来有人给我秘密传递消息,说刘镇华不断催逼陈树藩,要赶快处理闹事的学生,以收杀一儆百之效。我再留下来恐怕有生命危险,同时也因为当时在西安已经无法立足,便在同同学们的帮助下逃了出来。我逃到当时以于右任为领导的靖国军总部所在地——三原,去谋求新的活动了。

1979年4月27日

天安门前的爱国斗争

黄助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一起卷了进来,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为了卖国求荣,讨好日本主子,枪杀山东爱国游行的青年学生和市民,并在山东实行戒严。马良这种卑鄙、残暴行为,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和同声讨伐,要求北京政府惩办马良,并立即解除山东戒严,救山东人民出于水火。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召开的紧急会议决定派代表郭隆真等30余人到北京向总统请愿。军阀与政府本是一丘之貉,不但不接见请愿代表,反而将代表拘押在警察厅里。消息传出,全国震怒。我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一致决定再接再厉,又选派代表30多人,联同北京、唐山、烟台、济南各地代表再到北京请愿,除要求惩办马良,解除山东戒严外,增加新的要求,立即释放我被捕代表。并决定由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为领导,在8月26、27两日先后到京。

上京请愿代表去京时,须化装分散乘火车。因为军阀政府早有戒备,派人在车站检查,凡是学生装束者,不许乘去北京的火车。我装成一个普通女子,将平时学生梳的左右两边的辫发改梳成一个“8”字头盘在后脑上,上穿刚做得的白官纱短褂,下穿黑洋绉八褶裙子——那时女学生只穿蓝、白布衫,提了一个包着学生制服和毛毯子的小包裹,顺利地于8月27日坐火车来到了北京。

这时,新华门的辕门里,已经到了好几百代表了,其中有的是

26日来的。男代表在当院(当时新华门大红门外有院落——辕门,后拆除了围墙)活动;女代表人少,就在传达处活动。当中所谓总统府的大红门严严实实地关闭着,水泄不通。我们从早等到晚,一点眉目也没有。政府顾问和国务院秘书唐、胡二人来谈过,说我们请愿手续不对,总统不予接见,只可将请愿书由他们代递。代表们驳斥他们说:每次请愿都是这样,为什么这次就不合手续呢?两人无言以对,就走了。那时只见马骏来往奔跑,同各方面联系,关照大家的安全。当晚召集大家开会,说总统府不走大门,只走后门了。于是大家决定第二天(即8月28日)全体分三路出发:一、留守新华门,二、到西苑门,三、到国务院。决定后,男代表即在当院露宿一宵。

28日早10点钟,等北京各校代表到齐,即集合出发。我们是到国务院去的队伍。除各地代表外,北京学联参加的共有1000多人。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任指挥。

队伍庄严地走着,沿途有市民踊跃地来围着。反动警察来的不少,名为维持秩序,实际是监视和威胁我们,我们昂扬的行进着,喊着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惩办卖国贼!”“惩办马良!”“解除山东戒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收回山东青岛!”……

天津代表走在前头。马骏见沿途人数众多,即乘机宣传爱国运动的事实和经过情况,鼓动听众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还具体地说明了这次请愿的原因。他声音洪亮,词意激昂慷慨,博得听众震天的掌声,大家同仇敌忾,气愤异常。

因为沿途讲演,走路即慢了,到国务院门口时已下午1点多钟。马骏和代表们向国务院传达处交涉,说明我们是来请愿的,要面见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当时走出一个40来岁,身套着值班红带的人来。他狡猾地说:“你们等着。我替你们传达去。”我们很有纪律地站在国务院门前等着,两个钟头过去了,仍没有消

息。我们向传达处催问，为何迟迟不接见？那个狡猾的家伙出来说：“总统和总理正在开会，等开完会就接见你们，你们稍候一候吧。”

我们左等右等，一点消息也没有，可是反动武装警察和军队却陆陆续续开来不少。他们全副武装，荷枪实弹，枪上插着亮晃晃的刺刀，一排排地包围着我们，气势汹汹，如临大敌。

等等，等到4点钟了。我们又去催问，狡猾的家伙说：“因人多不能全体接见，你们选派些代表去见总统吧。”我们即推选马骏和烟台、济南、唐山各处代表共14人，准备进去见总统。在选代表时，我们几个女代表正站在国务院门口。那个狡猾家伙走到门口，细声细气地对我们说：“你们几位女士，早先回去吧，站在这儿和他们在一起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是为爱国而来，目的是一致的，既同来就同一行动，同生共死，决不预先逃避，怕死就不来了……”那狡猾家伙狞笑了一下就走进去了。

反动军警来的相当多了。里面传出命令说：“总统没空，不接见了，你们走吧！”这时，见我们刚选出的代表，被军警两人挟一位，向前走着。我们大家怒气冲天，就跟在后面，和他们一起走，全无畏惧之色。

走了不远，马骏对军警说：“我们代表是为救国而来，不怕牺牲性命，不必挟着我们走，我们是不会逃跑的！”军警们放了手，任代表们随队行走。两旁夹着武装军警，每边四排人，把我们夹在中间。马骏为保护女代表安全，请队伍中北京童子军同学多人，用大家的童子军棍，横拦成一个长方块，让女代表们在中间走，以免反动军警有不轨行动。代表们照样是边走边高呼口号。

再走不远，马骏见市民跟随不少，他即手执国旗，登一土阜上，高呼队伍暂停下来。市民立即围拢上来。马骏挥动手中国旗向群众问道：“这是什么？”众说：“是中华民国国旗。”马骏即说：大家说

得很对。国旗是代表国家的，我们中国人应该爱护它，爱护自己的国家，不容别国侵略。日本曾和袁世凯签定二十一条的条约，现在又侵略我山东青岛，就是想灭亡我中国。同胞们，要勇敢起来保卫中国，我们宁死不当亡国奴。我们要使中国永远存在世界上。我们要打倒侵略者，要抵制日货。济南镇守使马良甘心卖国，枪杀我爱国同胞，并用戒严来压迫我山东同胞。我们这次请愿要求惩办马良，解除山东戒严。不幸我们前几天请愿的代表被捕；现在我们又被捕了。我们不怕牺牲性命，为爱国而死，是最光荣的。只求后人得享自由独立的幸福，我们于愿足了……听众非常感动，掌声响彻云霄。

马骏又转过来对军警演说：你们是中国人，应该爱中国。你们现在来阻挠我们的爱国行动，是长官命令，不是出自你们本心。你们多可怜呀！成天辛苦，得不到几个钱，听说好几个月没发饷了。钱上那儿去了？不是被长官入了腰包了吗？……反动军警听了非常难过！女代表也向群众演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国不爱，反而卖国求荣，真是禽兽不如。我们中国人，要起来保护中国，使任何外国都不敢来侵略我们中国，使中国永远独立于地球上……。群众更加感动。

队伍回到新华门，见里面已站满了凶恶的军警。我们存下的衣物都丢掉、散失了。再一打听，留在这里请愿的代表，都被军警挟持到天安门去了。军警不让我们进去，我们也就折到天安门去。

我们进了天安门，大家很疲惫，就坐在庑廊下面休息。这时，三处的代表汇在一起见了面。马骏精神奕奕，威风凛凛地又站在高台阶上向军警和留在天安门里的人讲演。内容还是鼓励大家爱国，不要为军阀政府的卖国诡谋所蒙蔽。那些人都聚精会神地倾听，表现出很受感动的神态。

天渐黑下来了。北京爱国团体派人挑来饭和菜给我们吃。大

家决定绝食。由马骏代表向他们致意,请他们把饭菜挑回去。

我们因为气愤满腔,不觉饥饿。我两天内只在新华门传达处分到半个“拉车”——“楔子”——解渴。

天更黑了。恶鬼军官出来指挥武装军警,把明晃晃的刺刀插在长枪上,横冲直撞地乱打我们。我们在大空场内跑着躲闪,乱成一片,被打得受伤的受伤,躺倒的躺倒。我被打在腰部,躺倒了。代表们不少受伤的。唐山代表郭友三受了重伤,回唐山即牺牲了,天津曾为他开了追悼会。

恶鬼们打累了,停下来用恶语谩骂,简直不堪入耳。还扬言要逮捕天津代表,尤其是要逮马骏。当时马骏勇敢地对大家说:“他们要逮我,我出去就是了!免得大家受累。”大家不同意地说:“既网来,就闹生共死,都是爱国,谁拖累谁呢?对军警,哪能这么老实,听从他们逮捕。再说我们来请愿是为了释放上次被捕代表,现在不但被捕代表没释放,你又要被捕去,他们凭什么要逮人,我们犯了什么罪?……”这一番话使马骏同意了。于是商定了替马骏改装的办法。一个代表脱下他穿的毛料西装来换了马骏的蓝布大褂,并换了皮鞋。马骏日间活动很多,恶鬼们都知道他是留飞机头的。代表们急于找剪刀,要铰短马骏的头发,可是哪儿来的剪刀呢?

马骏化完了装,恶鬼们又来了。他们吆喝着:不许动,动即开枪。这时已是三更天了。恶鬼们拿着手电向一个个代表的脸上照,并用手抬起代表的头来照了又照,照了一个更鼓的时间,也找不出马骏来。恶鬼们恼羞成怒,狂吠谩骂,又来了新花招。他们点燃了大汽灯,照得四周如同白日,更细心地找寻,却仍找不出马骏。恶鬼们暴跳谩骂,我们却坦然不动。

不久,反动家伙又出了毒主意,用四个兵士挟一个代表,一边两个人,拉到大门口时大声喝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来的?”等

被问人答完了，他们就推他出大门，放走了。这样挨个放了不少人。轮到马骏，也照样地喝问，马骏正严厉色地说：“我是马骏！”士兵们就把他逮住了。这时只剩下几个男代表了。他们说：“糟了，糟了！马骏被捕了。我们要赶快出去设法救他！”

约到四更时分，院里静下来了。一个男代表也没有了。忽然来了两辆小汽车。几个军官走到我们跟前说：“你们几位在这儿怎么样啦？他们都走了。”我们认为马骏已被捕，得出去共同设法救他，继续进行斗争，呆在这儿已没什么作用。于是就回到了集合地点。领队人告诉我们先回天津，再行设法。

天津学联得知这些情况，怒不可遏。各校学生倡议要全体徒步去北京请愿，质问政府，营救代表。各界联合会经过讨论，决定先选派 10 位代表再次赴京请愿，营救代表，不得要领时，然后各校学生徒步去京。

过了些天，马骏到我校来告诉我们，他已返津，是由各界联合会 10 位代表和他们学校——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先生等保出来的。我们和他在学校照相留念。现在我还存着他和杨宝森同学与我校校长照的照片。这张照片曾登在《益世报》上。其他照片，在我回粤时，遗失了，非常可惜。

以上是为要求惩办马良赴京请愿的经过。因为马骏大闹天安门，后来人们把他叫做“马天安”。

(天津市政协供稿，1964 年 12 月)

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

俞 劲

五四运动发生时,我是北京高等师范理化部三年级的一个学生,我亲身参加了这个划时代的伟大运动,曾是高师参加北京联合会的代表之一。从五四开始经过“六三”,一直到各界联合会的种种活动:如请愿、游行、抵制日货、派代表赴各地活动等,整整地搞了一年。现将我的亲历,谨述一二。

关于五四运动的背景、起因、经过、意义等,已有许多人写了回忆录和纪念文章。我在这里只回忆五四运动的前夕以及五四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一些情景。

五四运动的前两天,少年中国学会、爱国会、国民杂志社三个团体的少数成员,大约 20 余人(尽我的记忆所及,大都是湖南人和江西人,有匡日休、夏秀峰、易克嶷、熊梦飞等);在高工或北大理学院(现在想不起到底是哪一场所)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与会者异常愤慨,有主张暗杀卖国贼的,有主张实行暴动的。最后决定派人密查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行动,并准备于 5 月 4 日那天采取行动。这是五四前夕秘密会议的大概。这一会议,可以说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事件的准备战。

1919 年 5 月 4 日上午 10 时左右,各校学生约六七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每人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打倒卖国贼,收回山东权利”等标语。大会决议先向各国公使馆游行示威,再向总统府请

愿,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对巴黎和会签字。大会后,队伍向各国公使馆所在地东交民巷出发。队伍到达东交民巷口,被外国兵阻挡不准通过,据说是根据辛丑条约,中国人不能成群结队通过公使馆所在地。我们派代表向各国公使交涉达二三小时之久,终无结果。这时群情愤怒万分,又一再要求,最后只准通过大约 200 公尺左右之远,由一个小胡同出来。队伍出了小胡同之后,依照大会决议,应向总统府去请愿;但走在队伍前面的人(有些是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议的),却有目的地引导队伍浩浩荡荡向赵家楼曹汝霖公馆走去。

队伍到达曹汝霖公馆,只见公馆大门紧闭,有数十名武装警察守卫着大门。学生队伍只好在大门外怒吼高叫“打倒卖国贼”的口号。但是如何能打进去?公馆大门的左右边,各有一个一人多高的小窗户,这时突然有领队某君(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人员之一,湖南人,高师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膂力过人),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随即有好几个警察死死的拉住他的腿往下拽,领队的学生们看到后,有的就用尽力气去掰开警察的手,坚持不下。另有一部分人就痛哭流涕地向他们演说:卖国贼如何卖国,中国如何危险等,警察们终于被感动而放松了手。某君头向里面一望,内部还有数十名武装警察,正枪口对着他。接着某君向这些警察演说,警察大概也由于良心发现,不敢开枪,改变了瞄准的姿态。某君便不顾一切地跳下去,迅速而机警的把大门打开了,于是大队学生蜂涌而入。

几千学生涌进了曹汝霖公馆之后,便分散到这个像“大观园”的公馆各个角落。于是每个角落都是一片喊打声、捣毁家具声。各处搜寻曹贼,不见踪影。忽而搜得一个人出来,有认识的人喊道:“这是章宗祥呵!”群众愤怒极了,于是你一拳,我一脚,把他打倒在地。正打得起劲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人,拼死命地保护着他。

你打章的头,他用身体遮盖章的头;你打章的脚,他用身体遮盖章的脚,这样拼命保护章贼,却一言不发。有人认识的喊道:“这是个日本人,真奇怪得很呵!”大家恐怕闹出国际交涉来,把章宗祥打得一个半死,才让那个日人把他护送去了。等一会又搜到了曹汝霖的父亲和姨太太,大众不约而同的痛骂了一顿,骂他的父亲为什么养出这样一个卖国贼的儿子;对那位姨太太赏了两个耳光。院子内停着一辆小汽车,也把它捣毁了。大约到了天将黑的时候,忽然黑烟从后进房院升起,一会儿火势熊熊地蔓延了起来,我们广大的青年群众痛快淋漓地高呼口号而散。第二天才知道后面走得慢的同学,被捕了20余人。这场火究竟怎样起的?当时知道的人不太多。放火的人也就是那位跳窗户开大门的某君。当时队伍在大街游行的时候,我和某君同在队伍前面,他要我快跑去买盒火柴,我知道他不吸烟,干么要火柴?但立刻体会他要买火柴的意图,便迅速地离开队伍买了一盒给他,这盒火柴果然得到了妙用。这就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情形。

(1961年12月)

回忆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

方 豪*

我于1894年12月出生于浙江金华东南乡的一个满百户的小麓村里。我的家庭是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

我于10岁时进本村的私塾读了一年书,11岁,父亲送我到城里乐群小学去上学,15岁小学毕业。我的祖父要我改学种田,我的父亲看我读书还不错,尤其小学里教我的两位老师异口同声地说:“这小孩子很可造就,还是让他再念几年书的好。如果经济为难,我们可以稍稍补助他一点。”于是我有了师长的资助,加以父亲的同情,就鼓着勇气于15岁时考取了杭州私立安定中学,在这所中学里读了5年书。虽然就年龄讲是全班最小的一个,但成绩往往名列前茅,因此很承师长们的器重。

19岁在中学毕业了,但是我的彷徨歧途的烦闷也就从此开始了。照我自己的志趣,一心要想上进,最好能有进大学的机会。我的祖父固然叫我改业,就是我父亲,虽然希望我再能上进,但困于经济,也就丧失了鼓励我的勇气,这时的我确是感觉到痛苦万分。最后还是由于师友们的鼓励和资助,勉强借集了300元银洋,就单身离家到了北京,很幸运,竟让我考进了全国知名的国立北京大学,在那里整整读了8年书。1921年,当我26岁时,完成了大

* 本文据方豪自传节录。

学教育。

在我受大学教育的过程当中，恰巧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了所谓和会。当时国内是北洋军阀专政，那班不学无术的糊涂虫，只知卖国求荣，不管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形成了外受帝国主义欺凌，内受反动统治压迫的恶劣局面。而出席所谓和会的我国代表，无力扭转局势，竟想在巴黎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激起了一批热血青年的愤怒。但在反动军阀高压之下，很少有人敢出头发难。于是我和二三有志的同学，就暗地里秘密联络一部分北大同学，不避艰险地发动了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口号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彼时在北京的各大专科学校的同学们莫不一唱百和，很快就联同一起，高举义旗，于1919年的5月4日上午8时，在北京的天安门前聚集了1万左右的大专学生和部分中学生。大家一鼓作气，浩浩荡荡地向着卖国求荣的国贼曹、章、陆进攻，火烧了曹贼官邸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这就是震动全国以至全世界的五四运动。

这个反帝反封建运动爆发之后，北洋军阀政府大怒，当天逮捕了青年学生32人，一起关在北京大学的第三院（北河沿），受尽毒打与虐待。但是北京的广大群众却从迷梦中被这一伟大的运动唤醒过来，莫不齐口称快！最明显的表示是第二天就造成了北京全市罢课、罢市、罢工的从来未有的严重局面，致使反动军阀集团张惶失措！同时，策动这一伟大运动的青年同学们，为扩大效果，博得全国广大人民的一致同情，立刻组织了北京学生联合会——后来扩大为全国学生联合会，我曾充任首任主席。在5月7日的那一天，我被北京学联合会推为全权代表，兼程赶赴天津、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策动一致罢课、罢工、罢市的运动，并策动组织各地的学联合会。每到一处，不出三天就收到良好的结果。

在五四运动展开后的两个星期内,我曾经和天津学联合会代表杨兴亚、上海学联合会代表何葆仁,同去见孙中山先生于其上海寓所。孙先生和我们三个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谈了三个钟头的话,他的最后结论是“团结才有力量,诸位要希望这次学生运动发生力量,收到一定成果,惟有加入中国国民党。大家团结一致,来共同努力才是办法”。当时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一致回答说:我们都是学生,我们都还在求学时代,没有看到过三民主义的书籍,所以不知道三民主义为何物,因此未便冒昧入党;再说这次学生运动,是完全出于青年们的爱国至诚,既没有什么党派作用,也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所以发生了极大的号召力,并博得全国各界广大的同情心。虽然在这运动初发生时,北京的一般政客们也曾无中生有地造过谣,说什么这次学生的狂妄行动,是受了进步党所利用的、研究系所鼓动的,但是我们可以一言蔽之:“问心无愧”。

5月中旬我会同天津学联合会总代表杨君兴亚、上海学联合会总代表何君葆仁同赴广州,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到了广州,召开了4次群众大会,吸引了听众10余万人,所以不出三天,非但全体青年学生一致响应,连广大的工商界也一致实行罢市、罢工。

于是就以京、津、沪、粤四大都市为基于,向北京的反动统治者,提出罢免曹、章、陆等卖国贼及拒签巴黎和约的群众要求;北京政府因碍于舆论和人民群众的正义呼声,不得不暂时就范,罢免了曹、章、陆,拒签了巴黎和约。

但是这一暂时就范,决不是由衷的,我们也很明了。彼时这般顽固反动的军阀们,决不会对我们从此甘休的。果然不出所料,在1919年的6月3日,就发生了北京第二次大规模逮捕青年学生的血腥事件。一共逮捕了46名所谓各大专学校的激烈分子,而以北大的我、工专的夏君秀峰和法专的何君其伟三人为“主犯”,——彼时我担任北京学联合会的主席,夏、何二君是工专和法专的出席代

表。——于1919年6月3日下午在北大第一院举行学联会议散会时，在沙滩东口一齐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其它各校代表40人。被捕后我和夏、何分别隔离，关在首都卫戍司令部；其余各校的代
表们，则混合分禁在三个大统间。我就这样被关了7个月零8天，至1920年2月初旬才被释放。

在这七个多月的牢狱生活中，身体虽失却自由，精神上却得到了一种极大安慰。因为我在牢狱当中，依旧不断地向看管我的士兵们作宣传，我在狱中，不到一个月就和他们混得很熟了。有两件事给我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印象，迄今回忆起来，我还是深深地信仰着，为了人民福利的真正革命精神是可以感召一切的。

我所说的两件事，第一件是卫戍司令部专门派来看管我的一位名叫张得标的营长和他的部属，这位张营长据他的部下说他是一字不识的。有一次他的长官问他：“兵”、“骑”、“工”、“辎”四种兵种中“骑兵”作何解说？他回答“骑兵”是旗人当了兵的意思，结果被长官臭骂了一顿。他的知识贫乏至于此，但是却没有影响他的正义感。因为他看管我久了，混得很熟，每次见面总是向我问长问短，如什么叫做五四运动？究竟跟谁作对？你们的打算是怎么一个意思等问题。我就三番两次地用传教士的姿态，和他反复细说，久而久之，结果是他真的被我感动了。他的结论是：“你们学生们没有做错事。”并且他还用很憨直的态度发了许多诚恳的言论，他说：“我们的总长（指当时卫戍司令段芝贵——即小段）只知道住洋房、坐电车（北方普通人叫汽车为电车）、讨姨太太，对我们当小官儿和士兵们的痛苦一点也不管。”“要是我张得标不穿上这一身老虎皮，也愿跟你们一块儿干他妈的一下子。”我在狱中过了一个农历年，这位张营长在大年初一那一天，竟买了两盒茶点，并且带了他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看管我的房子里向我拜年贺岁，我当时真受了极大的感动。

第二件事是,半年来我和轮流看管我的士兵们也混得很熟了,他们也不时向我问长问短,我也乘机和他们宣讲五四运动的动机、经过和目的。他们听了后的反应都说是“对的”、“对的”。所以我入狱不到半个月,每个值勤的士兵,都自动地愿意替我往外送信,并为减少我的寂寞,自动替我借了许多小说。他们有时也要求我讲给他们听,这是他们平时对我的态度。等我出狱的那一天,他们竟合资买了许多水果和茶点送我,并且纷纷问我出狱后的住址,以约后会。

我出狱后,当年5月间,在李大钊、马叙伦诸先生帮助之下,由北大母校派我和其他4位同学去日本各大都市考察劳工运动情况,以资借鉴,为期3个月。在日本东京时曾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老友宫崎滔天,以及他的儿子新人会会长宫崎龙介诸人多所往还,并结识了我国著名文艺作家田汉等。归国后曾经写过《日本劳工运动的面面观》一文,载在当时的《世界青年》杂志。1921年6月,我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

(原载《金华(市)文史资料》第二辑)

五四时期参加赴京请愿活动的回忆

管易文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我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当时的姓名是关锡斌。

天津的学生爱国运动是由天津南开中学马骏、北洋大学谌小岑、高等工业学校谌志笃、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郭隆真、邓文淑（邓颖超）等人发动起来的，周恩来同志当时正在日本留学，回国后即参加领导天津的学生运动，并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积极推动学生爱国运动的开展，并唤起各界爱国人士一致行动。

1919年8月，山东济南发生山东军阀马良镇压学生运动、枪杀爱国人士的惨案，激起天津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极大愤慨。天津各界联合会组织了一个赴京请愿代表团，于8月23日会同北京和山东的代表3000余人到北京新华门（那时有围墙，东西两边各有三座门），向总统徐世昌请愿。徐世昌闭门不见，一直相持到晚上。我和郭隆真登上三座门旁的栏杆上，对总统府大声疾呼，叫徐世昌出来。我还对持枪军警说：“我们都是爱国学生，要救国，你们军警为什么包围我们？你们为几块钱，便做看门狗，给压迫你们的人看门！”有几个军警听了就把枪放下了。这时忽然有一个警官用枪托猛打我的头部，头破血出。张若茗、张嗣婧等人急忙将我送到米市大街青年会三楼，包扎好伤口后，嘱我不要出去。但在他们走后，我又到新华门去了。

这次赴京请愿归来后，周恩来、马骏、谌志笃、郭隆真、邓文淑、关锡斌、谌小岑、张若茗、李锡锦等人研究，必须加强组织，共同奋斗，才能救国。于是发起成立了“觉悟社”。“觉悟社”于1919年9月在草厂庵学生联合会地址召开第一次会。参加的有南开中学的周恩来、马骏、潘世纶、薛撼岳、李震瀛，高等工业学校的谌志笃，北洋大学的谌小岑，直隶第一师范的关锡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郭隆真、邓文淑、李毅韬、张若茗、郑漱六、张嗣婧、刘清扬等。“觉悟社”由周恩来、马骏、谌志笃、郭隆真、邓文淑领导，成为领导天津学生运动的核心力量。

同年9月下旬，为抗议山东军阀马良杀害爱国人士，山东、江苏、湖南、湖北等省，联络天津各界人士再次赴京请愿。天津代表中，学生有郭隆真、张若茗、薛撼岳、黄爱、关锡斌等；各界代表有马千里、时子周、冯复光等。10月1日，代表们到新华门，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徐派出总统府参议曾毓雋出来敷衍应付，被代表们碰了回去。到了晚上六七点钟，突然来了军警多人，用旧式的所谓“轿车”（一马两轮的马车，仅容两人可坐）十余辆，将代表32人强行装入车中，我和黄爱同被塞入一车。然后押送到警备司令部（在现王府井协和医院前右侧路北），每十人住在一间看守房间。在看守所中我和黄爱经常谈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日甚一日，都感到实在不能容忍，我说：“与其苟且图存，遗羞万古，何若大张挞伐，以决雌雄。不幸而败，虽败犹荣，再不幸而灭亡，虽亡不辱。”我们还向看守我们的军警聊天说：“我们是爱国的学生，我们反对日本通倭出卖我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这有什么过错？为什么要把我们关进来。我们都有父母兄弟亲人，你们为了几块钱为卖国贼欺压人民，心里难过不难过？”有一位姓戴的警察对我耳语说：“现在外界各方要援助你们，闹得很凶，不久可能放你们出去，有什么信我可以带出去。”我们与外面联系后，知道正在援救我们。不久，在

被拘禁 30 多天后,警备司令吴炳湘决定放我们。我们就问他:“你凭什么把我们抓进来?为什么现在又要放?我们不走!”吴奸笑地说:“不是逮捕你们,因为你们代表在外面游行讲演太累了,到这里可以休息一下,你们不是都胖了吗!”我们气愤极了,说:“卖国贼这样压迫人,早晚不得好下场!”最后,他们用大车将我们强行押送放出。

释放出来以后,郭隆真对我说:“你这样激烈怒骂徐世昌等,放出以后,他们还会用别的借口和方法处治你。”我说:“我失去了父母,经亲友协助进入师范学校读书,现在毫无办法……。”一位同难的戴君说:“最近中法勤工俭学会招生到法国半工半读,我们大家想法资助你。”于是在 1919 年 12 月 9 日我乘法轮金字塔号离上海去法。这是第二批去法的,约 150 余人。徐老特立亦乘此船赴法,经香港、海防、科伦坡、吉布提,通过红海、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在马赛港登陆,乘火车到巴黎,同徐老分配到巴黎东郊莫兰书院补习法文,开始了解法国情况和世界知识。1920 年周恩来同志也到了法国。周恩来同志曾对我说:“你太过于感情化,要改造中国是不能这样的。”至今仍无一日能忘这一句箴言。

我参加了五四运动

梁 实 秋

我那时候在清华学校读书，学校在北京郊外，我们只能在周末进城一次。我记得第二天全体学生集合在操场上体育馆前面，站在体育馆阳台作主席的是陈长桐。我们这位老同学是天生的领袖人才，他说话有条理、办事有才能、为人有风度。清华的学生在服装上和城里的学生不一样，平时都是布衣一袭，但是列队外出则颇为整齐严肃，高等科的学生一律着兵操军服，中等科的学生一律着童子军装。我们列队进城受到盛大欢迎。天安门前集会，被军警包围，拘送北大法学院，清华的同学亦在其列。以后我们逐日派队进城参加游行，作街头演说鼓舞民众抗议政府。这时候有一辆汽车驶了过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打，我们一涌而上，用旗竿打破了汽车玻璃，汽车狼狈而逃，我们不知道汽车里坐的是什么人，我们觉得坐汽车的人大概挨打不算冤枉。

这个运动由学生掀起，是自动的，没有人指使，也没有人操纵，只是爱国的热情表现。所以等到学生运动扩展而为商人罢市，由北京而及于上海，这运动的目标初步达成之后，这运动也就消歇下去了。但是影响所及，学生们醒起来了，五四运动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学生们的组织力加强，学生会纷纷成立。以清华的学生会而论，其组织是颇为民主的，评议会的成员由各级选举，干事会为执行机构分组工作。我们的学生会因为和学校当局齟齬，

一连发生三次风潮,把校长三人逐出校外,其基本原因是当局的官僚作风未能因势利导。全国其他各校也是事变迭起,秩序大乱。但是在另一方面,学生们的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对旧有的不能一律满意,乃欢迎外来的新的思潮,诸如政治学说、经济理论、文学、艺术的思想,纷至沓来。

五四运动中的北京女学生

吕云章

五四运动发生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因遭受政府的顾忌,及不满政府对亲日卖国分子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的袒护,于5月9日,留辞出走: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这封短柬由北京大学学生油印分送至各校后,立即引起很大的震动。在师长方面,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洪谔、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高等师范校长陈宝泉及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等相继辞职离校,北大教职员推派代表谒教育总长傅增湘请求挽留;在学生方面,则屡次召开各校代表会议,谋商对策。政府在这种情势下,不得不有所表示,5月14日,遂有令挽留蔡校长,但同日却另有令挽留曹、陆等。学生当然仍感不满,遂继续开会,非达到蔡校长复职,曹、陆等被罢黜,决不罢休。

于专上学校继续向政府陈情请愿之际,北京各中学学生也当仁不让,毅然起而响应,与大专学生组成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15个中等女学校(其中女师已有专修班五科,准备改为高师)虽然没有加入,但却派有代表孙继绪、王仲尧等去出席会议,并

不时提供意见，备供该会讨论参考。另外女中学生并筹划成立北京女子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

由于学生的要求未能被政府所采行，自5月19日起，专上及中等学校（女校不在内）开始全体罢课。北京全城大街小巷，尤其各游戏场所，无不随时可看到讲演或叫卖国货的学生。25日，教育部下令各校校长会同教职员督饬学生，限于三日内一律复课。警备司令部、步军统领署、警察厅则派出大批军警，严厉驱逐街头活动学生。6月1日，大总统下令两道，一替曹汝霖等辩护，一谴责学生。于是军警对学生的取缔与驱逐，更趋严厉，一时街头学生活动因而绝迹。

学生对政府此种一味袒护国贼，压迫爱国宣传等措施，当然益增激愤。遂秘密议定于6月3日恢复街头讲演，如遭逮捕，则次日加倍派人，直到所有学生被捕尽而后已。3日上午，学生按决议进行，军警则依命令逮捕，至晚已捕去一百七十八人，旋送往北大法科拘禁，化学校为囹圄，从此开始。4日，学生仍按原议进行，又遭逮捕，一日之间，被拘禁者达七八百人，北大法科已不能容纳，一部分复被送往理科。就在这情势非常严重，各界深虑学生爱国运动势将难以为继的时候，一支生力军——北京15所中等女校的学生，突然起而增援。

于5月间北京男学生罢课宣传游行请愿进行得有声有色之时，女学生却天天在校上课，从表面看来，好像一切都十分宁静，实则她们的内心，与男学生并无不同。她们所以没有迅速采取和男校学生一致的行动，是因为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譬如：

（一）她们求学的机会非常难得，她们能读到中学，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幸运了。她们必须把握时间，努力用功，方可不负宝贵的良机。不到万不得已，她们决不愿参加罢课游行，以免妨碍学业。

（二）当时社会一般心理，总认为女孩子不应抛头露面。一个

十六七岁的姑娘，如果到街头和男孩子混在一起，无论有什么理由，都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一般家长对女学生的管束都是特别严格，除了上学之外，总是禁止她们单独外出。

(三)当时女师范已设有专科，行将改制高师，人才众多，声望亦高，所以其他各女校的活动，无不以女师的马首是瞻。而女师校长方还先生，为人温和保守，据说又新得政府授给五等嘉禾勋章，自极不愿学生有与政府敌对的行动。是故于五四运动发生以来，就一面命教职员对学生严加约束，一面通知各家长决不允许学生有罢课行为，学生如果违犯，即请家长领回，宁肯将学校解散，校址交还政府，绝不让女师为学生运动的场合。

(四)当时北京 15 所女校中，除女师附中等三校外，其余如培华、慕贞、度志、燕京等 12 校都是教会所办。一般教会学校的主持者，一向多是尽量避免学生参加校外种种活动。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学校当局与学生家长有意无意之间，形成一配合，再加上女生本身的困难，自然使她们的活动，大受拘束。

6月3日，军警大批逮捕街头宣传与叫卖国货学生的消息传到各女校，她们感到已忍无可忍，决定在4日下午列队到总统府去请愿。4日午后1时许，女师全体同学在大礼堂开会，由评议员（当时各校多有评议会，其性质略同于后来的学生自治会。女师评议会有评议员七人，陶玄、孙继绪、吕云章等均为评议员）陶玄主席，并有各女校代表列席。会议开始后，一面由主席报告学生被捕及北大被军警包围的情形，一面推定孙继绪等撰写请愿书，并作整队出发的准备。

会议即将结束，请愿书尚未写好，有人来报告附中学生来到。她们的队伍很长，由劈柴胡同直排到东铁匠胡同，先头已经到达女师的后门，要女师同学赶快加入。这时候，学校为防止同学们参加请愿，前面的正门早已上锁，所以大家便赶快排队，准备由后门出

去。突然吕云章看到舍监夏连芳先生往后门跑去，她立刻高声大喊：“夏先生要去关后门啦！我们快走吧！”大家听到喊声，也顾不得排队了，一窝蜂似的离开礼堂，但跑到后门时，门上已经上了一把大锁。那是两片很厚的木门，做得非常坚固，大家正感束手无策，一位据说曾练过拳术的黄淑范同学，率先用她的肩膀去搦撞，大家立即上去帮忙，外边附小的女教员也参加推拉，就这样在内外合力之下，很快的两扇大门便被拖下来。

大家冲出大门后，自动的两人一行的排起队来，紧接附中队伍的后面，向总统府进发。一路上看热闹的行人，大都驻足观看，现露出奇异的眼光。许多军警跟随着队伍在旁边监视，但却没有阻拦，也没有逮捕。直等队伍到达总统府前的铁栅栏外，才受到警卫的阻止。经说明来意，府中准许各校推派代表进去，但这时却发现请愿书没有带出来。原来大家冲出后门的时候，请愿书还没有写好，孙继绪同学等只好暂留在那里继续写，准备写好后随后赶上来。但等写完后，学校已经迅速的把后门修好，又关起来，她们无法冲出，只好在学校里等。直到由总统府前派回去的同学到达，才把这份请愿书从门下递出，再拿到总统府前，交代表们向总统呈递。

可能是故意的安排，代表们进入总统府后，方才获悉总统徐世昌不在，由秘书陈子厚代表接见。代表们也无可奈何，便把 15 女校同学来此目的，向陈秘书说明，把请愿书交给他，请他一并转达。他们提出的要求大略为以下四点：

- (1)大学不能作为监狱，请从速释放被捕学生。
- (2)不应以对待土匪的办法对待高尚的学生。
- (3)以后不得命军警干涉爱国学生的演说。
- (4)对学生只能告诫，不能拘禁虐待。

陈秘书允许三日内答复，然后各校同学才列队而回。

各女校学生在这次请愿中，一切都表现得非常好，深得各界的赞许与同情。那时候刚换夏季制服，女师师范部学生一律是淡灰裙、淡灰上衣，专修科学生则是蓝布褂、黑裙子，后头一律都梳一个小髻；附中的学生也是淡灰裙、淡灰制服，头上则是左右一边梳一个小髻。队伍从下午1时后陆续出发，到总统府前变换队形排列站立，等代表们向军警交涉，等派人回去取请愿书，又等代表们进总统府去陈情请愿，好几个钟头之久，没有一个人坐下休息。尽管那天狂风猛吹，飞沙走石，每个人的头上脸上身上都加了一层黑灰，好像煤球一样，而且回校时已经黄昏了，但各校的队伍仍然秩序井然，没有人随便谈话，也没有人脱离队伍。

女师同学回校后，听说方校长获悉学生冲出后门去参加请愿的消息，即行通知教职员开紧急会议。会上他表示对学生此种行动甚为不满。国文专修班的一位导师陈钟凡先生提议，是否可以派人把学生劝回来。方校长本来就疑心学生活动，陈先生可能在暗中鼓动，听到他的发言，立刻很生气的说“道不同不相谋，合则留不合则去”，于是陈先生立即拂袖而去，另外一位吕凤子先生也当场表示对校长的态度不满，辞职退席。会议不欢而散，方校长便到教育部辞职去了。学生家长则纷纷来学校去看望他们的孩子，直到见面后问明了一切情形，才放心回家。

方校长提出辞职虽然未被批准，但他却通知学生家长，要他们把学生领回，否则出了问题学校不负责任，于是家长们便都到学校来领学生。但这时大家已经约好了，谁都不回去，一定要留在学校里，谁回家谁就是汉奸。所以尽管会客室里坐满了家长和他们的儿女，但他们费尽了唇舌，想尽了方法，希望他们心爱的孩子能跟他们回家，以免再涉及任何游行或请愿的危险，却一点效果都没有。谁也想不到即使那些平时在父母面前一向很乖顺的孩子，现在也变得如此倔强而不能说服。张曼均同学的母亲素来最有办

法,也最疼爱她的女儿,因此平时张同学对她母亲的话可以说是百依百从,但这一次却失败了,她用尽千方百计,张曼均就是不肯回家。

由于这一次盛大的团体行动,使各女校无形中打破了一向的藩篱。各女校的同学都来帮女师同学挽留校长,她们说:“为什么我们的校长都不辞职,只有你们的校长辞职呢?”同时,男校的活动,女校也开始参加了。因为政府不肯惩办曹、章、陆,虽已下令释放被拘禁在北大法科和理科的学生,他们却拒绝出来。6月8日晚,各校学生代表集会,决定自10日起,全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同往总统府前痛哭,此一会议即有各女校代表在内,而且各女校学生也决定参加。10日上午,大家正准备出发,接到政府电话,已有令准曹汝霖等解职,这项痛哭的计划,才因而停止。从此以后,女师等校也开始请胡适之、蒋梦麟等诸先生讲演,社交开始公开,男女交朋友也已不再被视为特殊,妇女界的思想与社会风气都大为转变。

回忆天津五四运动及“觉悟社”

谌小岑

1919年,我是北洋大学冶金班的学生,当时一直想“注意重工业”的建设来富国强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和会”,中国也派了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居然依照日本的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青岛的租借权、胶济铁路以及沿线矿产资源的开采等,在对德和约中写成三项条文,转给了日本,要中国签字承认。消息传来,立即引起全国舆论的坚决反对。5月4日,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高呼口号:“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

5月4日北京学生的示威运动,在天津引起了共鸣。

5月6日上午,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学生谌志笃来找我。我们1916年曾在高等工业学校同学一年,加上同宗的关系,因此很熟识。

我把他介绍给高年级的同学,讨论了如何响应北京学生运动的问题。

谌志笃的原意,是想推北洋大学的同学出来主持天津的运动,因为天津只有北洋是个大学。后来,因为北洋毕业班同学要进行毕业考试,他们考虑到自己的前途,有顾虑,又由于北洋大学远在西沽,离市中心太远,联系上不方便,几个学校的同学代表商议的

结果决定,以水产学校和高等工业学校作为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会址,5月14日正式宣告成立。推谌志笃为会长,南开中学代表马骏和第一中学的韩致祥(即韩麟符)为副会长,下设各科负责各项具体工作。另由各校代表一人组成评议会,决定5月23日举行罢课。

接着,在5月中旬和下旬,又接连举行了几次示威游行,强烈要求罢免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汉奸官吏、收回山东主权、否认“巴黎和会”条文、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

与此同时,有几个学校还分别出版刊物,开展了文字宣传工作。

《北洋大学日刊》围绕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学生何罪,爱国其罪”、“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论点,发表过几篇社论,在群众中反应强烈。

这期间,第一师范、第一中学也出了日刊。

二

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也宣告成立。这个团体是以第一女子师范的毕业生和同学为主体的,还有中西女中、严氏女中、普育女中、贞淑女校等校的学生和教职员,以及几位教会的妇女活动家参加。她们在西北城角等处设立有讲演台,进行爱国宣传活动。

在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推动下,天津各界联合会相继成立。参加的有天津教育界、新闻界、宗教界、工商界等团体及人士。

天津是华北一个进出口的大商埠,商会的活动对抵制日货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许多商店的青年店员,斗争情绪极高,督促检查各商号制订抵制日货的办法,行动十分活跃。

6月10日天津商会罢市。天津和塘沽的码头工人拒绝装卸

日货,天津三个火车站(总站、东站、西站)的铁路工人一齐罢工,天津“五四”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

三

6月5日,是天津学生运动开始进入高潮的一天。

在学生联合会的统一布置下,15个大中学校的学生近万人,于一早就齐集在南开中学前面的广场,举行了宣誓仪式,准备一次大规模的游行,并向省长公署请愿,提出否认“巴黎和约”条文、废除“二十一条”、罢免卖国贼、全面抵制日货等要求。学生们的爱国行动,遭到直隶省长曹锐派来的武装军警的阻止。军警们说:“奉了大总统的命令,禁止学生游行。”学生们坚持不散。几经交涉,直到下午,才允许推出马骏等代表四人去见省长曹锐。代表们离开南开广场后,近万名学生与武装军警继续坚持斗争。

马骏等四位代表去见曹锐。他们经过大胡同时,看见省长公署前面的金刚桥吊起,以阻学生游行队伍过桥,足见当时军阀当局的恐慌。学生代表见到曹锐后,他对代表们提出的各项要求(电请政府收回山东权利,取消“二十一条”,否认“巴黎和约”条文,罢免卖国贼等)拒不作答,反而要求学生即日复课,不准上街游行,更不得有损日本人的生命财产。随后甚至破口大骂,胡说学生示威游行会造成天津地方糜烂、日本海军登陆、引起战祸的种种危险。代表据理力争,坚持“不达到罢课的目的,决不上课”。后来知道,曹锐对学生代表一派怒气冲冲的言词,是在他出见学生代表之前,日本总领事见他时所提出的恫吓之词的反应,足见这个卖国政府省长的可耻可恶的嘴脸。

这时,在南开广场坚持斗争的广大学生,在下午4点多钟,终于冲破了武装军警的包围,浩浩荡荡地走向了街头。由南开广场经过南马路、东马路、大胡同,直奔省长公署。当时有几百名第一

女子师范的学生的队伍，排列在省长公署辕门前，声援到来的游行队伍。

在省长公署内的谈判相持不下，教育厅长王章祜设法解围，对马骏等代表们说：“学生队伍已到东辕门了，你们去看看吧！”代表们遂退了出来。这时，天色已经快黑了，学生队伍开到黄纬路高等工业学校的操场。马骏对大家说：“省长要我们明天上课，我们说学生罢课的目的一项也没有达到，决不上课！现在上海已经罢市，我们有责任促使天津商界也罢市。”

四

6月6日早晨，各学校门前都驻扎了武装军警，并贴有一张警察厅长杨以德的告示，内容大意是，“奉大总统明令，禁止学生结队游行、散布传单”云云。门禁森严，学生单独也不准出入校门。

6月7日，个人只要没拿旗帜和传单，可以自由行动了。晚上，各校学生代表便在法租界新学书院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化整为零”的方式，于8日下午1时在东马路基督教青年会附近集会，然后结队游行。

队伍分作两部分，一部分到省长公署，一部分到警察厅，要求省长曹锐、厅长杨以德书面答复为什么要禁止学生的爱国行动，要求召开公民大会。

这次行动进行得较为顺利，曹锐被迫允许学生在讲演所讲演，并同意6月9日在河北公园召开公民大会。

五

6月9日的河北公园公民大会是成功的。掀起了天津人民的爱国热潮。

当日，河北公园由于学生联合会发动大批学生经过彻夜布置，

显得整洁严肃。会场中心悬有大幅标语，上联为“振民气合民力万众一心”，下联为“御国敌除国贼匹夫有责”。下午1时开会，到会的公民达两万多人。学生联合会代表马骏首先宣布开会理由，大意说：“我们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已一个多月，全国人民热血奔腾，抗议呼救，但至今卖国政府在国际外交会议上还未拒绝签字，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至今还未罢免惩办，他们都是官官相护，一鼻孔出气，要想达到我们救国的目的，只有靠我们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奋斗到底……”接着被邀的各界代表，包括教育界、新闻界、宗教界、工商界，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一致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天津人民团结起来，收回山东权利，否认“巴黎和会”把山东权利让给日本的条文，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群起抵制日货。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会后，学生联合会率领到会群众组成队伍到天津商会，要求天津各商店于6月10日响应上海商会的号召，举行罢市。商会负责人被迫答应了学生们的请求，连夜发出了通告，号召全市各商店实行罢市。

六

商店罢市的消息，吓坏了天津军阀当局。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对商会的负责人说：“如果商店罢市，警察就要罢岗，这样市面的秩序就难以维持了。”妄图以此来恫吓商会，阻止商会罢市。

学生联合会连夜筹谋对策，决定由各校的童子军和学生分会分区负责站岗，维持市面秩序。结果，商店罢市的这一天，市面上虽行人众多，熙熙攘攘，但并未发生任何破坏事故。

北洋大学同学负责北大关以北街道的站岗任务，每二小时换班一次，同学们站岗时，手中拿着一根棍子指挥车辆、行人，市面上

秩序井然。

这样的行动使北京卖国政府感到十分恐慌。他们连夜派人来津，威胁利诱，许以罢免几个负责对日外交的官员，要商会停止罢市。

天津因有外国租界关系，不少商人与外国商人有所勾结，尤其是日本的轻工业产品充斥天津市面，一些买办、奸商从中获利很厚，因此，他们也极力破坏罢市运动。

罢市一天，商人不无损失，6月11日便又开业。但是，商会中也有一部分爱国商人，经学生联合会说服教育的结果，6月12日有一部分商店再度罢市。

由于这次行动是全国性的，铁路工人以及全国各地工厂工人也举行了罢工。

一连三天的全国范围的群众革命行动，迫使北京军阀政府明令免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亲日汉奸的职务。

三个卖国外交官员的罢免，虽然算是这次爱国运动的一次胜利，但是抵制日货、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否认“巴黎和约”条文等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曹、陆、章三个人负责对日外交，直接同日本人打交道，以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权利换取日本源源供给贷款来维持这个腐败不堪的卖国官僚政府，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其实他们三个人的企图也就是整个卖国政府的企图，他们之被罢免，不过是充作替罪羊罢了。

七

青年学生的头脑是清醒的，大家都认识到北洋军阀政府不推翻，中国没有挽救的希望。因此，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并未因曹、陆、章的免职而中止。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北洋政府就采取了一个恶毒的阴谋，

于6月中旬密令各省市教育厅转各大中学校当局提前放暑假,并让家长们把学生接回家去,想借以瓦解遍及全国的学生运动。

在当年,能够到大、中学校读书的人,大部分属于官僚、地主、买办、资本家的子女。在家长的督促下,不少学生果然回家去了。这对天津学生联合会在事实上确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学生会的骨干也大半走了。

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会长谌志笃是贵州人,他看到还有一些远地的学生没有回家,于是采取了一个对策,邀集各学校留校的学生会负责人集中到南开中学办公。

在这一号召下,我们《北洋大学日刊》的编辑、经理有5个人也搬到了南开中学。《北洋大学日刊》是北洋大学学生会在罢课后出版的,我一直是该刊的经理兼记者。6月10日,全市罢市、罢工,马路上挤满了人。我们的刊物本来只印1000份,后来增加到3000多份。10日这天,我带着一卷报纸在东北城角官银号附近卖报。报纸的定价本来是每份一枚铜元,可是不少人给我一角或两角的小银币不要我找钱。还有一个人竟给了我一枚银元。当时人民对学生爱国运动的同情,使我非常感动。这天的报纸一直印到傍晚才停,一共销了两万多份。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永远不能忘的:

当时,除《北洋大学日刊》外,第一中学和第一师范也出版了刊物。三个学校刊物的记者经常集合一起,共同行动。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在西北城角一带的小商小贩、人力车夫住宅区搭了一个讲演台,每星期在那里举办三次讲演会,听众都是些老老少少的妇女,秩序很好。

我们三个校刊记者曾多次到那里采访,招待我们的是当时只有16岁的邓文淑(即邓颖超)。她每次对我们都是热情接待,临散会时,总是要我们对她们的讲演会提些意见。起先,我们以为这不

过是一番客气话,并未重视,后来,由于她一次比一次的更加诚恳、严肃、谦虚的态度,使我们不好意思起来。

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这位年轻的女学生对我们的要求是真诚的,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唯唯诺诺地敷衍一番完事。经过几度商量,在她第四次向我们提出同样的问题时,我们就把我们的共同看法,诚恳坦率地告诉了她。大体上,提了这么三点意见:

第一,女界爱国同志会费了很大的气力搭起了一个讲演台,又难得召集到几百上千的妇女前来听讲,应该趁此机会,放宽讲话内容的范围,不要局限于抵制日货一个题目;

第二,关于男女平权,送女儿上学,放足(当时我们看见十几岁的姑娘们还是有缠足的)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着重宣讲;

第三,可以组织几个访问团,到这些人的家里去,同她们拉拉家常,看看她们在家里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邓文淑向我们表示了热情的感谢。在第五次的讲演会上,讲话就增加了新内容,在群众中反映很强烈,为此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和满意。

八

大约在6月20日左右,我们几个《北洋大学日刊》的负责人搬到南开中学的时候,谌志笃看见了我,约我担任学生联合会的会计科长。

宣传科的同学们编印了一期《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谌志笃看到内容贫乏,不让发行。他约我到基督教青年会去见一位刚从日本回来的南开同学。他说,已经同这位朋友见过一面,要我一同去同他谈谈。

谌志笃约我去见的的朋友,就是周恩来。当时只有21岁。他在南开中学毕业后,就去了日本,这次是特为天津的学生运动回国来

的。

在初次见面时,我看到的并不是一个魁梧奇伟的身材,谈起话来也不是那么慷慨激昂的样子。说话的声音并不高,但是,显得那么沉着实在而有力,那么和蔼、诚挚、可亲。

谌志笃这次找他的主要目的是请他负责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爽快地答应了。

经过一个时期的筹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于7月21日出版了。最初是日刊,后来改为三日刊。受到读者的欢迎,销行达二万余份。

周恩来在发刊词上提出了“革新”和“革心”的主张。“革心”就是“改造思想”,“革新”就是“破旧立新”,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这是从中国革命的长远目标着眼的宏伟目标。

从此,周恩来就成了天津学生运动的中心人物。

九

五四运动是以山东问题为导火线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青岛以后,又派兵占领胶济铁路沿线,济南车站即驻有日本兵,济南也成了日货倾销的市场。

山东,特别是济南的学生,响应五四运动,在济南举行过几次示威游行,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利”等口号。运动一天比一天激昂。山东的军阀、济南镇守使马良,怕开罪日本人,引起冲突,竟在8月初对学生爱国运动实行武力镇压,命令军警开枪打死打伤爱国群众多人。因此,济南学生联合会特地派代表来天津请求支援。

天津学生联合会决定派遣大批同学到北京示威请愿,要求北京政府惩办马良。

从8月21日起,天津学生开始分批向北京出发。23日下午抵

达北京的天津学生将近千人，会同北京学生 3000 余人在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北京卫戍司令部、警察厅逮捕了几十个同学，3000 多学生围住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相持不下。北京政府又动员两千多武装军警将学生包围，企图驱散学生队伍。

京津的三四千学生，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马骏的领导下，同军警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马骏的指挥使得这群军警毫无办法。他常用声东击西、突破一点的办法，弄得军警狼狈不堪。

黄昏时候，北京反动当局特别又从南苑调来几千武装兵士，由一名高级军官负责指挥，将学生队伍包围起来，把学生逼近天安门广场。

军警看出指挥学生队伍行动的是马骏，便派了几十名士兵将马骏包围起来，将他逮捕。然后又用棍棒驱散群众，把学生和群众赶出天安门。

这次斗争相持到 28 日午夜，才算结束。

这件事引起北京、天津、济南以及上海等地舆论的强烈抗议，一致要求北京军阀政府立即释放被捕代表，指责北京政府残暴、无耻。

天津在京的学生和北京学生并未停止斗争，而是天天继续在全市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要求释放马骏和被捕学生。

据说，当时北京军阀政府有人主张枪毙马骏，但又怕这样一来将徒然促使全国学生运动的更加激烈。结果，在 8 月 30 日不得不将马骏和所有被捕学生全部释放出来。后来，我们“觉悟社”的社员们都把马骏叫做“马天安”。

十

自从 6 月下旬以后，我负责天津学生联合会会计科的工作。

8月24日,湛志笃要我携带款项到北京去办理天津在京学生的后勤工作,安排他们的伙食、住处等问题。大多数天津去北京的同学都是自费买票的,有的住在亲戚家里,有的是在北京学生联合会的照顾下安排住处及照顾伙食。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人就住在西直门大街的天主教堂,她们都是自己出钱开伙。只有极少数几个天津同学受到学生联合会的接济。

8月30日,全体被捕的同学被释放出来以后,分批返回天津。最后有八个办理后勤工作的人是在9月2日下午乘坐一列客货混合慢车回津的。这一次慢车,给了我们一个一路谈论天津学生运动今后方针的问题的机会。

八个人当中,有五个女学生、三个男学生。其中女同学有郭隆真、郑漱六,男同学有特为到北京照料请愿同学生活的周恩来。

谈话的内容,最初集中在北京一个星期来的见闻和感受。大家都发现北京已出版几种介绍新思潮的期刊,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废除宗法礼教”和欢迎“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

所谓“德先生”就是“民主”,是从英文 Democracy 一字的译文而来;“赛先生”是“科学”,是从英文 Science 一字的译文而来。

大家都觉得北京的运动已经前进一大步了,天津极应急起直追。后来就渐渐谈到天津爱国运动今后的方向,认为应该把天津的学生运动引到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方向上来。

这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周恩来写的文章中本来已经有过这么一些含意。在谈话中他听到女同学中也觉悟到这个新的方向,就提议天津也出版一个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来推动天津的文化运动。得到了大家的同意。

另外,第一女子师范的同学郭隆真、张若茗提出想把天津男女学校的学生联合起来,改组学生联合会,也得到大家赞成。

这一路上的谈话,便产生了天津男女学校同学合组的新学生

联合会和由周恩来领导的男女青年合组的“觉悟社”。这在当时，都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新事物。

十一

天津的女子中等学校只有第一女子师范和中西女校等几个学校，而中等以上的男学校却有 15 处之多，至于学生人数男生更是远远超过女生。但是在改组后的新学生联合会中，工作人员中女同学与男同学的比例却为一比三。第一女子师范的张若茗当选为执行部负责人之一，邓颖超当选为宣传科长；中西女校的同学也有不少人被推为干事。

经过两星期的酝酿和周恩来、谌志笃、马骏等做了具体的准备工作，“觉悟社”也于 9 月 16 日在东南城角草厂庵学生联合会办公室里成立了。一共是 20 人，10 个女青年和 10 个男青年。女青年中有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长刘清扬、副会长李毅韬，她俩都是女子师范的毕业生，还有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各科负责人，邓颖超、郭隆真、郑漱六、张若茗、周之廉、张嗣婧及吴瑞燕等，都是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还有一个是中西女校的教员李锡锦。男青年有七个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其中五个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周恩来、编辑潘世纶及外勤赵光宸、胡维宪、薛撼岳等，还有两人是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马骏和干事李震瀛，其他三个人是：学生联合会会长谌志笃、第一师范的学生关锡斌（1939 年入党后改名管易文）、北洋大学学生谌小岑。男青年的名单是周恩来提出来的。

周恩来从一开始就是“觉悟社”的领导者。每次开会大家都公推他为主席。

第一次会议决定出版一个刊物定名为《觉悟》，公推周恩来为主编。主办这个刊物的团体就定名为“觉悟社”。

《觉悟》第一期，原定 10 月中出刊，由于在这期间大家忙于参

加爱国运动，以至延迟到第二年1月才出版。

十二

“觉悟社”成立后，决定约请北京各大学的名教授来天津讲演。被约请的有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几位先生。李大钊先生是9月下旬的一天来的。在学生联合会讲演后，特意来到“觉悟社”的社址，那是设在河北四马路东兴里十一号李锡锦家中的一间简陋的小房里。我们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和大钊先生谈了一个多小时。大钊先生对天津男女学生合并组织学生联合会和男女青年成立“觉悟社”表示赞赏。他鼓励我们要好好研究世界各国革命的新思潮。大钊先生那种长者的和蔼可亲的态度和朴素无华的谈吐，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这以后，我们大家都很喜欢阅读大钊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十月革命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时事的述评，以及妇女解放的文章，充实了我们当时感到空虚的头脑，大家都热心地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十三

北京军阀政府对于山东问题并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交涉；同时，山东军阀马良杀害爱国人民的罪行不仅没有被惩办，反而变本加厉，又迭次镇压爱国运动，甚至又枪杀了回教爱国领袖，因而引起山东各界爱国人士的极大愤慨。由山东爱国团体发起，邀请上海、南京、武汉、河南、湖南的代表于9月下旬到了天津，约请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派代表到北京再次请愿。

天津决定派10个代表参加，其中有三个“觉悟社”社员，连同山东等地的代表共32人，组成请愿团，于9月30日到了北京。另

外,由周恩来率领我们几个人同请愿团一起到北京替请愿团办理后勤工作,照料代表的生活。

10月1日上午9时,32个代表列队到了新华门,要求面见大总统徐世昌,为守卫的士兵所阻止,徐世昌派出代表同请愿团谈话,不得要领,相持到下午7时。当晚,卫戍司令部派来武装军警百余人将全体代表押送到警察厅关禁起来。

周恩来当即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商议营救请愿团的办法。决定于“双十节”在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等处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催办山东交涉,要求释放请愿代表。

这次32人组成的请愿团被关押了40多天,由于全国舆论的抗议,于11月中旬才释放出来。

十四

10月10日上午,天津各学校的学生和市民两万多人齐聚南开广场,到会的人都各自备了一面小旗,上面写着各种标语,声势浩大。

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恐惧万分,派了几百名武装警察把住南开广场出口,不让游行队伍出发。相持到中午,队伍冲破一个缺口,一拥而出。队伍一直奔赴警察厅,在门前高呼口号,质问杨以德为什么禁止学生、市民的爱国行动,要求杨以德出来答复。

杨以德动员了各学校的校长、教职员,劝诱学生回校,相持半夜才陆续完全离开。北洋大学远在西沽,学生队伍是最后离开警察厅的,回到学校已经是天快亮了。

天津的“双十斗争”相持了一个多星期。学校原已开学上课,有几个学校的学生会决定罢课一星期,分批到附近街道讲演,揭露卖国政府的罪行。

杨以德于11日的清晨就派了武装警察把守学生联合会和各

界联合会的大门,禁止开会。几个“觉悟社”社员在周恩来领导下,在东马路基督教青年会宿舍租了几个房间,每天夜间工作,将一天来天津斗争情况汇集起来写成报道,油印若干份寄往各地学生联合会和报社。

我们还集体用一个旁观者的口气写了一个传单,详述“双十节”天津学生和市民同警察斗争的经过,借以揭露杨以德阻止庆祝国庆、反对民国的罪行。

这张传单铅印了2000份,遍贴全市各街道,并寄给全国各报刊,经《上海时报》全文转载。这张传单署名“李宁二”,取列宁第二的意思,足见当时“觉悟社”社员已开始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他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尊崇向往。

十五

“双十斗争”以后,天津学生运动一时似乎进入一个较为平静的阶段。这是因为各学校都已开学上课,公开的集会在军警压迫下不好举行。学生联合会只得暂定每星期在法租界基督教维斯理堂开会一次。

11月福州发生日本侨民枪杀学生和警察的惨案。天津各界联合会决定加强抵制日货,以实际行动表示对福州惨案的抗议。在学生联合会的鼓舞下,以商店店员为主体的抵制日货的运动进入了一个更深更广的活动高潮。

店员们熟悉天津市场的情况,他们知道哪些商店是专门贩卖日货的奸商。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各界联合会成立了一个“跪哭团”,专门到几家奸商门前跪哭。要求他们不再贩卖日货,揭露奸商们的卖国罪行。

这一行动,引起许多儿童和过路行人的围观,给那些奸商店主以极大的难堪。而天津又是日货运往华北各省必经之路,对日货

运往内地也是个沉重打击。

日本商人感到抵制日货的损失重大，便寻找各种机会想和天津爱国团体直接冲突，以制造借口压迫北京政府，从而成为天津爱国运动最后受到打击压迫的一个主要根源。

十六

由于接受了李大钊先生的启示，“觉悟社”的社员开始进入一个埋头钻研理论和集体研究问题的阶段。

当时，北京、上海都出版了多种介绍新思潮的刊物，我们都设法订购了来。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我们也读过几期。

有一个时期，我们在法租界基督教维斯理堂开过几次会。后第一女子师范租到河北三马路三戒里四号的房子，便经常晚上在那里开会。每次会议都是周恩来主持。他别号翔宇，我们都用他的别号来称呼他。讨论的结论每每是由他做出来的。

有了社址以后，除了晚上的研究会，白天大家就动手写稿，准备出版《觉悟》第一期。由于印刷困难，一直到1920年1月才出版。序言是周恩来写的，着重于青年要改造思想，破除陋习。其中有两篇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是张若茗和郑漱六写的。

《觉悟》只出了一期。本来已收集了一批稿件，因为“一·二九”事件发生，周恩来和几个社员被捕，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被封，大家都忙于营救他们，没有付印。

在这以前，“觉悟社”又吸收了三个新社员（二女一男）；但他们都只参加过很少几次谈话，等于没有入社。另外又通过社友八人，男女各四人，男社友有黄爱（原名黄正品）、陶尚钊、胡嘉谟、梁乃贤；女社友有王贞儒（后改名王卓吾）、李愚如、郭蔚廷（郭隆真的妹妹）、韩恂华（北京大学第一批女生韩权华的六姐）。

社友中的一个突出的人物就是黄爱（当时在高等工业学校读

书)。他于1920年回到长沙,成立了湖南第一个纯正的工人团体“湖南劳工会”。1922年1月17日为湖南长沙第一纱厂工潮,在罪恶资本家出卖下,被军阀赵恒惕杀害。当时,周恩来在德国得信后,写了一首《生别死离》的诗篇,就是为悼念黄爱而作的。

由于经常开会讨论,探讨问题,彼此加深了了解,社员间的情谊更日益亲密起来。在1919年12月的一天,有人提议,将来分散后,应该用代号通信,以作掩护。这个意见得到大家一致同意。决定用50个号码,用抽签的方法,由20几个社员各抽一个,就用这个号码的谐音作为自己的别名,用以通信或作笔名。结果,邓颖超抽的是第1号,别名“逸豪”;周恩来是5号,别名“伍豪”;刘清扬是25号,别名“念吾”;谌志笃是50号,别名“武陵”;李毅韬是43号,她一度用“施珊”,后来就一直用“李峙山”,作她的本名。此外,郭隆真是13号;马骏是29号;张若茗是36号;郑漱六是34号;关锡斌是18号;潘世纶是19号;张嗣婧是37号;李振瀛是28号;李锡锦是31号;吴瑞燕是21号;胡维宪是20号;薛撼岳是11号;赵光宸是9号;周之廉是3号;谌小岑是41号。

十七

北京军阀政府对于山东问题一直没有进行交涉,福建惨案发生以后,天津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又在深入地持续进行,有时并与日本商人直接发生冲突。卖国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对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的压迫更加严厉。因此,又发生了1920年1月29日省长公署门前的一场斗争。

这天下午,在学生联合会负责人的领导下,各校1000多男女学生,手持各种标语的小旗列队到省长公署请愿,要求曹锐代电北京拒绝青岛直接交涉、收回山东权益、催办福建惨案、启封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释放被捕代表。

队伍进入了省长公署辕门,但是省长公署的大门却紧紧关闭着。相持了两个多小时,里面传出话来,要学生推派代表去见省长。同学们当场推举了周恩来、于兰清、郭隆真、张若茗四位代表去见曹锐。由于害怕学生们的正义斗争,里面军警却不敢开门,四位代表就从门坎钻了进去。后来知道曹锐并没有接见他们,而是把他们关进监狱。

大约在5点多钟,从东辕门进来几百个武装兵士,将学生队伍团团围住,企图把学生赶出西辕门。学生们同军警进行了搏斗,用手中的旗杆痛打士兵的头部,掀掉士兵的军帽。

有一件戏剧性的事是:有一个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是一个营长的女儿。这个营长的随从马弁,也在兵士队伍中间,看见他家的“小姐”也在学生队伍中,连忙立正敬礼,被这位“小姐”痛斥一番。

在这次搏斗中,有几十个学生受伤,被送进医院。

这天的斗争,我担任后勤交通工作。事后,连忙到法租界打电话报告北京学生联合会,并发了一份通讯稿,油印寄发各地学生联合会和报社,引起各地各界人士和学生对反动当局的极大愤慨,和对这次正义斗争的同情与支持。

第二天,天津军警当局在日本人的压力下,竟又逮捕了20个爱国团体的代表,把他们关进警察厅拘留所。

学生联合会没有被捕的负责人当即又发出了许多信件,呼吁各地学生联合会和报社声援。

以后,谌志笃、邓颖超等还组织了24个人,其中大部分是“觉悟社”社员,要求替代被捕的人坐牢,但警察厅长杨以德不准替换。杨以德在广大群众的抗议下,4月7日,除把患重病和年纪较小的代表先行释放,然后将余下的21位代表,又移送地方检察厅。

最后,学生联合会聘请了几位津京著名的律师刘崇佑等向法庭起诉。控诉天津反动当局迫害爱国团体负责人,要求公开审判。

地方审判厅不能不受理。律师们以“爱国无罪”为理由力争,7月17日,终于迫使将周恩来等21人释放出来,释放时,并在地方审判厅门前合影留念,这张相片就是《革命文物》1978年第2期所刊登的那幅照片。

天津各团体召集了一次盛大的群众大会热烈欢迎这21位代表的释放,由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组织了100多人慰问队及九辆汽车,到地方审判厅门前迎接,并且把大红绸花和铸有“为国牺牲”的纪念章佩戴在每位代表的胸前。

在这五个多月的牢狱生活中,这20多人在周恩来的发起组织下,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活动。主要的是分组举行座谈、讲解马克思主义、交流思想和学习的心得,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

周恩来当时写了《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前者是记述在警察厅拘留期间坚持斗争的前前后后,全文曾经在当时天津的《新民意报》连载,后由该报辑印成书;后者根据被捕代表在狱中的日志和日记编成,由《新民意报》逐日刊登,后又新印字馆刊印成书。现在这两部书幸而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天津五四运动宝贵的历史文献。

十八

周恩来等被释放后,于8月初发起召集一次“觉悟社”年会。

当时,有两个社员已经出国,一个社员在南京投考高等师范,一个社员回家省亲患病,有几个社员因家庭关系半年来退出了各项活动。

那次年会,14个人参加,在法租界一间小楼房里开了三天,每一个社员都谈了一年多来的思想变化和感受。

最后,由周恩来做了两项结论:

一、我们都还在青年时代,最长的只有25岁(谌志笃),年轻的

只有 17 岁(邓颖超),我们都缺乏革命的知识 and 经验,今后应该继续求学,充实我们自己;

二、我们应该团结各地的爱国团体,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

开会的最后一天,我们 14 个人在鼎章照像馆合照了一张相片作为纪念,这就是现在各地方各书刊所复制的那幅相片。

十九

1920 年 8 月 16 日,有 11 个社员到了北京,请李大钊先生约集了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几个团体于 8 月 16 日上午在陶然亭开了座谈会。除“觉悟社”的 11 个人外,北京方面有 30 几个人参加。

邓颖超报告了“觉悟社”成立的经过和一年多来的活动。周恩来把在“觉悟社”开会时提出的关于“联合改造”的意义作了说明,获得与会者的一致支持。李大钊先生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鼓励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说:“今日世界之潮流,极其显然,凡为一个团体,必须有其明确主义;如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统一全体意志,对外也不便采取联合行动。所以旗帜要举得更为鲜明……”并提出恳切希望,“要同工农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因为 20 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当时决定由到会的每一个团体推两个代表,起草一个文件,作为今后共同行动纲领。经过几次商议,通过了一个“改造联合宣言”和“约章”,提出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要本着团结互助的精神,组织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到群众中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切切实实地做点事”。

这次开会的经过及纪录,登载在 1920 年 9 月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三期上。

二十

1920年下半年,有几个社员相继出国。先后有六个人勤工俭学去了法国,一个人去了美国。

在国内的社员,有二人于1920年冬参加了张太雷领导的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编印了一份《劳报》,这算是天津第一份关于工人运动的刊物,并且同唐山铁路机厂工人取得了联系。

1921年,经李大钊先生介绍,两个社员参加了苏俄政府中央新闻机关“华俄通讯社”,担任编译工作。

1923年,邓颖超、李峙山应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的邀请,由北京回到天津,在达仁女校任教。我们三个社员发起组织了一个“女星社”,借用《新民意报》副刊编辑了《女星》旬刊和一个定名为《觉悟》的不定期刊,专门登载“觉悟社”国内外社员的通信稿件。

“女星社”还办了一个女星成年妇女补习学校,先后招收了50多个学员。其中有一个女学员是唐山铁路机厂一个工人的妻子,由学校供给她伙食,担任学校的一些勤杂工作,算是一种勤工俭学方式。这个学校的毕业生,有三个人被介绍到天津国货售品所任店员,倡导妇女走向社会,谋求生活独立。

1923年5月1日,我们三个人出名约集了第一女子师范、高工、北洋、法政的20几位同学举行了一次小型的纪念会,这大概是天津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纪念会吧!

1923年秋,我们又出版了一个《妇女日报》。由于宣传反对直系军阀,不久被禁止发行。

在《女星》旬刊、《妇女日报》上都广泛地讨论了当时认为重要的各项妇女问题。

这也算是天津五四运动带来的一些活动。

二十一

“觉悟社”社员中，有一部分人因思想问题、人事关系退出了革命队伍，有的加入了国民党。但是总计有八个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五个人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的活动对天津、唐山及华北各省的革命运动，以及党的建设培植了基础。

特别是马骏和郭隆真两位烈士先后于1928年、1931年分别在北京、山东被捕后，惨遭军阀杀害，为革命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他们的鲜血染红了今天飘扬全国的五星红旗。

二十二

当年继“觉悟社”之后，还有以省立第一中学和中西女校的十几个同学组织的一个“新生社”。该社社员在天津的五四运动中，也有一定贡献。于兰渚（即于方舟）就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个。张太雷领导的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也有该社社员参加。

二十三

天津五四运动是以青年学生为中心，团结了工人阶级和其他各个阶层，对北洋军阀卖国政府的压迫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以猛烈反击的一次规模浩大的群众爱国运动。概括起来，天津五四运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在全国青年学生中，天津学生是最先响应北京学生罢课的。

二、在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敦促下，天津商会于6月10日响应上海商会发动的罢市，开始了大规模的罢市。这一行动对于天津“五四”运动的发展，影响很大。

三、天津、塘沽的码头工人，拒绝起卸日货。三个车站（总站、

东站、西站)的铁路工人也在6月10日罢工。

四、许多商店店员组成的“跪哭团”，对于专事贩卖日货的奸商给以无情的揭露和打击。

后两件事，反映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反映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一是因为天津日租界是日货进口的枢纽，商店店员抵制日货和工人拒绝起卸日货，使日帝受到沉重打击。

(1979年1月)

天津五四运动的回忆

孙越崎

我原名孙毓麒，是1916年在上海复旦公学毕业后考入北洋大学采矿系的。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我是天津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参加了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

北洋大学的校址在西沽，距市中心较远，大门上刻有“国立北洋大学堂”七个大字。实际上，校长的任免和经费的拨付均由直隶省管。教授全是美国人，只有物理、化学实验室和野外测量的助教是中国人，校长、总务长也是中国人，但他们只管行政，不管教务。功课很多，考试频繁，学生只知读书，不问政治，是一个守旧的学校。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召开和平大会。日本帝国主义在大会上提出要由日本继承德国人在我国胶东半岛的全部权利。北洋军阀政府有意签订这项条约。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激于爱国义愤，发动北京全市大中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会后游行示威，火烧了亲日汉奸曹汝霖的住宅，殴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北洋军阀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30多人。北京学生当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这就是五四运动。

当时，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天津，天津的学生群情激愤，立即起

来响应。天津市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九人秘密集会,讨论声援的办法。记得到会的有:河北高等工业学校的谌志笃(贵州人)、南开中学的马骏(吉林人)、天津美术专科学校的沙主培(天津人),北洋大学由我代表出席。大约集会讨论了两三次,最后一次会上决定全市大中学校第二天一律罢课,表示声援北京学生的革命行动。当时会场上气氛非常严肃紧张,在表决时,要一个一个站起来表态,大学代表在前,中学代表在后。那时我想,虽然北洋大学存在着保守势力,罢课可能有一定困难,但广大同学是爱国的,为争取释放北京被捕学生、拒签辱国条约,他们一定会冲破一切阻力,支持罢课的,因此我第一个站起来表示:“我代表我校全体同学,从明天起,一定罢课。”接着,高等工业学校的谌志笃第二个站起来表示同意,第三个轮到高等法政学校的代表时,他说:“问题太大,不能负责,不敢表态。”一时很煞风景。当时天津只有这三所高等学校。然后,南开中学的代表马骏马上站起来坚决表示罢课,会上气氛为之一变,其他几个中学、中专的代表也都表示同意罢课,终于作出了罢课的决议。全市罢课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表决后大家立即散会,赶回学校去召开学生大会进行布置动员。我回到北洋大学时,已经过了下午6时吃晚饭的时间,我也顾不上吃饭了,立即找了几位同学商量,大家都很兴奋,马上分头向各个宿舍同学进行宣传。当时我考虑,能否实行罢课,关键在于即将进行毕业考试的三年级同学,因为如果罢课不考试,他们就拿不到毕业文凭,在那时没有文凭是谋不到职业的。因此,我就先找毕业班几位平时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在班里有影响的同学谈心,向他们介绍了情况,请他们支持,他们也都表示支持。我又向校长赵天麟作了汇报,他不置可否。在作了这些准备工作之后,就摇铃召开全校学生大会。会上,我详细报告了各校代表开会的经过情况,说明了第二天起天津市大、中学校一律罢课的决定,并说我已代表全校同学表示同意,请

大家审议。这时同学们情绪激昂，一致拥护次日罢课。

第二天，消息传来，各校都罢课了。从此之后，我们几个代表就公开开会，不再守机密了。

几天后，代表们又决定全市学生游行示威，先在南开中学操场集合，然后出发游行，预定路线是经过南马路、东马路、大胡同等闹市区至河北大经路省长衙门请愿，要求北洋军阀政府释放被捕的北京学生和拒签丧权辱国条约。但游行那天，南开中学操场被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率领的北洋保安队包围，特别是出口处有几十层保安队员堵住我们，不让我们冲出去。我们以大旗为先导，大喊大叫，多次突围，保安队也徒手多次阻拦，双方相持很久。后来杨以德亲自到现场，声称奉直隶省长曹锐之命，不许游行，并要我们推举出四个代表去见曹锐。商量结果，推选马骏、谌志笃、沙主培和我四人，由杨以德前导，一行五人分乘五辆人力车，直去省长衙门。沿途看到街道两边都站着许多肘绑白带布的北洋保安队，荷枪警戒。车到海河的金刚桥时，我们发现桥已吊起，由杨以德命令放下，五辆人力车通过，后又把桥吊起。过桥后，就是河北大经路，省长衙门的大门。往前不远我们看到了在大街上站着上百位女同学，我们估计到他们是女师的学生，是来参加游行而被阻拦在这里的。因此，我们一见，马上下车，先去慰问她们，请她们暂时等候。然后我们走进省长衙门。

衙门很深，走道两旁，也站了很多持枪的保安队员，如临大敌。这时，杨以德不见了，由另一人引我们，走过弯弯曲曲的路，来到一间破旧的席棚间里。等了很久，省教育厅长王章祜来了，他说：“曹省长在会见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和海军舰长，等一等才能见你们。”过了些时候，一个警官又把我们引到一间警官训练班的课堂内，又坐等了很长时间，由王章祜来把我们引到一间富丽堂皇的会客厅。客厅中间有一张铺着丝绒面的长桌，桌上摆着好几个高脚玻璃盘，

装着点心和水果。杨以德和王章祐分坐长桌两边，我们四个人也分坐两边。曹锐穿了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帽，出来坐在长桌的一端，他装着伪善的样子，叫杨、王二人端着玻璃盘请我们吃点心和水果。我们说：“大队同学没有吃饭，我们不吃。”他说：“他们已经离开南开中学操场，在大街游行中，我叫警察发给每人两个馒头，他们都已吃饱了，你们也吃吧！”我们不信他的话，坚决不吃。他又伪善地说：“你们不吃，饿坏了身体怎么行，将来国家靠你们复兴，如果身体不好，怎能担负重任？前清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名臣，在青年时哪里知道后来做这样的大事？你们任重道远，现在年轻，要保重身体，因此一定要吃，不要饿坏了身体。”我们仍没吃，并且要求他打电报给北洋政府，释放北京被捕学生。他说：“我打一个电报，无非北京政府里多一张纸，没什么用处？刚才日本海军司令和总领事来看我，对天津学生游行示威提出警告，如果学生游行，扰乱秩序，他们就要开炮轰击。因此，我要求你们回去劝告同学，从明天起一律复课。”我们不理睬他的恫吓，坚持要求他打电报给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他不肯，他也再次要求我们回校负责劝告同学复课，我们也不肯。双方针锋相对，僵持不下。这时，他听我们四人说话的口音，知道马骏、湛志笃和我都是外省人，只有沙主培是本地人，又最年轻。他突然用手在桌上猛拍一下，把茶杯都震破碎了，茶水四溢。王章祐慌忙站起来，连声说：“请省长息怒，请省长息怒。”曹锐指着沙说：“他们三个都是外省人，你是本地人，是我的同乡，咱们的祖宗坟墓和财产庐舍都在这里，万一闹出事来，日本海军一开炮，他们三个一走了事，我们本地人都完了，你不应跟着他们一起闹。”他指桑骂槐威胁我们。我们毅然起立，以蔑视的态度对他说：“你这套戏法对你的奴才用得着，对我们可用不上。你不拍电报，我们决不复课。北京学生一天不释放，我们一天不复课。天津地区闹出事来，由你省长负责。”正在这时，有人进

来,在曹锐身边说了几句话。曹对我们说:“学生游行大队已在门外,要代表们出去。”王章枯立即站起来说:“我陪你们出去,免得外边同学们惦记。”我们半信半疑地走到大门口,果然见到大队同学已冲破重重险阻,来到省长衙门外的大街上。他们见到我们,也高声欢呼。我们四人各自奔回本校的队伍。同学们告诉我,上海不但学生罢课,而且工人罢工、商界也罢市了。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必将影响全国,我们胜利了,高兴万分。

我们四人又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大队就近去高等工业学校的操场集合,并推举马骏向大家报告与曹锐交涉的经过情况。马骏站在滑梯顶上,我们三人坐在滑梯中间。马骏的报告声音响亮,口齿清楚,简明扼要,情义动人,非常成功。报告后决定继续罢课。大家情绪高涨,高呼口号。记得散会时,已是暮色苍茫,电灯放光了。这天,我虽然没有吃饭,但丝毫不感觉饥饿。

那时全国各大城市相继罢课、罢工、罢市,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不敢强令参加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坚强意志,开创了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史的新纪元。

我们的罢课斗争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暑假后才复课。斗争的胜利,使我们认识到了人民力量的巨大和团结就是力量的真理。

我们知道曹锐是直、鲁、豫三省巡阅使曹锟的弟弟。曹锟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因此我们原来以为曹锐也是个大老粗。在这次接触中,才知道他是个读过书的、老奸巨猾的官僚。事后,我们分析,他所以要我们派四个代表去会谈,实际上是在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的群众运动面前,他们非常虚弱,想以我们为“人质”,在省长衙门里先后换了三个地方,拖延四、五个小时,妄使游行学生出于对我们四人安全有所顾虑,不致发生“越轨”行动。同我们接谈中,时而拉拢收买,时而威胁欺诈,又用要求复课来抵

制我们要求他打电报,耍尽了花招。最后下不了台时,又以大队同学游行到门口来做借口,为自己解脱。这都说明他的诡计多端。

在这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当时南开中学的毕业生,邓颖超同志是女师的学生,都是这个运动的活动家、领导者,到处演讲宣传,常见天津报端。此外,如女师的李毅韬,北洋大学我的同班同学谌伊勳(小岑)也都是积极分子,后来他俩结婚,李早去世,谌现是国务院参事。

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北洋大学的政治空气空前浓厚了。他们对于平时压制学生的外国教授也敢于斗争了。记得暑假,土木系一个外籍教授在和学生去北戴河实习时,无理加重学生负担。引起学生不满,起来造他的反,没有实习完毕就返回学校,不上他的课,并要求校长辞退他,全校各班学生支持土木系学生的抗议行动,实行了罢课,迫使校长赵天麟辞职。曹锐派冯熙运来当新校长。此人十分固执,到职后便停止了电和伙食,要学生写悔过书才再开学,否则不开学。但是绝大多数学生坚持斗争,不写悔过书。这样,我和其他不少同学便离开了北洋大学,转到北京大学。继续学习至毕业。

以上是我亲自参加和知道的关于天津五四运动的片段回忆。时隔60年了,记忆不清,可能有错误之处,希知者指正。

(1979年1月)

回忆五四时期的天津学生演讲队

魏士如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消息,很快传到天津,立即激起青年学生的无比愤怒,各校男学生在5月7日举行了示威游行后,五四运动在天津就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

当时各女校的爱国青年,也都起来参加这一伟大的运动,但由于一时未能冲破封建枷锁,所以初期天津学生联合会没有把我们女校包括在内。那时我在女师附小读书,记得女师专修科的郭隆真首先站出来,主动联络各学级同学,要求大家联合起来,对于时局应有所表示,我们女同学也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打倒卖国贼,我们也要参加爱国活动。各学级同学听了后,都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表示要积极响应,于是分头召开会议,选举代表,来组织和领导同学参加运动。我记得九学级选出周敏、李锡智、徐芝;十学级选出邓颖超、王贞儒、冯梅先(冯悟我)、梁岫生、张嗣婧;十一学级有周之廉、王瑞生(王天麟);十二学级有许广平、徐兰、吴瑞燕;十三学级有徐士义(徐颖溪);十四学级有郝雨春、鲍凤鸣;女师附小教员李毅韬(李峙山),学生王文田、王静生、陈学荣和我。各学级代表会上,决定要立即联合各女中学生、教师,以至于家庭妇女。后来派出代表分头联系,中西女中选出聂玉清姊妹、严氏女中选出穆祥淑、王全、黄勋志,贞淑女中谁是代表不记得了。这些学校的代表与女师的学生代表,共同联合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

志会”，内设评议、执行两部。5月25日在东门里仓散街江苏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刘清扬和李毅韬为正副会长，邓颖超、郭隆真、张若茗为评议委员，郑秀清、王天麟为总务委员，王贞儒、周之廉、张嗣婧、周敏、郝雨春、王瑞生等为执行委员，并推许广平、卢琳瑜、蒋云、徐兰等负责主编《醒世周刊》。

参加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有八九百人。其中有60多岁的老太太，也有十三四岁天真热情的小学生。会上大家情绪振奋，都表示要以坚强不屈的精神，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卖国政府展开不妥协的斗争。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后，就成为妇女救国运动的先锋队，邓颖超、郭隆真分别担任了演讲队正副队长职务，在她们领导下，在四城搭起演讲台，向人民作爱国宣传。我那时也是演讲队的成员，但不善于讲话，我就去做些准备工作，如借地方、扛板凳、看门等，帮助维持秩序，呐喊助威。演讲队以每五人为一组，设组长一人，每五组为一队，有队长一名。

这时的演讲内容，主要是配合爱国口号，宣传抗日救国、抵制日货，以及朝鲜人民所遭受的亡国痛苦等。当时喊出的爱国口号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拒绝凡尔赛和约”，“取消二十一条”、“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青岛”、“不作亡国奴”、“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等。后来又进一步宣传“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保卫国家领土主权”、“要求妇女解放”、“争取妇女自由平等权利”、“反对包办婚姻”、“男女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等，使反帝反封建的内容更充实，更鲜明了。

在初期，演讲队的女学生因受封建思想的限制，不好意思和男学生一样到街头去讲演，只是定期经常到市内各民教馆和一些公共场所去讲。后来逐渐地习惯在街头演讲了。每次演讲，听讲的人很多，当演讲员讲到慷慨激昂之处，讲的人声泪俱下，听的人也

很受感动,特别是邓颖超邓大姐,那年她才16岁,她的演说热情奔放,富于鼓动力,而且遇事不慌。如一次邓颖超带领女师的同学到郊区农村去宣传,一去就碰了钉子,人家把大门砰地一声关上,随你怎么叫门,就是不开,有的同学泄了气,埋怨说:“我们是为救国,又不是要饭的。”邓颖超却鼓励大家,要大家想办法深入群众,为群众办事,发动群众。这个办法果然灵,群众慢慢从关门到开了一点门缝,以至最后走出来听演讲了!

回想起来,当年演讲队走到哪里,人群就聚集在哪里,警察也挥舞着木棒跟到哪里。但是人流筑成了血肉长城,不是警察的木棒所能驱散的,总是这个角落散了,那个角落又筑起更厚的人墙。事实说明,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有群众基础的爱国运动,是任何反动力量冲不垮的!

(柴寿安记录)

天津各界联合会与跪哭团

吴子铭

1919年五四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员李大钊先生的领导下,全国学生和工人阶级以及所有的爱国人士都风起云涌的响应,一致参加到这轰轰烈烈的爱国行列中。天津各界人士在当年的7月间也组成了天津各界联合会,从事于反对当时军阀政府的卖国勾当。给卖国辱权的统治者以严重的打击,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显示了无比壮烈的爱国热情。

各界联合会

天津各界联合会是包罗天津各界人士所组成的民众爱国团体,以绅、商、报、学、教(宗教)五大单位为主要组成人员,五界中都有代表被选为委员,直接参与联合会的推动工作。正会长卞月亭(商),副会长马千里(耶稣教),刘潜卿(天主教),秘书长夏琴西(绅),委员30余人。代表学界的有谌志笃、马骏。代表报界的有王醉生、王墨林。代表商界的有尚墨卿、李散人。代表宗教界的有王卓忱、时子周。代表妇女界的为刘清扬(时天津有爱国妇女同志会即由刘领导,为妇女参与社会活动及争取男女平等的最早团体)。这些人在当时的各界中都有他们一定的声望,因此便产生了很大的带动鼓舞作用。其中学界代表谌志笃、马骏所领导的学生

联合会更是其中表现最突出,热情最高昂的一个。

调查股与跪哭团

抵制日货是各界联合会主要任务之一。因为当时日货充斥于中国市场,全国人民为了反对二十一条,为了反对日帝对我国旅大青岛的侵略,除了呼吁请愿,督促军阀政府停止卖国辱权的行为外,在群众本身所能实际做到的就是不买日货,使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魔手不得伸张。各界联合会中设有调查股,是执行抵制日货工作的前哨,它直接掌握各商号购销与实存的日货情况。各界联合会经常要以调查股的情报为根据,分别派员采取劝导、说服或自立公约等方式向各商号进行宣传。有些商号贪利忘义,表面上具结立保,冻结日货,声明决不再与日商为伍,但暗地里仍是口是心非,唯利是图,私与日商勾结,偷偷进货。他们干的虽秘密,却终不能逃脱爱国人士的监督,各界联合会的调查股是随时能够得到情况的。调查股对这些奸商总是以最大的耐性向他们进行说服。有时派人到他们家去向家属做工作,把当时国家的危机和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道理剖切说明,激发他们的爱国心,希望通过家属再对那些商人做到更有效的劝阻。有些人是能生效的,在社会舆论的制裁和家人劝阻的双重影响下,也就知难而退,不再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效劳了。但有些个别的好商却执迷不悟,丧心病狂地仍去蛮干,调查股认为再三劝阻已不生效,只有改变方式,采用最感动人,最能促其觉醒的跪哭办法来作最后的忠告。跪哭团就是这样产生的,也是调查股在各种不同劝说方式中的一种方式。

跪哭团是以调查股长王卓忱为主干,其余参加跪哭的团员大多是年龄较长的,如刘雁宾、于方舟等都是团中热心分子。他们在

确定跪哭对象以后,首先在联合会集齐团员,一律披麻戴孝,完全装扮起灵堂孝子模样,手持哭丧棒,戚容满面地列队出发。在行进沿途中自然要引起很多人注意,因而尾随而行的群众也就很多了。东北城角成记纸行是当时屡劝无效一意偷销日货的商号,调查股根据情况曾出动跪哭团前去跪哭。当全体团员到达该店后,便寻找该店执事人出来见面,把他围绕在中间,大家便跪倒地下悲痛号啕地大哭起来,其悲凄惨痛的情景比灵棚吊孝还哀伤,叫人闻之心酸。团员们边哭涕,边作忠言逆耳的劝告,历述亡国灭种的残酷遭遇。王卓忱本来就嗓大声宏,哭起来更是激昂慷慨,有时嗓哑声嘶还不肯罢休,是凡天良未泯的人,都要受到感动。记得在跪哭成记纸行时,其他团员都被劝扶起来止了哭声,只有王卓忱仍以哭哑了的嗓子还在陈说朝鲜亡国的惨痛。用朝鲜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惨遭蹂躏的先例,向甘心为日帝效劳的奸商作最中肯的劝说。直至成记经理表明态度,向全体团员说:“宁肯买卖不干,也决不再购销日货了。”王卓忱始止哭而起,领着跪哭团全体整队返会。他们每次出动的人数并不固定,经常总是十数人。在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中确曾起到一定的作用。对丧心病狂的奸商是一种有力的教育方式,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人们的钦敬与拥护。

跪哭团是随着天津各界联合会而诞生的,它在各界联合会被军阀政府强迫停止爱国活动的摧残下也同告夭折。由诞生到解散仅仅六个多月(1919年7月至1920年1月)。

献日货与烧日货

在各界联合会的领导下,天津各界自动组织起来的大小单位团体约有200余个,其中学生联合会拥有各大中小学校的全体学生和教职员,人数既多,声势亦大,表现的热情也最高,是推行爱国

运动的主力大军。许多商号在浩大激昂的爱国声势下，很能深明大义，幡然觉悟，自动停止销售日货，并把原存各种日货完全贡献出来，以表明决不给日帝经济侵略作帮凶。如祥帮的各绸缎店便自动献出日货棉织、布匹，洋货，奢侈品等，在商界中起到很大的模范作用。但也有些商号顽固不化，各式各样的劝阻办法都对他们使用过了，仍然不能回头，以致终于激起群众的愤恨而予查抄。许多货栈为了支持群众的查抄措施，自愿免费收存这些没收货品。

1919年11月19日，福建发生日本居留民枪杀我爱国三学生的事件。全国人民无不愤怒。天津各界联合会为了支援福建学生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枪杀事件，特于当月23日在南开广场举行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决定当场焚烧所存日货。是日出席大会的各界群众约有数万人，由各货栈运出查抄与自献的日货共八大卡车，都堆放在会场中心。在群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青岛等响彻云霄的口号声中，堆积如山的日货立时变成火海，一时浓烟四起，火柱升天。围绕四周的几万群众一致鼓掌称快，把人们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和坚决不买日货的激昂热情表现无遗。这些日货直烧了一天才全化为灰烬。当时海光寺日本兵营距南开广场很近，营中的日本官兵看到我国人民这种声势浩大，忠烈激昂的爱国运动，也只有交头接耳，私相窃语，暗地胆寒心惊而已。中国人民不可凌辱的伟大气节，叫他们亲眼目睹，得到认识。

上海学生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经过

李玉阶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翌年元月各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会。我国以战胜国身份由团长陆征祥,代表王正廷、顾维钧等参加和会。当和会讨论到处理德国殖民地问题时,日本代表竟要求将德国在中华民国山东省的权利无条件让与日本;我国代表虽据理力争,但和会不顾我国的反对,同意日本的要求,并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一节载入对德和约之中。当时北京政府昏庸无能,而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前任驻日公使,与曹经手二十一条及西原借款案)、驻日公使章宗祥竟私通日本,有屈从签约之意图。

消息传出,北京各大学的学生异常愤慨,于5月4日集会举行游行,参加游行的人数愈聚愈多,终于爆发成为震动后世的五四运动。

这次中国青年第一次纯洁的救国爱国运动,就在北京大学学生领导下爆发,而在上海学生响应支持下展开,立刻蔓延全国各个角落。

1919年我就读于吴淞中国公学,学名鼎年字玉阶(中公是革命最早的学府,国父孙公和黄兴、蔡元培、于右任等前辈均是中公董事,胡适博士于中公毕业后赴美国深造,归国后曾出任母校校长)。当五四运动发生,我被推为中国公学的学生分会会长及出席

上海学生联合会首席代表,对这一段历史性的上海学生爱国运动曾亲身经历,虽然时隔半个世纪以上,我与此地的十几位上海五四学联老同志,手头上均已没有参考史料,但往事历历大致均能回忆得起来。为使世人了解上海五四学生运动真实资料,爰就所能回忆的当时经历,概略记述下来,以供读者参考。

5月4日晚上北京学潮的专电到达上海,先是复旦大学教授们,立刻在校园内紧急鸣钟,召集在校的全体学生,报告北京大学学生游行示威,及殴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并与警察冲突,被捕50余学生的详细情形。当即决定连夜推派同学分赴上海各校联系报告,并请各校代表出席5日下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上海学生会筹备会议。

5日下午出席筹备会议的有50余所大学、中学的学校代表,会议决定各学校组织学生分会,推出代表组成上海学生联合会,并定于5月7日上午十时举行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当天未到会的学校由出席代表再分别通知。

5月7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是在公共租界静安寺路环球学生会举行,参加代表有80余所学校,首先通过组织规程,设会长一人,副会长一人,分设评议、执行两部,评议部设部长一人,议定本会一应重要活动事项,交执行部执行,执行部部长由会长兼任,下设秘书室、总务部、宣传部,当场选出复旦大学代表何葆仁为会长,南洋大学(即交通大学的前身)代表彭听(精一)为副会长,复旦大学代表狄侃为评议部部长,瞿宣颖为秘书室主任,我为总务部部长,潘公展为宣传部部长。大会通过通电全国各地学生,拥护支持北京学生的主张,反对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立刻罢免卖国贼,并电请北京政府立刻释放被捕学生。

就我与彭精一兄等记忆所及,当时参加的上海校名与代表姓名为:复旦大学的何葆仁、程学愉(天放)、余井塘、谭常恺、江一平,

南洋大学的彭昕(精一)、吴长城(道一)、邵禹襄、恽震,圣约翰大学的瞿宜颖(因学潮被学校开除,立即转入复旦大学仍为该校代表)、岑复彰、马崇淦、刘云舫、刘麟生、刘凤生,同济大学的沈怡、杨继曾、周明栋,东吴法科的狄侃、何世楨、吴经熊,吴淞中国公学的李玉阶、孙锡祺(嗣转入复旦大学改名寒冰)、萧志囊,中西女塾的陈纪彝、陶月琴、俞素青、黄倩鸿,澄衷中学的端木恺(嗣入复旦大学),圣玛丽女校的俞庆棠、欧阳雪、张继英,市北公学的潘公展,民立中学的董克仁,爱国女学的张鸾贞,南洋路矿学校的姚颂馨、潘卓吾,青年会中学的张明炜,华童公学的奚玉书,育才公学的陶凤威,务本女学的张杰人、严椽,爱群女中的顾友如,沪江大学的李骏华、张维贞,民立女中的管文贞,晏玛氏女学的张佩璞,民生女学的任铃萃,江苏第二师范学校的汤宗威、孙祖基,两江女子体操女校的陆礼华,清心女中的张玉珍,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的杜月蟾,神州女学的金素琴(振玉),还有只记得代表姓名而想不起校名的有孙道胜、裴国雄、唐世昌、顾谊夫、蒋国珍等诸同学。

北京学生负责代表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姚作宾等四人亦曾由北京秘密赶到上海公共租界与上海学联合会负责人密商扩大响应行动方案,旋即星夜返回北京配合联系。

上海学生联合会第一步行动就决定通知全市各学校全体学生,立即罢课,并通电全国学生一致行动,同时通知上海各学生分会在罢课期间每日出动宣传队在街头演说,将日本无理要求和北京政府卖国意图以及本会请求政府拒绝签订对德和约等等经过告诉同胞,并要求爱国民众积极抵制日货多用国货。

5月11日下午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召集民众大会,扩大宣传北京学生的要求及主张,大会在军警包围如临大敌严密的监视下举行,到会群众达5万余人,对北京政府的误国极为愤慨,一致通过通电拥护北京学生的要求和主张,会后举行游行。

记得当时胡适博士正在上海招待杜威博士，他也参加了游行的行列。

学联合会自成立之日起，每天重要活动情形均经上海两家最大报纸《申报》、《新闻报》以大量篇幅报导，因是全国瞩目，同时上海全市学生罢课以后，连日在全市街头出动演说，人心更加激动。

大约在5月20日的上午开始，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商店均自动纷纷响应学生而打烊罢市，继而南市、闸北商店也相率关门，声势越来越大。

承环球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热心支持，欢迎学联合会在该会办公，学联合会于成立之日即有办公处所。同时，更重要的还是当时上海美国总领事与英国总领事，态度公正，同情爱国青年，不但不理会北京政府的阻扰，而且还暗中命令公共租界巡捕房，对学联合会一切活动不加干涉，并对学联合会负责人予以保护，因此学联合会得能安心在公共租界作为活动大本营，其中得力于学联合会所聘的两位义务法律顾问美国林百克(Lambarger)及佑尼干两大律师关护之处甚多。

形势逼人，自5月20日罢市后的第三天起，全市工厂的工人，也接着响应商人的罢市而纷纷起而罢工，影响最大的当为全上海公共汽车和电车以及出差汽车行的所有司机，都一律奉公会决定响应罢工，使得上海全市交通形成瘫痪。

在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紧张压力下，北京政府颡顽无能尚不肯俯顺舆情，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更为愤激，全市商店在紧闭着铁门的店门上，均贴出“不除国贼，誓不开门”的标语。

在这种气氛紧张复杂的情况下，有一天上午，学联合会接到确实报告：“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南市闸北所有的电厂、水厂全体工人继司机工会之后将于明天罢工。”果然如此，则全市治安将不堪设想。

学联合会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立刻劝导全市水电工厂工人，顾全大局停止罢工。本人身为总务部部长，责无旁贷，惟当时最感困难者为交通工具，而全市出差汽车（等于台北的计程车）司机均遵公会决议全体罢工，迫不得已，乃向同乡逊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先生的四公子恩顾借得私人汽车一辆，于晚饭后由中国公学萧志驾车，赶往杨树浦电厂和水厂，与两厂工会代表恳谈，告以爱国固然重要，但须顾到全市市民生活的需要，几经努力，终于说服。继而又分赴法租界和南市、闸北三处电厂、水厂工会苦口劝告，并以公共租界电厂、水厂工会均已同意打消罢工相告，舌敝唇焦，直到天明，总算达成任务，三处工会亦均同意作罢，因而满天风云，顿告消散。

第二天消息传来，公共租界当局和北京政府的上海最高治安当局方面——淞沪护军使——都认为学联合会这批青年深明大义，处置得当，否则全市电厂、水厂工人一经罢工，上海陷于瘫痪，治安将不堪设想。原来同情和支持我们的英国和美国总领事与公共租界治安当局面临影响他们自身的安危，势必改变对我们的态度，采取强硬干涉措施，其后果必然是学联合会被迫解散，使我们这场爱国运动前功尽弃。

老实说：我们这群天真无邪的青年负责学生，除潘公展为市北公学教员年纪有 27 岁外，年龄最大者不过 25 岁，都是初出茅庐，未见世面，经验有限，安能担当中国历史上这样空前的救国运动的重任！我们当时深恐走错一步影响全局；幸承各方响应爱国运动的《申报》社长史量才，上海市商会会长聂云台，广东商会会长汤节之，江苏省教育会会长黄炎培，仕绅贾季英、沈信卿、穆藕初、及《大晚报》社长沈卓吾诸先生从旁协助，共商大计。当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最紧张的时候开始，每天晚间上述各位先生均都能抽出时间，和我们学联合会负责人在《申报》社长办公室或在聂家或在黄家一起

会谈研商应变办法,及今思之,当时苟无这许多位老成持重的爱国长者策划指导,其后果将不堪收拾。

当时北京政府对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压力越来越大,感到非常焦虑,束手无策。因为当时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频频透过上海外交特派员,向英国与美国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他们责成公共租界巡捕房,封闭学联会,驱逐负责代表的釜底抽薪办法已告失败。由于英、美总领事认为学联会在公共租界,从事纯洁的爱国活动,并没有违反民主法治国家的常轨,不便加以干涉取缔;反而由上海领事团正式向北京公使团提出书面文件,请求北京政府俯顺輿情接纳学生、商民、工人等要求,早日平息风潮,安定人心。

在此重要关头,上海学联会暗中游说沪、宁铁路局及沪、杭铁路局司机工会成功,两路司机工会决定于5月30日开始响应罢工。当时我们的准备是如果两路司机罢工,使从上海至南京,上海至杭州的交通断绝,如果再不能达到目的,则相继浦口至天津铁路司机立刻跟进罢工。

天从人愿,北京政府鉴于形势严重,群情愤激,不得当机立断,接纳全国学生的要求,于6月10日下令将曹、陆、章三人罢免;并训令我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以平公愤。

电讯传到上海,《申报》、《新闻报》即刻刊发号外,全市欢腾,爆竹之声不绝,满天云雾消散。学联会当夜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各学生分会,明天恢复上课,第二天全市学校开课,商店开门,工厂开工,上海全市秩序恢复正常。这个由北京学生爆发的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纯洁的青年学生爱国行动,经上海学生的支持展开,而终于完成后世所谓的五四运动。

在此我必须坦白声明者,自上海学联会成立之日起到北京政府接受全国学生的要求这段期间止,学联会始终未与国父孙中山

先生和戴季陶、于右任、叶楚伦、邵力子诸先生以及国民党在上海的其他负责人有过接触往来，全凭一腔爱国热心，绝无半点政治企图；至于共产党在民国八年根本尚无组织，更谈不到。此所以我一再强调五四学生运动是绝对的纯洁清白的原因，值得骄傲。58年以后的今天，回忆起来，良心上觉得非常安慰，尤其对响应学生罢课而罢市的商界和工厂罢工的工界同胞，完全信任学生的爱国行动而激发的爱国不后人的胸怀和精神，更值得钦佩。

上海市民对学联会的爱国运动自始至终非常热心，纷纷捐款支持，学联会为表示公开起见，于成立之初，即商请上海市总商会，上海银钱业公会及《申报》、《新闻报》派员来会共同管理财务，因此捐款越来越多，使得学联会除了支应浩大的开支外，尚有余力创办日刊，以加强宣传和联络。

在上海各学校恢复上课后，学联会和各学校学生分会照常活动，不过有些学校出席学联会的代表略有调整而已。本来学联会会长的任期规定为一年，由于会长何葆仁辛劳过度，坚请提前辞职，于是改选复旦代表程学愉（天放）继任会长，彭昕仍为副会长，并改选何世楨为评议部长。办公处所则由公共租界环球学生会迁至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一所租赁的民房，法租界对我学联会的态度和一切活动，比诸公共租界当局更加友好，更加方便。

学联会在会长程天放任期内，一面切实监督北京政府执行对巴黎和会代表的训令；一面实施抵制日货，由各学校分会出动学生宣传队，劝告商店封存日货，并请同胞随时检举，如有违反公意，一经学联会调查科查明属实，当场没收焚毁。我因毕业期近，功课繁重，遂即辞职专心读书。

上海的五四运动，含义深远，有学生罢课，有商民罢市，有工人罢工，可说是中国空前的全民群众运动，更不能不有记载，以供研究中国近代史者之参考。

子弋儿时常鼓励我把当时亲身的经历记述下来，以存信史。一直事忙，拖延下来。今年五四第 58 周年纪念日将到，适逢我新病初愈，心血来潮，深感责无旁贷，鼓起勇气来写此一段珍贵回忆。因思精一与我当初均身历其境，负过实际责任，知之较详，年虽都在 80 左右，但记忆力尚可，乃商诸于精一，承其提供我许多宝贵资料，爰秉笔直书，问心无愧，凭吾两人的追忆，可把这段历史交代清楚。

在上海参加五四运动的回忆

张廷瀛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北京中等以上学生首先发动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当时我的年龄还轻,只有19岁,正在上海市徐家汇李公祠复旦公学中学部读三年级。这时候大学部和中学部是在一起的,两部分学生合计不满400人。

北京发生这一伟大运动后的第二天夜里12点钟左右(据朱仲华回忆为5月6日晨),学校里的大钟忽然敲起乱钟来了,敲个不停。全校同学在睡梦中惊醒过来,都莫名其妙。有些同学担心是厨房失火,急忙跑出房门,可是不久又跑回来了。有人问究竟为了什么事敲乱钟?他们说:“中文老师邵力子先生在那里敲钟,他叫我们来唤你们去饭厅集中,他有重要消息报告。”同学们就马上赶去饭厅,见邵老师正同大学部高年级同学谈话。我们许多同学就坐的坐、立的立,等候听邵老师报告重要消息。过了几分钟,邵老师站在一只凳子上讲话了。他的报告很长,讲了差不多3小时。不仅报告了北京传来的学生运动的种种消息,而且从中日马关条约讲起,一直讲到袁世凯阴谋称帝,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提出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从德帝国主义手里抢去了在我国山东省的种种特权讲起,一直讲到战胜国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者,在法国巴黎召开的所谓巴黎和会,我国代表要求归还德国在我国山东省种种特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

约,以及取消一切帝国主义者在我国的特权,都遭到帝国主义国家毫无理由的拒绝。

同学们听完了邵老师的报告,极为愤怒,主张马上积极响应。接着大学部同学何葆仁站上凳子讲话,主张推举代表,一等天亮就去各大学和规模较大的中学联络,采取一致行动。另一位大学部同学朱承洵建议,在日帝国主义就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提出最后通牒的那天,就是5月7日,在老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以学生群众为基本队伍的国民大会,会后开始游行示威。何、朱两位同学的主张,得到全场同学的拍手赞成,接着推举了代表28人去各校联络,其他同学仍留校照常上课。

这一夜,邵老师和我们全体学生都没有好好睡觉,特别是邵老师通宵未睡,直到代表们出发后才回去。当时他除担任复旦国文教师以外,还担任《民国日报》的总编辑和报馆经理。5月5日那天夜里,他看到了北京发来的新闻电报里有关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和怒打卖国官僚章宗祥的消息,马上把编辑部工作安排好,赶来学校作报告。

复旦派去各校联系的代表到达南洋公学和爱国女学等学校时,他们的学生还在抢看报纸,讨论如何响应。经过复旦学生代表的联系,大家都赞成采取一致行动,于次日上午召开大会,会后游行示威。《民国日报》支持上海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在第二天报上,除详细报道各校学生的活动情况以外,还在封面第一版为召开国民大会登了一条义务广告。

5月7日上午8点钟还没有到,复旦学生队伍已经到达老西门公共体育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有这么多人的群众大会。这次大会由复旦学生代表何葆仁担任主席,全场一致支持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要求严惩卖国贼、不许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日本归还青岛和撤回盘踞在胶济铁路沿

线的军队、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还通过了用大会名义发出的通电，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斗争。

会后，我们学生队伍拿着写上“废除二十一条”、“还我山东”、“惩办卖国贼”、“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的纸旗，浩浩荡荡，出发游行，沿路高呼口号。两旁观众人山人海，拥挤非凡。这是五四运动在上海开展的第一次大示威游行。事后，据目睹当时示威游行的老年人说，他在上海住了近50年，像这次的学生示威游行，还是第一次看见。

5月9日是袁世凯政府承认日帝国主义所提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签字的日子，所以当时人民就称这天为“国耻纪念日”。在这一天，各学校都停课，表示不忘记这个耻辱，决心要洗刷这个耻辱。复旦和南洋公学等校同学相约赴各马路演讲并分发传单。

隔了两天，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第一任会长就是复旦大学部同学何葆仁。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重点工作就是广泛宣传抵制日货。

到5月中旬，北京传来消息，军阀政府日益严重地镇压学生运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辞职。北京中等以上学生，为反对军阀政府的无理压迫，实行罢课。上海学生联合会召开全上海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大会，决定响应北京学生，实行罢课。当时复旦学生会决定分派同学去京沪杭铁路沿线各县市去宣传，推动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惟来去旅费须要各人自备，因而采取自愿报名由会分派的方式。我报名以后，被派去嘉兴、松江一带宣传。我和另外两位一起去的同学，带了传单和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铜版照片，乘火车去指定地点。为避免宣传品被军警没收，我们三人事先分了工，一人单独演讲，一人专门携带宣传品，一人专管分发传单和卖国贼照片，彼此暗中照顾，宣传时分开，暂不联系。宣传告一段落，去预先约好的亲友家中休息，作再次宣传的准备。前后总共出去

了三次，每次都是早上出发晚上回校。各地听众都颇为动容，也有当场接口高呼“拥护学生运动”、“坚决抵制日货”、“惩办卖国贼”等口号的。

到6月初，北京和上海各地的军警，秉承军阀政府的意旨，对青年学生变本加厉进行迫害，不是逮捕便是殴打。上海工人和店员耳闻目睹军警的暴行，先后举行罢工来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上海各商店到6月5日也就关起门来罢市了。

以后，上海的学生运动发展成为罢课、罢工、罢市的全市性的三罢斗争的群众运动。由于北京、天津、上海和全国各地人民，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好多省份还派代表去北京请愿，终于迫使当时北京政府下令免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官僚的职务。被捕的学生也都恢复了自由。

反帝爱国斗争得到了初步的胜利，上海商界得到店员的同意，才于6月12日开市，各工厂也相继复工，但仍继续坚持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因为全国人民不许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同时在法国巴黎的华侨工人和留学生包围了中国代表的住宅，使他们不能出席签字，总算达到了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目的。

我们复旦学生会在暑假放学前，又召开全体大会，要求留校学生和回家学生继续宣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秋季开学，大学部二三年级增加了一部分新同学。经过了解，才知道是圣约翰大学和东吴大学等教会学校的同学，校方对于带头搞学生运动的同学表示不满，要他们转学。复旦学生会听到这个消息，就帮助他们向本校教务处交涉，并由邵力子、叶楚傖等教师从旁协助，校长李登辉也就接受了学生会的请求，欢迎这一批学生运动的骨干转入本校肄业。

五四运动中的上海商界

严 谔 声

1919年北京军阀政府压迫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引起了上海各界人民的愤怒。首先起而响应的是上海的学生。5月26日上海大部分学生都罢了一课，在南市各马路演讲宣传，高呼“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打倒卖国贼曹陆章”等口号。学生们要求上海商界一致行动，罢市响应，但商界则迟迟不动，学生们非常悲愤，情绪激昂。有的学生沿街挨店痛哭要求，引起了一部分店员的同情。6月3日，南市有少数店铺关门停业，店主纷纷到上海县商会询问应付办法。

当时的北京政府是亲日派的皖系军阀当政，而上海的军事当局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也是皖系人物，因此一部分商界中人，一方面怕得罪上海的军事当局，一方面对学生的爱国赤诚也有所感动，觉得罢市与否两面为难。那时上海县商会会长是顾馨一，副会长是苏筠尚。顾馨一是经营杂粮生意的，一向和日商三井洋行有往来，苏筠尚是经营海味生意的，也和日商有关，惟恐牵涉到自己，于是他们两人以力不胜任为词，提出辞职，未得会董会同意。

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开展到租界，租界中的店员和中小商人也有参加运动的趋向。那时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是平和洋行买办，实际上不大过问总商会工作，主持会务的是副会长沈联芳。此人早在这年5月9日，竟不经会董会通过，发一个电报给北京军阀

政府，赞成中日直接交涉。电文一发表就引起民众的激愤，会董也纷纷诘责，因而朱、沈感觉应付为难，提出辞职。这些事实说明当时上海总商会和上海县商会的负责人对五四运动至少是采取逃避的态度。

到6月5日，由于学生一天比一天热烈的宣传鼓动，南市小东门外大街各商号首先罢市。参加的是鱼行、水果行、绸缎店、洋货店、烟酒店等，一般都是中小商店。他们因为得不到商会的支持，就自动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商店联合会，并标明“保一方治安，为永久之计”。这说明他们的这个组织固然是为了参加爱国运动，但也为了商会的权力把持在大商人手里，他们平时得不到保护，所以想组织起来保护自己。小东门外店铺罢市后，南市各商店立刻响应，到上午9时，租界各商店也相继停止营业，形成全市性的罢市热潮。一般人说起五四运动，总提到上海商界的“六三罢市”，其实，上海全市性的罢市是6月5日，而不是6月3日。

6月5日全市罢市后，上海总商会发出了一个紧急通告，说：“此次商界罢市虽激于义愤，而一切举动务求文明，勿酿意外。”这里所说的“文明”，是完全迎合当时军事当局的意图，害怕群众运动兴起，会触犯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想走妥协的道路。

那时，上海各马路的商界联合会还没有成立，但有一个“上海商业公团”，是比较进步的商人组织起来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的组织人是赞成罢市的，但也同样害怕群众运动。因此，就由几个主要人物陆维鏞、黄伯平、汤节之、赵晋卿、邹静斋、冯少山等六个人，在报上联合登了一个启事说：“上海各界人士鉴：此次商界罢业，诚国民出于万不得已而发。惟两日以来，各街衢时有拍手大喊等事，非惟无益，且近妨碍治安。奉劝诸君，有店者回店，无店者回家，切勿在马路上聚立闲游，以免危险而保秩序。”这里所说的，“拍手大喊”，实际上就是爱国宣传演讲，那时除学生外，店员也出动在马路

上从事爱国讲演。

商界罢市后，要在6月6日借上海总商会会所开会，因为这个会所在天后宫庙的地界内，租界巡捕房依约不能进行干涉。但总商会却借口会章规定，拒绝借用，说：借总商会议事厅开会，只限于商业团体，按照规定手续，须正式具函商量，经总商会允许，才可借用。到了6日那天，开会的人蜂拥而来，总商会会董中，有稍识大体者，恐怕固执不借而犯众怒，主张通融办理，这才允许借用。

全市罢市，要求打倒曹、陆、章卖国贼，震动了当时的上海军政当局。6月7日，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在上海县商会召开了一个“官民会议”，目的是劝导开市。卢永祥在会上说：“罢市已经三天，如再旷日持久，恐怕工人起而效尤，地痞乘机扰乱，实属非常危险。现在就开市，已经不是5分钟热度，还可以表示各位能发能收。”荷兰银行买办虞洽卿站起来说：“这次罢市，店东都是不愿意的，只因为各伙友出于同情学生的一念才发动的。事情如果有转圜地步，商界无不从命。”会议的结果是由上海总商会劝导开市。于是总商会在9日印发传单，通告各业说：“要求之事，目的已达，应即于10日开市。”其实，那时曹、陆、章还未罢免，总商会的话最低限度是言之过早。所以上海商业公团出而反对，说商学两界要求之事，虽有达到目的的传闻，然正式命令未见发表，未可据以为实，仍应静候确音。这样，原定10日开市的钱庄业，接到上海商业公团的信，只能和其他各业一样，继续罢市。至于卢永祥所说的“恐怕工人起而效尤”，更不是事实。那时商务印书馆印刷工人、华商电车公司的司机和售票员，早已于6月5日、6日先后罢工，参加五四爱国运动。

商界罢市后，日本货的销路大受打击，因为当时轮船没有停驶，部分奸商乘机将日货大批运赴各地。“商轮公社”看到这种情况，就在6月10日召集各轮船公司的主任和买办，在四明公所开

会商量停驶。虞洽卿以三北公司代表资格出席会议，竟借口航务紧要，可令已装货的船照开。他的话还没说完，即引起反对者的高声斥责，群情激昂。虞见势不佳，仓皇走出会场，场内仍接着决定停驶，等商界全体开市时，再行开船。

在反帝爱国运动发动时反对罢市，已罢市后主张屈服开市，甚至诱致开市，这在虞洽卿是一贯的。早在1905年为了英国副领事韦德门在会审公廨诬指黎黄氏贩卖人口而酿成的大闹公堂案，引起当时公共租界商店的罢市，虞洽卿就跟了当时的上海道袁树勋，挨户向各商店劝导开市，甚至打躬作揖，企图获得帝国主义者的青睐，充当工部局的中国董事。可是他尽管很卖力，仍然没有达到目的，只由工部局总董恩纳生送了他一只金表，说：“租界闹事，承我公大力维持，得以转危为安。”虞洽卿后来对人家谈起这件事，还引以为荣。

生意人决不肯放过每个做生意的机会，五四运动时也不例外。且不说那些私贩日货和把日货假充国货的奸商，就是有些“聪明”的商人都利用时机，推销货品。那时，有一种威古龙丸（记不起是哪家药房的出品）就大登广告来“敬告热血男儿”，说什么“血不热则志不奋，血不足则热不能久，能爱国者须求热血之充分，则热血者须求补血之妙药。威古龙丸补血之第一灵丹也，爱国志士，盍一试之。”要爱国有持久性，而有赖于吃威古龙丸，这简直是大大侮辱了我们的爱国人民群众，也可见投机商人见利忘义，无所不为。

其实，趁反帝爱国运动掀起的时候，登广告招揽生意的，大有其人。在五卅惨案时，上海民众抵制英美烟公司的香烟，那时华成烟草公司就大登广告说：“静待公理解决，切勿任意暴动，诸公少安毋躁，且吸金鼠香烟。”把群众发动起来的反帝斗争说成“暴动”，而在严肃的政治运动中，劝人“少安毋躁，且吸金鼠香烟”，可见这些资本家那时的立场和态度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回忆五四运动前后在安徽的活动

朱 菴 山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内部发生分化。以宋教仁为首的一批人,主张议会政治、政党内阁,与北洋系妥协,孙中山先生当时处境孤立。袁世凯利用同盟会内部的矛盾,攫取了大权。

袁世凯上台后,一心追求独裁专制,企图把封建君主制重新加在人民头上。他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步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独揽军事、行政大权,颁布诸多法令。对外秘密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为了在地方布置心腹,袁下令罢免江西、湖南、安徽、广东四省都督,使北洋军阀倪嗣冲入皖,占领安庆。倪嗣冲、马联甲一伙与袁世凯紧密结合,伪造民意,推行帝制,互称君臣,丑态百出,激起安徽人民极大的义愤。

为了反对袁世凯和地方军阀推行帝制,1916年,我和段瑞兰、杨允中、沈子修等曾密谋在安庆举行武装起义。我先与段瑞兰筹资约2000元,设地下据点两处:一个设在酒馆味菴园,地点在安庆旧藩署前,我充经理(当时同志们叫“朱贵酒店”);一个设在安庆大南门中药铺楼上,由允中负责。药铺储有炸弹。允中与上海方面接洽,约定旧历端午节前一日运回手枪20枝,准备在端午节夜间起义。计划首先纵火味菴园,趁救火混乱时,由警务处督察长翟少垣先将朱家珂(省警务处长)扣押,把东署、南署和西北两署中下级

警察,包括巡查一大队,共 2000 余人,集中起来,成立安徽讨袁军第一军。同时,将常恒芳、褚辅成^① 从陆军监狱接出来(常恒芳与褚辅成在 1913 年同时在北京被捕,解交皖军法处,押于陆军监狱),组织安徽讨袁临时军政府,并决定以常恒芳为首,段瑞兰和我为副,管理全省军事、民政事务。同时,还制定北伐计划,训练和扩大军队,响应云南蔡锷讨袁义举。不料事泄,倪嗣冲在武汉立即电告皖警务处,于端午节前一日先下手,缉拿我等归案。程少垣是我的知己,得此消息后,夜半亲自送来两张出入城证,叫我迅速离去。我为了掩护同志,就把两张通行证给了瑞兰和子修,让他们迅速离去,我遭到了逮捕。他们出城后,正好在途中遇见允中从上海购买军火归来,也就一起返回上海避难去了。这次反袁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民主共和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改变的,袁世凯做了 83 天皇帝,终于在全国一片声讨中下了台,忧惧成疾而死。倪嗣冲仓促由武汉逃回蚌埠。孙中山先生回国通电全国各省反对帝制,同时还电北京黎元洪,要求释放政治犯。安徽同乡会和柏文蔚联名电皖,指名释放我和常恒芳。不久我就恢复了自由。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是实权操在国务总理段祺瑞的手中。北洋军阀与地方势力矛盾重重,政局十分混乱。张勋认为这是大好时机,大造复辟舆论,在徐州召开“督军团”会议,组织军阀攻守同盟。倪嗣冲的反动势力在皖复起,他们大力搜捕革命党人。杨允中不幸在上海被捕,押解到蚌埠,英勇殉难。我接到芜湖赭山第五中学教员、陈独秀的密友刘希平由芜湖来信,催我速到他处避难。1917 年 2 月初,我秘密来到芜湖,住在赭山第五中学。当时的校长潘仰山,对我尚起了掩护作用。刘希平在该校讲修身课,即现今的政治课,高语罕担任国文教员。他们提出筹备工读学

^① 常恒芳、褚辅成均为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国民党国会议员。

校(即芜湖职业学校),要我担任驻校董事,借以掩护。同时我还见到了李光炯^①、卢仲农、王肖山等人。大家一致认为,黑暗的政治局面甚长,这不仅是安徽一个地方的现象,当前的任务应该争取在学校机关长期埋头下去,从改革教育、培养青年入手,提倡新文化,竭力而慎重地介绍新思潮,去提高青年们的社会责任感。做好这项工作,还应该大力提倡普及义务教育。

在大力作好普及教育,提高青年革命觉悟的同时,我和刘希平6月初还到了上海,去进一步推动反对倪嗣冲运动。在那里,我写了一本《燃犀录》,即《倪嗣冲祸皖记》,来揭露倪乡教皖。可惜原稿已经散失。当时倪嗣冲得知此事后,曾派颍州倪某家走卒以5000金和安顿高位向我购买此书,被我严词拒绝。8月份刘希平返回安徽,我继续北上。来到北京后,我去北大找了陈独秀和胡适,还找了皖籍议员常恒芳等人,并和他们交换了对当时政局的看法。我告诉他们,我们想从教育青年入手,同时,发动皖籍军人去反对倪嗣冲的安武军等做法。这些意见都得到他们的支持。

1917年9月,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推孙中山先生为大元帅。我应鲁北平原混成旅胡翊儒和济南第一混成旅张克瑤的邀请,来到了山东,交换了反对安武军、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伐的意见。不久接到刘希平、卢仲农等人来信,催我速回芜湖,商量在皖西建立第三甲种农校。11月初,我离开济南,路经芜湖,和刘希平一起来到安庆,会见李光炯等人。大家决定要我回到皖西六安筹建“三农”。1918年9月,我和桂月峰来到六安正式筹建,得到当时县长李铭楚的支持,由县劝学所垫借3000元、各界捐助2000元作为开办费,借六安老廣颺书院旧址为校址,于当年冬筹建告竣。同时,我

^① 李光炯,早年创办安徽公学(校内集聚革命志士,为安徽早期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场所),1911年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

还筹备六安女子学校于城西，推但西平为筹备员，聘吾妻周佩隐为校长。当时倪嗣冲爪牙刘道章是“公益维持会”会长、省教育会会长，沈子修是教育会总干事。刘认为沈不是危险人物，如果沈子修担任校长，学校经费就比较容易解决。其次，霍山劣绅郭缉熙与刘道章有勾结，曾企图把农校设立在霍山县。子修是霍山县人，负有众望，可以协调地方之争，使学校在六安开办。这样，在筹备就绪后，我就报告省教职员联合会，提请省教育厅委“二农”校长沈子修担任“三农”校长。桂月峰担任学监，我任修身课。1919年春，“三农”正式开学。六安学生会于3月成立。成立不久，就发表宣布，响应安徽全省学生会提出的教育基金独立运动。

安徽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从芜湖第五中学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推动了反帝反军阀运动，实质上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当时，安庆、芜湖两地以进步的教育界人士和青年学生为中心，组织了全省教职员联合会和全省学生联合会。当时的文化运动有两股力量：一股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早期陈独秀在安徽芜湖长街创办过科学图书社，提倡新文化，普及科学知识。后来，陈独秀虽离开安徽，但是，他所办的《青年》杂志，早在1915年在安徽就已出现，安庆、芜湖两地先进人士和各校青年受了很大影响；另一股是以李光炯为代表的反清、反北洋系民族主义思想的文化界人士。他们在文化界是很有号召力和影响的人物。陈、李两人早有深交，但是政见不同，然而在当时都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力。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安徽各地广大青年，如安庆、芜湖、合肥、蚌埠、六安、寿县等地的青年学生，都纷纷起来响应北京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当时在北京的陈独秀同在安徽的刘希平、李光炯和我等都有联系。陈独秀离开安徽时曾说过：“我去搞全国性的运动，你们在安徽搞反军阀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刘希平实际上是陈独秀在安徽的代表。当北京一发动，

我等在安徽就积极推动,发表宣言,组织游行。在青年学生宣传动员下,工人、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广大城镇居民也纷纷行动起来,形成一股巨大的反帝反军阀的力量,同时还开展群众性抵制日货的运动。在教育方面,还提出开展教育基金独立运动,提出经济公开和校务公议的具体改革方案。这些,对推动运动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运动一旦深入,封建军阀、地方官僚就暴露出他们的凶恶面目。5月下旬,督军倪嗣冲、省长吕调元先后发布紧急命令和布告,开始镇压学生,扬言要“依法逮惩”,“决不姑宽”。最后倪嗣冲还下令解散学校,强令学生回籍。尽管运动受到镇压,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教育了广大的安徽人民,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方向。

五四运动后,为了进一步推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安徽各公团和刘希平、李光炯、光明甫等提请我筹办《评议报》,兼任总主笔。经费由各学校筹集。通过《评议报》来评议当时的安徽政局,宣传革命思想,并积极支持全省教职员联合会和全省学生联合会,推动安徽省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运动。

安徽大批青年经过五四运动,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更迫切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较前更为普及。1921年在安庆、芜湖两地就已出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记得与《评议报》发生关系的青年团员有:柯庆施、周新民、朱子帆、许继慎、薛卓汉、舒传贤、郑鼎(李云鹤)、王坦夫、宋伟年等。

1921年6月,省议会按照军阀倪道烺(倪嗣冲的胞侄,凤阳关监督)、马联甲(皖南镇守使)的意图,拟削减已决定增加的教育经费,以扩大军费。6月2日,安庆各校师生派代表去议会请愿,竟被驱逐。数千名学生得此消息后前去支援。不料马联甲悍然下令毒打学生,打伤学生40余名。其中学生姜高琦身受七刀,不治而

死。校长光明甫带领学生直接与马联甲斗争,要求马联甲赔偿学生性命。这件事引起了全城舆论大哗,不久即举行了有各界人士支援的万人示威游行。后经省参议会出面和解,马联甲自知理屈,逃回当时监军驻节的蚌埠。这件事同时也震惊了全国,得到全国各地的同情和支援。在这种情况下,省当局被迫同意将教育经费由 92 万元增加到 150 万元。但是,凶手马联甲没有受到惩处。

姜案发生后,倪道烺与马联甲及国民党老右派管鹏合作,阴谋夺取政权。通过他们的爪牙刘道章、关芸农等,由倪道烺出 300 万元,包办省议会,妄想推举倪道烺为民选省长、管鹏为副省长,便于处理各学校风潮和扑灭学生运动(当时督军不能管辖学校、直接处理学生游行等事,民政问题只能由省长专理)。我们当时决定各回原籍进行活动,反对贿选。李光炯和光明甫、史恕卿等回桐城,卢仲农和朱子帆等回无为,我和沈子修回六安。我们捣毁选票柜,收集捏造选民假票的情况,公开揭露贿选内幕,并利用合法手段向北洋政府控诉倪、马非法贿选罪状。倪、马无法,又以 40 万元巨款购买北洋政府内阁总理靳云鹏,任命倪道烺的老师李兆珍为安徽省长,希望接事后,下令召集贿选议员开会,控制安徽政局。安徽人民再次奋起斗争,拒不承认李兆珍为安徽省长。当时我们发动教职员和学生 2000 多人,背着行李睡卧江岸,把守城门,不许李兆珍下岸入城就职。李看此情况,化装成商人混入省长公署。安庆、芜湖两地立即举行“三罢”,进行游行示威,直捣公署。卫兵与学生发生冲突,还打伤二农教员王肖山,引起了群情怒愤。李兆珍慑于群愤,终于溜出省长公署逃跑了。驱李运动取得成功,安庆还举行了万人庆祝大会。

在促进安庆六二学潮、反对倪道烺贿选省议会和拒绝李兆珍入皖的斗争中,《评议报》对推动安徽民族民主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五四运动前后我的亲身经历中可以看到：反帝反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五四运动以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学生走上街头，起了宣传、动员、教育广大人民的作用，使工人、城镇居民、工商业者都行动起来，卷入到反帝反军阀的巨浪中去，形成一股巨大的斗争力量。它增强了革命党人领导、组织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决心。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书籍更为普及，安徽出现了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斗争舞台。这些都为建立马列主义政党打下思想和组织的基础。

1979年

湘江的怒吼

周世钊*

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

1919年的春末夏初,中国人民的心是特别不平静的。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巴黎和会中正在讨论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问题,全国人民密切注视着这个关系中国生死存亡的问题,一致提出取消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号召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北京、上海和各地的报刊舆论,普遍传播爱国人民的这种呼声。

湖南人民的心情和全国人民一样,激昂、慷慨,主张奋斗到底。但在北洋军阀张敬尧暗无天日的统治下,爱国运动被禁止,一切外地爱国活动的消息也多被扣留,广大爱国青年学生感到十分愤慨。我们一群青年教师,和学生的心情一样,每天想从报纸上得到自己所盼望的好消息;教员休息室里,坐满了等待报纸的人;报纸一到,大家抢着先看。但不幸的是每天都使人失望。因为每天报纸报导的是:青岛归还,势将失败;二十一条,取消无望。我们的心上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感到异常沉重。每当学生要求我们报告时事时,就不知从哪里说起,只好鼓励他们发扬爱国精神,争取最后胜利。

* 周世钊,湖南宁乡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新民学会会员。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建立后任湖南省副省长等职。

记得是5月9日上午第二堂课后，我从课堂出来走到办公室，刚进门，就听见有人在高声念当天报纸上的专电和快信：

4日下午1时，北京学生五千多人，在天安门集会，举行学界的大示威。高举写了“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卖国四大金刚应处死刑”的白色旗帜……游行示威的学生，行至赵家楼曹汝霖宅，打破窗户，将卖国贼旗子掷入屋中。曹宅忽然后起火起。

章宗祥时在曹宅，学生见之，愤而殴击，章负伤甚重。

曹汝霖狼狈逃避六国饭店，因北京人心激昂，又走奉天，藏入日租界。

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学生殴伤甚重，性命已在呼吸。

北京学生，现被捕去三十余人。大学校长蔡元培愿独身抵罪……

听完这段消息，大家感到痛快，也感到愤怒。痛快的是打了卖国贼，愤怒的是北京政府逮捕了学生，外交上没有取得胜利。

这消息即时传遍了全校。课堂里，课堂外，学生三五成群，都在议论这事。有的说：“北京学生真勇敢，真爱国！”有的说：“卖国贼罪该万死，可惜没有把他们都打死！”有的说：“我们一定要援救被捕的学生，要继续争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

这消息也震动了全长沙城，全湖南省。全省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都交织着兴奋、痛快、激昂、愤怒的心情，准备响应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湖南学生的大联合

五四运动前，湖南学生的统一组织，也曾有过酝酿，并且在反对段祺瑞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秘密订立反对苏俄的中日共同防敌

军事协定的时候,还组织过湖南的学生联合会,以领导请愿废约运动。但因组织不健全,没有发挥大的作用,而陷于停顿。毛泽东同志回长沙后,首先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开展湖南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必须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这时有好些学校如第一师范、商业专门等校的学生组织比较健全,搞社会活动也有一些经验,他首先和这些学校学生中的骨干分子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接着再扩大联系的范围,并对所联系学校的学生主要干部,详细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特别是巴黎和会和北洋军阀的外交政策以及全国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发展的新形势。他提出:我们的斗争,第一,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要力争山东主权的完整,和反对北京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第二,要有统一的组织,使力量集中,声势浩大,以取得斗争的巨大胜利。第三,要对斗争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有足够的估计;如何对付张敬尧必会施加的压迫,使斗争坚持到底,就是应该注意的问题。

这时,北京学生由于段祺瑞政府的压迫,又不肯罢免几个著名的卖国贼,斗争情绪更加高涨。到5月19日,北京全体学校宣告罢课,并组织十人团,上街进行爱国宣传。不几天,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张敬尧知道势态严重,戒备更加严密。每天派人检查报纸,不许刊登有关爱国运动的消息;同时,重申禁令,不准学生作一切爱国活动。毛泽东和各校学生会负责人集商,要加紧团结,突破张敬尧的控制,取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又亲自写了一张很激切的传单,号召大家即刻行动起来,以支援北京和全国各地学生的斗争。写好以后,用第一师范等几个学校的名义发出去。并组织新民学会会员日夜紧张活动,动员各校罢课,同时推派代表,即日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

经过10天左右的联络、协商,统一领导全省学生运动的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于1919年6月3日正式宣告成立。当日通过决

议：全市和全省学校全体罢课。罢课宣言内有这样的话：“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需挽救。……学生之求学，以卫国也。国之不存，学于何有！我们的学生出于良心之感发，鉴于形势之要求，决定自6月3日起，全体罢课，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并在宣言的最后发出：“请斩曹章陆以谢天下”的呼吁。于是以公立法专、第一师范、长沙师范为首的长沙学生罢了课，接着湖南全省学生也罢了课。

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和全国各省学联的组织差不多。会长之下，分设评议部与执行部负实际责任。当时推定商专代表彭璜作会长，长郡中学和第一师范学生代表作评议部执行部主席。他们都是新民学会会员。其他各校代表也多数是新民学会会员或与新民学会早有联系的进步青年。如长郡中学的彭光球、周南女校的魏璧、雅礼学校的陈纯粹、法政专门学校的黎宗烈、蚕业学校的李思安、第一师范的蒋竹如等。会址设在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离毛泽东住的修业学校很近，他每天都到这里来和学联负责人研究问题。这年暑假，他日间多在商专，随时指导学联工作。

从学联成立后，湖南学生有了统一的组织，因而使爱国运动进入高潮。

掀起了爱国运动的高潮

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后，积极开展了各种爱国运动，最重要的是：要求废止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争回青岛，抵制日货，进行爱国宣传等。

由于段祺瑞政府于6月3日逮捕了在北京街头讲演的学生千多人，引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上海的工人和商人于6月5日开始罢工、罢市。不到几天，罢工罢市的浪潮就席卷了全国各大城

市,也席卷了湖南全境。这时的五四运动已发展成为全国工人、商人和学生大联合的革命运动。力量更加雄伟壮大。北京政府迫于这种人民联合力量的威力,始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辞职,企图缓和全国人民的愤怒。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早已在5月间由湖南各界公法团体如教育会、商会等所组成的国货维持会取得联系,并积极参加当时抵制日货的中心工作。这样一来,长沙城和湖南全省以抵制日货为主要活动的爱国运动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湖南学生联合会是国货维持会最有力的支柱。它派出很多学生作调查员,经常到纱号、南货、纸业、印刷、玻璃和百货等商店进行细致的调查。查出日货,即行封存,限期拍卖。如这些商店阳奉阴违,继续偷卖日货,就对它们分别给予罚金、没收或焚毁日货等处分。以贩卖日货著名的吴大茂百货店,违反规定,被苏广业国货维持会开除。华泰长洋货号改国货号以后,暗地仍贩进日货,被学生将店里的日货捣毁。唯利是图的奸商在这样监察、惩罚之下,仍然花样百出,不服从处理。于是由国货维持会、学生联合会、绸布业国货维持会于7月7日联合举行烧毁日货游行示威大会。游行队伍中的学生每人肩负一匹日本布,后面跟着绸布业的店员工人,最后才是国货维持会和学生联合会的旗帜。游行热闹街道,最后到了教育会坪。学生们将布匹堆放坪中,淋上煤油焚烧。直到布匹烧成了灰,游行队伍和观看群众才散走。

到7月9日,学生联合会又邀集工商各界开会,正式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组成包括20个代表的各界联合会代表团。各界联合会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各界爱国人民都纷纷加入,各校教职员组织的救国十人团就达250余个。7月中旬,救国十人团已发展到400多个,成立了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筹备会。到10月下旬,十人团又继续组成了很多。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正式成立,

柳直荀被推为联合会的副总干事。救国十人团的主要工作是抵制日货和作爱国救国的宣传。当时风起云涌地组织起来,热火朝天地开展活动,声势极为浩大。

这年暑假,学生联合会组织留校学生成立讲演团 14 个,到街上、码头、车站和挨家挨户进行反日爱国的宣传。男女学生在炎炎烈日下,把抵制日货、保卫国家的道理,详细向听众宣传;并结合朝鲜亡国后人民被残杀、几家只许共用一把菜刀等种种惨痛的事实,以及当时日本海军在福州登陆、殴辱学生的消息,以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奔走呼号。许多听众感动得哭起来。学生因为多日连续紧张活动,不肯休息,有的累得吐血。

各校学生又组织了许多话剧团,日夜排演有爱国意义的新剧,如“鸦片战争”、“哀台湾”、“高丽亡国史”等。我教书的修业学校中学部的师生,因排演“安重根”一剧,就花了 20 多天的时间。各种新剧演出后,也起了很大的爱国教育作用。

在全国爱国运动和长沙抵制日货、爱国宣传的影响下,国货维持会和爱国讲演团普遍在湖南全省组织起来,积极开展活动,爱国热潮已在全省范围内沸腾起来。

(原载《五四运动在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此为其中第 3、5、6 节。)

回忆长沙五四反帝斗争的一幕

舒新城*

五四运动时期,我正在长沙福湘女学作教务主任兼教历史、教育等课。

当5月4日北京学生空前的大示威、要求严惩卖国贼、痛殴卖国贼、焚烧赵家楼的消息传到长沙,湖南的报纸连续发表“山东问题之警报”,呼出“吾人断不能承认!吾人当出死力力争”的口号。5月7日,长沙各校学生举行了“五七”国耻纪念示威游行大会,通电北京政府要求严惩卖国贼,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从那天起,学生天天在市面宣传毋忘国耻,散发传单,呼唤国人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贼。5月11日起,湖南督军——段祺瑞的走狗张敬尧竟封锁新闻,并发布防范“过激党”的命令。学生爱国情绪更加高涨,于5月末正式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并于6月3日起举行总罢课,组织“救国十人团”,发起“爱国储金”运动,同时与湖南公团联合会组织国货维持会,抵制日货。几天以后,全省学生风起云涌地响应。

当时的一般知识分子已感到社会改革、民族自决、妇女解放等

* 舒新城,湖南湘潭人。五四运动期间在长沙任教。后任《群海》主编。

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受十月革命影响较深，毛泽东、蔡和森在五四以前即发起新民学会（成立于1918年4月14日），它在政治上当前的目标是驱逐军阀张敬尧，长远的任务为“改造中国和世界”，所以会员经常集会讨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局势，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并创办“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创刊宗旨）的《湘江评论》（出至第5期被查封），宣传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教育界人士朱剑凡、陈凤荒等则组织“健学会”，“对新思想及时进行研究，导之正轨”并举行学术讲演。其他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主张均应时而生；各学校的刊物则更多。

以上是五四时期长沙青年学生和知识界情况的大概。

二

福湘女学是美国长老会所办的学校，有美籍女教师三人，以培养为美帝殖民主义服务的妇女以利于从家庭和儿童方面腐蚀中国的民族精神为目的。因而凡有利于达到这个目的规制如检查学生书信、不许学生与校外学生团体接触，中文教本用“四书”及《古文观止》，自然科学以至历史地理用英文本等等都执行很严，而礼拜与灵修则比一般教会的男校尤为重视。所以该校学生对于本国各方面的常识都极缺乏；甚至有师范毕业生不知有“国民学校”（当时的初等小学）名称的，很多高年级学生不能看中文报纸，不能写普通书信。学校开办20余年，建筑了很大的校舍，有师范和中等各年级，但学生最多不过80人，且有很多学生中途转学去周南女校（长沙最早的私立女校，徐特立老师曾在该校任教多年）的。学校的负责人为争取较多的学生以便向美国经济支持者报账，她们趁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1918年3月至1920年6月），搜刮民财，摧

残教育,各校经费无着,经常停课之机,争取周南女校的学生;并打算聘请国立学校毕业生作门面,以广招揽。适逢我那时在兑泽中学、第一中学教书,因教育经费无着,生活困难,经在高师时美国教师的推荐,遂于1918年下期兼在该校教课,1919年上期专任该校教务主任,并教教育学、心理学及中国历史。

我到该校即发现学生无阅报习惯和不与外界接触,对国家各方面的常识缺乏,爱国热情不足。于是,我初步利用历史课联系现实,讲述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并每日勾画报纸中之重要新闻,和《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重要文章令学生阅读,组织课外学习讨论会,由学生将课外阅读的心得互作报告。五四运动以后,并介绍《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学灯》(时事新报副刊)等给学生看,并在每次上课时以一定的时间与学生谈国家大事。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也动员她们参加。但因校长阻止,不曾参加6月3日的罢课运动。

三

我之所以进福湘女学工作是抱着“教育救国”的指导思想来的。自从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以后,军阀连年混战,经济文化均被摧残,青年人本着自发的爱国心,对现实不满,在思想上有寻求“出路”的要求。但因未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缺乏斗争经验;所谓“出路”只能凭主观臆想。我因为在高等师范学过一点资产阶级的教育学,便以为教育是可以救国的;而当时湖南的地方教育,为军阀张敬尧摧残殆尽,为逃避现实的斗争,而走进教会学校,以为在那里可以发挥“教育救国”的作用。其次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尤其是1915年与袁世凯所订的二十一条的亡国条约,是一般知识分子所仇恨的,经五四运动的鼓动,仇视日帝之心更深。但因看不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对美帝国主义却存幻想,以为在美国人

所办的学校中可以进行爱国教育。

根据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所以我到福湘女学以后,很心安理得地进行所谓“教育改革”,钻研、编译资产阶级的教育科学。殊不知一切教育都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福湘女学是美国人所办的学校,它所要求的是灌输奴化思想,腐蚀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而我却要把学生教育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精神的人,我们之间便不得不展开剧烈的斗争。

五四以前,我在教学上有所改革,学校主持人尚能勉强相容,只不过在谈话中要我注意学校的传统,实即为培养诚心诚意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服务的“十字军”而已。1919年5月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曾派人至福湘学生会联系,要求参加学联组织及六三罢课。学生会征求我和校长的意见,我同意而她不同意,因而不曾参加。但学联自成立后,即积极参加国货维持会,开展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活动,并与各界组织“湖南各界联合会”,发行《救国周刊》,声势浩大,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包括湘雅医校(美帝所办)的学生会都参加,福湘的学生会也参加了长沙女学生联合会。可是长沙学联在7月16日被张敬尧解散了,从此她对我和学生的防范、警惕,就更严密了。

暑假期间,我对于全国和长沙出版的各种新刊物无选择地、日以继夜地阅读,头脑中充满了各色各样的所谓新思想;暑假开学以后,对学生也照样要她们广泛地阅读新报刊,学校不允订购的刊物如《新青年》、《星期评论》,则由家里带去。学生在各种书刊的启发之下,对于现实尤其对于学校的书信检查、婚姻不自由(该校曾因中学四年生与其表兄通信被开除)、宗教仪式太多等等感到不满以至仇恨,福湘的当局(包括长老会差会的牧师和校长)当然不容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而要以我为斗争的对象了。

四

1919年10月13日——18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在读者论坛中发表我用笔名写的一篇《我对教会的意见与希望》。在这篇文章中写了我在该校及其他教会学校看到的一些缺点和优点以后，提出五点希望，其中有希望办教会学校的外国人根本觉悟，把宗教和教育分开，为中国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要求舆论重视教会教育，改造教会学校，希望教会学校的学生自己觉悟，并参加各地学生联合会，共求进步。这种愿望本然是可笑的，但因我受过较多的美国式的教育（我在高师英语科，主任教员及科任教员均为美国人，在福湘一年多又看过比较多的美国书刊），在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却对美帝国主义有好感，因而对于美国所办的学校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时事新报》寄到长沙以后，教会学校的外国教师和牧师都认为这篇文章是对教会学校放了一颗很大的炸弹。其理由：第一是把教会学校一些不可告人的内容和盘公开；第二是鼓动学生反对学校，鼓吹舆论干涉教会学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鼓吹废弃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既违反“国际条约”，也违背“信教自由”。因此决定辞退我，先是通过我的推荐者和我协商，要我“自动辞职”，如不成，则用法律对待。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勾结的统治下，自揣难与继续斗争，终于被迫“自动辞职”了。

这次斗争唤醒我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梦，教育我认识知识分子没有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是不会从阶级本质上看问题的，没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是不会真正参加革命的。——我在当时看不清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是同一种本质，曾在“健学会”作过教育学的报告，但不与“新民学会”接近和接受《湘江评论》的思想的指导就是因为此！

……帝国主义者已彻底被赶出中国大陆了！我和帝国主义斗

争的往事,青年们是永远不会遇着了。但帝国主义仍然在仇视我们,时时想乘机制造变乱,破坏我们的人民民主事业,我们应当提高警惕,发扬五四运动的斗争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文化,坚定工人阶级的立场,把全部力量投入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

(原载《学术月刊》1959年第5期)

对五四时期济南学生运动的回忆

石 惠 山

五四运动于1919年5月4日从北京发起,迅即扩展到全国各地,山东省济南各大、中学校的学生,普遍参加了。当时我是济南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师)应届毕业的学生,是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之一,和广大同学们一道参加了这个运动。北京爆发五四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的消息传到济南,立即在济南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加上又听到消息说:反动政府为了防止“五四”事件扩大,竟密令山东当局严厉禁止学生一切爱国活动;而驻青岛的日军司令,竟然也无理地向山东省政当局提出威胁,要求采取强制手段,压制学生反日爱国运动。反动政府的这些行径,更加激起了我省人民和爱国学生的无比愤怒。济南市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为了协同行动,有力地开展爱国活动,抗议反动政府卖国行为,声援北京被捕同学,由齐鲁大学、工业专门学校、第一师范、第一中学等学校学生会倡议和主持,联络各学校,并由各校推选代表二人于5月中旬成立了山东省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学联合会),会址设在富官街诚社内。

一、组织罢课

学联合会成立以后,各学校有了一个统一指挥的机构,当时学联

会提出的共同斗争目标和行动口号是：(一)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二)要求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三)要求政府收回山东权利，废除二十一条密约；(四)要求政府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为了向反动军阀政府表示抗议并且电明正义要求，为了响应北京学联5月20日发出的罢课宣言，学联合会于5月23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讨论决定5月24日全市各校大罢课。

5月24日，济南全市各大、中、小学在学联合会的统一部署下开始了罢课。是日上午8时左右，一师全体学生300余人，在学生会率领下，整队到达南关演武厅大会会场，其他各校学生，也都先后到达，共有七八千人。每人都手执小旗，上面写着：“誓死收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立即释放北京被捕学生”等标语。会上由学联合会负责人说明当前形势，宣布了学联合会罢课的决定。会议结束后，以学校为单位，整队出发，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此后，各校学生在学联合会的领导下，不顾反动势力的一切阻挠破坏，积极地进行了许多活动，主要的有：

一、街头演讲。所有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差不多都参加了街头演讲的活动；

二、发动了商界职工清查和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

三、扩大了斗争力量，成立了学商联合会，并分别组织了学工联合会、学农联合会。在学联合会倡议下，召开了全市各界联合大会。到会的有：学联合会、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律师公会、报界联合会等各会代表；另外还有许多学生、工商业者和市民，合计约有七八千人。会议上各界代表相继发言，一致表示要坚决声援北京学生，谴责军阀政府丧权辱国的可耻罪行，表示坚决反对北京当局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二、罢市斗争

6月3日,北京军阀政府继续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竟大肆逮捕学生一千余人,北京学联紧急呼吁全国学生声援;从而激起了全国许多地方爆发了罢工、罢市,声援北京被捕学生的活动。特别是上海市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爱国浪潮,大大影响和推动了济南市各界人民的爱国运动。

6月9日上午,在学联合会要求下,由省议会出面,在省议会会址召开了一个全市各界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了如何声援北京被捕学生和响应上海等地罢市等问题。当时一致通过决议,于6月10日起,全市实行大罢市,并责成学联合会具体进行组织和发动工作。

当天下午,学联合会分别召开了学联合会和学商联合会两个会议,对有关罢市问题作了具体研究。

学联合会本部会议开得很顺利很成功,但学商联合会的会议,却经过了一番曲折,情形大致是这样:会议到的人数约五六百人,会议内容主要是讨论罢市的问题,讨论中,以商会会长张子衡(山东银行行长,章丘人)为首的一些大资本家,对罢市问题声言要“慎重”,说什么罢市有碍治安,影响生计,当局不允,虑有后患等借口阻挠,而一些中小商人,虽然同意罢市,但都不敢出头,因此很少说话。会议继续了很长时间,决定不下来。中间休息了一会,学生们进行个别发动的工作之后,情况有了改变,如有一位小商人发言说:“北京学生是为我们山东问题被捕的,上海市各界人民为声援北京学生罢工罢市,我们是山东人,难道我们自己就不关心山东吗?”他的话说得那些大商家闭口无言,会议经过争论,除小部分大商家不同意外,大多数商家都举手表示同意罢市,继之对罢市的部署作了具体安排。

6月10日这天清早5点钟左右,第一师范的学生们,由组长带领,陆续出发,到达预先规定的地区(西门大街西头)后,发现大街上军警密布,警戒森严,如临大敌(以后才知道,反动当局早已得到罢市的情报),此时街上行人渐多,各商店也都开了门。到6点钟(事先规定的罢市时间),学生们从怀中抽出小白旗高举摆动,高喊“罢市”的讯号,这时各学校学生一见号令,立即通知各商店:“罢市开始”。各商店伙友一见通知,立即上门板,关店门。而反动政府指使下的军警见罢市开始,便冲向各商店进行干涉,不准关门。学生们见军警阻拦,也随即赶上前去“劝阻”。在一片混乱声中,从西门大街西头到院东一带,绝大多数商店都关了门,罢市了。不肯关门的有山东银行、瑞蚨祥等二三家大商号,后经学生们的动员劝说,也关了门,和别家的商店一道罢市了。与此同时,从商埠到西关、南关、东关等处也都罢市了,全市的大罢市实现了。

各商店罢市以后,店员们、中小商人和市民们,都跑出来了,跟着各校学生队伍举行了游行示威。

全市的大罢市直接冲击了当时的反动政府,反动统治者山东戒严司令部(即四十七旅马良司令部)为进一步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便通知各学校“不许学生游行示威和进行演讲活动,否则以扰乱治安论罪”。并调动大批军警,企图用武力强制商民开市。学生们没有听从反动军警的指挥,第一师范学生会的一些学生,当天晚上照例碰头开会,讨论第二天的活动。这时有的学生已知道了反动政府“不准学生出校”的命令,并听到第二天军警要干涉学生活动,强制开市等消息,因此感到形势严重,一致认为必须团结一致始能斗争下去,绝不能说卖国有功,爱国有罪。根据这种情况提出了如下对策:(一)演讲时,遇到军警干涉,一部分围着他们讲道理,一部分继续演讲;东边不行就转移到西边,西边实在不行,再转移东边。不管怎样,演讲决不停止。(二)如果军警用武力干涉,学生

也强硬对待。如逮捕学生,我们就沿街高呼,发动组织群众,一起跟着走,决不能畏缩后退。(三)如果军警强制开市,我们就发动街上群众一同进行阻止,坚决不让开市。

6月12日清早,天还未亮,门房(第一师范)工友就急忙地跑来告诉我们:“来了许多军队,在学校大门内住下来了!”学生们一看,果然大门以内住满了士兵,约百多人。

学校大门被军警堵住了,学生们都非常焦急,经大家商量,议定:第一,向士兵们说明我们是爱国行动,请他们放行。第二,如果以上做法不行,全体学生分成三队,第一队由大门硬冲出去;第二队由后楼越墙出去;第三队由西南院越墙出去,均到学校门前会师。

根据以上计划,行动结果,第一个办法没有行得通。于是,只好按第二个办法行事了。结果学生们喊着“冲上去”的口号蜂拥而上。有的学生被打倒了,爬起来还是向前冲。正在第一队学生和军队英勇搏斗时,第二和第三两队的学生,便趁机越墙出去,绕道到了校门前,在他们的协助下,第一队的学生们也终于冲出了学校大门。

第一师范学生突破反动军队封锁来到大街时,其他各校学生也都先后冲到大街上来了。原来其他各校也和一师一样,同样遭到反动当局派出的武装兵士的包围封锁和拦阻,都被军队堵了校门。但是各校学生用了种种方法,也都冲了出来。其中工专的学生,经过了一场激烈的厮打,终于在门外工人群众的支援下,内外冲击,才得以胜利的夺门而出。反动政府第一个卑鄙阴谋——封锁各校校门,被挫败了。可是反动派并不甘心。他们调动了驻济南市四十七旅部队和驻辛庄的第五师部队,分东西两路向中合拢,企图强力驱散街上的学生队伍。我们一师的学生,一部分正在院东大街一带进行示威演讲,忽然见到大批马步兵配合着警察自东

向西推进而来，在院东大街相遇了。这些反动军警一面吆喝，一面开始动手打拉学生。学生们一面奋力抵抗，一面大声向他们说理。这时赶来了一中、正谊、商专等校学生，沿街市民群众，也都来到学生队伍这一边。从西门大街东段到院东大街西段一带，人山人海，口号声此起彼伏，群情忿怒，反动军警见此都愣住了，不敢再进逼，两边就这样僵持下来。坚持到中午时分，从西边，工专、齐大等许多学校的学生，也涌过来了。听他们说：他们也经过了一场激烈的冲突。他们原来在商埠二大马路一带游行，准备到四大马路的日本领事馆去示威。刚过纬一路，就遇到第五师的部队，枪上膛、刀出鞘，学生们冲不过去，便改道向东进入西门，和一师等校学生会师。他们刚进西门不久，女师同学也冲破重重封锁，随后赶到。把守西门的反动军警，见到女师学生的队伍前来，正想关闭西门，有一位女学生毫不犹豫地飞步抢上前来，向着正在关着的门里伸进一只腿去，士兵略一迟疑，后面学生们已经一涌而上，夺门而入。这样各校的学生，大都集中到芙蓉街南口以西、大布政司街南口以东这一段大街上来了。反动政府妄想把学生们冲散驱走的阴谋，又可耻的落空了。反动派见无法驱散学生队伍，于是就命令军队，将这一段大街四面封锁起来，准出不准入，企图用围困的办法，迫使学生自动解散。可是连闯两阵的学生们，这时集中在一起，感到力量更大，斗志更旺了。大家抱定决心和反动派斗争到底。一师门前临时搭起了几张桌子，成了临时的指挥中心，各校代表轮流上去演讲，继续说理斗争。与此同时，大街两边的商店伙友和各街道市民，为学生们的爱国热忱和斗争精神所感动，送来许多吃的东西，有面包、糕点、鱼、肉、鸡、蛋，也有茶水等等。一师对门路南广生行，并送出大批果子露，泰康公司也拍出来许多点心。而学生们为了对反动当局的武力迫害表示严重抗议，都不肯食用，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深夜。反动当局眼看群众的愤怒愈来愈大，学生们又

非威胁所能屈，便被迫派出代表和学生谈判。当时各校学生推举了四位代表，提出了以下条件：

第一，省政当局立即电告北京，要求北京政府：坚决拒绝巴黎和约签字；严惩卖国贼；无条件收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密约；全部释放学生。

第二，保证今后人民出版、言论、集会自由，不准再用武装力量侵犯学生爱国活动。

第三，在承认前两项条件的基础上，对于开市问题，政府不得干涉。

这些条件，张树元的代表被迫都答应了，并当场写成了文件，由省议会盖章保证。代表们向大家报告，协议达成后，首先由张树元下令调开军队，解除对学生的包围，然后各校学生整队返校。这时，已经午夜12点以后了。

三、赴京请愿

6月17日得悉反动军阀政府仍准备在巴黎和会上签署不平等条约，日期预定在6月底。听到这个消息后，济南各界人民纷纷举行集会，强烈抗议反动军阀政府的卖国阴谋，并纷纷致电北京反动政府和巴黎中国专使，表明坚决反对签字。为了制止反动政府的卖国勾当，在学联合会倡议下，由省议会出面主持，于6月18日召开了一个各界联合会代表会议，一致议决，立即派出“山东各界请愿团”到北京请愿，并议决请愿团由各联合会分别推派代表组成。当场选出代表83人。现在还记得的有：省议会代表王乐平、聂湘溪、李子善、李向山、朱仲康、张毅伯等。学联合会代表有王建兴、李澄之（一中）、庄达中、王汝霖（商专）、张文英（工专）、张辑吾（农专）、石志昆（一师）等。教育会代表有田信卿、连之铎、违季真、冉

庆容等。律师公会代表有鲁佛民、吴镜荪、张思维等。

次日即6月19日一早，天方微明，一师全体学生和其他各界代表，都赶到车站，为请愿代表团送行。当晚7时左右，到达北京车站。食宿由山东同乡会的几位代表负责安排在私立山东中学内（在化石桥）。饭后就有关请愿的具体问题作了研究：

（一）明日（20日）赴总统府请愿；

（二）推选王乐平、李子善、聂湘溪、王香荪、庄达中等五人代表大家发言。并推选聂湘溪为交际、张毅伯为文书、朱仲廉为会计、李向山为庶务等工作的负责人。

6月20日早饭后，请愿团代表整队出发，11时左右到达总统府门前。此时此地警卫密布，如临大敌。请愿团上前要求晋见总统，几经交涉，得到的回答都是：“不接见”。后来，竟索性把朱红大门关闭起来，把请愿团代表们拒绝于门外。许多代表见此便高呼口号，向着朱红大门手捶脚踢，由于天气极热，加之心情过分激动，有的代表当场晕倒。这时总统府门外围聚的人愈来愈多，见总统府拒绝代表们的正义要求，无不表示气忿，纷纷咒骂反动军阀政府无耻，只知卖国殃民。这种情景一直坚持到下午，由于群情所迫，反动政府终于派出了一个什么军警督察处处长马龙标来，以山东人的身份，装模作样来劝说代表们暂时回寓，听候政府答复。但代表们坚决声言：外交危局，已届刻不容缓，代表不远千里来京，岂有不见之理！非立见总统不可。到晚10时左右，马龙标又出面，并代表总统府答复说：“今天已晚了，明天上午大总统一定接见。”代表们商量了一下，始勉强同意，整队回寓。

第三天（6月21日）一早，马龙标来了，把代表们带到了总统府，约在8点钟左右，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终于被迫出来接见了，但开始时他站在台阶上一声不吭，两旁簇拥着步军统领王怀庆、警察总监吴炳湘和侍从等数十人。我们请愿团代表们，站在阶

下递交了山东各界人民请愿书,然后分别讲话。内容除了陈述山东人民身受日本帝国主义种种蹂躏的痛苦和人民激忿的心情外,着重提出了对政府请愿三条内容,要求采纳民意,明确表示态度,以便回告山东父老。尽管代表发言情词恳切,徐世昌那副黄胖脸上却毫无表情。他的答复是:……关于外交上失去之权利,政府一定要竭力收回。至于所提三事,第一条,关于和约问题已电巴黎专使,暂缓签字;第二条,高徐、顺济两路草约问题,是可以废除的,不过先偿还日本垫款的2000万元,目前尚有困难;第三条,关于惩办曹、陆、章等人问题,事属司法范围,本总统无权过问。代表们要求他当面批还请愿书,他把手一挥说:“这须转由国务院总理批复。”接见就这样结束了。代表们回寓后,仔细一琢磨,得到的答复是:一“从缓”,二“困难”,三“无权”,竟把代表们的三条要求推得干干净净。于是,大家又计议决定:一方面推出六位代表,明天就去见总理龚心湛,要求他明确表示,拒绝签字;另一方面,各代表分头去各界联系,请求声援。

6月22日,反动政府的总理龚心湛,接见了请愿团的代表,口头答应马上批复。可是,一直到了25日,这个批复才送到我们手里。这个批示原文如下:

此次欧会和约,政府以关于山东各条最为主要,迭经电飭专使悉力争持,近接专使电述,保留一节尚在多方进行。所有各代表等陈请不能保留拒绝签字等情,昨亦经电达专使遵照在案。国家主权碍难丝毫放弃,政府与国民主张初无二致。无论如何,必将胶济铁路设法收回。此则夙具决心,可为国民正告者也。

所称高徐、顺济路约一节,查该路原系草约,自必多方磋议,力图收回,决不续订正约,以慰民望。

至中日二十一条密约,及高徐、顺济路约经过情形,案牍

具在，前经择要公布。共和国家，一切措施，悉为准诸法律。必有确定证据，乃能受法律制裁。

政府于国家利害，人民疾苦，无日不在注念之中。乃以国家多艰，致该代表远涉京师，有妨本业，殊属轶念。其各归告父老子弟，俾晓然于外交真相，及政府维护国家之苦心，各持镇静，勿滋疑虑。此批。

以上这个批复，表面看，冠冕堂皇，面面俱到；但实际上是玩弄笔墨，欺骗人民。我们要求拒绝签字，他说正在“悉力争持”，“必将胶济铁路收回”；我们要求废除两路草约，他说“自必多方磋议，力图收回”，“决不续订正约”；我们要求严惩卖国贼，他说“一切措施，悉为准诸法律”。这样的答复，不但纯粹是敷衍搪塞，一点没有能够解决我们的正义要求，而且埋伏着许多出卖祖国的阴谋。代表们越研究越生气，一致认定：不能带着这个结果归见山东各界人民，非要弄出个结果不可。于是，经过商讨后，决定如下：（一）立即将原批复退回，要求明白表示保证决不签字。（二）立派代表李子善专程回济，组织第二批请愿团来京增援。（三）再次通电各省，约请各省组织请愿团来京作全国大请愿。

这样，又过了两天，到6月27日晚，接到了龚心湛的第二次批复。大意是：已电令巴黎和会我国专使，不保留山东问题，对和约决不签字。随后6月29日，又接到消息：巴黎和会我国专使来电，已在和会拒绝签字。

就在6月29日，山东各界第二批请愿代表80多人，又赶到了北京。两批代表碰头后，经过研究，认为请愿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决定离京返济。这次北京请愿就这样结束了。

（原载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转载时稍有删节）

“五四”在山东农村

陶 钝

1919年5月中旬,在济南读书的学生回到了诸城县的家乡。他们都是县立高等小学毕业的,那时候的小学是七年制,高小是三年。他们在当地有不少同学,多数都熟识。他们不到6月30日学期终了就放假回家,带来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了抗议巴黎和会瓜分中国罢课的消息;也带来了济南各校学生响应北大学生罢课宣传的任务。他们讲说,欧洲大战协约国胜利了,在法国都城巴黎召开和约会议。中国也是参战胜利的国家,不但没有分享一点胜利的果实,在和会上列强要瓜分中国。日本提出了山东省由日本控制的二十一条款。中国参加和会的代表是亲日派,在日本代表的威胁下将要签字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为此举行罢课抗议、游行示威,要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他们还讲了,中国当权的北洋军阀压制学生爱国,包围了北大第三院,学生的饮食断绝,激起了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一致罢课,并包围外交官的住宅的情况。这些讲话激起了在校学生的爱国热情,各班都开始议论了。

学校里有两份报纸,一份是上海的《申报》,一份是北京的《晨报》,都在校长办公室里。《晨报》上已经发表了北大学生罢课的消息,校长和教员都知道。可是学生平时不看报,教员又“莫谈国事”,所以学生们闷在鼓里。这时向校长室找报看了。学校当局还有点爱国思想,对学生们的行动明地里不干涉,暗中还支持。

一、反日大会

诸城县城里的高等小学只此一家；还有高小隔邻的两级女学，高级学生只有几十个人，都是城里的大家闺秀。她们出入学校，走上大街，还是低头看脚尖，目不旁视；还有一处单级师范养成所，学员有四五十人，年龄较大，有的是读过“五经”、“四书”的老先生，经过学习一年回去当小学教师糊口。这两校的学生也知道北京和济南的学生罢课游行，却引不起他们的行动，从京、济回来的学生也不大注意他们。他们注意的是高等小学。经过他们讲演宣传，高小学生动起来了，每个班都集会酝酿罢课游行，筹备反日大会。

高小学生有五个班，共有 200 余人。首先发动起来的是三年级和二年级，接着人数最多的一年级也跟上来了。诸城县立高等小学反日会成立选举了三年级的陈宝琨为反日会会长，徐宝梯（我的学名）为副会长。各班排练队伍，剪贴小旗——内容是“还我河山”、“抵制日货”、“反对卖国贼出卖山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实什么是帝国主义，我们也还不懂。问历史教员，他解释说：“帝国主义就是强国侵略弱国的主义。”县立高小动起来以后又去联合两级女学和单级师范养成所。定于 6 月 7 日在西关人烟稠密，商业繁荣的地区开反日大会。两级女学和单级师范能参加的不过几十个人，高小学生 200 多人全部参加。一律是灰色的制服、军帽，浩浩荡荡从学校出来，沿途高呼口号。游行路线，本来是出西南小门去西关会场最近，为了影响全城，从南门里出来走南北大街，经过县府前面，出西北门再转向西关。体育教员和历史教员都跟在队伍旁边，指挥员是反日大会推举的。在西关财神庙街高地上搭起一座主席台，台上交叉挂着五色国旗。

反日大会主席是陈宝琨，宣布开会以后，是唱爱国歌。我还记

得第一段歌词是：

一统旧江山。亚细亚文明古国四千年。最可怜犹太印度
与波兰！亡国史，读之心寒！

共唱了三段歌词，音调怨哀沉痛，无论是唱的人和听的人都感觉心情沉重。下边是讲演，高小学生三个年级都推出能讲演的代表，轮流上台，讲的都是“中国要亡了，同胞们……越讲情绪越激动，讲得痛哭流涕。当他们讲到青岛和胶济铁路已经掌握在日本人手里，矿山也要归日本人开采，3800万同胞将要作亡国奴的时候，开会的群众，连周围参观的商人想到山东人民的命运，想到自己的命运，齐声痛哭了。三年级的同学王伯年，跳上台去，撕下自己白小褂子的一块衣襟，咬破指头写出了“宁死不当亡国奴”七个字。血书激起的怨愤情绪达到了沸点，由号啕大哭，变成了低头吸泣；呼口号也凄惨嘶哑了。大会宣布游行，把血书挑在国旗上边，举在游行队伍前头。游行的队伍扩大了，没有参加游行的青年们在后边也跟上了。路经商店门口，有的学生停下来向商人宣传，商人们也感动了，纷纷地上门板。一家上门各家响应，一时间上门板拍、拍的声音响彻大街，形成了罢市。

诸城县城离青岛不过130华里，县境离青岛更近，他们知道日本人在青岛欺侮中国人的事实。诸城闯关东的人也多，他们看见过朝鲜亡国，作日本人牛马的惨状。群众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是同情的。

二、查烧日货

反日大会以后开始抵制日货，要群众不买日货，不用日货，给日本经济造成损失。红货店——布匹等，挂货店——带子之类，差不多全是日货。火柴是青岛工厂制造的，红白糖是从台湾运来的。

如果没收了这些货物，商店连资本都亏损了，也会影响到店员的生活。反日会和商会谈判的结果是，贴上反日会查过的符号，可以继续出卖，卖完了不再贩卖日货。

商界也成立了反日会，商会会长成了反日会的会长。学生查日货，商会来配合。商店老板对于学生是有戒心的，对于商会来的人使眼色、对袖口作出了种种姿态。我们抓不住人家的毛病，明知其中有问题，也提不出来。

中药铺、酱菜园和茶庄是没有日货的，对学生查日表示欢迎，老板在店门外看到学生来往柜台里边让，可是我们也不进去。有一天晚上我到—个茶庄找当二掌柜的舅舅，想了解一些商界的情况。他说：“商会长和店掌柜是一家人，你们几个学生管什么用呀！人家有利可赚，该买进的买进，该卖出的卖出，管他什么国货日货。”我听了他这话，心情很沮丧，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他又问：“你们查过瑞华春号没有？”我说：“查过，没有日货。”他哼了一声说：“他们没有，西关就没有日货了。你们真是小孩子。”“你们知道瑞华春东家是谁？”他这一提我明白了。瑞华春的东家是高等小学的于老师。我们平日到西关买东西，常常碰到于老师从瑞华春出来。瑞华春的小楼上是于老师吸鸦片、打麻将的地方。高小的校长和于老师是拜八兄弟，这些关系，我们知道。于老师两个儿子，一个在三年级，一个在二年级。我们的一切活动，他们都知道。瑞华春的日货都藏起来了。我在回校的路上，回想舅舅的这些话，认识到瑞华春的事和于老师及两位同学有关系。那两位于同学和我们在一起，大喊大叫地抵制日货呢？

有一天校长叫了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室内坐着两位客人；都是绸子大褂，黑纱马褂，这是城里绅士们通常的打扮。我以前在学校里也看见过他们，他们和校长是常来常往的客人。今天，当着他们，校长叫了我来干什么？我愣愣地进了屋子，按通常的规矩站在

一边，听候吩咐。校长指着一个矮个的胖子说：“这是你的伯父，他愿意认识你这个同姓侄子。”又指点另一个黑瘦的家伙对我说：“按行辈算，你应该叫他表叔，我知道你们是亲戚。”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低下了头，什么表示也没有。他们认为我这个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怕见生人。他们开口赞扬我说：“你们校长和国文老师都说你的作文好，是个有出息的学生。”接着又说：“爱国不仅你们几个学生，现在满城绅商都爱国，参加反日会、查日货，咱们一起干！”我还是不言不语，现出了为难的样子。校长放口要我回去，我转身就走。那二位绅士，屁股离了椅子有半寸算是送我。我出了校长室还听到他们议论我是个老实孩子。

不久诸城各界反日会成立了，学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绅士和老板掌握了反日会的大权，出了很多主意。有一项主意是不让日货进城。从县城到青岛必经之路是离城 30 里的辛兴镇。在这个镇上安置上查日货的卡子。有一些肩挑贸易的小贩到这里就被查住了，把他们的日货扣留下，拿出一部分来，当众烧毁。逢辛兴集的这一天烧日货让四乡来赶集的人看看。赶集的人把烧日货的场所围起来，点上火以后，货物着了火，烈焰冲天，发出刺鼻的臭味。这些烧日货的人，不是学生，也不是商人，不知哪里来的一些少年人，他们对劳动人民用血汗生产出来的货物烧毁毫不动心。那些小贩眼看着自己的血本丢进火堆想向前抢出一些，被烧日货的人，推出场外。

我们碰上这样的问题不知怎么办才好？总是内心里不安，又阻止不住，心情十分沉重。学校要提前考季考，学生反对，学校干脆宣布不考了——放假。乡下学生纷纷回家，只剩下我们反日会的几个主持人。城里的学生还来办事，那位于同学也在内，非常活跃，他们和本城的绅士、老板很合手。每天下铺子吃吃喝喝。我们几个人呆不下去了，也就收拾行李回家。相约在乡下组织反日

活动。

三、在农村查日货

我们村就有几个肩挑贸易的小贩。他们收购乡下的鸡和鸡蛋挑到青岛市去卖了，买上火柴、红白糖、香烟和各色的线等物回来。这些人都是我的邻居和同姓叔伯或者哥哥。我在城里查日货他们是知道的，往常回家到他们那里去，总是很亲切热情地，笑脸相迎；长辈有长辈的样子，同辈有同辈的样子。这次回来不同了，他们总是避着我，我们之间有了隔阂。我就去他们家里，他们见了我很恭敬，不像从前那样自然。他们的精神，显示出很不安。我环顾他们的小破屋，他们更为难了。自动地说：“穷，没有办法，做点小买卖，又碰上这年头，你说怎么过呵？”他们的话是实话，我没法说不对。正在这时候买火柴的人来了。“大叔：我买封洋火。”这位大叔回答说：“卖完啦。没有啦。”买火柴的在门外叫：“刚才还有人来买过，怎么一回就没了呢？”说着进了屋子，看见我在这里也就不再问有没有了。以小贩为生的人没有土地，不作小贩就不能生活；火柴是一天也离不开的火种，没有火柴就要回到火镰火石的时代去；而且打火工具早已没了，今天一时也弄不来呀。我看到这情形，不能不说话了，我说：“查日货，本来是为了爱国给日本造成经济困难，不是和自己的同胞为难。有就卖给他一封吧，卖完了不办日本货就是了。”卖者听了这话果然拿出一封来。也许是买火柴的出去透露了风声，买火柴的连三接四地来了，他们害怕买晚了买不到，以后没有火柴用。

我又问：“大叔没有别的生活吗？”他回答说：“没有土地，还能做什么？打短工，挣个肚里饱，家里这两口人吃什么？”说着话，眼圈里含着泪水。这位穷大叔因为欠账借了高利贷，还不起把两亩

薄地卖了。自己跑到关东去，老婆带着一个孩子要饭吃。闯了几年，回来时还是双肩托一口，没有剩下什么。在关东男人多，女人少，闯关东的多是男的，不能成家，怎能传宗接代，还得回来找自己的亲人。回来以后借了同姓近友的一个地角，盖了一间土打墙、草苫顶的屋子。把剩下的两块钱作本跑青岛、做小买卖。一家三口人，吃这条扁担，遇上阴雨风雪天气，不能出去，在家里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这次从青岛回来，为了躲避查日货，放夜站、走小路，才回到家来。

这家同姓邻居离我家最近，我小的时候常到他家听他讲青岛的火车、汽车、大楼马路，像听神话那样有趣。今天能查他的日货断绝他的生路吗？当然不能。正在这时候来了买线的，他不再掩饰拿出一把来劈给顾客一缕。我说：“多买卖这些不行吗？”大叔听见笑了说：“你们天天查日货，您知什么是日货吗？带轱辘的线是日本货，不带轱辘的就不是日本货吗？实说了罢：这些线也是日本工厂出的，把日货查净，我这个小买卖就不用做了，大家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你穿的大褂是日本工厂织的布，你念的书是日本工厂出的纸印刷的，你若一点日货不沾，就得光着身子，烧掉书。”

我从这间破草屋出来，心情十分沉重，这教育太深刻了。我们的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尤其是住在青岛附近各县的人民，旧用的火镰火石丢了，专用日本工厂出的火柴；我们把纺车织机丢了专穿日本工厂织的布；就是针头线脑都取给日本。为什么日本人要割去山东，他们早把山东人的生活命运掌握了。我们抵制日货，拿什么样的国货来代替它呢？在城里查日货的时候知道双龙牌的洋布不是日货，那也不是国货，那是英帝国主义进口的布，查日货用英货，这不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吗？这些问题在我这个少年心灵里，像波浪似的翻滚。

我也曾听到来往济南和北京升学的同学们讲过，他们都是从

高密火车站上车。胶济路日本在欧战期间从德国手里夺过来以后就归他们所管辖。中国人拿着银元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钞票不能买火车票，必须拿银元和中、交两行的票子到车站上的日本商店换成日本正金银行的票子才能买火车票。这些在济南和北京反日爱国的学生，也是这样才坐上火车回到家乡的。他们不能自背行囊，或者雇骡马车走十天半月才回来呀，那样，一月的假期不是光在路上了吗？我是准备升学的，也准备低着头咬紧牙关去作自己不愿作的事情。我觉得小贩大叔值得同情，如同对学生们不得不用日本钞票买火车票一样的同情。今天我查日货断绝小贩大叔的生路，将来自己为了不坐日本火车就不升学了吗？回想起自己也参加了烧日货的行动感觉内疚。

日货不能不查，痛心的事情还要去做，亡国奴的前途摆在面前，出路在哪里？那时发生了狂想，想到和日本人拼命，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两个挣一个；中国人多，日本人少，最后是中国胜利。

我们村里还有一家小铺，是一家小地主开的，专卖油盐酱醋茶和一些零碎土产货物。他们不是不卖日货是很快就卖完了，看见我们学生就自动招呼我们去查，当然是没有日货以后才有这种表现。可是他们卖的货一律涨价了。本来一个铜板可以买十片火纸，现在买五片，他对顾客态度很蛮横：“不买，过两天一个铜子一片也买不到，嫌贵，贵的日子还在后头呢！”这家小铺乘机发了财，洋洋得意。村民只能用白眼珠子瞪他。

四、在农村开反日大会

诸城县城北昌城区是最富庶、最文明的一个区。围绕着昌城镇的村子都有个小学，也有在县立高小读书的学生。联络高小学生和各小学的老师，就可以开成一个反日会。要动员小学参加也

要接触各校的董事长。他们是当地的绅士，小学都是他们办的。这些董事长都知道我在县立高小作过反日会的副会长，所以所到之处受到欢迎，满口满应地参加反日大会。尤其是隋家官庄有个隋理堂老先生，他是动员我祖父送我入高小的前辈。他在清朝是个秀才，现在是山东省议会的议员。他又是同盟会的会员，见过孙中山先生，竞选过山东省参议会的议长没有成功。他对我奔走开反日会极口赞成，夸我爱国，答应我一定到会，并且叫出他的大姑娘隋焕东和我认识。

隋大姑娘，不只我这样称呼她，县城甚至省城的一些知道她的人都这样称呼她。她年纪约二十二三岁，山东省立女子师范毕业，现在县立两级女学当教员。细高条身材，四方脸、大眼睛，头上梳了两个蘑菇髻，上身穿爱国布（其实也是英国纱织的）短衫，下身是黑绸裙子。那是袖齐手腕，裙扫脚面。在县城开反日大会的时候，两级女学是她带队。因为在县城组织反日大会是互相知道的。那时还是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不能随便谈话。她在自己家里见到我，说话很开朗，我倒显得很羞涩。叫她什么呢？不是同学，又不是同事，叫她隋老师又太尊。我叫隋老先生表大爷，顺口叫她表姐，她却按省城男女学生因公接触的习惯叫我徐先生。

反日大会的会场设在刘家河岔，离我家只有二里、十几个村子最远的东老庄也不过五里。这十几个村子，共有十处小学。刘家河岔的张校长得知会场设在他那个村子里，十分欢迎，答应布置会场的一切。

若是按今天的习惯只要打扫出一个会场地址来，挂上国旗，一切都完了。学生可以自带小板凳和小马扎就行了。可是那时上层人士认为和农民一样矮坐不成体统，所以会场要放下小学的凳子，还不够又向村民借了一些，会场里的坐位全是凳子，而且摆得很整齐。会场周围的树上和墙上贴满了标语。

隋老先生指定他们小学一位教师——曾跟他在省城活动的人——作司仪。第一项是推举主席：张校长推举隋老先生，隋老先生推举张校长。最后还是张校长，恭敬不如从命当了主席。

城里的绅士只要是出大门就穿大褂马褂，热天也不穿短衣出门。我们高小学生在乡下没有穿大褂的习惯，弄个大褂进城时就穿上，出城就脱下来，在肘窝里夹着。在城里不穿大褂，如果被校长和老师碰上，就要因为“不敬”记一条过。这天反日大会上，乡下教师一律不穿大褂，只有隋老先生和张校长都穿大褂，不外加马褂，就算是常礼服了。隋大姑娘还是在学校里上课时的打扮，就不能不惹得乡下人注意。特别是乡下妇女看到一个大脚板、长裙子，头上挽着两个疙瘩的姑娘，觉得很是稀罕。

秩序单上第一项是宣布开会，第二项主席致开会词。这位张校长是到过济南的，有人说他到过北京。平日他讲的是本地话，上了主席就讲“官话”了，表明自己不是一般的乡下老，是走了官场，见过世面的。他的话小学生们听不懂，教师们听到有点惊讶，想不到他是个乡宦。

在第三项——讲演，宣布以后隋大姑娘向两边的人略作谦让之后，缓步上了主席台了。教师们带头，小学生们跟着鼓起掌来。这时不仅会场里的目光集中向她，周围的墙头上树杈上都上去了人。他们，也有她们从来没见过大脚板，走起路来一掀一掀的样子，也没见过长裙子、蘑菇髻。会场周围抬着筐、扛着锄的男人也聚了不少。我看到会场里有一部分凳子空着，想去招呼他们来坐下听听，可是我不到他们面前还好，到了他们面前，他们抽身回头就走了。再走向几个也是同样，像是赶他们走似的，我就停止招呼了。

这位大姑娘在济南女子师范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位活动分子。今天在小学生、小学教师面前她毫不拘束。她向场子前一鞠躬就

讲话了。第一句就是“同胞们”。她的讲话好像早已背熟了：从日本帝国主义要侵略中国，先从山东下毒手；全国四万万同胞，山东3800万同胞要当亡国奴开头，越说越激动，忍不住声泪俱下，呜咽的听不清讲的什么了。台下的教员学生被她激情所感动得也纷纷落泪。司仪趁这机会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本货！”台下也跟着呼喊。她在讲完了话下台的时候，还用手绢抹眼泪。

接着各校的教师有两位讲演，都是有准备的背讲词。隋家官庄小学的学生，十三四岁四年级生也上台讲了背熟的词。最后一项是喊口号，经过开会学生们也习惯了，口号喊得有点声势了。

这次反日会开过以后，我们也没有查日货，乡村里依然风平浪静。

五、新旧文艺的斗争

诸城县立高小的校址是清朝时代的观海书院，这是一些秀才进修的地方。全校七名教职员中就有四位是秀才，那三位刚在师范学校毕业的，被社会上和学生瞧不起。国文课本是文言的，有现代编写的，也有选自古人文集的。例如：白居易的《凌霄花》和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国文教员讲完之后要学生背诵，所以至今我还能背过几句。现代编的课文，老师说不用讲，要学生自己阅读，也不要求背诵。课本以外还从《古文观止》里选一些文章讲读。韩愈的《原道》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在《古文观止》中是篇幅最长的了，我们都能背出来。

作文时谁把八大家的文章套上就得到好分数。秀才教师还拿这些“好”卷子给县城的举人、翰林老爷看，表示“斯文未坠于地”。举人和翰林老爷看了满意之后，高起兴来，在后面批上几句夸奖的话。谁有篇这样的作文，不仅全校欣羨，连本城的好文绅士都

知道。

学生们自修常常是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对此学生们并不满足。认为梁启超的文章像流水一样，经不起思索推敲。对梁启超给蔡锷拟的讨袁世凯称帝的文电《盾鼻集》，认为是慷慨淋漓、纵横恣肆，使人快意。还爱读林琴南的《畏庐文集》。林的文章是难懂的，越难懂越爱读，叫人看不懂的才是好文章。学生们也爱读《枕鸳浪墨》和苏曼殊的爱情小说——都是文言体的。

胡适的《尝试集》传到诸城高小以后，引起了学生们议论纷纷，这些从古文堆出来蠢鱼，拿语体文不当作文章看。他们择其中的语句开玩笑。例如，看到两个要好的同学携手同行，就说：“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又如搞一件事情失败了，又引用《尝试集》的句子“尝试成功自古无”。

《新青年》杂志在学校出现以后，由于思想先进，道理讲得透彻，受到部分学生的欢迎，从北京带来的少数几本，常常你传给我我传给他，没有没人看的时刻。

这年冬天学生们从北京弄来了新剧本，组织演新戏，庆祝新年。没有女角，只好男演女。这地区闹春节踏高跷、跑旱船、跑驴都习惯男演女。新剧在学校出现，校长和教师因为北京的学生也演戏，持一种不问不管任其自然的态度。在校内排练一些日子，演两场校内学生自己看，也不到社会上公演，这样还引起校外社会上的不满，批评说：“学生不读书，演戏，和戏子同流，要不得。”校长是自称有革命思想的，但逢迎社会上“舆论”又说：“逢场作戏，偶尔为之，未尝不可，不要因此荒废学业。”

1920年春季，学生作文也出现了白话的卷子，而且是受过举人、翰林品题的学生。文章讲道理条条有理，读给别人听明明白白。于是国文教员老秀才又得出一条结论，说：“文言写得好的，白话文才能写得好。你们看写白话文的××同学不是咱班里文言写

得最好的吗？”在教员的挑拨下，学生还是写文言文。可是任凭秀才们怎样阻挡，《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和《老残游记》等书在学校里暗中流行，上班时在桌子底下看，上学习课的时候上边盖上课本偷看，有时被查堂的教师揪出来。熄灯以后在被窝里点着香头看。老师没收了学生的书以后，自己在屋里也看迷了，学生闯过去要书，只好还给他们。

时代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1979年3月12日

广州学生五四运动记

邓曾臻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爱国示威运动,风起云涌,全国响应。广州的青年学生,也在这场斗争中留下一页光辉的史诗。兹分叙如后。

前后四个学联合会组织的经过

广州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在五四革命运动过程中,前后组成过四个学生联合会。一是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省会学联合会),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为基本队伍,以该校的李朴生为首,联合岭南大学、省立女子师范及南武、培英、培道、真光等中学共同组成。它散播什么“学成救国”,不主张从事现实的斗争。二是广东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中上学联合会),以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广东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为发起单位,及时组织起来,为声援北京、天津、上海各地运动,提出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是为广州的爱国青年学生所拥护的共同组织。参加的有广东光华医药专门学校、广东公立医药专门学校、韬美医药专门学校、公立医药专门学校、私立广州法政专门学校、教忠、番禺、八桂、培正、岭海、圣心、岭峤、潮州八邑、中德德文、育才英文等中学及妇孺产科学校的学生。还有明达、志诚二间小学的学生,由于此二校

赴义若渴，作为特殊情况参加。一致推选张启荣、周其鉴任正副会长，并选出阮啸仙、刘尔松、陈肇棠、云逢瀛、邓曾骧、符明昌、马福年等分工负责，领导活动。1920年冬，运动经历过一个暴风雨般的阶段。此后，为使更能符合于“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本旨，适应运动行将转入长期斗争的情况，乃将中上学联合会进行改组，分为广东学生联合会和广州学生联合会，前者会长为李惠民，后者会长为邓曾骧，莫京、杜济荣副之。

广州学联合会组成前，曾邀请省会学联合会合并组织，但没有结果，故仍门户分立，各走各的路。

运 动 始 末

广州的教育界与各中上学校的学生，一闻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便发出同声相应的要求。学校不分界限，几经共同开会，以南武中学校长何剑吾为首，同谋共策，筹划斗争。每次到会数千人。做过事项：(1)致电挽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2)拍电巴黎和会要求归还青岛；(3)力争取消与日本所订之二十一条密约；(4)举行学生示威游行；(5)组织调查劣货会(当时名日货为劣货以避日本领事干涉)。其后不久，北京的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联合会总会派出方豪为代表，到粤与中上学校的学生联络，后又派朱广陶、陈肇棠为指导员(后以刘青阳代朱广陶)。当时方豪代表假座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召集市内中上学生开会，在会上作了讲话。他首先说明五四运动的原因与焚曹殿章(即惩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之经过情况；并说明日本以中国为其倾销商品之市场，将其倾销所得充作军政费用，劝导同学极力抵制劣货。划分劣货为必需品、次要品和普通品，分别对待，普通品势在必禁，即如日本以海产税养海军，若果我们不买日本海味，这就成为他们的致命伤。说时声泪俱下，全

场感动。可是,就此以后,意见分歧,南武中学的校长何剑吾,包括高师、岭大等校,认为如此主张和做法过于激烈,容易惹生事端,他们另有主张,那就是和平将事;公立法政、甲种工业等校认为他们等同畏缩,不是热血青年之所为。因而不及两月,中上学校的学生便形成两派。前一派组成省会学联会,后一派成立广东中上学联合会,各有主张,各行其道。中上学联合会成立后,首先发出通电宣言,标明旗帜;排演街头剧,分组到街坊宣传,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刊印“国耻”、“国货月刊”、“殷鉴”(写朝鲜所受日本的苛政)等小册子,专人负责打五更等(即应急醒起之意),扩大宣传活动;水陆检查日货,开设国货陈列所,使国货与日货并列,俾免鱼目混珠;创办平民义务学校,灌输爱国主义思想;举行罢课、罢市,不断进行示威游行,大有震撼山岳之势。其中以焚毁和安泰商号的日本洋纸事件、反抗先施公司摧残学生案事件最为剧烈,规模大,影响深(下文另述)。

中上学联合会下设总务、宣传、检查、教育四个科,分头活动起来了。总务科负责人为陈肇棠;宣传科由杜群英、沈传礼、陈英勉、曹传骥、李六更等人负责,并由邓钧、梁泽民二人负责国货陈列所的工作;检查科长邓曾襄兼任检查队长,队员有蔡沙棠、黄应球、温大经、冯启恕、陈式熹、陈衍松、黄立勋、张殿邦、冯世英、黄仲河、文兴、曾祖武、谢汝诚等人;教育科兼义学负责人有黄宪公、高慕德、陈爱珍、杜济荣等。

在正义浪潮的冲击下,省会学联合会的骨干队伍内——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引起了学生内部的分化。该校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如周启祥、刘万镒、林卓夫、余鸣銮、蒙卓凡、黄开光、苏文、黄佩伦等人,从他们自己的学联合会所标榜的“学成救国”的迷魂药中苏醒过来,以周启祥为首参加到中上学联合会这方面,因而中上学联合会的声势更加雄壮。

在罢市活动中，中上学联合会曾派出代表到各行业商店作了恳切的要求，邀约他们贯彻执行罢市措施，并填具志愿书不再购入日货。曾要求广东全省商会会长陈勉斋策动全省商界举行大罢市。但除布匹、瓷器等三数行业外，其余俱系一时应付，不能持久。

中上学联合会自始即遭军阀广东督军莫荣新、广东警察厅长魏邦平之忌。会名牌额固被无理拆毁，即每有集会亦被横加压迫。迫得利用外国人之韬美医院、博济医院及沙面域多利酒店等处召集会议和进行各种活动。托庇外人，事似自卑，但为求事成，遂不计小节。

莫、魏军阀对于凡有接受中上学联合会委托承印文告的印刷商号，一经查出，即行封铺拿办。因而不得不在自己的学校中——公立法政学校印刷处打主意，要求他们承担出版印刷品的任务。在个别教职员中，曾有过借口急待印刷讲义上堂，而加以推诿，迫得以武力（喊打）对待之。当时的省署以公立法政学校过于纵容学生，改派政学系之何泮文长校，何带同警察保护接任，还饱受学生之砖石迎击，不敢再来。（当时中上学联合会曾通过一项议案，在运动中不得更易校长，何接长公立法政被学生所拒，亦与此议案有关；在同一时期，广东公立医药学校亦换陈彦长校，但陈同意学生运动，以先答允学生要求为条件，故能安然接事。）结果将同学符明昌、云逢瀛递解文昌原籍（由陆路按县递送），交县署管束。但不久，即摆脱拘禁，潜回省垣，勤助运动，士气益振！时人有“高师穷、法政翁、岭南富、真光猪”的俗号，法政学生至此，一洗过去“法政翁”的绰号了。

抵制日货是此次运动的主要内容。因为当时认为：（1）我国是日本货之最大销场，若能坚决杜绝日货，日本的工商业必大受打击而发生内变，由此可以获致取消二十一条条约；（2）抵制日货使得北洋政府穷于内外应付，必然更多露出丑态，以此作为打倒卖国贼

的手段之一。广州的先施、大新、真光三间公司中，日货充斥，不受劝导，继续沽售，所以人们呼之为三大亡国公司。他们的面目暴露以后，每次示威游行，必围集其门前，高呼“打倒三大亡国公司”、“抵制劣货、坚持到底”、“打倒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条约”、“警惕5分钟热度”（日人说我们不过5分钟热度）等口号。在游行示威和检查日货的过程中，时对横加弹压的军警予以回击，挺身搏斗！

7月16日，我们检查队在西堤省港船码头外检查日货时，警察游击队（即公安队）闻风驰至，勒令解散，并用枪托毆击学生。同学怒目相对，其中以张殿邦、蔡沙棠、冯世英、黄应球等反抗至力。警察游击队旋将张等九人押赴警厅，中上学联合会闻讯之下，星夜集合各校学生前往围困警厅，要求释放被捕同学。警厅恐学生冲拥入内，亦在四周警戒森严，相持不下将达两日之久。起初，张等押在警厅侦缉室，傍晚，由该室讯问一次，继提到楼上厅长办公室，由厅长魏邦平亲自讯问。魏大发雷霆，张以柔制刚，申述杯葛日货是爱国行动，厅长是中国人，国之兴亡，不能与厅长无关；厅长本应领导我们进行抵制日货，今反出此，这于情于理似有不合。魏闻言后辞色稍霁，和声讯问，卒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由一些教育行政负责人出面劝解，要张等在他们写好的悔过书上签名释放。

10月某日，运动正在走向高潮，我们游行队伍经过先施公司门前，奸商与军警勾结一起又进行了一次残暴的弹压。当时捕去张殿邦等学生11人，并以游击队一个班押往南石头惩戒场扣押。解送时绕道大沙头转用船只运送，以避免群情愤激不平和学生拦途抢人。事情经过了七八天，警厅厅长魏邦平在群众压力下，才示意保释，经广东省教育会派会员高师校长金曾澄、南武中学校长何剑吾等三四人前往保释。张等要求以后不能再有同样事件发生，金氏不能答，先走；后经何氏力劝，张等乃出。

运动持续了将近二年之久。鉴于当时各方面的形势发展,学生家长顾虑其子弟在学业进修上有影响,有些家长不能长此供给其子弟在社会活动方面的费用,且运动在取得一定成效后群情亦稍宁静,当时广东省教育会正会长鍾荣光、副会长陈其瓊劝导学生不要长期脱离学校课堂,专搞社会活动,谓这对学业进修是有碍的,中上学联合会乃提出改组,分开组成广东全省学生联合会和广州学生联合会两个组织单位;在各种活动方法上也有变更,如将过去采用昼夜逡巡检查日货的办法,改变为奖励举报者的办法。1920年底,广州五四革命运动强烈的斗争形式从此结束,把这一运动转入到长期深入的斗争中去。中上学联合会结束前,曾组织一次大游行,发出宣言,勉励市民奋斗到底。宣言中提出:“中上学生会今者结束,能发能收,端在自觉……”等语。

两大事件

1919年9月下旬某日,据报日本三井洋行运载白报纸两船,为避免学生的检查,准备午夜运往佛山与天庆上街之和安泰商号交易。检查队长邓善襄闻报马上召集会议,讨论对付办法。当时有人主张星夜乘船往截;有人谓道经鹰沙附近土匪披猖,主张天明才去,讨论结果决定星夜往截。认为如遇土匪,可晓以大义,土匪亦有义侠气,未必肯下毒手;并在船上挂一对“广东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公干”的红黑字灯笼(以前的红黑字灯笼是公干所用),使土匪知所识别。连夜跟踪追赶,到天明才把这两船洋纸截回来,靠泊长堤天字码头。其时日本领事竟行文与莫荣新,说有土匪将他的三井洋行白报纸两船从佛山抢去,现停泊天字码头,要他负责追回。莫即命令魏邦平照办,魏乃着清道伙到来起运洋纸,终为同学们所说服而去。同学们以为他们不复再来,即登岸午膳,只留下

少数人在船上看守。岂知警厅再令警察游击队率同徒手喽啰赶到，在同学众寡不敌的情况下，洋纸被搬往商会。

但是，事情并不就此罢休。我们即派人到佛山活动，一面向和安泰周旋，劝他向警厅具结领回洋纸，一面与佛山学生会密商协助。和安泰当时提出条件，要我们派出同学护运洋纸货船回到佛山，我们佯为答应，以便该商号堕入彀中。该商号勾引日领出头，引狼入室，诚为爱国青年所切齿愤恨！佛山学生会（负责人王孙江淮）对此，当然大力支持，特别是华英中学的学生，热情洋溢；在协助活动和关怀同学们生活各方面，都做得很周到。

越二日，洋纸货船运抵佛山，该地学生会便依计行事，阻止劣货登岸。正当商学双方同往佛山商会谈判问题之际，我们即乘机将这两船洋纸拖回广州，一早就在南堤东园门前旷地焚毁，以免再生意外的枝节。随即散发传单，大事宣传，以儆效尤。烧毁洋纸时，观众人山人海，无不鼓掌称快，大呼奸商应有此下场！由于该纸已由和安泰具结承领，已非三井洋行所有之货物，日领至此，也只得哑口无言，无所施其技了。这是惊动一时的“烧毁和安泰劣纸”事件。

抵制日货是复杂的、艰苦的斗争，广州日领和我国官僚买办，对此极尽威迫利诱之能事。张启荣曾说：三大亡国公司使用金钱拉拢学生，有些人受其收买，专到公司里面去装作顾客伪为购物，同时大降货价，谋求招徕，以为这样可以使人误认中上学联会的同学被其收买，好像风潮平息，可以平购劣货，其计可谓至毒。不料仍然门可罗雀，生意萧条，该三公司乃又另出一套手法：声言如矛头不再指向他们，那就可以供给两个同学往欧美留学的费用，或捐款一万元充作会费，但我们不为所动。

自和安泰事件发生后，我们继续组织大规模的示威和检查日货游行，在检查日货和示威游行的斗争中，因与军警搏斗受伤致死

者有范曾滌(范因积劳成疾,复被刺伤殒命)、李某等(忘记姓名)四人。10月中旬,我们在南堤八旗会馆门前旷地举行追悼大会,群情愤激,高举着范、李等四人遗像,再度展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进至先施公司门前,即大呼“誓为死难同学复仇”等口号,拉出先施公司的负责人,各在胸前挂上写有“先施亡国公司凉血司理马璇德”及“先施亡国公司凉血部长区耀”的白布条,使人们在游行中认清奸商面目,并在门前拍照影片留作罪证资料。这时,突然出现大批军警蜂拥而来,挥舞刺刀枪托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乱撞乱刺,并且开枪射杀,施行其残酷弹压的手段。我们男女学生义愤填膺,与军警展开搏斗,缴获了马枪五支,同学中受伤者10余人(总领队邓曾襄执旗指挥,首先被刺受伤,其余有陈式熹、蔡沙棠、温大经、黄应球、刘貽德、马师赞、冯启恕、陈衍松、符明昌、陈英勉等),还把在格斗中进入该公司里面的数百名学生关闭起来,从中逮捕学生代表11人(见上述),禁绝送进衣裳、食物等,妄想借此以压服学生,减低斗争情绪。

但由于反动政府的血腥弹压,引起各界人士很大的同情,纷纷派出代表组成慰问团,分别到广东公立医院和南石头惩戒场慰问受伤和被捕的学生,赠送彩旗、鲜花、食物等等。正义感人,于此可见。

反动政府终于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将囚在公司内饿了三天的同学释放出来。释放前还逞淫威,借搜查失去马枪为名,使用刺刀挑起女学生的衣裙,其兽性举动,殊令人发指,女同学陈慕德、陈英勉、陈爱珍、严静宜等又被他们痛殴一场。这又是一个重大事件,是反抗先施公司摧残学生案事件的严重斗争!

几种影响

全国中上学联合会曾派代表刘青阳等来穗指导,继又指派刘青阳与广东中上学联合会陈肇棠会同前往海外东南亚各地募捐,以维持学联经费和扩展平民义学。

香港大学学生会曾派冯子恭等二人来穗慰问。美洲、加拿大、南洋、马来亚、西贡等地的华侨团体,均发电来勉励。

省会学联合会方面的如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岭大、培英、培道等校均派出代表恳切慰问与军警冲突受伤之同学。

南来的国会议员当时多数住在先施公司隔邻之东亚酒店,他们也挂出白布长条一幅,墨书“国会议员不人亡国公司”。

学生中也有些败类充当军警方的“暗探”,指望从一些轻率的同学口中得到情报。故我们的行动往往被警厅所侦悉。(黄英图纪录整理)

1961年12月

(原载《广州文史资料》第五辑,转载时稍有删节)

五四运动在桂林

李文钊

一、学生爱国活动的蓬勃兴起

五四的前一年——1918年，欧战结束，留日学生因在日备受侮辱，纷纷回国作反日救国宣传。桂籍留日学生周公谋曾回桂报告日人欺侮中国同学的情况，激起了桂林学生们同仇敌忾的愤慨；将去欧洲留学的曹德三也由北京来桂传达北京学生的反日活动，进一步鼓舞着桂林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桂林学生在全国学生反日救国热潮激荡之下，为了统一指挥，集中力量，推进工作，由各学校代表共同发起筹组桂林学生爱国会——包括各高等、中等以至小学的学生联合组织。互推法专学生李铭勋（笔者当时的学名）为筹备会会长，师范学校学生蔡挺生为副会长。筹备会设在皇宫街县文庙左侧的明伦堂内（即今市人委左侧的印刷厂地址）。经过一段筹备，根据会章进行了选举，蔡挺生为会长，李铭勋为副会长。从此，桂林学生爱国会正式宣告成立。

在筹建桂林学生爱国会的同时，建立、调整和健全了各校学生的基层组织。

桂林各校学生自治会或校友会的普遍建立和桂林学生爱国会的成立，锻炼并加强了桂林学生的组织能力和组织经验，莫下了以后“五四”运动的基石。

1919年，北京学生举行五四示威游行的消息传来，桂林学

生热情敏感，马上响应，立即由学生爱国会发动全桂林所有大中小学校的全体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由各校学生分头组织宣讲队，展开广泛的街头宣传讲演。6月3、4日，北京政府对学生实行大逮捕后，桂林学生的反日救国运动也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深入开展了一步：一是从街头讲演发展到进入各剧院讲演，一是发动各校相继在慈善会作演剧宣传。这时的宣传口号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势力范围”，“不承认巴黎和约”，“立即释放被拘捕的爱国学生”，“打倒北京卖国政府”，“打倒北洋军阀”等。由于北京政府的专横卖国和学生爱国运动的正义热忱，当时的宣传讲演是很受欢迎的，有时各戏院还主动参加和安排这样的讲演，艺人们还热情地把讲演的内容反映到演出中去。记得一次法专讲演队的谢振民同学讲述北京政府的媚外卖国勾当后，名丑六指姆马上在他所演的《刘文静降妖》的戏中，把北京政府一伙卖国贼当妖魔鬼怪予以捉拿，痛快淋漓，观众深为感动。

演剧宣传是由各校自报演出剧目，在慈善会舞台轮流公演。记得当时法专演的是《朝鲜亡国痛史》，省三中演的是《刺伊藤博文》，省师演的是一出活报剧，其他已无记忆。这些演出多是以反对日本侵略和拯救中国危亡为主题的，对当时观众有一定的反帝爱国的影响。这些演出虽然不免带有文明戏、幕表戏的形式，但是其中也有完全依照话剧形式演出的，如上述法专、省师的演出，就极力摆脱文明戏的影响。可以说，桂林学生这次演出活动，政治上在努力完成宣传反帝的任务，而在话剧运动上也起了启蒙的作用。应该说，广西的话剧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二、桂林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与抵制劣货、推进新文化运动

在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坚持和发展的形势下,为着统一全国学生的组织以加强斗争,全国学生总会在上海举行代表会,决定全国各地学生组织的爱国会、救国会、救亡会或其它种种不同名称的学生会,一律依据新会章改组或改称为学生联合会。桂林学生依照决定,将原有的桂林学生爱国会改组为桂林学生联合会。

桂林学联除去领导抵制劣货等活动之外,还有一个出色的活动就是出版刊物,开展了桂林的新文化运动。学联成立不久,出版了自己的会刊(3日刊),报道全国各地学运的消息和本身的工作。3日刊是白报纸八开单页直行四号字铅印。到第二届学联时期,会刊改为周刊,由白报纸八开扩大为四开,除报道会务和各地学运情况外,侧重于新文化问题的介绍、讨论和新文艺的研究著述。由于会刊改版后大家有了争鸣的园地,会刊的内容也就日益生动活泼,丰富多采,不仅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尽到了介绍推进的作用,并且对新兴文学——白话文,特别是对新诗歌,起到了拓荒、开垦的作用。

三、学生运动的分化与新中国学社的成立

1921年春,桂林学联进行了第二次改选,选出了第三届负责人。这时桂林的学生也和北京的学生一样,在斗争过程中逐渐发生了分化,有的在不断追求光明,摸索着应走的道路,继续奋勇前进;有的则经不起艰苦的历程和险恶环境的考验,走着相反的道路。由于学联第三届负责人中的会长范澍、干事王觉、蒋培英等是

省师中较顽固的学生,他们都是兴、全、灌一带的人,和国家主义派的唐谷是小同乡关系;他们在强调“救国不忘求学”的幌子下梦想着“求学即能救国”,也就是梦想着中国要他们这些“饱学”的来救;因而他们在学联中是积极争取地位,消极、放弃斗争的。因此学联的各种活动在这一时期无形停顿。王、范等人后来成为国家主义派在桂的骨干,而蒋则更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搞党务的红人。

但是,另一方面学联中一部分较为激进的人却有了新的结合,形成了新的组织,这就是新中国学社的诞生。新中国学社在1920年夏已在学联中开始酝酿。因为暑期中学联第二届负责人不少要从学校毕业离校,同时也要离开学联。他们想到,毕业后的继续学习、研究和继续参加活动,都需要有一新的组织。部分还继续留校的也有些同感,觉得在校总是短期的;建立学术文化团体,无论在校离校都同样需要。因此,经过互相交换意见,逐渐提出了组织新中国学社的具体方案。社章是笔者草拟,大致是:

“学社”而冠以“新中国”,是表示“新中国”是大家的憧憬,大家的愿望,也是大家奋斗的目标。但叫“学社”而不叫其它党会,则是标明组织的性质,是学术的而不是政治的。

学社以结合同志,砥砺身心,研究学术,参加救国运动为主旨;
以平等、博爱、互助、自由为信条;
以吸烟、酗酒、赌博、宿娼为禁例。

学社于1920年秋成立,以皇宫街县文届及明伦堂(即今环湖北路市人委所在地)全部建筑为社址。

学社的活动主要是:

创办会刊——八开、单页、石印。内容是介绍当时的各种新思潮及社员的文艺写作。每半月一期。

开办补习学校——设升中学及升大学补习班,开有国文、英语、数学等课。

设置文娛场——有各种弈棋和球类。

开辟图书阅览室——订阅京、沪、粤各地杂志。

新中国学社的这些活动很受青年们的欢迎，对青年有一定影响；但对封建头脑的士绅们，却引起不小的反感。尤其是学社占用了县文庙，把文庙前门的“德参天地”、“道冠古今”的两座大牌坊粉掉，改写上新中国学社几个大字，叫这些士绅先生们一看就大伤脑筋，竖眉瞪眼。但这也正标志着，新中国学社一成立就与封建势力采取了对峙的姿态。

新中国学社的主要成员是社长李铭勋，社员李征凤（均法专学生）、黄成业（省师学生）、粟丰、罗瑞成、谢铁民、易忧（均省中学生）、苏鸿基、秦志俊、赵世恪、锺廷普（均桂山学生）、梁克缙（北京回桂学生）、谢慧英、莫佩珠（均进德学生）、何国瑞、周为干、曾庆鸿、文庄（均附小毕业生）等。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在过去的桂林学运中积极工作过的；由于在学生爱国会和学生联合会中的多年共事，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为着实现未来的理想和创造未来的事业，他们共同组织了这个学社。但是他们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当时各种澎湃着的新思潮，有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都在激荡着他们，卢梭、易卜生、克鲁泡特金、巴枯宁、马克思、恩格斯都在吸引着他们。他们究竟走什么路，向什么方向努力，都还是很模糊的。他们曾经一度想把学社办成一个新村，成为一个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集体。这是受当时无政府主义所提倡的“新村运动”的影响，这种幼稚的乌托邦式的新村尝试，自然不久就失败了。他们从中吸取了教训，仍然继续摸索，探讨，追求着光明，终于在1925—1926年间大多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于1927年蒋介石叛变的大屠杀中几乎全部遭到了毒手，其中李征凤、黄成业、苏鸿基、赵世恪、谢铁民、文庄等都已壮烈牺牲。就新中国学社的活动和它的社员们言行的实践说，它对当时各种

新思潮运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运动,是起了启蒙作用的。

由于 1925—1926 年间,中共广东区委派谢铁民、罗瑞成、杨秋人等回桂建立组织,成立了以李征凤为支书的桂林支部,桂林的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就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也就更为开展与深入。当时桂林开始建立各行业的工会组织,过去以学生为先锋的运动,就逐渐以工人为主了。工人组织起来后,曾举行反教会压迫工人的示威大游行;同时教育界也爆发了驱逐国家主义派唐谷的运动。反帝反封建运动在桂林日益明朗和深刻。但这已不属五四运动的范畴,历史已进入 1927 年大革命前夕、山雨欲来的阶段了。

(1962 年 7 月)

五四运动在绍兴

李士豪 金鸣盛

五四运动从北京学生界首先发动，迅即遍及全国，绍兴亦不例外。其时，我们在省立第五中学（即现在的绍兴一中）念书，正是毕业的一年。5月6日那天下午4时下课后，我们正在元斋前面玩，上海报送到，看到登出北京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和上海学生响应的情况，我们都很振奋，马上在全体同学中传开，大家决定积极响应，即便与五师、越材等校联络，定5月9日联合各校同学举行游行和纪念大会。5月8日，绍兴《越州公报》、《越铎日报》以第一版报道了这一运动的有关消息。

9日这一天，五中、五师、越材等校同学和各界人士约1700余人，在布业会馆觉民舞台举行国耻纪念大会，散发传单，登台演讲，群情激昂。会后结队游行，高呼口号，对政府提出警告，务须惩办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3个卖国贼。5月15日，五中、五师、越材3校学生联合拍电报给北京学生联合会，表示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我们愿为“君等后盾”。

在运动中，3校学生会曾各推代表经常联系。我们两人是五中代表，五师代表是陈云，越材代表是王贤材。代表们还到杭州参加全省学生联合会的活动。记得在杭州曾同往岳坟去参谒，大家对岳王墓行了礼，表示洗雪国耻的决心。我们的活动博得舆论的好评，《越州公报》5月9日那天发表社论，标题是《可敬我第五中

学学生也,可爱我第五中学学生也》。但是五中学校当局对于我们的活动是不太赞成的。当时一度传说,要把运动中心的同学开除,但没有成为事实。记得五师同学董秋芳等听到这一消息,还特地来我校慰问过一次。后来校方决定提前放假,由舍监叶廷芳来和我们商量,我们考虑同学们分散到各县各乡去作宣传活动也有好处,因此同意校方的决定。当时一位国文教师出了一次作文题目是:《善始者众,克终者寡》,料定我们有始无终。李士豪在作文中给予反驳,大意说:“善始者必克终,不克其终者其善始伪也”。

继国耻纪念运动之后,即展开了一次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同学们先把自己用的日本货拿出来当众焚毁,表示抵制日货的决心。5月25日,五中、五师和大路杜氏私立小学的学生约300余人,从开元寺出发游行,分组在街头讲演,劝同胞不用日本货,有些同学还下乡去讲演。此后就联合各界,组织日货检查队,不准商店再进日货。当时以商会(在小校场绍中旁边)为活动中心。查获的日货在大校场焚毁过一次。在检查活动中,发生过一个插曲:金鸣盛参加的一个小组,在福禄桥脚王国记玻璃店查得新到日本货玻璃好几箱,照例应该查封,听候公议处理。那时金鸣盛剪的头发是西式,王国记老板看到我们封玻璃,就气愤地对金说:“我们的玻璃是日本货,你的头也是西式,应该同样处理。”这显然是无理取闹,我们回到商会,请大家评道理,结果讲话的人不敢出来,由另一老板认错,后来玻璃也没有毁坏。

在抵制日货运动中,还组织了一个“国耻图雪会”,除学生参加外,越州公报社记者章天觉(曼伽)、翁天寥、朱公威3人也参加。选举章天觉为会长(或主任),会址设在仓桥街朝东一所平房内。入会会费每人3角,大多数五中同学都入会。国耻图雪会的主要活动是贩卖国货。贩卖员每人胸前挂一方筐,沿街叫卖,同时兼做爱国宣传工作。卖的东西有无敌牌牙粉、龙虎人丹、国货毛巾牙刷

等日用品。参加贩卖都是义务性质，目的在于宣传。这个活动的时间甚长，整个暑假期间都在进行。

绍兴五四运动不但在城区进行，也在各乡活跃。主要由假期回乡的同学分头进行。柯桥、平水、东关、孙端、安昌、党山等处以至各乡各村，都有同学们的足迹和墙上写的宣传文字。

五四运动以后，语体文运动在绍兴也有影响，当时五师曾出版一些白话文刊物，名称已记不清楚。

五四运动中的湖州学生*

湖州市政协文史工作组

五四运动的浪潮,也猛烈地冲击到湖州地区。尤其是五四运动中被北京学生检举出来的卖国贼之一的章宗祥是吴兴县荻港人,因而吴兴人民都引为奇耻大辱,更激怒了吴兴的青年学生,于是湖州地区的学生爱国运动,也就轰轰烈烈地爆发了。

1919年时湖州的中等学校有省立第三中学、第三师范、教会立的苏州东吴大学附属海岛中学、湖郡女学、吴兴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吴兴县立甲种商业学校和教会立的浸会中学,共7所。五四运动以前,校际往来极少。三中校长潘廉深是前清举人,曾留学日本,办学偏重数理化。海岛中学校长美国人魏斯德注重英文,教科书除国文科外大多数用英文原本,平时学生谈话也都用英语,如果讲了一句中国话,规定要罚一个铜元。第三师范学校校长王念劬(号松渠)是举人出身,又是留日学生,学监刘某也是举人,教育方法多半采用清朝的书院制度,注重国文、书法。那时师范学校的学生免收学费,也免去一半膳费。所以师范学生大半都是贫寒子弟。海岛中学和湖郡女学学费很贵,一部分教师是英、美人,有钱人家的子弟都喜欢进教会学校,希望毕业以后出洋留学美国。至于甲种商校和浸会中学,前者是职业学校,后者设备简略,师资亦差,两

* 本文原题为《湖州人民反对本乡卖国贼章宗祥》。

校学生都很少。吴兴县立女师,虽然同是师范,学生成分和省立三师不同,大都是书香门第的小姐,学风也和潮郡女学不同。

五四运动的风暴使死气沉沉的湖州也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在罢课游行的示威运动中,湖州学生响应北京和各大城市学生联合会的号召,各校先后成立了学生会,并且联合组织了湖州学生联合会,刘于武(三师)、刘藻(海岛中学)任正副会长。代表中海岛中学的岳锡皋、潮郡女学的毛彦文、三中的张晓凡、三师的蒋锡恩(冲虚)和黄中美、女师的许志盈等都成为学联的骨干分子。湖州的爱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一位三师学生在学联会成立大会的讲台上曾慷慨激昂地用小刀割破小指血书“良心”两字的决心书,表示要坚决打倒卖国贼,坚决抵制日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有些代表把自己所用的东洋货物当众撕碎焚毁,表示坚决抵制日货的决心。这些实际行动,都博得群众极大的同情,也鼓舞了群众的热情。在示威游行活动中,湖州商界提出响应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爱国运动,举行罢市、罢工运动。这一来,惊骇了当时的官吏和中学的校长们。各校校长和教员们对学生运动当然各有不同的看法和办法。海岛中学校长美国人魏斯德,认为中国人吃了日本的苦头,今天海岛中学学生罢课是破坏美国人的学校秩序。学生们要求商界罢市,吴兴县知事吴某便去请求嘉湖镇守使王桂林出来干涉,城区宣布了戒严。于是运动辗转扩大到市镇和乡村。

各校采取提前放暑假的办法,使学生们早些回家,以瓦解学生运动,并通知学生家长,劝令学生回家。事实上,这一措施引起了不同的影响:首先,提前放了暑假,学生们索性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来开展学生运动,大家好留在学校搞好学生会工作;另一方面有部分学生,因为受到家长的压力,经济上发生问题,不免动摇了起来,因而巩固学生会内部成为学生运动的严重任务。有些人提出坚决留在湖州,宁可脱离家庭关系,从而有些人便大声喊出摆脱封

建束缚,打倒封建家庭,打倒封建制度,反对旧式婚姻的口号。湖州女学的毛彦文,公开演说抨击封建制度的罪恶,她是江山县人,因为不满意封建的旧式婚姻,设法摆脱家庭的束缚,由于表兄朱君毅的支援,所以到湖州来读书。在当时出现了这样一位敢于对封建主义作斗争的女性,博得了全湖州青年学生的喝采,但也惊骇了社会上的卫道者们,他们唾骂青年们胡作非为。恰在那时,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生施存统发表了一篇惊人的文章题为《非孝》。在“百行孝为先”的旧社会里,竟提出了反对“孝”的主张。各地有觉悟的知识青年,拼命地把世界上的新思想介绍进来,新的潮流冲破堤岸似的猛扑过来,对以孔子的名义所代表的一系列的旧思想、旧道德,都被认作封建的思想道德,而与之展开激烈的斗争,“打倒孔家店”成为一时的风尚。青年们都拼命研读新出的书刊,民主与科学的大旗高高地举起在湖州的小城市里,于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职业问题、妇女问题等等都提了出来,各种研究的社团也纷纷成立,时常举行辩论会、演说会,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国家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

五四时代的成都

范朴斋

北洋政府在五四学生请愿时,虽暂时慑于群众力量,接受了拒签巴黎和约和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的要求,但对群众恨之人骨,采取严厉镇压的手段,在6月3日逮捕了讲演学生数千人,这一下激忿了全国人心,首先是上海全市学生于6月3日全体罢课。同时上海的铜器业机器工人首先罢工响应。上海的印刷、纺织、乃至电车、火车工人也全体罢工。到了6月5日,上海商人也罢了市。这一浪潮很迅速地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都罢课、罢工、罢市。接着展开了全国性的抵制劣货运动——本来的口号是抵制日货、抵制仇货。政府在群情忿激的情况下,不敢公然制止这一群众运动,但又怕因“日”字“仇”字而引起外交麻烦,于是向群众劝说,把“日”字“仇”字改为“劣”字。成都正是在这一运动中行动起来。

抵制劣货初期情况

五四以后,成都大中学校学生响应这一运动,组成了学生联合会,会址在高等师范学校,即今成都市人民委员会(旧皇城)内。但学生群众对当时四川地方政府,并无对立情绪。当时四川军政首长为督军熊克武、省长杨庶堪,四川政权属于南方护法政府体系。

在五四后十天南方护法政府与北方政府在上海开始和谈,即所谓“南北和会”(会议从5月13日开始,距五四仅10天)南方护法政府提出的八条条件:第一条“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表示不承认”,第二条“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当日订约之人,以谢国人”,这与学生群众反帝爱国的要求是一致的。而当时南方和议代表的组成,凡属护法省份,都有人参加,四川省籍的代表是刘光烈。广东护法政府对代表的安排分配,似是有意这样做的。关于和会的一切情况,成都报纸都有较详记载,人们都很清楚,护法政府对中日关系及山东问题的主张,既与爱国群众的要求一致。政府对群众抵制劣货的爱国运动,也未采取高压手段加以干涉。

抵制劣货运动,是“六三”以后开始的。最初由学生联合会派代表与商会交涉,经过协议,决定一些办法:买卖日货的商人,以后不再进日货;已进日货的门市销售商家,按照成本尽速脱售,使成都市场经过一定时间以后,日货绝迹;“来货商”(从上海、天津等口岸贩运日货到成都批发的)也经营门市业务的,还可延长脱售时期。这是照顾到从上海、天津等口岸贩进货物的交通运输条件,使已在途中的货物到达成都后还能按本脱售,不致亏本;文化用品包括书籍纸张及教育用具如科学仪器等,以及医药用品包括药品及医疗器材等,不在抵制之列。这些办法,原是很和平很合情理,而且是学联与商会经过协商决定的。如果商会方面真心实意执行这些办法,抵制劣货本可顺利而彻底地进行,不致酿出其他事故。代表着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商人的商会,想法却不是这样,他们以为学生们青年纯洁,可以欺骗,于是从中捣鬼,庇护日货商人。首先把许多门市销售商家的注册,都改成兼营“来货商”,藉以延长脱售时间。其次是放任商人私改商标,企图鱼目混珠。最初学生们并不觉得商会会弄狡猾,但事情久了,市上的日货永远脱售不完,商会所搞的把戏,渐渐败露出来,激怒了学生们,于是学联自己组织

了纠察队，向市上商店进行检查劝说。这是在是年7月以后的事。

打商会的起因

市上的日货越买越多，当时有这样一种传说：由于“来货商”可以延期脱售货物，竟至有人钻空子，在6月以后还赶去上海，以贱价进入日货，运到成都，托名“来货”出售，这真是只知图利，全无心肝。初期，学生们是信任商会。这时，警觉了，组织纠察队上街认真检查，但也只是着重在宣传劝说，并无过分行动。学生们从事检查工作，既久，也渐渐能够鉴别日货真伪。一次在商业场内一家洋货商店，发现摆在货架上出售的座钟，是改了商标的日货，纠察队向店主交涉，要他收进去。店中学徒，与学生发生口角，出言不逊，开口谩骂，激怒了学生们。商业场距商会不远（商会会址，仍在今工商联），学生们把这一骂人的学徒拉到商会去，哪知那些“会董老爷”们一味袒庇学徒，倒是对学生们很不客气，甚至说学生们在街上随便拉人，是“私擅逮捕”是犯法。趾高气扬，一派官腔，给学生们一场过不去，因而争吵起来。这时，同去商会的一部分学生，跑回学联报信，讹传商会以学生们“私擅逮捕”把去商会的学生们扣留了。碰巧，那时学联正召各校学生在开会，得到这个消息，把很久以来对商会玩弄手段全无心肝的忿怒情绪触发了，听到同学们被扣留，更是遏抑不住情感，一声怒吼，各校学生代表，纷纷各回本校，动员了全体学生，四面八方向商会飞奔而去，打！打！打！一片打声，把商会打得落花流水。银样蜡枪头的“会董老爷”们，其初还以为绅士派头把学生们压制住了，不料晴天霹雳，发生了突变。这时，会董老爷们，吓坏了！有的翻墙，有的躲床底，结果还被捉去了七个人。学生们高喊着口号，把这些人捉到学联去，连夜开会，决定押着这些“卖国商人”来一次示威大游行。

示威大游行

商会被打之次日，学联决议举行示威游行。政府得知这一情况，是日一早省长杨庶堪、省会警察厅厅长张群等都赶到高等师范学校，杨庶堪在至公堂广场集合学生讲话，意在劝阻游行。当群众怒火燃烧到最炽热的时候想泼冷水熄灭火焰，是不可能的。全城各校学生是日拂晓都整队到学联集合，杨庶堪话未讲完，学生队伍便已开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就这样开始了。队伍的排头是女生，经过路线：由东华门经提督街、总府街、湖广馆、打金街、东大街、东御街回到学联。

被捉去的七个商人，被绑着，反戴着瓜皮帽，有的背上挂着“卖国贼”“亡国奴”这类纸牌，左右有人扶着，这些人是吓得面无人色，像绑赴刑场的囚犯似的。沿途学生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气势非常激昂。是日大街上的商店，都关了门。全城景象森严，街道两旁看热闹的人很多。

游行队伍经过商会到商业场口第一楼茶馆门前，曾有小小波动，这里看热闹的人特别多，有谣言说商会组织了一批打手，要抢回被捉去的商人，学生队伍特加戒备，显得有些紧张。其实，商人们那时已是惊弓之鸟，谁敢出头。立时也就证明，这是谣言，队伍是秩序井然的过去了。

当学生们从高等师范学校整队出发开始游行，杨庶堪见势已不能阻止，也就只好见风转舵，并未强行禁阻，倒反命令张群率领少数警察，跟在游行队伍之后，沿途维持秩序。张群带着警察，隔队伍稍远的后面，随同游行队伍，走了一遭。

游行队伍全体是学生，但有些新闻记者，是始终同游行队伍一道走着。我记得当时川报记者卢作孚，便是其中之一人，并且也参

加了呼口号、散传单这一类动作。

一个很久以来死气沉沉静如止水的成都,经过这次示威大游行,人们像从睡梦中突然被惊醒了一样,各方面人士,尤其是文化教育界人士,都活跃起来,社会风气,为之一变。那次示威大游行,给予成都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调停经过

商会总理周葆臣、协理白米舟(正副会长)和全体会董们,在商会被打后,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头问事,商会会务无人负责,已陷入瘫痪状态。那时,成都商会是由78个商帮组成,与日货有关的只有八帮,其中销售日货较多的,又只有正头、干菜、洋广杂货、颜料、五金等几个商帮。其他商帮的人士,有爱国热情的人也不少。在商会被打,示威游行之后,许多商界人士对商会负责人袒庇日货商人因而引起风波的行为,表示不满。由一些人发起,约集了各帮负责人,在安乐寺集会,一致谴责当时的商会负责人,要他们行咎辞职,改组商会。虽然被商会中另一些保守分子,托词未到法定改选时期,改组不合法,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在这次风潮之后,商界人士中涌现出一些进步分子,从安乐寺的集会,得到证明。因此,一些具有热情的社会人士,意图打破商学两界的僵局,使抵制日货运动,能够继续进行。首先由吴玉章出面,约集了近十位社会人士,包括商界、文教界、进步绅士、新闻记者这些人商定办法,向学联和商会两方面建议:抵制日货的工作继续进行。鉴于经过一场风波以后,学联与商会,自然不免隔阂,抵制日货的工作,另组机构——商学联合会,负责执行。商学联合会的组织机构是:由学联与商会各选正副干事二人共四人,负总责。各选文牍一人,庶务一人,办理常务,并得酌设司书雇员杂役等给薪的人员,会费由商学两界平

均分担。此外,有调查、鉴定多股,机构大体如此。并有这样一种谅解,商界选出的人员,可以不限定是商人,这是由于爱国运动全民有责,社会人士也可以参加。这些建议向商学两方提出后,得到同意。另外被捉到学联的七个商人,学生们曾给这些人拍了照片,称之为“卖国商人”,准备寄到上海去登报。建议学联把他们放回,并把所拍照片连同底片一并烧毁,原因是这些人并不都是与日货有关的商人,其中如商会庶务员黄研芝,根本不是商人而是雇用职员。学联也接受了这一建议。一场风暴以后,经过调停,算是平静下来了。随着是组织商学联合会,继续展开抵制日货的工作。当时我是以社会人士的身份,被邀参加了调停工作。

商学联合会的工作展开了

商学两方接受调停办法后,很快就推定人选,组成了商学联合会。商会方面选出的正副干事是闵问聃、汪澄波,文牍范朴斋,庶务鼓璧岑。这四个几乎都不是商人:闵问聃是外国语专门学校的教师。汪澄波还是前清时候任过彩票帮帮董,这时并未经营商号。范朴斋是记者。鼓璧岑是昌福印刷公司的职员,并非商会会员。学联方面选出的正副干事是张秀熟(高师学生,今四川省副省长)、袁诗堯(高师学生,过后加入共产党,被反动政府杀害了的烈士),文牍是一位姓张的高师学生。最初商学联合会会址是在旧臬署监狱学校内;即今春熙路南段一带地址,那是还没有春熙路。(商学联合会差不多经过一年才结束,中间曾迁入商会,最后是在骆公祠。至于人选,商会所推选的人员,自始至终没有变更过。学联方面是由各学校轮番推任。继张袁两干事之后,四川法政学校的袁宗汉,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彭世锡沈若仙等都作过干事。此外各股职员,也轮换较多)。

为了进行工作,健全组织机构,最关重要。在商学联合会组成后,学联和商会都不直接管抵制日货的事情,完全由商学联合会负责进行工作。

商学联合会初成立的三个多月,工作相当紧张,以后渐渐松缓了,这是由于规定各商号自行脱售日货的时限已满。各商号未售完的货物,由商学联合会集中起来举办一次大拍卖以后,一时市上的日货,确是绝迹了,抵制日货的经常工作,已是无事可办。但是,商学联合会并未解散,而是转了方向,做了一些与文化,社会福利有关的事。比如商学联合会成立不久,自己创办一个日出一大张的报纸——商学联合会会报——一直维持了将近一年,才停刊。在1920年春,成都青年宫花会经四川省长杨庶堪决定改为劝业会,由省长公署委托商学联合会参加筹备。并由范朴斋主持创办“劝业会报”发行期70天。商学联合会且在劝业会会场分设了办事处。更在会场中心地方搭了一个讲台,组织学术文化界有名人士向群众讲演,宣传有关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问题,在当时,这是一件新人耳目的创举,是同五四运动有关,但已不是抵制日货范畴内的事了。关于大拍卖,是在是年冬季举办的。各日货商号送来的货,相当多,临时组织了拍卖股,分保管、售货、会计几个组。人员是由会临时聘约。拍卖时间大约经过十来天,一时商学联合会成了闹市。学联派有学生——童子军——到场,政府也派有警察到场,维持秩序,卖的货款为数不少,都在事后连同账目,送还原主,有一部分卖不掉的货品如假象牙假水晶图章,和损坏了的儿童玩具之类,也一并归还原主,担任拍卖工作的人,都是商界人士。一件值得提到的事,当拍卖开始时,学联贴出通告,希望同学不到拍卖场买日货,商学联合会也作出决定,会中人员一律不买日货,这事是确实做到了的。

一段插曲——商会被迫改组

由商会选出参加商学联合会工作的商人，时间一久，事过境迁，以前商会中那些官僚架子绅士派头的“会董老爷”们，又故态复萌，以为天下太平，又可以玩手段了。商学联合会对商会有所商洽的事，渐渐露出不合作的表示，尤其对转达日货商要他们册报存货这件事，又从中玩弄玄虚，少报、谎报的事，经调查股查出来的为数不少，并且都得到商会暗中支持这样做的。最初是向商会交涉，要他即时纠正这种错误，他们是表面对付，暗中捣鬼，甚至放出流言，说由商会选出的人们都是“不顾娘家”的坏人，商会有权另选。但这些人既不甘于伙同商会那些“绅士老爷”们去欺骗学生群众，而那些“绅士老爷”们的恶劣作风，又不肯改正，积怒难平，终于爆发。从商会选出的全体人员，开了一次大会，公开揭露商会舞弊的许多事实，引起全体人员的愤慨，当场决定向商会提出严厉的书面质问，要他们就列举出的事实，一一作明确的答复。同时，这些人集体向商会辞职，要商会另行推选接替的人，学生们也极不满意商会的行为，对商学联合会中商界人士的这种举动，表示同情和支持。恰好这时监狱学校要扩建校舍，商学联合会须另觅会址，会议决定通知商会，商学联合会暂时迁入商会办事。这一来，商会中的那些“绅士老爷”们以为将会再来一次狂风暴雨，吓昏了。商学联合会进入商会，那些“会董老爷”们一哄而散，从此没有进过商会的大门。本来那时商会总理周葆臣、协理白米舟，在商会被打之后，已经闭门在家，没有过问会务，再经这样一来，商会已形同解体，自行垮台，其势不得不改组了。这次改组，不是法定期满的改选，酝酿了很久，还经过总协理和全体会董向各帮提出辞职，又以商会名义呈由省长公署批准改选等手续，才正式由各帮按照法定选举，选出

总协理会董。新选出来的人,比较是与文教界接近的。总理陈子立,是昌福印刷公司的总经理,协理是中华书局成都经理胡浚泉。此外在商学联合会工作的商界人士李献廷,王斐然(调查商界股长)和汪澄波,都被选作会董。范朴斋也被推选为商事公断处评议员兼文牍,选举虽已完成,但新当选的人们,仍迟迟不就职,经各帮一再催促,又向商学联合会及其他方面做了许多疏解工作,然后才正式就职,恢复了商会工作,这已是1920年夏季的事了。

以上是五四以后,成都抵制日货运动和与这一运动有关联的一些历史事件。我是参预这一些事的一人,但事隔几十年,有些事已记忆不清,脱漏与错误,是难免的,谨此声明。

闽垣五四别记

赵效沂

一般人追述五四运动故事，多数着重北京，其次宁沪，对其他城市很少有详细的记述。现在写“我”，写“福州”，或可补缀其他记述之不及。所以写“我”者，乃记身历其境，易于存真也。

我那年不过13岁，肄业于私立法专附属中学一年级，何以会在当时游行队伍中，有“横冲直撞”的机会？事缘我们同班同学三十余人，突然兴起组织童子军（并非学校主动），当时福州并无童军正式组织，仅教会学校苍前山英华学校（正式校名为英华书院）有一大队，计分三小队，队长马育才（？）服装整齐，行动机敏，使我们羡慕不已。因之我们就请马君任编组教练之责。课余操练不已，穿着童子军服装，到处亮相，煞有介事。

五四运动爆发，北京等地军警大捕学生，福州各校立时响应，罢课游行。我们和英华学校童子军，便理所当然地负起“交通”、“联络”工作。一大清早，穿起童军制服，手持木棍，夹杂在各校长蛇般队伍之间。

福州临近日据台湾，日本浪人既多，日货更充斥市面，因是示威游行之外，还宣传抵制日货。队伍走到任何出售日货的商店便派人劝说，不听者多予严词斥责。日本浪人尚不敢出面滋事。

当地有名的巨商黄瞻云，资本雄厚，在南台闹区开设一家绸缎铺，兼营华洋杂货。货品中95%为进口日货，成为游行队伍“检

查”“取缔”的总目标。到了该店，店门紧闭，店员走避一空。大队人马一时性起，破门而入，不知如何有那么大的傻劲，遇物即毁，见布即撕，不及半小时，被撕毁的布匹，堆积达四五尺的高度，我们行动均须攀登“布丘”而过，两脚软棉棉，有登云驾雾的感觉，为我生平仅有的一次蛮干。

一连三进大商铺的货品全部捣毁之后，正要拔队离去，这时突闻一位学生惊呼：“黄瞻云惨杀同学，藏尸墙角啦！”大队学生，年少不更事，既不多加思考，也不查明究竟，此时又有人高呼：“到地方审判厅（即地方法院）控告去！”于是一行队伍齐赴地方审判厅，数千人在门外广场席地而坐，推学生会会长谢翔高（此人后来被暗杀，始终未查出凶手，成为疑案）入内请见检察官，要求签发拘票，拘捕黄瞻云兄弟。检察官满头雾水，搞不清怎么回事，双方争持不下，闹得不可开交。此时督军李厚基突派出大批北洋军队前来围捕。迫近黄昏，突降大雨，景象凄清。在“秀才遇着兵”的情况下，一个个只好被押到省立一中拘禁。我们身为童子军，还在押运的行列中，维持交通秩序。

全市商人听说数千学生因爱国游行被捕，群情愤激，立时罢市，并派代表送来糖粥、光饼、征东饼（上述三种食物，在福州销售极为普遍。所谓“光饼”、“征东饼”，相传为戚继光征倭时所制，可以贮存月余日不变质）以及其他食物、水果，慰劳被捕学生。我们席地或坐或卧，大吃慰劳品。糖粥是用大水桶一大批送来的。有人又呼：“大家不要吃！粥中有人下毒！”一时相惊怕有，此与在南台误传黄瞻云杀死学生的事，同属子虚。于是医专被捕学生出面声言先要“化验”。其实既无仪器，又无试药，如何化验！纷扰片刻，大家因饥渴照吃不误。

“一宿无话”，督军李厚基终不敢触犯众怒，悬铃解铃，一手为之。下令将被捕学生全部取保释放。事实上，不必找保人，大家一

哄而散。

回家后，被母亲痛骂一顿：“游行彻夜不归，害得我们一夜不能合眼！”父亲倒能判断情况：“我早说不用瞎操心。几千人被集体拘捕，还怕李厚基不放！”母亲又对我说：“以后不要再干什么童子军了！”父亲再反驳：“这一次被捕的，才有几个童子军？大多数还不是不穿童子军制服的大中学生？”他总算给我撑腰。

如今事隔 60 年，我也经历了多少次大小动乱，冷静剖析：凡是国家有难，可爱的青年无不振臂奋起，发为救国运动，场面均极为感人。

记五四运动前后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

胡 俊

一、反对中日军事协约的爱国运动

1918年春天,留日学生为反对段祺瑞内阁和日本寺内内阁所缔结的日中军事协约,在留日学生总会会长阮湘、王洪宾领导下全体罢课归国,成立了学生爱国总会和分会。总会设在上海,分会遍设于全国各大都市。留日学生各省同乡会各选派代表二人出席总会。我和夔苏生代表河北省去上海参加了总会。大家到了上海以后,国内学生也都纷纷响应。北京学生总会派了段錫朋、傅斯年等前来参加。当即举办了和开展了各项爱国运动,宣传排日排货。如集体游行示威、派人赴各学校各工厂各团体讲演,同时广泛地展开了街头演讲,揭穿军事协约的内容实质。(此项运动常常被警察驱散)并派人到游玩场所或大公司大商店门前,散卖各种爱国书籍,又创办了救国日报。与此同时,散布在全国各大都市的学生爱国分会也举办了同样的爱国运动,有时还邀请了名流学者进步人士来会讲演时事。记得黄炎培校长、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先生等都应邀来讲演过。只有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要他捐款他不肯捐助,请他讲演他不肯出面。总之,此次运动获得极大效果。第一,联合国内学生做了许多有计划的大规模爱国运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擦亮了当时对付日本的唯一武器——排日排货。第二,对于1919年爆发的伟大的五四运动,亦不失为侧面的一种

推动力量。

二、响应五四运动的爱国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齐集天安门游行示威,包围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卖国贼章宗祥,掀起了惊天动地的五四运动。消息传到东京以后,留日学生为响应五四运动,即于5月6日在东京神田区中国青年会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知道中国向日本收回胶东半岛的交涉,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方面所以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段祺瑞卖国政府向日本签订了高徐、顺济两条铁路的借款条约,堵住了中国代表的喉舌。而当时中国驻日公使是章宗祥,代办是庄景珂。签订条件时因章归国述职,是由代办庄景珂签订的。于是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庄景珂身上。当场决定5月9日(签订二十一条的日子)下午1时,全体在虎之门公园集合,然后结队到中国驻日公使馆请愿,并分赴各国驻日大使馆请愿。散会以后,我就买了一把尖刀。准备请愿时乘机刺杀庄景珂,以雪心头之恨。到家曾与同学王家楨商量。他认为开会时,庄景珂未必出面,即或出面戒备亦必十分周密,一定不能得手。苦口劝我不要冒险。我执意不听。到了9日那天我就身藏尖刀,到虎之门公园集合,遂后列队向中国公使馆进发。不料大队方入葵桥(中国驻日公使馆和日本众议院都在此巷内)巷口,即遭到日本警察宪兵的拦阻。大队接连突破了两道防线,最后到了中国公使馆门前。这个时候,宪兵骑着马横冲直撞,警察挥棒乱打。学生手无寸铁,然因义愤填胸,也都挥起老拳与之周旋。赵云章用手杖一击打在日警头上,把手杖打为两截。我也在愤怒之中,用刀砍伤了一日警小队长的右手,而我的左腕也挨了一刀。因之被捕入狱。总计此次入狱者共有七人,即:赵云章、刘国树、杜中、黄杰、刘某、雷某和我。

我们被捕入狱以后，各方面都深表同情，大力支援，设法营救。如留日华侨总会、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各省同乡会、各校同学会等。至于学生总会，更是想尽方法不遗余力了。可是经地方法院判我徒刑一年，赵云章判处徒刑三个月，其余五人无罪释放。后来由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马伯援代表各团体，请得著名法学家先进人士吉野作造博士出面帮忙。他极力主张提起上诉。并经他领我和赵云章会见高等法院院长铃木某，陈述当时冲突的情形。又介绍他的学生片山哲律师出庭辩护。主要的理由是——“地方法院的判决所根据的理由和精神，是处罚日本人的一般办法。而他们是中国青年学生，所做的事情，又是爱国运动。不能与日本人一律看待”云云。结果经高等法院改判我徒刑 10 个月，变为缓刑三年（根据日本法律，徒刑在 10 个月以内的得变为缓刑）。赵云章无罪释放。综计此次入狱，自被捕至释放共计 35 天。在此 35 天中，虽然饱尝铁窗风味，备受摧残折磨，可是一点也不感觉痛苦。因为我本打算刺杀卖国贼庄景珂抱定以死相拼的决心去的，今落到入狱判刑，更是不足谈论了。尤其是得到各方面的关怀和鼓励，更使我意志弥坚，勇气更足了。至于营救我们出力最大的，要推马伯援、阮湘、王洪实、王家楨、吉野作造、片山哲等人，叫我真是没齿难忘了。

到了现在回忆当初，得了两个结论：第一，五四运动是警钟，是灯塔。留日学生此次爱国运动，也是受了五四运动的感召而掀起的。而五四运动迫得卖国政府不得不命令它的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因此才有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根据华盛顿条约，中国方得由日本手中收回胶东半岛。第二，那时常有一个疑问盘旋在我的脑海之中，得不到解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学生的爱国运动，本是崇高的可爱的举动。政府代表人民应当给予辅导培育才是。而那时政府却横加摧残镇压，人民咒之为卖国政府、卖国贼。直到解放后，才晓得当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军阀政府

所代表的不过是地主官僚罢了。而他们的靠山又是帝国主义,根本不能代表人民,而是人民的死敌。期待他们对学生的爱国运动,给予辅导培育,那简直是与虎谋皮了。

1963年3月25日

孙中山支持五四运动

朱仲华 口述*

在我青年时代,有幸多次会见过孙中山先生,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在他有力的支持下,我负责带队,首次把游行队伍冲进租界,进行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以及以后几次到孙先生寓所,面聆教诲的往事,始终留在我晚年的深刻记忆之中。

我最初见到孙中山先生是 1916 年 8 月 20 日在故乡绍兴。当时,卖国贼袁世凯垮台死去才两个半月,孙中山先生应浙江督军吕公望之邀,先到杭州,三日后,于 8 月 19 日下午 5 时左右,到达绍兴。次日上午,绍兴各界召开欢迎会于布业会馆党民舞台,孙中山先生登台发表了演说。我当时已在母校复旦附中毕业,放暑假,回到绍兴塔子桥老家。听说孙中山先生到了绍兴,也主动前去布业会馆聆听他的讲演。

五四运动那年,我已 23 岁,正在上海复旦大学读文学系三年级。我学名朱承洵,担任校学生自治会主席等职务。

五四前夕,我们同学从报上获悉,巴黎和会正在召开,巴黎和约即将签订,到底订的什么条款还不清楚。而当时日本觊觎山东正在向北京政府递送秋波,扬言要贷款 4 亿日元给中国,以全国田

* 晨朵记录、整理。原文题为《在孙中山先生支持下上海学生在五四运动中首冲租界的前前后后》。

赋作抵押。为此，邵力子先生曾在5月3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题为《麻木不仁之国民》的时评，文中说：

“日本对于山东问题之主张，是否果为东亚和平之福，今姑勿论。但观其集合各派鞭挞政府之气势，固非我麻木不仁之国民所能及矣！”

“国内议会若存若亡，欧和专使相猜相忌，而国民袖手旁观，迄无起而严重监督之者。国法凌夷，外交失败，其咎皆在国民之自身矣。痛哉！”

这篇时评，很有鼓动性，分明在动员人民群众密切注视时局动向，群起监督政府之外交活动。

巴黎和会上政府代表准备秘密签订丧权辱国条款，我们上海乃至北京学生事先是不知道的。那是由于当时任徐世昌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将国务院所发出的密电内容，到北京东堂胡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家，如实透露给了蔡先生。蔡先生于5月3日当晚，召集了北大学生代表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清、段锡朋等，把这秘密公开告诉了学生。当时北大学生原定在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得此消息，便提前在五四那天，由罗家伦任游行总指挥，开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

5月4日下午，北京3000余名大、中学生齐集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了。5月6日早晨，我的老师邵力子先生（当时在上海《民国日报》社任总编和经理）拿了当天刊登五四运动消息的报纸，匆匆来到徐家汇复旦大学。因为我是学生自治会主席，他当面嘱咐我紧急集合全校同学到大礼堂开会。在会上，邵先生先读了报上关于北京学生反对巴黎和约中丧权辱国条款，在天安门前集会并游行示威以及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报道，然后慷慨激昂地动员我们说：“北京学生有这样的爱国思想和行动，难道我们上海学生会没有吗？……”同学们听了，情绪

一下子就沸腾起来。当天,马上决定停课,分头出发到上海各大中学校去串连;邵先生也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到其他学校去演讲(以后他还在1961年7月《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说过:“孙中山先生莅四时在上海,对全国学生总会起了领导作用。我到各校演讲,也是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思做的。”)。目的是要求全上海学生先团结起来,强有力地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5月7日下午,由当时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的黄炎培先生主持,在西门外体育场,举行了约有2万人参加的市民声援北京大会;其中主体是次中学校学生,会后在南市一带游行示威。5月9日各校又停课一天,同学们分头上街演说、宣传,提出了“外保国权,内除国贼”等政治口号。与此同时,我们已把全上海44个大中学校串连好,先后两次来复旦开会,认为在当前万分紧迫的形势下,为了反帝救国,我们学生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统一行动;又为了避免牵累老师,只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谢绝教职员参加。

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终于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环球学生联合会会所成立。公举复旦同学何葆仁(字子元,福建厦门人,华侨子弟)为主席,瞿宣颖(字兑之,湖南醴陵人,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子)为文书,我被推为总会计兼总干事。环球学生联合会会长是复旦校长李登辉先生,这是当时为出国留学学生代办手续的组织。上海学联能在这里成立,与李校长的同意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学联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在5月14日召开各校学生代表大会,热烈欢迎京津学生南下代表方豪、段锡朋等一行到上海,请他们公开宣讲北方同学掀起反帝爱国热潮以及遭受北洋政府残酷镇压、迫害的实际情况。

上海学联成立后第二件大事,就是准备全上海统一罢课。原计划定在5月15日开始,后来因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为不满北

京政府愤而辞职，离京南下，到了杭州。为了与全国学联代表一起，去杭州迎蔡还京，我奉派一同前往，上海学联才一虎把统一罢课日期往后推。

当我们复旦同学热烈紧张地投入反帝爱国运动之际，也影响到了复旦的工友。

复旦原有一个校工会，会长名叫徐福，江苏扬州人，系总务处工友，平时负责给学校领款、购书及采购仪器等工作。他在学生群众中很有威望，有好多同学凡家有汇款多来托他代领，托他买书购物等等，向无误差。以后他还当了校长李登辉先生的侍卫。我们在复旦毕业后，有一次徐福做寿，大家还纷纷给他送寿礼。副会长刘福，是当时复旦的门房，也就是负责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此外，还有约40名左右的校工，包括在各学生宿舍中服务者（当时称为茶房）以及伙房中的炊事员，记得其中一位炊事员还善于英语。

在学生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积极开展之际，复旦校工会在徐福、刘福带领下，也开始在5月19日组织成立了一个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经邵力子先生支持，他们还在5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2版《大家都来讨贼救国》副刊中，公开刊出了下面这封信：

学生联合会复旦分会会长先生钧鉴：

敬启者：敝会已于5月19日成立。当时捐洋三十一元，系出诸同仁劳力所得。除敝会印刷传单、分发鼓吹用项等外，尚余二十元。公同决议，捐呈贵会充作经费。自知杯水车薪，无甚裨益。同人佣工而外，甚愿致身国事。区区之款，聊表寸衷。谨此奉上，只希哂纳。

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复旦分会启

复旦校工，在信中写了“同人佣工而外，甚愿致身国事”，说明他们的工人阶级觉悟已大大提高，不再停留在争本身福利待遇上，他们的着眼点已在政治上了，这应该说是了不起的。

运动发展到了5月22日,我们上海学联领导全上海44个大中学校,实现了统一罢课。但是美、法教会插手所办的两所教会学校,也就是圣约翰大学和震旦大学,他们借口是外国人出资创办学堂,绝不允许学生参加中国学生组织的学联,并出面干涉、破坏学生运动。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芳济居然下令将参加学联的学生代表章益、江一平等24名学生开除,赶出校门。这事被学联得悉之后,我们一面派代表前往慰问,一面由我请求李校长支持,得到他的同意后,公开宣布复旦大学吸收他们24个同学转学肄业,从而有力地粉碎了教会学校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阴谋。

在实现全市罢课之后,学联还计划进一步实现罢工与罢市。由于当时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的儿子,在日商银行当买办,他们通过秘密策划,竟发布了一个“佳电”,公开向北京政府献媚。电文中把丧权辱国的责任,全推到驻日公使章宗祥一人身上,更无耻的公开赞扬日本帝国主义接替战败的德国,侵占山东的所谓“功绩”,从而引起了舆论界谴责的怒潮。以后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副会长沈联芳,借口辞职,对实现罢市多次推诿,始终未能配合我们罢课,协同进行。

下一步到底怎么进行,我们心中无数。正在面临困惑为难之际,5月20日,环球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突然跑来找我和何葆仁说:“孙中山先生刚才来了电话,叫你们学联去两个代表,时间在今晚7点,地点在西藏路南京路口老晋隆西餐馆,他有要事,要同你们密谈。”

接到了这个异乎寻常的电话之后,我和何葆仁就兴奋地应约在当晚7点到了老晋隆。门口已有一位着西装的人在等着我俩。他说他姓洪,是孙中山先生派来的代表,他已叫好了3客西餐,一同上楼招待我俩。我们边吃边谈,着重向他汇报了我们上海学联成立后开展活动的情况和当前碰到的棘手问题。洪先生认真地听

了,然后向我们传达了中山先生的口头指示,大意是说:

“这次你们学生罢课,完全出于爱国热忱,中山先生非常赞成。但是目前这样温温吞吞下去是不成的,势必会旷日持久,贻误时机。中山先生说你们学生应该再大胆些进行活动,不要怕这怕那,要有牺牲精神,要有突击行动,要扩大阵线,设法激起怒潮来。万一工部局出来抓人,中山先生已经为你们请好了外国律师,一名是法国律师叫达商,一名是英国律师叫穆安素,一定会出来为你们办交涉的,你们放心,大胆干好了!”

我们先后谈了约有两个小时之久。洪先生临分别还告知了我们,孙中山先生的住处在莫利哀路(今香山路)。叫我们有空时去找他。

有了孙中山先生这般具体有力的支持,在回来的路上,我俩都非常兴奋和激动。在这次会面之前,本来我们上海学联已经决定要在5月31日召开一次郭钦光烈士追悼会(郭钦光是在北京因冲击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时不幸殉难的一名同学),为了声援北京,决定会后仍要举行示威游行。但游行的路线,还是在“中国地界”,重点是从南市指向龙华,当时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的衙门。在路上,我同何葆仁秘密商量了一下,这次决定要大胆去冲一冲一直被外国人统治着的中国神圣领土——租界。但这一计划,暂时不好公开,因为万一过早公开了,难免会使事情横生枝节,势将影响游行的顺利进行。

5月31日下午,我们学联就在西门外体育场召开了约有2万人参加的郭钦光烈士追悼会。那天会上,我们请五四时在北京被捕,释放后南下到上海的许德珩上台讲了话。会后照例游行,临时宣布分作两路,各约1万人左右。一路由何葆仁带队,南下龙华;一路由我带队,北上直冲租界。

那天下午,骄阳如火,同学大都戴着草帽。我们这支游行队

伍，沿老西门走民国路到了老北门，再从河南路直冲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路过三茅阁桥上海《民国日报》社时，只见二楼阳台上，邵力子、叶楚傖先生等正在向我们招手，并热情鼓掌，给了我们学生以会心的支持与鼓舞。沿途有不少商店的中国职工，看到我们这支首次冲进租界来的游行队伍，还纷纷主动送上一杯又一杯的茶水来招待我们，使我们更加鼓起了勇气。

游行队伍到了重要地段，也就是四马路（福州路）巡捕房，门口站出来十几名中、西包探，其中有一个操着洋泾浜英语问我这带队的：“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我只回答：“我们要到天妃宫去！”便径自带队向前走去。天妃宫在河南路桥的苏州河北，是当时上海总商会所在地。看来我们保密得真不差，工部局事先毫无所知，万万想不到学生游行队伍居然会一反往例，冲进租界来。上司没有布置，这些下属的奴才包探，临时连请示都来不及，哪里有啥对应措施，敢阻拦我们游行。只有几名中国包探，紧紧盯住这支万人游行队伍直往北进。过了天妃宫桥（今河南路桥），到了市总商会，负责人早已溜之大吉。两名在场的商会理事，对我们严肃地提出要“限期罢市”这一点，再三声称不敢作主，光是空口表扬我们学生是爱国行动，他们十分敬佩云云。

我们再三叫他们把负责人找来谈话，他们却一直拖延应付。这时，跟来的一名中国包探，也插进来悄声对我这带队的说：“你们学生的行动，我们也是支持的，大家都是中国人嘛！只要你们不要出啥事情就好。要不，日本领事会来找我们的麻烦的。”看来他已等不及了，准备先走掉。

看天色渐晚，我们在平时很难进来坐一坐的上海市总商会大厅椅子上，已坐得差不多了，我便宣布队伍解散，分头回家。这样，免除了整队回去时，横遭不测。万家灯火时分，我们终于胜利结束了首次冲击租界的反帝示威游行。

总之，在孙中山先生具体有力支持下，这是我们上海学生破天荒第一次在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段，公开举行的爱国救亡反帝游行。

过了两天，即6月2日，我和何葆仁作为上海学联的代表，按照洪先生所留下的地址，前往莫利哀路孙寓，晋谒孙中山先生。

这是一所精巧的别墅，听说是一位华侨赠送给中山先生的。到了门口，我俩递上名片，由一位姓马的副官先上楼通报，经孙先生允许后，马副官领我们上楼，他还指点我们把礼帽挂在楼梯下的衣帽钩上。上楼后，中山先生招呼我们坐下，我就向先生汇报了胜利冲进租界游行的经过，并且感谢他派代表对我们学生进行了有力的支持。中山先生细细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兴奋地赞扬了我们上海学生反帝爱国、团结一致的斗争精神，还特别对我们终于粉碎了圣约翰校长卜芳济破坏爱国运动的阴谋活动表示赞赏。他说：“你们能攻破这个顽固堡垒，这是了不起的胜利！这是你们学生团结一致的力量！”我俩听了都非常高兴。座谈了一会，就告辞回校。

6月3日—4日，北京学生近千人，又连续被北京政府逮捕，救亡运动掀起了新高潮。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鉴于上海市总商会不肯下通知统一罢市，我们学联便临时决定采取组织小分队分头动员商店罢市。6月5日那天，在上海最早罢市的，是开设在南京路西藏路口的荣昌祥西服店，因为我们复旦同学常去此店做制服，早与他们的职工熟悉，一经动员，他们就带头关门。于是接着再分头劝说动员，得到了店员工人们的同情和支持，连锁反应，从大马路到二马路、三马路……家家关门停业，形成了“三罢（罢课、罢工、罢市）的强大声势。当时上海有一家小小的理发店，也贴出了“国事如此，无心理发，关门罢市”的布告，堪称佳话。

这时候，我们复旦校工所组织的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也在上海《民国日报》6月4日第12版的《大家都来讨贼救国》副刊上，发表了一份义正辞严的《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宣言》，兹抄录全文

如下：

现在我们的中国，实在是危险得很哪！日本要夺我们的山东，恐怕全国的同胞，是无人不晓得了。山东是文化出产的地方，又占在中国地理上很要紧的位置。亡了山东，还不是同亡了中国一样了？他们学界的人，结了一个大团体，终日的在那儿奔走呼号，尽他们的救国责任；商界的人，也结了团体，渐渐的活动，要显出他们救国的热心。看看我们工界的人是怎样呢？可算是简直没有一点举动，就是简直没有一点爱国心。唉！难道这么大的中国，单是他们学界、商界救得了的么？难道我们工人不配救国么？要晓得我们工界的人，是占最多数的。我们多数工人不去救国，那还有希望吗？况且我们向来是能吃苦，能耐劳，不好虚名，脚踏实地的。若是拿这样精神去救国，不是格外切实，格外厉害吗？所以我们复旦大学里的工人，办了一个工界联合会，那会的宗旨，就是上面所讲的了。吾们的苦心，就是想唤醒全国的工人，大家快起来，也办一个联合会，然后联络各处的小团体，做成一个极大的团体。那时候，既有他们的学界、商界大家一致的救国；又加了我们工界的一致救国，那还怕什么山东争不回？还怕什么日本的强暴呢？

这份《宣言》，应该说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它充满着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历史责任感和十分高涨的自豪感；它对爱国救亡前途更充满着必胜信心。可是在不少近现代史著作中，都只抽象地写：六三运动，意味着中国工人阶级已日益觉醒，正开始走上政治历史舞台。却根本不提这活生生的《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宣言》，我认为这是十分遗憾的事。至于这份宣言之所以在当时日出3大张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这又与作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的邵力子先生的支持分不

开的。

中国五四运动发展到了六三运动，由于有了工人阶级的参加，它以史无前例的强大攻势，到6月10日终于迫使北京政府无可奈何地罢免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

此后，我们又一次前往晋謁孙中山先生。他老人家当时也十分高兴，还操英语对我说了两句话：“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导致灭亡！”

到了下半年，即1919年10月18日，孙中山先生在环球学生会作公开演讲。我们复旦同学也前去听讲。他讲的题目叫《救国之急务》，中山先生热烈赞扬了我们上海学联。他说：“试观这次学生运动，于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效果，可知结合者强也。”

10月22日，为了答谢中山先生对我们上海学生的赞誉，我又一个人前往莫利哀路晋謁孙先生。那天下午我登楼时，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都未午休，正各自在静悄悄地埋头读书，当时就给了我以极深刻的教育。中山先生见到我，热情招呼我坐下。我说，环球学生会那里先生作的演讲，我也听了，十分感谢先生对我们上海学生运动所作的评价。并且又一次向孙先生说，这与先生有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接着，孙先生同我谈了当时北京政府派内务部长朱启铃南来上海议和的情况。他说：“我是坚决主张南北统一，反对分裂的，但要实现南北统一，先决一条，必须和议双方有一个‘天下为公’的思想。”谈话时，他兴冲冲地取来笔墨纸张，在长约4尺、宽可9寸的宣纸上，欣然挥毫，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并署上“仲华先生属”和“孙文”二字的落款，还取出朱红印泥，端端正正地盖上了一方印章。同时对我说：“天下为公，要的是天下鼎鼎大公。实现了天下为公，就可以达到世界大同了，这就送给你做个纪念吧！”我作为年仅23岁的青年学生，幸福地收下了这位伟大革命领袖所赐的墨宝，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孙中山先生还从书架

上抽出来一本书,这是他亲自译注的《会议通则》,是他根据《英国议会法》写成的,是1917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线装本(后改名为《民权初步》)。当时孙先生还在书上写了“仲华先生惠阅”,送给了我。他还补充说:“现在商务印书馆连我的书也不出了,他们不出,难道我不会从别处去出?”

中山先生所赠那本《会议通则》,是我们学习民主政治的人门书,我早在1933年就赠送给了绍兴稽山中学图书馆。可惜抗日战争时,学校内迁,此书已毁于战乱。至于“天下为公”这一横幅,幸喜我已于1959年捐赠给了鲁迅文化馆,至今得保存在绍兴市文物管理处。

此外,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环球学生会所作演讲《救国之急务》,全文当时印有小册子分送,我廉也宝藏一本,195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紀念会时,邵力子先生任筹备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我将这本小册子送北京,转赠了紀念会。

(原载《绍兴(县)文史资料》第七辑)

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

高一涵

这是 1919 年冬的事。

在北京发动五四运动后，引起了全国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军阀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这时正是段祺瑞执政的时期，段系集团的横行霸道，尤为全国广大人民所仇视。因为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段系集团更视为眼中钉。对北大教授具有前进思想的，或赞成苏俄革命的，都称之为“过激派”，对陈独秀、李大钊等则早称之为“过激派”的首领。

陈独秀在这时，可以算做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性情一贯地急躁，反对北洋军阀尤其激烈。有一天，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大约有十几条。交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在夏天的夜里，我同陈独秀一道，到嵩祝寺旁边一个小印刷所去印刷这个《北京市民宣言》。因为这个印刷所是为北大印讲义的，夜里只有两个印刷工人在所内，工人们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后，又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净净。我们印完时，已入深夜一点多钟。

暑假期中，北京学校和机关人员，下午多到“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去吃茶、乘凉、会友。他们坐到茶桌子后，往往是坐坐走走。有时茶桌子上，只有茶杯茶壶，而没有人入座。我们就把印好的《北京市民宣言》一张小传单放在没有人的茶桌子上，用茶杯压好，等到吃茶的人回到原桌子上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

拍手欢呼，引起陈独秀和我们大家高兴。

第二天下午，陈独秀约我们四个人（即王星拱——北大理科教授、程演生——北大预科教授、邓初——内务部金事）到香厂新世界附近一个四川菜馆子浣花春去晚餐。餐后，陈独秀、邓初和我三人上新世界去散发传单，王星拱、程演生往城南游艺园去散发传单。

今天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真正幼稚，一点不知道做秘密工作的方法。根本没有想到昨天在中央公园散发的传单，已被军警拾去，因而在各个游戏场、电影院、戏馆、公园里暗布下军警密探，穿着便衣，装作游客，散在各个角落，等到散发传单的人到来，他们就予以逮捕，讨赏。

我同陈独秀、邓初三人到新世界，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同我两人只得上新世界的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我们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哪知道，我们正在向下撒传单时，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天真、幼稚，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张传单给那个人，那个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即刻叫埋伏在屋顶花园暗地里的一伙暗探，把陈独秀抓住。我乘着这个机会，急走到层顶花园的天桥上，探子大叫：“那里还有一个！”我就在此一刹那间，把手中拿的传单抛了，赶快走下去，杂在戏园的观众中，并脱去长衫，丢掉草帽，躲藏起来。转眼看到邓初一人，还在对过台球场内，把传单一张一张地放在茶桌子上。我小声告诉他，说：“独秀已被捕。”他还说：“不要开玩笑罢！”正说间，遇见陈独秀已被探子们捉下楼来。陈独秀怕我们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来，说：“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

侥幸的是：京师警察厅派来的暗探多，京师卫戍司令部派来的

暗探少，在双方互相争夺时，陈独秀落到警察厅便衣暗探的手中，立即用汽车把他解到警察厅去。为什么说侥幸呢？因为那时京师卫戍司令是段派嫡系段芝贵，我们散发的传单中，有一条就指明：“要枪毙段芝贵”。如果陈独秀落到段芝贵手里，就不一定能保证他不被杀害。那时警察厅长吴炳湘是安徽人，平日还认为陈独秀是很有名的文人。等到后来，安徽几个老顽固派马通伯、姚永朴、姚永概等都用书状要求保释，吴炳湘也就卖个人情，把陈独秀释放了。但陈独秀虽然被取保释放，仍加以管制，不得自由行动，有行动就须得到政府批准。这是陈独秀在京师警察厅中关了三个月的经过。

在陈独秀被捕的三个月中，可以看出五四运动的人物向左右分化的开始。李大钊真正是威武不能屈的好汉，他这时还是大讲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就，广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胡适则不敢在家里居住，搬到受帝国主义保护的东交民巷附近的北京饭店去躲藏起来。胡适听说有人对他所写扇面的主人说：“你怎么找这个‘过激派’胡适替你写扇子？”大吃一惊！因此，就要出来辩白，说他自己并不是“过激派”。那时我同胡适同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我们所办的《每周评论》，就是以这个地方为通信处。我那时负《每周评论》编辑责任，因陈独秀被捕，气愤不过，对段政府和安福系大加痛骂，说：“安福胡同是他们的聚义厅。”李大钊仍然在《每周评论》上介绍马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那时反动的北洋政府叫布尔什维主义为“过激主义”，说所有谈“过激主义”的人都是“过激派”。胡适至此，掩盖不了自己的真面目，就在这时候写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论文，针对李大钊进攻，借以表明他自己不但不是“过激派”，反而是反对“过激派”的人。可是李大钊的态度却十分坚定，就在反动政府极端仇视“过激派”的时候，仍在《每周评论》上著文答辩，声明他自己是欢喜研究马克思理论，绝不动

摇。当这场大辩论还没有结束时,《每周评论》就被反动政府勒令停刊了。

陈独秀出狱后,仍住北京北池子寓所,这时他已辞去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他因有事到上海去,回北京时,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取道武汉,做了一次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他讲演的重点,用大字刊出。北洋政府看到这些报纸,才知道他已出北京。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企图等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

当时同李大钊计划:为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后来每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陈独秀和瞿秋白到苏联去,路过北京,住在邓初家中。此行极端秘密,一切照料也都是李大钊同志计划安排的。等到他们安全地抵中苏边界来信后,李才告诉我们沿途平安的佳音。

今天回忆,知道这件事的共六个人,至今仅有我一个还在,因而把它记录下来。

〔附注〕李大钊同志于1927年在北京被害,陈独秀于1942年在四川江津逝世,王星拱于1949年秋后在上海逝世,程演生于1955年在上海逝世,邓初于1959年在北京逝世(他是北京大学教授邓叔存的二兄)。

再关于《每周评论》出版及被封时间的回忆:《每周评论》第一期是在1918年12月22日出版的。共发行36期。到37期刚付印时,即被查封,停刊时间是1919年8月31日。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登在《每周评论》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第31期。李大钊同志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登在1919年8月17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5期。这时李大钊同志在五峰,陈独秀尚未出狱,故李大钊文中有“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一句话,就是指陈独秀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的事。

胡适害怕“过激派”三个字: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中说:“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派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1963年10月)

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顾颉刚

我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4年又考入本科中国哲学系,中间因为生病及家中人死亡等原因,屡次休学,直到1920年才毕业。1919年5月4日,我正在家乡养病,不在北京,因此没有参加那天的游行。但五四运动前后我都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过新文化运动,因此,对那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情况,多少了解一些。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深信:北大1919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指挥部,同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有密切关系。

我考入北大的时候,听说教育部曾请严复来当校长,他怕事烦不干;继请章士钊当校长,他又因自己年轻,怕对付不了一班老教授,也不干。后来请了浙江的数学家何燠时来当校长,他干了不到一年,就被风潮赶跑了。此后一直由工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工学院院长)胡仁源代理校长,沙滩的红楼就是由他计划建造起来的。1916年冬,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聘请蔡元培先生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初,蔡元培正式到任。他满心想把法、德两国的大学学风移到中国来。他办校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学术自由、百家争鸣。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才改名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来之前,校名改了,本质并无什么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1913年我考入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

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容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韵学、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的黄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树德先生（他著有《九朝律考》），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5000银元；当然，这样的豪富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10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长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个什么“最高学府”？我当时比较注意读书，暇时看看京戏，就算是好学生了。

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他到校不久，就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蔡先生自己虽然在

前清中过举人、进士，点过翰林，但他后来到欧洲德、法两国留学，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一到任，就着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来代替北京大学那一套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他最注意的是文科，认为文科的任务是该用新思想代替旧思想的。他到校之后就断然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当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以后还陆续聘请了一批有真才实学和有新思想、希望改变旧社会的人来任教。

我在1917年的日记中曾经记叙当时的蔡先生：

其一：“蔡子民先生来长吾校，锐意图新，将以农、工、商三科与原有的专科学校合并，大学本干，独留文、理、法三科，文科在沙滩，理科在景山东街，法科在北河沿，对于哲学门尤为注重。文科学长自夏仲彝去，改聘《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2月）

其二：“先生之为人，诚实恳挚，无丝毫虚伪。……其言讷讷也，如不能出诸口；然至讨论学理之时，则又滔滔不绝。”（8月）

蔡先生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提倡学术民主，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无分新旧，应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和林琴南曾经发生过一次有名的公开辩论，轰动了全国。林写信给蔡，攻击蔡主办北京大学以来“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引用土语为文学”。蔡于1919年3月18日写了一封公开信答复林琴南，阐明了自己的办学方针：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

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比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事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笔欤?

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指引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辜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蔡先生主校以后,许多学者名流来到北大,一时人才云集,面目一新。像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都来到北大教书。李大钊、陈独秀和他们一起,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展开斗争,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蔡元培为了贯彻自己的办学方针,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例如,在他的提倡下,学校成立了各种学会(最有名的有“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邓中夏主持)、社团(如《新潮社》等)、研究会(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还有“静坐会”等体育组织。蔡先生还亲自主持成立了一个“进德会”,师生都可入会,条件是:不嫖、不赌、不娶妾。学校还开音乐会,办体育运动会,允许成立学生自治会。总之,是要努力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研究学问、研究大事上来,让学生有正当

的文体活动,有健康的、高尚的爱好和情操。因为各类学术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校内经常举办讲演会、辩论会,思考和讨论之风盛行,师生都活跃了起来。无论在教师还是学生中,都有左、中、右,有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有立宪派,甚至有帝制派、复古派(如中文系里的“国故派”),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从那以后,学生们打麻将、吃花酒的越来越少,研究学问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越来越多。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北大名副其实地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了。

蔡先生当时声望很高,但不轻视青年人。记得我当时作为一名学生,曾经向蔡提出:北大“中国哲学系”应改为“哲学系”,以便包括世界各国的哲学。蔡先生不因人废言,接受了我这个青年人的建议,后来就在北大成立了“哲学系”,讲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哲学史和哲学流派。另一个例子:梁漱溟比我小半岁,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蔡先生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请梁漱溟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

蔡先生当校长期间做的最骇人听闻的事是开放女禁。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王昆仑的姐姐)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触动了封建主义神经末梢的小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

那时,由陈独秀等主编的《新青年》办得非常吸引人,畅销全国,李大钊同志等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我们学生组织了“新潮社”,由“新潮社”办了一个杂志,名叫《新潮》,与《新青年》相呼应。《新潮》的影响也很大,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内销完,以致再版和三版。那年头,办杂志要赔钱,我们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元培先生请求帮助,蔡就决定由教育经费拨款支持办了 this 刊物。我参加了《新潮》的发起和编辑工作。

创刊时,主编是傅斯年。1919年底,傅斯年出国留学,由罗家伦主编。第二年,罗出国,由我接编。我办了三期,因为北洋军阀政府不发学校经费,学校便不能再给补贴,经费不足;再加上印了不少《新潮丛书》一时卖不出去,积压了资金,才办不下去,停了刊。先后参加过《新潮》编辑工作的还有孙伏园、俞平伯、周作人、康白情、何思源等。《新潮》停刊后,当时主管行政财务的干事李小峰,把《新潮丛书》摆在家门口的地摊上卖,大概卖了不少钱。后来他开了一家书店,取北京大学和《新潮》杂志的前一个字,叫“北新书店”。

北京大学的变化影响到了北京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如北高师、女师、法政专门、俄文专修、高工、高农等,也仿效北大的样子,成立了一些社团组织,有时还和北大合搞一些活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5000名学生游行示威,有32名学生被捕,关在北河沿,其中北京大学就有20名。蔡元培先生本人虽然在五四当天没有参加游行,但他的同情是在学生一边的。他曾经以北大校长的名义营救被捕者,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反动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五四运动得到广大的工人、商人、学生的拥护,他们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以示支持。北洋军阀的头头们害怕弄得不可收拾,过几天就把抓去的学生释放了。

蔡元培先生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这样开明的态度,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1919年2月,他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劳工神圣》的讲演(载《新潮》第一卷第二号),这篇讲演颇能代表他的思想,特抄录于下:

诸君!此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我昨日曾经说过,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

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智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教员、著作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咨议顾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固然蔡先生有勇气,同学们也有勇气,可是北洋军阀的势力也很大。5月4日学生游行示威之后,段祺瑞的有力助手、陆军次长徐树铮就命令他的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示威。在这样严酷的压迫下,蔡先生只好剃掉了留长的胡子,混上了火车,又到了欧洲,校务由他的秘书长蒋梦麟维持了下去。

五四运动时周恩来二三事

凌勉之

我于1912年下半年从河南来到天津，进南开中学补习班学习，1913年夏转入正班学习时，认识了周恩来同志。1917年夏从南开毕业后，我去南方上金陵大学，后退学，于1918年秋去日本，在日本又见到了周恩来同志。我们曾一起在东亚日语补习学校补习日语。

周恩来同志为了投身于国内的爱国运动，于1919年4月从日本回国，大约在6月间回到天津，^①我随后于8月中也返回天津。当时南开学校开始设立大学班，周恩来同志和我进入了南开大学，他学的是文科，我学经济。周恩来同志虽然进入了大学，但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天津的学生运动，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在爱国运动的高潮中，爱国学生与各界人士又发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周恩来同志曾亲自到总商会与商界代表会谈，团结商界共同斗争。在12月间，在南开广场隆重集会，当场焚烧因违法售卖而被没收的日货。这一行动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也吓坏了卖国求荣的北洋军阀政府，更进一步地疯狂迫害爱国学生。

^① 据周同宇同志最近提供的材料：“周恩来同志到津日期，我记得是在‘五四’运动开始以后，但回国日期可能在4月。因为他是先去东北沈阳见伯父以后才到天津的。”——编者注

1920年1月,我带领南开学校的一个小组,共五个人,到针市街一个大布店去检查日货。当我们正在检查时,奸商打电话给警察厅,把我们五个人全逮捕了。

在警察厅,厅长杨以德问:“你们搞这些事是胡闹,到商店检查干什么?他们做买卖,又不犯法,你们家里有什么人?把你们保出去!”我们说:“我们是爱国行动,我们无亲无友,没人保我们,既然被捕,随便你们处理吧!”杨以德暴跳如雷地说:“好!你们还嘴硬,非给你们点厉害看看不可!”于是叫狗腿子把我们送到看守所,一间十几平米的屋子关押了40来人,其中有小偷、流氓、刑事犯,……什么人都有。晚上睡在地上,虽然是严寒的冬天,但里边臭虫、跳蚤、虱子咬得厉害,墙角还有一只尿桶,又臭又脏。反动军阀警厅根本不以人道对待学生。

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同反动政府斗争到底,周恩来同志在1920年1月29日领导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示威运动。愤怒的群众高呼口号,包围了直隶省署衙门,省长曹锐看学生运动来势汹涌,又有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内心恐慌,命令卫兵紧闭大门,不敢露面。接着,曹锐、杨以德指使大批军警,对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并把代表周恩来、郭隆真、于兰渚等四人非法拘捕。

周恩来同志等人后来被扣押在警察厅,杨以德把我们五个人又转押到保安队的一间木棚子似的小屋里,我和一个姓师的同学住在一起,日夜有人看守,不能和其他的人见面。警察厅规定,早晨9点是上厕所的时间,那个厕所很大,一排有十几个格,木格的下面是通的,我们就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传递纸条,互通消息,研究对策。在狱中,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积极开展斗争,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同时还设法和保安队士兵搞好关系,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1920年春节时,杨以德召集我们在一起,说:“过年了!我请

你们吃饺子！”我们谁也不吃。杨以德说：“现在外边已安定了，你们在里面好好过年，有什么事，咱们再商量。”当时周恩来同志站起来气愤地说：“你们这些无耻的军阀，我们不吃你们的饺子，我们要问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是出于爱国行动，日本帝国主义如此侵略欺侮我们，国家要亡了！我们青年学生满腔热血要救国家，难道爱国有罪吗？”问得杨以德无言答对。接着，我们要求审讯，要求大家能见面，要求洗澡。经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在一起谈话、晒太阳和洗澡了。

3月初，外边学校已经开学，周恩来同志提出利用反动派强令复课的机会，向警察当局提出要求审判，要求读书。杨以德出来说：“念书可以，你们开个书单。”于是，我们每人都开了一个大书单子，杨以德一看就急了，气势汹汹地说：“你们是犯了罪的，你们还想在我这开图书馆吗？”

杨以德对外宣传我们被捕学生在警厅中备受优待，为了揭穿敌人的谎言和反动本质，我们接着又进行了斗争。春天了，我们还穿着入狱时的棉衣，3月中旬的一天，我们都把棉衣脱了，要求典当，好换单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撕破他们的假面具，让社会上知道我们的生活真相。杨以德哪敢答应，遂又将我们分别看押，不许见面，我们仍利用上厕所机会，传递消息。后来，周恩来同志决定如不答应立即公开审判的要求，就进行绝食。这一要求被杨以德拒绝后，绝食斗争就开始了。我们一口饭也不吃，一口水也不喝。他们一看，一天饿不死；第二天认为不要紧；到了第三天，嘴上都起了泡，在押的全倒下来了。他们一看不得了，害怕出事，忙对我们说：“你们吃饭吧！有问题可以解决。”周恩来说：“我们爱国无罪！我们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要有爱国权利！你们非法逮捕，我们要求审判，不应长期关押。同意以上要求，就停止绝食，不然一定绝食到底！”杨以德很害怕，这事如闹大了，国内外都

有影响,被迫答应了我们的全部要求,但是他狡猾地不肯签字,我们坚决要求签字,最后他派了一个小头头签了字。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我们才停止绝食。

1920年4月上旬,释放了几个人(我就是这次出来的),然后将周恩来、马千里、郭隆真等都转送地方检察厅,又押了一个多月,直到7月,才被释放。后来周恩来同志等人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我则到南开大学继续求学。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朱 僂

我于 1923 年到 1929 年在北京大学求过学；先父朱希祖从 1913 年起，在北京大学担任过预科教授、文科教授、国文研究所主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史学系主任，直到 1932 年才离开北大。所以我所接触的北大各方面人物较多，积累有关北大的史料也比较丰富。现在先把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1916—1930)就我个人所知道的写在下边。

一、五四运动以前北大的学风、文风

北京大学创办于 1898 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到解放以前已有 50 年的历史。在这 50 年中，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 从 1898 年到 1916 年蔡元培长校为第一阶段，名称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校。

(二) 从 1916 年蔡元培长校到 1927 年张作霖派刘哲改组北大为第二阶段，名称从北京大学又改为京师大学。这 10 年中，是旧北大的全盛时期。

(三) 从 1927 年复校运动到 1949 年解放为第三阶段，名称从北京大学院又改为北京大学。这一阶段中经过抗日战争，学校迁到昆明，与清华、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

在五四运动以前，北大曾在同旧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出现了崭新的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文化生力军，北京大学在这种新的形势面前，又首先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五四时代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河北乐亭人，1888—1927）以及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先生（浙江绍兴人，1881—1936）都曾在北京大学工作过。他们在北大播下了革命种子，数十年来繁荣滋长，使北大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事业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这种文化革命，是在北大内部和外部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而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后来又发生了分化，现在先谈五四运动以前的北大学风和文风。

在蔡元培（浙江绍兴人，1867—1940，清光绪己丑科进士）到北大以前，代理校长是胡仁源（浙江吴兴人，1883—？）。胡本是前清的进士，后来到英国去留学，在推尔蒙大学毕业，专门学工业。1913年，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后来又担任工科学长，代理校长。他所聘请的一些教授，大多数是前清遗老，和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一些所谓名流。在教授中间，有拖着辫子的保皇党辜鸿铭（福建泉州人，1854—1928，教拉丁文），也有封建文人如刘师培（江苏仪征人，1884—1919，曾与杨度等组织筹安会，拥护帝制，为“六君子”之一）、姚仲实（安徽桐城人）、陈石遗（福建闽侯人）、黄季刚（湖北蕲水人，1886—1936）等。在学生中间，也大多是着长袍马褂，捧着水烟袋的遗少，上也者在报章上写写文章，捧捧女伶（当时叫做“女戏子”）；下也者则打打麻将，逛逛八大胡同。学术研究的风气是异常缺乏。

以当时北京大学的文风而论，大约可分为三派：第一派竭力提倡骈文，以黄季刚，刘师培为代表。黄季刚名侃，是章太炎的学生，

他为文必效法郦道元、杨炫之，做诗必取法颜延年、谢灵运，说“颜谢之术、乃五言之正轨”。他当时在《中华新报》上发表的一些诗文，完全是模仿这四家。刘师培字申叔，在旧中国文坛上颇擅盛名，他完全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为文好用古字，也写骈文。第二派竭力提倡古文，以姚仲实、陈石遗为代表，姚氏是安徽桐城人，自以为文章正宗，更提倡桐城派的古文。第三派则主张骈散不分，以为文章本来面目是纯乎自然、只要说理畅通，描写生动，可以用散文，也不妨参用一些骈句。持这一派主张的人较多，先父朱希祖当时为北大文科教授，便是其中之一。他在1917年11月5日日记中写道：

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为三派：黄君季刚与仪征刘君申叔主骈文，而刘与黄不同者，刘好以古文仿今文，古训代今义，其文虽骈，佶屈聱牙，颇难诵读；黄则以音节为主，间仿古字，不若刘之甚，此一派也。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今姚、陈二君已辞职矣。余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太炎）议论相同。此又一派也。

蔡元培到了北大，觉得这种学风、文风有改变的必要，遂决心大加改革。1917年初，首先请陈独秀（安徽怀宁人1879—1942）为文科学长（当时北京大学分文、理、法三科），理科学长复元琛（1884—？），法科学长王建祖（1881—？）。不久胡适（安徽绩溪人1891—1963）从美国留学归国，又被聘请为文科教授。他与陈独秀等共同创办了刊物《新青年》，提倡新文化运动，向旧派开火。钱玄同（浙江吴兴人1887—1939，这时还没有改名，他本名夏，字德潜）又从而和之，刘半农（江苏江阴人1891—1934）也摇旗呐喊，这是所谓新派。先父这时主持国文研究所（当时还没有设系，相当于后来的中国文学系），也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当新旧两派斗争最激

烈的时候,他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发表《论白话文学之价值》一文,赞成白话文学运动。学生方面也创办《新潮》杂志,响应《新青年》,声势十分浩大。于是姚仲实、陈石遗等才不安于位;黄季刚、刘师培也先后去职。北大学风、文风为之一变。这是新派对旧派交锋的第一回合,结果是新派旗开得胜,旧派败下阵来。

二、《新青年》、《新潮》与《北京大学月刊》

《新青年》的前身是《青年杂志》,原来是一种极普通的学生读物。后来经陈独秀主编后,始改名《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新文化运动,遂成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经常撰稿的有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人。当时与《新青年》对立的,在北大有《国故》,在南方有《学衡》杂志,更有林琴南在上海利用《新申报》发表《论史丛谈》,向陈独秀、钱玄同、胡适进行攻击。《国故》以旧派学生为主体,办的并不出色。教员中只有黄季刚在课堂内外对学生骂骂新派而已,但是他向不执笔。刘申叔写了一些文章,但是他只谈旧学,却未还击。《学衡》杂志出版较迟,以南京高等师范的柳诒谋、梅光迪、吴宓、胡先骕为主体。他们代表封建文化,宣扬所谓人文主义,用文言文来批评反驳,不是《新青年》的对手。《新青年》上写文章的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积极地采取攻势,锋芒锐利,猛烈无比。其中以刘半农复王敬轩书最为痛快(王敬轩原是社内“某君”的化名,后来成为公开的秘密)。钱玄同也参加论战,但以发表随感录与通信一类短文为主。这一类短文大多是短小精悍,像一把尖刀似地插中敌人的要害。后来陈独秀于1920年在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散发革命传单,为段祺瑞军阀政府所捕;胡适又分化出来,变成新文化运动的右翼,《新青年》不久也就停办了。

《新潮》以北大学生为主体,它所提出来的宗旨有二:(一)介绍

西洋现代思潮；(二)批评中国现在学术上社会上各种问题。主编是中文系的傅斯年(山东聊城人 1896—1954)和英文系的罗家伦(浙江绍兴人)。傅斯年本是黄季刚派的重要学生之一,这时忽然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变。后来大概由于胡适的关系,学校对于傅、罗办刊物加以赞可,为之垫款印刷发行,前后一共出了三卷。在当时《新潮》算是响应《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多少起了一点作用,但是历史是无情的,20 年不到,这二人都显出了原形了。

第三个刊物是《北京大学月刊》。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性刊物,它是直接在蔡元培提倡之下,由当时北京大学各学门研究所主任轮流担任主编的。在 1919 年 1 月创刊号上,有一张轮流担任编辑的姓名、别号和收稿处所表如下:

- 第一册 朱希祖(逖先)(1879—1944 年)
国文研究所
- 第二册 俞同奎(星枢)(1876 年生)
化学研究所
- 第三册 马寅初(寅初)(1882 年生)
经济学研究所
- 第四册 胡适(适之)(1891—1963 年)
英文学研究所
- 第五册 秦汾(景阳)(1882 年生)
数学研究所
- 第六册 陈启修(惺农)(1894 年生)
政治学研究所
- 第七册 蔡元培(子民)(1867—1940 年)
校长室
- 第八册 陶履恭(孟和)(1887—1964 年)
哲学研究所

第九册 张大椿(菊人)(1882年生)

物理学研究所

第十册 黄右昌(黻馨)(1884年生)

法律学研究所

这一张表,所列的都是各学门研究所主任,在当时都算是“一时之选”。再加上当时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琛,法科学长王建祖;总务长蒋梦麟,教务长顾孟余,便可看出当时(“五四”运动以前)北大教授阵容的大概了。《北京大学月刊》发表学术性论著,有的用文言,有的用白话,代表当时百家争鸣的盛况。

三、废科设系 现代综合性大学的形成

蔡元培的另一措施,是取消过去北大的分科制度,改设 18 个系,直接隶属于校长及教务长之下,使北大成为一座现代综合性大学。这 18 个系和它们的负责人如下表:(有括弧者当时尚未成立)

组一

数学系 前秦汾(江苏嘉定人 1882 年生);后冯祖荀(浙江杭县人 1879 年生)

物理学系 前夏元琛(浙江杭县人 1884 年生);后颜任光(广东崖县人)

组二 (天文学系)

化学系 前俞同奎(浙江德清人 1876 年生);后何育杰(浙江慈溪人 1882—1939 年)

地质学系 前李四光(湖北人 1889 年生);后王烈(浙江萧山人 1882 年生)

生物学系 李石曾(河北高阳人 1882 年生)

组三

(心理学系)

哲学系 陈大齐(浙江海盐人 1886 年生)

(教育学系)蒋梦麟(浙江余姚人 1884 年生)

组四

中国文学系 前朱希祖(见下);后马裕藻(浙江鄞县人
1880—1945 年)

英文学系 前胡适;后陈源(江苏无锡人 1895 年生)

法文学系 李宗侗(河北高阳人 1895 年生)

德文学系 杨震文(河南南阳人 1891 年生)

俄文学系 顾孟余(代)实际负责人俄人伊文

组五

史学系 朱希祖(浙江海盐人 1879—1944 年)

法律学系王世杰(湖北崇阳人 1882 年生)

政治学系周览(湖南长沙人 1888 年生)

组六

经济学系 马寅初(浙江嵊县人 1882 年生);后顾孟余

这个措施,是在 1919 年 4 月经过北大评议会正式通过而实行的。在这以后,又成立了东方文学系(以日文为主),以周作人为主任;最后又成立了社会学系,以陶孟和为主任。至于天文学系、心理学系、俄文学系主任是谁,现已记不清了。此外还有预科,主任是关振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是李大钊,他还在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并在政治学系讲授现代政治。这样,一所现代的综合性大学,便在北京大学的基础上形成了。

四、蔡元培的“兼容并收”政策

蔡元培在 1907 年到德国柏林大学留过学,后来又于 1920 年到 1921 年赴欧洲各国考察过教育,多少受到一点欧洲大陆上自由研究风气的影响。所以他做北大校长,便提出“兼容并收”的政策。只要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成就的,不管你是属于何种派别,不管你站在什么立场,都可以请来在同一学校讲学。于是北大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园地。在政治上极端反动的保皇党辜鸿铭,也居然在讲台上高据一席,和政治上最先进的李大钊、陈独秀分庭抗礼。在哲学方面,许丹、梁漱溟讲印度哲学,张颐(四川叙永人,1888 年生)讲黑格尔哲学,马叙伦讲老庄哲学,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并宣扬他从美国贩来的实用主义哲学。北大教授和学生办的刊物,如《每周评论》、《语丝》、《莽原》、《猛进》、《现代评论》、《新生》……层出不穷。在同一学校里,甚至在同一座大楼的楼上楼下,便可以听见两位教授同时在唱对台戏。

蔡元培开设新课程中最遭受外界批评的,是中国文学系里新设的戏曲小说和哲学系里新设的印度哲学两课。在这以前,我国大学里还没有开过这两门功课。当时上海的《时事新报》对于大学里开起戏曲课来,便曾冷嘲热讽地加以攻击。戏曲最初的教员是吴梅(字瞿安,江苏吴县人,1883—1939),著有《顾曲尘谈》、《霜崖曲录》、《元剧研究》、《曲学通论》等书,本是有名的戏曲家;后来吴梅回到南方去了,便推荐许之衡(广东番禺人 18??—1925)继任。印度哲学起初由许丹(字季上)担任,除了讲佛家哲学以外,还讲婆罗门及外道六师的哲学,不但一些“卫道”的先生们反对,连正统派的佛教也表示不满。许丹本属于佛教密宗,不大愿意教外道哲学,教了一两年,坚决地辞职不干了,随后由梁漱溟继续担任。蔡元培

也感到校内外责难纷至沓来,不好应付,所以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里加以解释道:

吾国承数千年来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闻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兼治宋、元以后之小说曲本,则以为排斥旧文学,而不知周、秦、两汉文学,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其讲座固在也;闻吾校之伦理学,用欧、美学说,则以为废弃国粹,而不知哲学门中于周、秦诸子,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闻吾校延聘讲师,讲佛学相宗,则以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过印度哲学之一支,藉以资心理学伦理学之印证,而无与于宗教,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则也。论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则深以为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当时北大的自由研究风气,的确是经过一番斗争而后树立起来的。有人以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学术界思想界的混乱现象归罪于北大,而蔡元培的“兼容并收”政策实为祸首,认为蔡功不抵过。这是不懂得历史辩证法的妄议。如果没有当年五四运动后百家争鸣的盛况,就不会取得后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所以用辩证法的观点看来,五四运动时代北大自由研究风气的发达和兼容并收政策的实施,也正是历史发展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

五、五四运动侧写

关于五四的研究和报道文章,已经很多,本文只就侧面略加叙述。运动的直接起因,是由于青岛问题的外交失败,北京学生激于爱国义愤,故有“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北大学生于1919年5月4日午后1时,在红楼大操场集合。下午两点钟,和其他各

校学生集会在天安门前广场，列队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到了赵家楼，烧了曹汝霖的住宅，又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北洋军阀派出军警镇压，逮捕了三四十个学生。一时学生罢课，表示反抗，接着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发展成全国性的运动。当天晚上，北京十四校校长，营救被捕学生，要求保释不允。北大校长蔡元培亲到警察厅交涉，愿以一人抵罪。当时的军阀当权派是段祺瑞。他主张严办学生，解散北京大学，更换各校校长。第二天传来消息，说段芝贵等一些死硬派，甚至有“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的说法。于是蔡校长愤而辞职，学生通电挽留。可是蔡元培因为提倡新文化运动，又曾在《新潮》发表《劳工神圣》等文章，久已为当局所忌；恰好这次风潮又发生于北大，当局遂借题发挥，阳为慰留，而暗加压力，并放出空气，说要调廊坊驻军某旅进京来镇压学生运动。蔡知事不可为，遂决意辞职。辞呈已经送出，5月8日晚上11点钟，忽然传来急报，大概是不利于蔡的消息，又说徐世昌已下惩办学生的命令。蔡遂于第二天一早只身出京，在报上留一启事道：

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迄可不休；我愿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这个启事短短几句话，传遍了全国，蔡的声名益大，学生的挽留益坚。北大教授会和评议会于13日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一致决议挽留蔡氏，并推派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为代表，赴教育部请愿；当时教育总长是傅增湘，他也对蔡氏表示同情，向国务院力争，并三上辞呈，后来见形势不佳，也离开了北京，退居到西山去了。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本来无意于留蔡，而且已派胡仁源为北大校长，来接蔡氏的后任。可是北大学生坚决表示反对，双方相持不下。不久运动又扩展到全国，各地纷纷

起来响应。北洋军阀政府自6月2日起,即开始大捕学生,3日并派出军警占据北京大学,这是所谓“六三”案件。后来因各专门学校校长抗议,到6日才把军警撤退。政府终迫于舆论,不得不仍请蔡氏回长北大,并罢免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等三个卖国贼的职务。蔡氏于9月间回到北大,但和北洋军阀到底不能安然相处,1920年10月,遂出国赴欧、美考察教育。1921年9月,蔡回到北京,然以北方政局日非,频频发生军阀内战,不久遂离开了北大,以后虽名义上仍担任校长,实际上不再回到学校了。

六、旧北大的全盛时期

我在1923年夏天考入北大,一直到1929年夏天离开北大。在这六年中间,前四年(1923—1927)是旧北大的全盛时期,当时北方时局虽然犹疑不定,学校经费虽然时发时欠,然而在学术上思想上和言论出版上还是比较自由的。蔡元培虽然离开了学校,而以蒋梦麟代理校长,但是一切制度秉承蔡氏的成规,教授治校,评议会决定一切。全国有名学者教授,齐集北大;而万方学子,也莫不以一登龙门为荣幸。有的远道前来的学生,一时考不上北大,也情愿前来做个旁听生。外国留学生到北大来求学的也颇不少。当时景山东街、沙滩、骑河楼一带小公寓里,住满了各地来的学生。生活虽然艰苦,然而他们各自追求自己的理想,大多都能安贫乐道,为追寻真理摸索前进。

当时在第一院是“三沈二马”的天下。三沈是沈士远(1880—1950)、沈尹默(1882年生)、沈兼士(1894年生),都是浙江吴兴人,而且是三兄弟;二马是马裕藻、马衡(字叔平,1880—1951),都是浙江鄞县人,也是两兄弟。中国文学系的主任便是马裕藻,(字幼

渔),他教小学音韵,著有《戴东原之音韵》一文,和胡适《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一唱一和,共同宣扬戴东原的学说;但是“戴学”在北大,终不若“红学”之走红运。马裕藻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最久,在北大评议会(马神庙公主府银安殿上)24把交椅中,常居首席。但是中国文学系的主任也不是好当的,因为学校里派别分歧,新旧两派的斗争常很激烈,每逢一学年开始,马氏常坐着包车,奔走于各派之间,一面联络旧交,一面网罗新进,还须适应学生的要求,折衷于新旧之间。在“三沈二马”之中,沈尹默虽然是领袖,但是他好居幕后,不大出来讲话;代表这一集团出面讲话的,总是马氏。此外名教授中,钱玄同讲文字形声,后来提倡国语罗马字拼音,在《新生》刊物上发行专号。沈尹默讲唐、宋诗。沈兼士讲小学音韵,说文释义。黄节(字晦闻,广东顺德人,1874—1935)讲汉、魏诗(尤其是曹子建诗)。鲁迅讲中国小说史。周作人讲新文学和东方文学。许之衡讲戏曲。还有刘半农、刘文典(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891年生)、林损(字公铎,浙江瑞安人,1892年生)担任的功课已经记不清了。总之北大的中国文学系,办得有声有色,在国内当时各大学中是首屈一指的。

哲学系的主任是陈大齐(字百年),讲授逻辑及心理学。胡适讲中国哲学史,但是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到第三册,(应该是宋元理学)便写不下去了。另外马叙伦(字夷初)讲老庄哲学,许丹、梁漱溟讲印度哲学,傅铜(字佩青,河南兰封人,1886年生)讲西洋哲学,张颐讲黑格尔哲学,徐炳昶(字旭生,河南唐河人,1886年生)讲欧洲哲学史。胡适于1926年出国赴英、美考察,即离开北大,回国后转任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梁漱溟亦不久离开北大,到山东去搞乡村建设了。所以在这个时期的后半段,北大哲学系的阵容已经比前减弱了。

英国文学系主任本是胡适,后来胡于1926年出国,由陈源(字

通伯，别号西滢，江苏无锡人，1895年生）担任主任，他代表资产阶级反动文学，和鲁迅展开文艺思想上的论争，是《现代评论》派的中心人物之一。该系教授有温源宁（广东陆丰人，1899年生）、罗昌（字文仲，广东宝安人，1884年生）、徐志摩（浙江硖石人，1895—1932）等。德国文学系主任是杨震文，教授有德人卫礼贤、洪涛生；法国文学系主任是李宗侗；东方文学系主任是周作人。这三系学生人数较少，办的都不大出色。

史学系也是北大有名的学系之一，1919年成立时，在国内各大学中首创现代历史学系的课程和规模。过去讲授历史，往往与文学不分，所谓“文史”往往相提并论；现代的史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其基础，所以它和经济、政治、法律三系的联系最为密切。在北大18系中，史学是和这三种科学并列为—组的。朱希祖担任主任，并讲授《中国史学概论》、《中国文学史》；1928年以后，又专开南明史的课程。此外名教授有陈汉章（字伯弢，浙江象山人，1874年生）讲中国古代史，陈翰笙（江苏无锡人，1897年生）讲西洋史，何炳松（浙江金华人，1890年生）讲史学方法论，张星烺（字亮生，江苏泗阳人，1887年生）讲中西交通史，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1879年生）讲元史（后二人系兼任）。

教育学系由蒋梦麟兼任主任，教授阵容也还整齐，该系有许多课程，是和哲学系共同开设的。名教授有高仁山（江苏江阴人，1894—1928）、刘廷芳（浙江永嘉人，1891年生）、董德禧（字禧文，湖北蕲春人，1882年生）等，兼任教员有袁同礼（字守和，河北徐水人，1895年生），专讲图书馆学。

第二院是过去的理科，一共有六个系。数学系主任是冯祖荀，物理系主任是颜任光，化学系主任是何育杰，地质系主任是王烈，天文系主任是秦汾，生物系主任是李石曾。就中以地质系最为有名，教授除西人葛利普外，有翁文灏（字咏霓，浙江鄞县人，1891年

生)、李四光(字仲揆,一度担任地质系主任)、丁文江(字左君,江苏泰兴人,1887—1935)、朱家骅等。

第三院是《现代评论》派的大本营(当然并不是说所有教授都属于这一派),一共分为四系:政治学主任是周览,字鯁生。他是国际公法的专家。教授有高一涵(安徽六安人,1885年生)授政治思想史,陶孟和授社会学,张祖训(字慰兹,江苏吴江人,1892年生)授英文政治名著选读。法律学系主任是王世杰,他是《现代评论》派的首领,在第三院操纵一切。老教授中,除王建祖、顾孟余、马寅初可与分庭抗礼外,其余诸人大都受他支配。王世杰讲授比较宪法,贩卖资产阶级民主学说。另外黄右昌讲法律学,何基鸿(字海秋,河北藁城人,1892年生)讲民法,燕树棠(字召亭,河北定县人,1892年生)讲法律哲学,林彬(字佛性,浙江永嘉人)授刑法。(还有余荣昌、白鹏飞、石志泉、陈瑾昆都在该系担任过教授,所讲授的课程已记不清楚了。)经济系主任是顾孟余,他从事政治活动较多,还兼教务长,不大授课。教授有王建祖讲经济学,马寅初讲银行学,陈启修讲财政学,皮宗石(字浩白,湖南长沙人,1887年生)也讲经济学,周炳琳(字枚荪,浙江黄岩人,1893年生)讲经济政策,余文灿(字育三,广东台山人,1892年生)讲国际贸易,周作仁(字耀生,江苏淮安人,1895年生)讲汇兑等。社会学系成立较迟,主任是陶孟和,教授有谢循初,讲授社会心理学。

北大的预科,分甲乙两部(甲部预备入理科,乙部预备入文科、法科),为大学本部打下基础,办得也很不错。预科主任是关振伯,后来是沈士远。国文教授有郑奠(字石君,浙江诸暨人,1895年生)、张煦(字怡荪,四川蓬安人,1894年生)、朱洪(字兼臣,浙江海盐人,1894年生),国故概要教授有沈士远、单不厂(浙江萧山人);历史教授有李素棻(字革痴,河北阳原人,后任伪天津市教育局局长,成为汉奸),地理教授有郑天挺(字庆牲,福建长乐人,1900年生),

逻辑教授有屠孝实(字正叔,江苏武进人,1893—1932年)。数学教授有赵淞(字雨秋,四川阆中人,1896年生)、罗惠侨等。

北大还设有国学门研究所(第三院),由沈兼士担任主任,招收研究生,并聘请钱玄同、徐炳昶、陈垣及朱希祖担任导师。该所搜存明清大内档案极富,整理研究颇有成绩。北京大学图书馆设在第一院,由李大钊担任馆长,在北京各大学图书馆中藏书之富,也是首屈一指。

这四年是旧北大的全盛时代,当时在北京出版界和报刊论坛上,空气也最为活泼。北大教授们办的刊物,有《语丝》、《猛进》、《现代评论》。文艺界的左翼和右翼,时常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展开论争,引起全国的注意,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回想北大当年

张申府

我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到毕业后留校教书,前后共八个年头。想起北大当年,使我兴奋,令人回味。

进北大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它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产物,是维新派克服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建立起来的高等学府。辛亥革命后,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大学校校长,各科的监督改称学长,原来附属的高等学堂亦改称为大学预科了。

1913年,我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班读书。秋天,跳班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当时的北大设文、法、理、工科和预科,本科设在地安门的马神庙,预科设在北河沿的清代译学馆旧址。

所谓“预科”相当于北大的附属高中,学制为三年(后改两年),毕业后可以免试升入本科。预科又分为两类:第一类预科毕业后升入文、法本科;第二类预科毕业后升入理、工科。它偏重于数学的教学。

我在第二类预科上了一年,觉得并不太吃力,便想去考本科,可是北大的理工科有严格的规定:凡报考本科者,必须有高等专门

学校毕业的文凭。初期读文科的人并不太多,因此报考文科只要求同等学历,并不注重文凭。我升学心切,暑假改了一个名字,考上了文科。

北大文科分哲学、历史、国文学、英文学四个学门(后改称为系),我上了哲学门。照北大原定的计划,哲学门分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三类,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只是混合设立一个哲学门。我虽然入了哲学门,却一心不忘数学。那时,我见知于数学系主任兼代理学长冯祖荀先生,在哲学门不到两个月,又转入了数学门。

可是转了数学门,我又放不下哲学。在哲学门两个月的学习中,时间虽然极短,但眼界大开,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我上的是数学的课,读的却多是哲学的书。从那时起,我主要研究的都是哲学及其有关科目。当然,数学书始终不断在我的涉猎之中,只是数学题从不肯做,化学实验更是绝少动手。

藏 书 楼

我刚进北大时,学校还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藏书楼,设在马神庙校舍后院的所谓四公主梳妆楼里。藏书楼的书可以外借,但没有阅览室。过了一年,藏书楼腾出一些地方,辟出阅览室,阅览桌放在中间,四周摆上书柜,柜里都是西文书。平时总是上着锁,线装书则放在楼上,借阅的人也并不多。我上预科的时候,常常从北河沿到藏书楼来借书,犹记得那时我借的书有德文与法文的《数理科学百科全书》等。一个大学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借读这样高深的德法文书,当时并不很多。这得到了冯祖荀先生的青睐,藏书楼的管理人员由此也给了我许多方便。上本科后,我更是经常呆在阅览室里。那时书本来无多,我可以就架恣意快读,除了工程书以

外,柜里的书几乎没有我不看的。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本装潢精美的书,是一个精装本,1914年美国出版,书名是《我们的外界知识》,英国罗素著。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意思,又坐下来接连看了两遍,真有点爱不释手了。由此我发现了罗素,并对之产生了兴趣。30年代,我一度再任北大讲师,专讲罗素哲学,这也可以说是与北大藏书楼的帮助分不开的。

蔡元培主校

1917年初,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学校厉行改革,出现了新的气象。

蔡先生是浙江人。1868年生,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为壬辰科翰林,时年26岁。蔡先生早年很有才名,他见清王朝已不能持久,为适应时代的潮流,便从事哲学、伦理学等新学的研究。他到过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后来又德国学习。辛亥革命后,蔡先生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后因遭到袁世凯的仇视,被迫再赴欧洲。袁垮台后,蔡回国出任了北大校长,他虽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又是科举出身,但他对破旧创新有锐利的勇气和坚强的毅力。

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旧学旧人不废,而新学新人大兴。他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章行严(士钊)、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陶孟和等任教授,后又聘任马寅初、陈豹隐等。同时,蔡元培还裁减了不称职的教员,排除了一批腐败守旧的人物。经过这番整顿,教师队伍的素质大大提高,给学校带来了蓬勃的朝气。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口号下,当时在校的教员既有宣讲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也有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另外还有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教生物

学,年仅二十三、四岁的梁漱溟先生讲印度哲学等。

蔡先生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培养学术研究的风气,这是他进行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北京大学过去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不少学生以升大学为晋升的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上学不读书,而是想方设法混资历,找靠山,还有的人打麻将、逛八大胡同。与我同宿舍的几个学生,就很少读书,而是聚在一起打牌。

面对这种局面,蔡先生从提倡思想自由出发,举办学术讲座,组织学术团体,例如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蔡元培亲任新闻研究会会长,以“研究新闻理论,增长新闻经验,谋求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邀请李大钊和著名的新闻界人士邵飘萍等到会讲演。同时,一些进步的政治团体也纷纷成立,像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等。这两个团体分别编辑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和《新潮》。我亦参加了这两个团体的活动,并为之撰写了一些短小文章。

蔡先生还发起组织了一个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为基本戒条,针对北大一部分学生的恶习,用这样的方法培养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个组织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旧社会上层道德堕落、生活腐朽的强烈不满。当时进德会在校内颇有影响,入会的人很多,对于北大部分知识分子个人道德的培养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蔡先生在学术上,是以治美学而闻名的。他刚到北大不久,我送他一大本新出版的讲述法国19世纪美学家居友(J. M. Guizot, 1854—1888年)学说的日文书,他很快就看完了还给我。他组织了“画法研究社”、“音乐研究会”等一些课外文化艺术活动来培养学生对美育的兴趣,以贯彻其“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

在蔡元培校长的革新精神指导下,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五四爱国运动

的中心。

李大钊和红楼

1917年底,李大钊经章士钊之荐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

自从蔡元培主校后,北大藏书楼改为图书馆。1918年夏,沙滩的红楼建成,图书馆也搬了进去,占了新楼的第一层楼。李大钊的主任室就设在红楼东南角上的两间房子里。一时红楼成了新思想运动的中心,许多进步的教员、学生聚集在这里读书、座谈。

我认识大钊还是在1916年他到北京后不久。我的一位同学郭小峰与大钊是同乡,他们同是河北乐亭人。经郭的介绍,我们认识了。当时,大钊从日本留学回来,在北京创办《晨钟报》(即后来《晨报》之前身),继后,他又主编《甲寅日刊》。1917年,我曾在此刊物上发表过讲“青年问题”的文章。

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给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李大钊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思想敏锐,博学多识,广泛接触社会,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著名文章。与此同时,他还组织演讲会,邀请名人讲演,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使民主和科学的口号逐步深入人心。一次,大钊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组织讲演会,我也去听了,地点在当时有名的湖南会馆。邀请的讲演者有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李石曾、张继等人。这次讲演会听众很多,整个湖南会馆都挤满了。每个人讲演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大钊组织这次讲演会不久,就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了。

大钊到任后,对图书馆的业务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调整和改革,并开始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

著作。是时，我在北大已经毕业，留校做助教，教预科。平时课程不太多，就在图书馆帮助大钊做些工作。我的工作室标为登录室，在主任室的旁边。其时，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卡片等，我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同志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担任登录工作。由于工作之便，我得时与大钊聚谈。每年北大放暑假，大钊回家乡到五峰山休假，我就代理他在图书馆的职务。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图书馆成了北大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许多激进的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听他介绍新的思想。大家也常常在此聚会，探讨中国的出路，寻找救国拯民的方法。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少年中国学会

1918年6月底，由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一个带学术性的进步政治团体，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还有四条信约：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学会总会设在北京，成都、南京等地还设立了分会。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很多，大多数人希望通过这个组织，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团结进步青年，从事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想通过它寻找中国的出路，但他们往往不能把握现实，陷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中。邓中夏、高君宇、赵世炎、毛泽东以及杨钟健、周太玄、袁守和、朱自清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后来成了国家主义分子的李璜、左舜生、曹琦等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由于学会组织成份很复杂，内部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正式成立于1919年7月。学会出版

了《少年中国》月刊和《少年世界》。《少年中国》由北京会员编辑，一至七期，由王光祈负责。从第八期起，组织了少年中国编辑部，由李大钊、康白情、张申府、孟寿椿、黄日葵五人担任编辑事宜。上海亚东图书馆办理印刷发行。

学会经常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常会，内容多是研究学会的日常工作、与各地分会进行交流等等。

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为了联合进步团体，采取共同行动，全体社员到北京，邀请北京的进步团体举行座谈会。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等五团体20余人参加了这次座谈。

8月16日，座谈会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举行。觉悟社社员刘清扬主持会议并报告了开会宗旨，继由邓文淑(颖超)报告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多来的活动，接着周恩来发表演说，说明觉悟社提出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致答词，他提出各团体有标明主义的必要。认为近年以来，世界思潮已有显然的倾向，一个进步团体，如不标明主义，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就更不能与他人有联合的行动。我也在会上发表意见，极力赞成改造联合。会议决定，由各团体各推代表三人，再次开会讨论联络办法。

8月18日，各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继续开会，议决定名为“改造联合”。并公推我起草“宣言”和“约章”。根据会议的决定和大家提出的意见，我草拟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后经过各团体的讨论，得到正式通过。《改造联合宣言》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集合在“改造”赤帜下的青年同志，认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在

这个联合里,各分子的生活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勤劳而愉快的。要想实现这种大同世界——人类大联合的生活,不可不先有自由人民按他们的职业结合的小组织作基础。我们为渴望此土的各种自由组织一个一个的实现出来,不能不奔走相告,高呼着“到民间去”!

以后《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的第二卷第五期上。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少年中国学会的内部斗争日益激烈,以致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最后终于公开分裂了。

离校赴法

1917年,我在北大毕业,留校三年后提为讲师,继续教逻辑和数学。在此期间,学校从教育部得到一笔经费,决定陆续资送四个教员、四个毕业生到国外学习深造。教员四人是朱家骅、陈大齐、周作人、刘半农,学生中第一人就是我。我报的学习专业是美学,学校却指定我学图书馆学。但是还没有等到学校资送,就又有别的出国学习的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法人士为沟通中法文化交流,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参加了发起和组织工作。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华法教育会的鼓吹和倡导,逐渐形成了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许多进步青年为探求彻底改造中国的真理而踊跃报名。当然有许多人是因为国内军阀长期混战,民不聊生,到欧洲去寻求生活出路的。

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中法大学,但是很缺教授。经别人推荐,他们找到我,我是受聘教逻辑的。其时,蔡元培先生正准备赴欧美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遂约定与

蔡同行。我用“蔡先生秘书”的名义办理了出国手续。

1920年11月下旬,我离开了母校,离开了祖国,登上了旅法教书的征途。

1985年6月2日

五四时期的自由辩论

周谷城

现在就记忆所及,可以举出文、史、哲及政治等方面的几个例子。

(1)关于文学方面的辩论:首有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辩论。白话文,中国原来就有,流行的章回体小说及农民中戏剧唱本,多是用白话文写的。不过五四以前不久,又有人特别强调要用白话写一切文章。当时北京的报章杂志发表的文章,多是白话文,如《晨报》副刊及《新青年》杂志,就是实例。其中发表文章者多是北京大学教授。南京方面,有一种较大的杂志,名叫《学衡》,发表的文章全是古文;写文章的人多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北京的白话文,南京的文言文,两相对峙,俨然唱对台戏。会作古文的林琴南,曾从英文中翻译过许多小说,都是用古文译出的,而且多用词章家的笔调。他挺身而出反对白话文,在报上发表公开信,批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责他不应该把一些写白话文的人留在北京大学里。又有会作古文的章行严,也常根据英国政治家的理论,写一些政论文章,偏偏好用古文写,反对白话文。他一个人曾挺身而出,办一个《甲寅周刊》,以容纳各方面的古文或文言文,专门与作白话文的人对抗。但后来事实证明,白话文是胜利了。

其次有平民文学与古典文学的辩论。这是与白话文言之争同时并起的。提倡写白话文的胡适,曾提出八项主张:“一曰须言之

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话,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赞成的人很多,如钱玄同、刘复等,都是出名的人。他们号召大家读《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等小说。有时也谈京剧改革,并同宋春舫、梅兰芳等讨论改革的方法。钱玄同等曾主张废除京剧的锣鼓等乐器。不过成效并不大。至于用白话写文学作品,那本来早已成为趋势,不过离真正的平民文学还是很远的。当时所谓平民文学,虽不一定是劳动人民的文学,但毕竟与传统的古典文学不同,更与专写帝皇将相、才子佳人,以及专谈风花雪月者不同。大势所趋,古典文学作品渐渐少了。至于大学中文系里研究古典文学,那意义已不同了。

(2)关于史学方面的辩论:这以“古史辨”为最突出。古史辨的重点在疑古辨伪,即大胆怀疑古书的伪造,要求恢复古籍的真相。古史辨也曾成为一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为顾颉刚。顾颉刚在五四运动时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在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也就是有关儒家经典的部门读书时,对儒家经典的所谓古文派和今文派摸索了一番。他发现今文派的攻击古文派,不坚持历史事实却喜欢体会孔子的意见,颇引起了他的疑古辨伪的思想。后与北大教授钱玄同谈起此事;钱是兼通今文和古文的,颇不满今文和古文的偏见。顾颉刚叙述钱玄同的看法说:“今文学是孔子学派所传衍,经长期的蜕化而失掉它的真面目的。古文经异军突起,古文家得到了一点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整理改造,七拼八凑而成其古文学,目的是用它做工具而和今文家唱对台戏。所以今文家攻击古文家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撕破假面,显露真相,是古史辨派的精神。凭这精神,同古书

的伪造者辩论,写出了很多文章。这些文章,我们看到的凡五厚册。疑古辨伪,并不始于五四时代;但五四时代却曾盛极一时。

(3)关于哲学方面的辩论:首有梁启超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时,曾用英文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名叫《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发展史》。所谓《中国哲学史大纲》实即是这本书的中文本。这本书看的人颇多,影响不小,胡适自己在北大文科也颇有声势。法科学生也想找一个适当的人到法科讲讲学。恰好这时,据说梁启超要批评胡适的著作,即被请到北大法科作报告。梁启超以评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为题,曾在北大法科大会堂作了两个半天的报告。第一个半天被批评者没有出席,听讲的人很多,批评也很尖锐。这情形胡适大概知道了,第二天他赶到会场,正当快要开讲之时,即向主持报告会的人请求先讲几句话,并说,“昨天因事,未能来听梁先生报告,很抱歉。本人自小就是读梁先生著作的,受益很多,今天请梁先生多予指正。”然后陪着听完了梁的报告。此后梁在学术界的声势忽又大起来,并又著了许多书,都收在《饮冰室合集》里。

其次有吴稚晖的《箴洋八股》,及评其他哲学著作。吴稚晖是南菁书院的旧人,后又到英国住了多年,很想提倡科学,曾写了类似科学小说的《上下古今谈》。眼看胡适一面写白话文章,另一方面又叫学生读旧书,并曾替学生开过一个很长的线装书目录,很不以为然。于是发表《箴洋八股》的尖锐意见。这意见虽未指明说是警告什么人的,但大家都晓得是警告胡适的。吴稚晖又把当时三本流行的哲学书相提并论,各加以讥嘲,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三分中国思想,却有七分西方思想;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只有三分印度思想,却有七分中国思想;朱谦之的《周易哲学》只有三分中国思想,却有七分印度思想。大意似为:各人都在发挥自己的主张,所标书名,只是幌子。被讥嘲者都没有从正面作

回答。只有胡适后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似为《清代四个大哲学家》，首一名好像是顾炎武，末一名即吴稚晖。文章对四个大哲学家都很尊重，其中一部分似为对吴稚晖的一种客气而钦佩的回答。

再其次有丁文江和张君劢关于人生观的论战。丁谓人生观可用科学来处理，张则谓人生观不可用科学来处理。张意似以为人生观是活的，科学是死的，以死驭活，断断不可。丁意似以为这是可以的。其实他们所讲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我也不甚了解。但有一事是确实的，即对于人生观有科学家的意见，有玄学家的意见，形成了所谓科玄之战。

(4)关于政治方面的辩论：首先有改良与革命的辩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不谈政治则已，一谈政治，就多主张改良。例如胡适，就是主张改良的；当时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他就辩驳，要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意思就是要进行点点滴滴的改良，反对革命或根本解决。这种主张，后来系统地见于《努力周报》。该报主张所谓好人政府，写文章的人有政论家李剑农、高一涵等。至于主张革命或根本解决的，则以李大钊为最突出。他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自始就主张根本解决，反对改良。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说：“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它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做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有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做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后来事实证明，改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才能解决中国问题。

其次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论。当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时,北京也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出现。有一种小型杂志,名叫《自由》,其封面“自由”两字,是署名李煜瀛题的;李煜瀛即李石曾,是无政府主义信徒的首脑。里面写文章的有师复、凌霜等,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又吴稚晖曾写过长篇论文,题目叫《一个新信仰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文中有一句最突出的话曰:“我吴稚晖,即烧成了灰,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吴与李都是要人,经他们提一提,无政府主义思想便也有所活跃,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北京以外,其他各大城市,也偶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出现。例如湖南第一师范便出现崇新学社与安社的对立,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后者是无政府主义的。当时第一师范信无政府主义的颇不少,教师中如夏丐尊、沈仲九、叶鼎洛、王鲁彦、沈俊工等都是的。两个社虽没有明显的冲突,却是明显对立的。其他各地类似的对立也有。不过后来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胜利的,而且一直发展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唯一思想。

以上几种辩论,只是极少的几个例子。“自由辩论”,即在今日的学术界,仍值得提倡,故特举出于此。

(原载《复旦大学学报》1979年第三期)

新中学会纪要

杨扶青 李峰 张芥尘 于树德

新中学会诞生的时代背景

新中学会诞生于辛亥革命果实被军阀篡夺以后，五四运动发动以前。当时中国人民正处在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重重压迫之下，人民生活日益困苦，人民权利毫无保障，国家则更深地陷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当此内忧外患严重关头，具有革命性和富于政治感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首先对现状不满，首先要求改革，首先起来组织团体，奔走呼号，进行爱国主义的斗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新中学会就在这种环境之下，于1917年诞生了。

新中学会成立之时，十月革命的炮声还没有响起；待响起之后，它的正确消息被封锁，歪曲消息被传播，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十月革命的意义还不甚了解，还没有立即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领导思想，还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普及教育、振兴实业以救国家等爱国主义的范围内兜圈子；虽然也有少数人接触到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但对科学的社会主义则还没什么接触。新中学会当然也不例外。

和新中学会同年诞生的，性质也很相近的，还有一个少年中国学会。新中学会和少年中国学会由于李大钊的介绍，联为友会。

他们都以反对军阀专政、卖国,反对列强侵略掠夺,主张刷新国内政治等爱国主义,号召青年,组织青年,对于后来的五四运动,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较多,而且会址和主要会员都在北京,所以它对五四运动的影响比较显著。新中学会强调学术救国,会员较少,而当时的会址和主要会员又多在东京,因而对五四运动的影响比较小;不过在天津的会员如周恩来、凌勉之等,曾轰轰烈烈地领导过天津的五四运动。

新中学会的创立

1917年春,童冠贤、高仁山、刘东美、陈铁卿、杨伯安等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相偕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他们深切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一举一动,莫不在侵略我国家、奴役我人民;而国内的军阀政客,醉生梦死,只知卖国求荣,不顾人民死活;深感到国破家亡、民族覆灭的严重性。他们每逢星期日,就聚在一起畅谈国家大事;有时伤心悲泣,有时怒发冲冠,有时相对默坐,有时拍案大叫。暑假期间在热海避暑,在海滩上也经常纵谈国家大事,大家都忧愤填膺。当时童冠贤、高仁山提议组织团体,借以敦品励学、积极救国,并引三杰复兴意大利的历史故事,以自勉励。暑假期满,他们回到东京,就同杨扶青、李峰、黄开山等,创立新中学会,起草会宪,物色会员;那时马洗凡虽在国内,因为事前取得联系,也列为创立人。

新中学会的会宪和宗旨

新中学会的章程称为会宪,就是会的宪法的意思,表示会章的严肃性,号召会员严格遵守,贯彻执行。又规定以“赤心”为会徽,

表示赤心肝胆,为国为民,为本会的事业努力奋斗,同时也含有热烈、勇敢和会员们赤诚相见的意义。

会宪规定会的名称为新中学会;规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所谓刷新中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改造中国,很明显它是一个政治性团体。新中学会既是一个政治性的团体,为什么又以学会相标榜,而不用政党的名称呢?这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表面上自命清高,薄政治而不为,而实际上是因为当时国内各党派、各政团闹得乌烟瘴气,为社会人民所齿冷,所以避开党派名称而用学会的名称。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少年中国学会也是一样。

新中学会的政治思想,当时是很模糊的,只是激于爱国的热情,对当时的政治不满,想要改革一番。至于如何改革,则没有明确的政治路线。会宪中所谓以科学方法刷新中国,只是很笼统的一句话,并没有具体的内容。其含义是科学万能、科学救国,实质上是施用新技术,开矿设厂,富国强兵,所追求的不外乎资本主义民主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当时会员们对于这句话并没有既深刻又一致的共同理解。只因为大家都是爱国的青年,而且都在学习一门科学——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回国后都可以运用所学,从事所谓救国。所以在政治主张上和气相处,很少争论。当时吸收会员最着重条件,是个人的品行和私人间的情感;所吸收的会员大都是志行纯洁,有守有为,与某些会员来往密切、感情笃厚、相知有素的人,对于这一点是抱宁缺毋滥的态度的。入会后,如果发现私生活不检点,还是要严肃对待的。曾有一个会员在日本搞女人,又有一会员耽于玩乐,既不认真读书,又不关心国事,都被开除了。但是对于政治倾向是否一致,则不甚注意。

新中学会的组织领导

新中学会既没有会长,也没有执行委员会或理事会一类的集中领导组织。开会时公推一人为主席,大概都是比较年长的。会内具体事务,按照实际需要,推举一人或二人以上的干事担任。如总务工作推举执行干事担任;编辑工作推举编辑干事担任;会计、出纳工作,推举财务干事担任。这些人都是事务人员,而非领导人员。至于会议都是少数服从多数,而且大都是大家协商无异议后通过,很少付表决。但新中学会的实际领导人,为大家所公认者,则是董冠贤、高仁山、马洗凡等。他们是新中学会的中心人物,会内一切大事,事实上都由他们决定。

新中学会的会员和组织生活

新中学会创立于日本东京,初时会员以留日学生为主,就中以出身天津南开中学、天津法政学校的同学为多。后来发展到国内各学校,发展到留学美、英、法、德各国的学生中。

新中学会创立初期,会员的组织生活是相当严格的。那时在东京租定早稻田雀卷町 12 号为会址,题为“新中寄庐”。每星期日的上午,举行会员座谈会。先是每人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自己的学历志愿等,后来就座谈国家大事、个人的学行感想等。如在凡尔赛会议期间,经常讨论凡尔赛会议有关中国的问题,再就轮流座谈个人一周来的读书心得,或作学术讲演等。为了纠正不遵守时间的恶习,乃规定准时开会、准时闭会、无故不许迟到早退,并决定凡无故迟到者应自觉地站立一旁,必须等主席招呼后,方许就座。这种规定曾一度严格执行。

后来又在早稻田租了一所较大的房子,约十七八间,作为会员宿舍。除事实上确有困难者外,决定大家都搬到宿舍居住,过集体生活。为了锻炼劳动生活和养成节俭习惯,凡宿舍内一切清洁卫生、烧饭、洗碗、采买、看门等,都由会员们轮流担任,不雇用人;并实行一饭一菜制度。为了发挥会员间的互助精神,各人所有现款都一律交公存储,大家按需要支用,不许浪费。此外由经济比较充裕的会员一次或分次交出定额互济金,帮助有困难会员的学膳等费。1918年,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天津水产学校校长孙子文、教育总长范源濂等,访美回国路过东京时,曾到“新中寄庐”参观并进午餐;这次午餐,就是由会员马洗凡、周恩来、李峰等自己烧的。张氏等都称赞这种集体生活是新中国、新社会的开始。

1919—1921年间,东京的会员,或毕业回国,或转往欧美留学,遂分别在美、德、法、英各国成立新中学会分会。又因东京会员减少,乃把总会移到北京,租定鲍家街27号为会址。这时在京会员不过三四人,又因为各有自己的工作,会务仅能维持;没有什么发展。会员们的团结精神虽依然如故,而集体生活则不如在东京的时候了。

总计全体会员,共有50余人,分布在国内外。1923年后,留英美、美的会员分别回国,在北京、天津各大学工作,京津会员人数渐多,会务仍未能有很大的发展。这时已是大革命的前夕,会员的政治思想就逐渐分化了。

北京总会每年开年会一次,除在京会员外,多有从外地赶来参加的;每次到会人数约在20人左右。会刊在东京时曾印行过两三期,在北京又刊印了四五期,封面上套印一红线心形,其下为会刊的目录,如论著、译述、会员通讯之类。1926年停刊。会刊只赠送给会员们,不向外发行。

新中学会有关的事业和活动

新中学会虽没有明确一致的政治思想,但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国家,则是全体会员们的一致愿望。会员之中,有的学政治,有的学经济,有的学商业,有的学理化,有的学技术,有的学教育,有的学银行……他们都想学成后对中国有所建树。其中有些人毕业回国后,在学术上或在工作中,多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现在谈谈和新中学会有直接关系的几种事业和活动。

一、艺文中学 新中学会为了推行教育救国的方针,原计划创办一所艺文院,其中包括自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以及博物院、图书馆等,首先办一个艺文中学,以树立基础。推举高仁山、薛培元、陈翰笙、查良钊等组织董事会,并推查良钊为董事长,高仁山为校长,于1925年8月开学。艺文中学采用道尔敦制,即学生学习以计划、主动、讨论为主,教师多方辅导的教学方法。其办法是由教师编定各科教学大纲,学生按照大纲中每日计划学程的进度,填写作业表,经教师批准,即进行学习。每日由教师主持讨论并解答疑难。经过多年实验,成绩极为显著。该校师生对于爱国运动也都热心参加。1926年“三一八”运动时,全校师生列队参加,学生陈时芬牺牲,教师顾淑型受伤。校长高仁山也因参加属民革命运动被捕杀。高仁山牺牲后,由薛培元、李鸿敏、查良钊、顾淑型等先后担任校长,继续维持发展,并增设幼儿园、小学和高级中学。小学采用设计教学法,注重观摩实践,和中学的道尔敦制相衔接。七七事变后,校长和主要教师均离校,校务由留校教师维持,道尔敦制和设计教学法始被放弃。解放后,1952年由北京市教育局接管,改为第28中学。

二、新中罐头食品公司 新中学会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于1920年，由会员杨扶青先后招股20万元，创办一个罐头食品公司。新中学会也入了一部分公股，以学会的名称命名为“新中罐头食品公司”，以学会的会徽“赤心”为商标。公司设在河北省盛产水果和海产的昌黎县。在昌黎经营18年中，几经军阀混战，股匪骚乱，暴日入关侵扰，公司收容妇孺，资助青年学生读书就业，参加社会活动，一直坚持到七七事变结束。该公司的股东限于工、农、商、学界，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业救国的典型组织。它采用了很多的对劳工改良主义的措施。如该公司以勤俭诚爱为信条，以烟酒嫖赌为戒约，经理、技师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工作；每餐一饭、一菜，全厂18年如一日。公司附设小学和工人业余学校；组织职工友爱会：凡职工遇有婚丧疾病，均赠以礼物和费用，职工因公致病，由公司负责治疗；职工互助会：由公司捐助互助基金，职工遇有急需或困难时，可以暂借济急；职工储蓄会：职工按薪金储蓄10%到25%，公司赠储半数，满10年后可提取全数，用以独立经营事业。在当时起到了一些良好的作用。

三、天津工余补习学校 1921年，安体诚、于树德由日本回国，在天津法政学校担任教员。他们在日本京都大学受到日本社会主义学者河上肇的教育，认识到劳工运动的重要，乃联合同志创办天津工余补习学校，招收工人和学徒，给以国语、算术及时事常识等教育，并灌输劳工运动等知识。后来安体诚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学校就成为共产党在天津领导工人运动的基地了。

四、参加远东民族会议 1921年冬，列宁在莫斯科召开远东民族会议，目的是促进远东各国组织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进行民族革命运动。到会的有中国、日本、朝鲜、蒙古、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布勒亚特蒙古（西伯利亚的一个民族）。中国方面委托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负责组织人员参加。当时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应邀参加者

数十人；于树德也代表新中学会应邀参加。那时他是新中学会的执行干事。

新中学会的解体 and 分化

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特别是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无产阶级参加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后，中国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达于高潮。全国各地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参加革命组织。在这种波涛汹涌的革命大风暴中，每个个人和团体都必须表明其政治立场——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那种在启蒙时期政治态度暧昧不明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这时候也不得不表明其政治立场。大势所趋，新中学会自然也不能摆脱这样的命运。

1924年童冠贤、马洗凡接受了英国学者拉斯基的政治学说，想把新中学会改组为一个拉斯基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从德国寄回一个新中学会会宪修正草案，请国内会员在年会时讨论通过。当时会员之中，周恩来、安体诚等早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实际地参加了国民革命运动；其他会员有的已另有政治结合；有的埋头从事于实业或教育；有的并不明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义；有的事实上已与新中学会脱离关系；因此大家对会宪的修改，都不怎么感兴趣。当1924年夏季，年会通过会宪修正草案时，于树德当场声明不能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要求出会；全场会员因激于多年来的感情；且深深感到新中学会解体分化危机的到来，都不禁失声痛哭。1924年后，虽勉强举行过一二次年会，都是无精打采而散；从此新中学会就无疾而终了。

由于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各人的政治思想逐渐明朗化，因而新中学会解体，多数会员分别投入各种政治团体，从事于革命的或反

革命的政治活动了。

〔附注〕 1926年童冠贤、马洗凡等加入国民党，曾联合一部分人组织“新中革命青年社”，成为国民党内的一个派系，不明真相者称它为“新新中学会”，其实与新中学会是两回事。

(1961年3月)

回忆《新潮》

俞平伯

1918年秋至1919年底，我正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即现在的“中文系”）读书。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我参加了当时北大学生组织的新潮社。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但那时中国人民的觉悟还不很高。我国人民新思想的真正开源之时，应该说是1917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有一份宣传新思想最有影响的杂志《新青年》，是北大的名教授们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办的。《新青年》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了舆论准备。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918年下半年，北大文科、法科的部分进步学生组织了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为《新青年》的友军。新潮社设在沙滩北大红楼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里，与北大图书馆毗邻。参加新潮社的有：法科同学汪敬熙、何思源；文科的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顾颉刚、江绍原、康白情、李小峰、孙伏园、俞平伯。因年久，我已记不得谁是主编了。我们办刊物曾得到校方的资助。校长蔡元培先生亲自为我们的刊物题写“新潮”两字。英文名 Renaissance，是“文艺复兴”的意思。

《新潮》和《新青年》同是进步期刊，都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赛先生”（即 Science，科学）与“德先生”（即 Democracy，民主），但在办刊方向上却稍有不同：（1）《新青年》偏重于政治、思想、理论论述；《新潮》则偏重于思想、文学方面，介绍一些外国文学。（2）《新青年》内部从一开始就分为左、右两派，斗争激烈，直至最后彻底分开；《新潮》的路线相比之下则稍“右”一些。

我参加《新潮》时仅 18 岁，知识很浅。由于自己出身于旧家庭，所以对有关新旧道德的讨论比较注意，曾写一篇有关新道德的文章。顾颉刚写过论述家庭的文章，怕自己家里知道，署名“顾诚吾”，在《新潮》上发表。

《新潮》的政论文章不太多，大多数是文艺作品，我那时初学写新诗和白话小说。我最早的一首新诗《北河沿之春》发表在《新青年》上（其时尚未有《新潮》），记得中有四句：

双鹅拍拍水中游，
行人缓缓桥上走，
都说春来了，
真是好气候。

我发表在《新潮》上的第一首新诗是《冬夜之公园》，描写当时北京的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以后又写了描写天津海河的新诗《春水船》等。我还写过两篇白话小说：《花匠》和反对妇女守节的《狗和衰章》。《花匠》曾被鲁迅先生编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里，说的是花匠修饰花卉，把花的自然的美完全破坏掉了。这是一篇反对束缚的文章。这些早期的作品现在看起来是很幼稚的，因为那时年纪很轻，思想里并没有明确的反封建的意识（我们当时对“封建”的理解是分封诸侯的意思，与今天不同）。尽管如此，这里面实际却包含着反对封建、要求民主的思想。

1919 年我从北大毕业，随即离京回南，以后就出国留学。《新

潮》在我离开后仍然接着办,后来还出了几种丛书,但具体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

五四运动中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潘世纯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激于爱国义愤,汇聚天安门前举行集会,提出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随即列队示威游行,火烧曹汝霖住宅,总毆章宗祥。北洋军阀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镇压学生运动,并抓去了学生30多人。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就是这样爆发的。当晚,这个消息便传到天津,天津中等以上各学校学生,群情忿慨,立即奋起响应。只经过一天联络,5月6日,各校学生即组成天津临时学生联合会,作出统一部署;5月7日,各校学生乘“五七”国耻纪念日机会,走上街头,为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举行集会、请愿及示威游行。又经过几天酝酿,5月14日,各校学生正式组成天津学生联合会;5月25日,各校女学生接着组成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会并肩战斗,从此五四运动在天津也和全国各地一样,风起云涌,蓬勃展开,并以两会为核心,各界人士包括知识分子、工人、爱国工商业者、店员及宗教界,也都组织起来了,6月18日,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从此,五四运动在天津,更加轰轰烈烈,声势越来越大,力量越来越强,斗争越来越激烈。

正当这个时候,周恩来同志从日本弃学归国,回到天津。他于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中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这次为赴国难回

到天津,立刻投入爱国斗争。自此以后,他以出众的组织能力和卓越的领导才干,在天津的这次爱国斗争中,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作出非凡的贡献。

周恩来回到天津不几天,天津学生联合会为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加强各校学生的联系,进一步唤起民众,继续揭露反动政府的卖国阴谋,决议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作为自己的喉舌,以便通过自己的报纸,说出自己的话。

天津学生联合会既决议创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首先接受邀请承担主编的任务。1917年我同周恩来在南开学校中学毕业分手后,即去南京入金陵大学;当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我也从南京赶来天津。见面之后,便被他邀为助手,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此外,他还找了几个同学,有赵光宸、胡维宪及薛撼岳担任采访等工作。

7月12日,周恩来亲撰了一篇《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旨趣书》,在各大报纸刊出,立刻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其中主要提出:

……日本的“米骚动”风潮,朝鲜的独立运动,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我们学生感受这种潮流……实在不能不有个觉悟……

可是社会团体受这环境的影响同束缚,不能直接将意志表出,所以我们学生惟有不顾利害,先动起来……我们学生联合会在求社会同情的时候,不能不有两个利器:一个是演讲,一个是报纸。演讲、报纸全是表我们学生思潮的结晶。现在演讲已经实行两个多月,报纸还没有组织。求社会同情的利器终久不算完全。所以联合会本着自动的精神……预备定期发行日刊。

我们学生思想学识的程度实在不敢说办报,不过拿我们

的意见贡献于社会同大家讨论。至于一切的研究还是须求社会的帮助指导,我们以便共同得着大家新生命的所在。一、联合会日刊,是学生联合会的舆论机关,所以必须同联合会一致始终;二、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三、联合会日刊完全是学生自动的组织;四、本民主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五、学术研究的发表,不分派别,但以稿件合于社会的进步作标准……八、新闻的记载有关于社会生活人类进步为范围,并且力求敏捷;九、对于社会生活同各种学术,用哲学的眼光,科学的分析,下公允正确的批评……十一、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十二、文艺的登载,以切合人生为范围……十四、联络各新闻报纸同各通讯社交换新闻消息……十七、代表全津学生的舆论……

这篇旨趣书的发出,标志着《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即将出版,各校男女学生,无不奔走相告,兴高采烈,表示拥护;各界人士,也都热情支持,纷纷向天津学生联合会询问什么时候出版,要求订阅。

周恩来和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受到这番鼓励,更加奋勉,投入紧张的筹备工作。为了尽快出版,三个先决问题相继得到着落:第一个是立案问题;第二个是经费问题;第三个是印刷问题。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出版,首先要取得警察厅的立案,始准发行,而警察厅为维护反动政府的立场,当然不会轻易答应。因此,当提出申请时,警察厅主管人员便摆着官架,哼着官腔说:“我们研究研究,回去等着罢!”显然这是一种推托之词;我们则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不怕对方刁难,据理力争,不断催促,不达目的不止。办报为当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许可,警察厅没有理由公然拒绝立案,尤其是当时学生爱国运动方兴未艾,慑于群众的威力和舆论的谴责,虽仍不肯明文准许,却不能不予以默认。因此,立案问题便被搁置一边了。

接着就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经费,还没有着落。这个问题是从两方面下手解决的:一方面由南开学校新剧团举行义务公演,全市人民激于爱国热情和对学生们壮举的同情,争先恐后踊跃购票,每场戏票几小时内便销售一空;一方面通过社会关系招揽广告,爱国厂商多愿付出高价刊登广告,借以资助。依靠这两项收入,已初步可抵开支。

最后便是印刷问题了。因为没有自置印刷设备的条件,只有找承印的地方。当时南开学校老师仇乃如的哥哥在南市荣业大街开设协成印刷局,经过仇乃如从中奔走,协成印刷局愿接受承印的业务,并给以便利,特别是协成印刷局工人听到接受承印爱国报纸,无不振奋,表示全力支持,保证要多少印多少,决不延误。

三个先决问题既都有了着落,立即转入着手发刊的工作。先在各大报上刊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出版预告:“本日报的发行旨趣书已经发出,想大家当已看过。现在本日报外面的接洽同内面的组织均将办好,所以现在择定于阳历7月21日实行出版。日报的内容约分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八大栏,每日出一大张……”

出版预告登出后,来自各处的订报函件,就像潮水一般涌进天津学生联合会,截至出版前一日,订户即近两万。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其中不仅有学生、教员,还有工人、店员、职员以及家庭妇女等。不仅有天津的订户,还有外地甚至南方的订户。有一封订报的函件特别声明,他原来订阅别的报,现在决定退订,改订《学生联合会报》,最后并恳切要求:“务请寄来,勿负热望……”

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终于以崭新的、战斗的姿态与世人见面。周恩来亲撰社论《革新、革心》作为发刊词,提出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响亮口号,对当时五四爱国运动的坚持和发展,

对提高广大学生的认识和觉悟,都是一个很有力的推动。

各校学生争先恐后承担《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卖报的义务。首先得到电车工人的大力支持,凡是卖报学生乘车概不要票,并都愿让学生在自己车上卖报。电车公司是比国经营的企业,比国经理知道后,大发雷霆,竟下令:“凡售票员不让卖报学生买票者,一律科以罚金。罚金数额按原票价的两倍……”电车工人群起抗议,并为此举行怠工,全市电车一律停驶,迫使比国经理只好让步,“收回成命”。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出版后,受到各校学生和各界人士的普遍欢迎,争相抢购,不少学生都走上街头卖报,拿去100份立刻售光,经常供不应求,买报的人不胜遗憾地说:“怎么不多印呢?”因此,有很多人自动捐款要求多印,有的捐款人甚至不愿说出自己的姓名,实在令人感奋。

编辑部就设在南市协成印刷局的一间小层里。从汇集新闻到组织文章,从排版到校对,都由周恩来主持,重要报导和言论都亲自执笔,我则担任些辅助工作,其余三人主要从事外勤采访工作。每日下午四五点钟,有时三四点钟,周恩来和我就到编辑部开始工作,直至深夜一两点钟以后,才能完成编排,进行校对;有时还要讨论问题,同工人研究标题、拼版及使用标点符号,帮助工人搬运报纸,裁叠报纸,以及参加操作印刷机等,经常通宵达旦。在这些日日夜夜里,周恩来和我在同学旧谊的基础上又结下战斗的新谊。我还记得当时周恩来家住河北元纬路元吉里四号,从南市回家要走很长一段路,每天工作完毕,已天将破晓,听到街头上喊出“看《学联合会报》”的卖报声,始能迎着晨曦步行回家休息。睡不了多久,他便又出来继续从事学生联合会的爱国活动。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首要特点,就是密切配合了当时的爱国斗争。1919年,从7月1日起,山东学生因反对日本人在山东挑

衅,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全省人民都起来支援,声势浩大,北京政府为了镇压爱国运动,竟于7月25日宣布山东戒严,派济南镇守使皖系军阀马良为戒严司令,大捕学生。8月5日,马良又屠杀了回教救国后援会领袖三人,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立即派出外勤,遣赴济南深入现场采访,及时地报道了上述血案真相,激起爱国人民的无比愤慨。8月8日,并以《速逐残害回教徒的马良,速要求北京政府取消山东戒严令》为题,揭露马良镇压民众媚日卖国、充当安福派爪牙和日帝国主义鹰犬的狰狞面目,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行动起来,对马良举行“国民公判”,形成强大的舆论威力,在天津进一步掀起学生和各界人士的爱国高潮。8月23日,天津以学生为中心结成的各界代表,偕同山东代表前往北京,会同北京代表齐集北京总统府门前示威请愿,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刽子手马良。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代表们坚持斗争达三天三夜之久,8月25日终于全部被捕,押进北京警察厅,《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随行外勤也遭逮捕。当晚,《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出号外,万人争购,街头喊声一片:“看学联合会报号外,政府决心与民为敌,请愿代表全部逮捕!”像战斗号角,召唤人们起来继续斗争。跟着天津人民积极组织力量,投入战斗,26日,派出第二批代表,27日派出第三批代表,28日,派出第四批代表,相继赶至北京,向反动政府展开猛烈进攻。这期间,周恩来除在天津与各界领导人共同商讨行动计划,指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紧密配合斗争外,还亲自赶到北京,做了大量工作。北京反动政府在声势浩大的群众压力下被迫于8月30日后分批释放被捕代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又及时地发出号外,详尽报道,使这一胜利的喜讯传遍大街小巷,有力地推动着五四爱国运动在天津继续发展。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另一特点,就是始终坚持抨击反动政府。当时反动政府由安福派当权,安福派后来习称安福系,是由以安福

俱乐部为中心一群投靠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组成。安福俱乐部设在北京,初在安福胡同,后迁太平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针对北京反动政府出卖国家权益、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行,向安福派开火。如8月6日,发表了《黑暗势力》一文,大声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愈来愈多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依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等等。怎样推倒安福派呢?8月9日,接着发表了《讨安福派的办法》一文,集中指出:“天天打电话,发宣言书,上请愿书,骂‘安福派’是推不倒安福派的”、“‘捉贼同贼窝里人讲话’,一定不能达到目的”、“安福派依然稳固在北京太平湖,安福派的人依然‘到处横行’”。究竟应该用什么办法去讨呢?“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发动力,第一是学生应当鼓动各种分子快快成立各种组织,各种工会、同业公会,尤其要紧;第二是男女学生天天出外演讲内政外交的黑暗,国人当求根本的改造;第三是公民大会,应当看着时机聚会,好让国人对于国事知道真相。”并且要“罢工!罢市!不纳税!罢课!”同时还要全国紧密团结,互相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推倒安福派及其所依仗的首领、请来的外力——帝国主义势力。

正因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号召学生和各界同胞采取罢课、罢工、罢市、示威游行等各种有效方式,积极参加爱国斗争,无情揭露敌人阴谋,反动当局自然视为洪水猛兽,万分恐惧。当时,北京政府便如此咨请直隶省长曹锐:“兹查阅8月25日、28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载有让各省速派各界公民代表来京请愿及做群众运动的事,罢工、罢市、不纳税、不当兵;又载有联合会致各处电文,望全国一致,互做声援等语。核其文字语意,实于公共秩序安宁显有妨害,应请查照本部通咨转

飭警察厅,依法处理。”9月21日,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据此便以武力威胁协成印刷局不准继续承印,并以尚未经正式核准立案为理由,强制停刊。

当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被迫发出号外,宣布暂时休刊,立刻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援。经过不屈不挠的奋斗,10月7日终于复刊,并登出《本报继续出版的布告》,宣称:“在本报休刊的号外上,已经说过,本报是天天在奋斗里讨生活的,又岂能因为杨以德干涉印刷局,因为杨以德不予立案,我们就不去同他奋斗。我们办事是秉着良心去做,光明正大,没有一点退缩的。现在学生的奋斗是一天急似一天,我们靠着传布消息的会报,是断断不能再噤若寒蝉的歌着不去尽他的责任。”同时毫不畏惧地表示:“杨以德看我们做‘眼中钉’,看见我们的形影又在社会上飞走,不知又有什么鬼计,来阻止我们,总之我们必定拿我们的全力,去同他奋斗。他不能禁止我们人民存在,我们必定想法尽我们的责任。”复刊后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由日出一大张改三日出一张半,然而战斗性却更强了,它明确提出:“集世界大事,作为系统的记载,引着国人注重世界大局的潮流,打破狭义的国家范围。”因而在组织稿件上,重视选择“有关世界新潮流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

当年,《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共出一百几十号,第一百号还出版了一个专号——“奋斗号”,每日行销多到两万份以上,不仅在天津畅销,而且在外地,如北京、上海、南京的销路也不小,经常供不应求。北京《晨报》曾给以极高评价,寄以热情期待,并大力支持供应稿件。南京出版的《少年世界》还发表过专论说:“《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办得很有价值”,在天津“有这种新曙光,令人十分快乐。记者敢希望把这种光照遍了全中国各处,群起效法……”上海出版的《新人》也发表过长文说,《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办得“很有精神”,

“更为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色。敢说是全国的
学生会报之冠。”

1979年1月

1979年1月

1979年1月

《浙江新潮》的回忆

倪维熊

随着五四运动在全国展开,出现了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标志的文化革命。当时杭州青年学生也不例外地响应而投入这一伟大运动,《浙江新潮》就是在这历史洪流中的一个先驱刊物。

在杭州青年学生中最早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书刊的,是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部分学生所组织的书报贩卖部,当时《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在各个学校中都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浙江新潮》的诞生,与这个文化传播站有着密切的关系。

1919年9月间,省立第一中学学生查猛济、阮毅成、阮笃成等与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生沈乃熙(即沈端先,后称夏衍)、蔡经铭、孙锦文、杨志祥、倪维熊等合办了一个以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思想为主旨的半月刊(铅印八开),刊名《双十》,于1919年10月10日创刊。发行两期后,第一师范学生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傅彬然、张维湛等10多人参加合作;宗文中学学生也有2人参加;共计有27人。还有工业学校毕业同学汪馥泉、褚保时参加写稿。阵营一扩大,力量增强,就改名为《浙江新潮》,扩为铅印四开报,改为周刊,每星期出版一次。社址设于平海街原省教育会楼下一间耳房,编辑发行,都在一室之中。这个社址是通过在省教育会主编《教育潮》的沈仲九帮助而借用的(《教育潮》是以介绍新教育思想、批判

旧教育思想为主旨的进步刊物,并首创横行排印文字)。印刷由原印《双十》的浙江印刷公司承印,是通过阮毅成的父亲阮性存介绍的。写稿大家执笔,编辑轮流负责。

第一期创刊于1919年11月1日。《发刊词》提出了改造旧社会,实现理想中的“自由”、“互助”、“劳动”的新社会的战斗目标,强调知识分子必须和劳动者联合。在这一期里,有傅彬然写的《学生今后的针应怎样》;汪馥泉写的《寄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的主笔》,对三报提出了犀利的批评;此外,有汪馥泉、查猛济的新文艺,夏衍(当时署名宰白)、倪维熊(当时署名V·Y·生)的随感录。紧接着,我们又出刊了第二期,内容即有震动一时的施存统写的《非孝》一文。这一期我是参加编辑的。发稿后,施存统还要看一看原稿,我同他一起到印刷公司去,施把所有的稿又作了一番修正。发刊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军阀政府和省议会的议员老爷们大为震惊,认为这是洪水猛兽、大逆不道的邪说。在省议会里一片喧嚷,要找出一个“罪魁祸首”来,他们以为宣传邪说的是一师学生,一师教员中又有提倡新文学反对旧礼教的当时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一师校长是经亨颐(子渊),于是攻击目标就集中于经。一面在省议会里酝酿着对经的所谓“弹劾案”,一面由省政府查封报社,并将浙江印刷公司正在排印的第三期底稿全部搜去,已排好的版子也勒令拆毁,并责令印刷公司的经理周佩芳具结不准再印。当时督军是杨善德,省长是齐耀珊,教育厅长是夏敬观,省会警察厅长是夏超。

反动派这样的凶暴压迫,却吓不倒我们这一群小伙子。我们就推杨志祥携了重写的第三期稿件到上海去,向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的沈玄庐(定一)、戴季陶请求帮助解决印刷问题;结果,第三期的《浙江新潮》就由上海《星期评论》社替我们代印。印好后,仍由杨志祥带回杭州来发行。这一期内容,有傅彬然写的《废孔》一

文,还有蔡经铭写的揭露杭州纬成公司、虎林丝厂、武林铁工厂的资本家剥削面目一文,非孝、废孔,打倒资本家,在当时的社会里,真是骇人听闻。不用说,反动政府以及封建卫道者们是更加吃惊了,更加恼火了,连知识界中也有人认为这是狂妄不近情理,感到惶惶不安。在一师学生中就有凌某以个人名义发行一种刊物,刊名《独见》,大做反“非孝”文章。总之,在当时社会中,我们这一伙被顽固派们斥之为“过激派”,就是“布尔什维克”。连北洋的北洋军阀政府也发出了“查禁浙江新潮”的电报,加此刊罪名为“主张家庭革命,以劳动为神圣,以忠孝为罪恶。”那时风声传来,27人的黑名单已在省会警察厅,就要动手逮捕,施存统大约就在此时潜离杭州。我们工业学校几个同学,曾经密议去日本或苏俄,因川资问题得不到解决,没有成为事实,准备硬挺。在一个冬天的傍晚,我们各人穿上了一件破大衣,在校门口会客室里等候去尝铁窗风味。但后来只受到校长许炳堃的一番温语有加的训诫,没有被开除,也没有受处分,实出我们意料之外。

《浙江新潮》虽被迫停刊,影响却极为深远。北京陈独秀就在第七卷第二号《新青年》上写了一篇题为《〈浙江新潮〉——〈少年〉》的随感录。《少年》是由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少年学会出版的一种刊物。陈独秀对《浙江新潮》的评价很高,说《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和攻击杭州四个报——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和杭州学生联合会周刊——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来的。”他还说“我祷告这班可爱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扬《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重点是原来就加的),万万不可中途挫折。”当时对我们来说,确是一种鼓舞。另一方面,一师师生展开了一场抗议反动政府撤换经亨颐的斗争。社会舆论形成两派:一派是主张正义,支持斗争;一派是附和当权派,指责经亨颐

刊行《浙江新潮》主张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种种邪说,用以破坏数千年社会之秩序,有似“洪水猛兽,流毒无穷”。反动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学校,企图用武力驱散学生,封闭学校,更引起了全省教育界的愤怒。杭州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在杭州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游行。当游行队伍到达梅花碑省长公署时,为守卫军警所阻,就与军警发生冲突,某校一同学为刺刀所伤,造成五四以来第一次流血案。这场斗争结果,一方面反动派迫于輿情,同时,有人出面调停,由姜琦(伯韩)出任一师校长而结束。再一方面是革命性刊物的继续兴起。在一师内部,校友会十日刊继续刊行。《钱江评论》是继《浙江新潮》被迫停刊后再接再厉地出现的革命性刊物。在《钱江评论》的发刊旨趣中说,“1919年虽然是中国的出版年,但是杭地的出版界却是寂寞得很,除了已经夭亡的某周刊外,没有私人组合自由发表新思想的出版物……就是免不了要蹈那天亡的覆辙,也顾不得了!所以要发行这评论。”这里所指的某周刊就是指《浙江新潮》。此外,《杭州学生联合会报》从第19期起作了重大的改革,由傅彬然主编,原《浙江新潮》社成员都为该报写稿。《浙人》也是在《浙江新潮》被封禁后另起炉灶的一个刊物,由查猛济主编。《曲江工潮》是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出版的工人报刊,浙江印刷公司的工人在接触到新思想后也动起来了。以上所举,仅就与《浙江新潮》直接有关者,其他新兴刊物不断出现,真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革命思潮日益滋长。

参加《浙江新潮》的人,我能举出姓名的仅上面提到的十数人。就其中所知的,后来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革命道路直到现在;有的走向反动;有的经历了曲折反复,又走向新生之路。这正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分化现象。

我当时只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社会环境并不了然。《浙江新潮》如昙花一现，手头又无原刊物可为佐证，难免记忆有错。1958年上海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第17页，有“当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刊物，除《新青年》与《湘江评论》外，尚有……浙江的《浙江评论》等”。我在当时未见过《浙江评论》，当系《浙江新潮》或《钱江评论》两刊名称之误，《浙江新潮》在当时影响之大与战斗性之强，是较为突出的。

五四时期温州的《救国讲演周刊》

王希逸

五四的浪潮传到温州，在爱国青年中引起了抗日反帝的怒潮。

1919年夏，我十中同班同学郑振铎由北京俄文专修馆回家过暑假，他与我姐夫陈仲陶（闲慧）在资福山双忠祠内开办了一个《救国讲演周刊》，由他两人负责。参加写作的有：陈仲陶（笔名剑公）、郑振铎、李荫芳、李景贤、莫邪、痴生、声素等。

这刊物每期有插画、言论、时评、记载、讲演稿、调查、艺文、杂俎、别录、来件各栏，石印出版，24开本，每册二十三、四张，每册售价铜元5枚。

第三期言论中有剑公的时评《李厚基残虐学生》，对当时福建军阀迫害学生运动提出了抗议，态度颇为激昂。如云：

佞臣媚敌，要港见夺；政府腐败，信用尽失。我中华民国乃四万万人民共戴之国，存亡与共，岂容坐视！学界发难于前，工商继之，勇往直前，不挠不屈，类皆本诸爱国之诚，发为自决之举。一时民气发扬，迥异曩昔，斯诚国家之幸，而亦吾人所宜崇高扶植者也。顾闻之李厚基，竟以残虐学生，闻其所逮捕，达三四百人之多，压迫民气，不遗余力，倒行逆施，闻者咋舌！

记载栏有国内外大事记，记录了当时国外交涉情况与京津各地的运动发展情况。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到当时全国人民的悲愤和

各地罢市、组织联合会、讲演的浪潮。本埠新闻有：某商人私去东洋堂批购日货被学生查到，立刻逼令戴高帽游街；学生组织国货贩卖团，与奸商对抗，等等。

还有调查栏刊登了国货的品种目录，也登了不少国货广告。艺文栏登出了陈去病与徐自华的悼秋瑾的诗文。这些文字在当时也是风行一时的慷慨悲歌之作。

更有趣味的是一个“来件”：《永嘉府符区青年联合救国会启》。这个会的发起人有张蔚、黄佐、叶维桐、刘翥、邱青钱（即后来的国民党将领邱清泉）等12人。当时大街有个马增记洋行偷运大批日货洋伞等进口，由状元桥附近的徐家桥起运，被学生知道了，去搜出放在状元桥三港庙后江边烧了。

我们当时又组织了一个讲演队，去府符区各地演讲。当时状元桥有个米贩林三郎，传说他把米漏海运给日本人。我们去把他的米封起来，林向法院起诉，我们请律师出庭，结果判决不起诉。

郑振铎也写了一则标题是《私运日货被获》的本埠新闻，内容说：“前日广济船到，学生会前往检查，于水手私货中搜获日本草帽、皮鞋扣等物，当即立予扣留。访系城内元大等两店之物，因前往质问，议定除将各货烧毁外，并罚银若干，以为设立提倡国货木牌之用云。”

此外，还刊有教员讲演团定期讲演：日本横蛮之可恶、忠言劝告反被殴辱、收用台湾汇票之罚锾、女子讲演团实行讲演、购买日货者自取其咎、商界讲演团之成立等，说明当时人心如何激动，从轿夫、黄包车夫，到女子高小学生都参加了斗争。

这个期刊大约出了六七期，陈仲陶是出了很多力气的。他是举人陈寿宸的三子，浙江省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毕业生。后来写古诗很有名。

这刊物是被瓯海道尹黄庆澜扼杀的。因刊物上登了一个《漏

海道尹黄庆澜》的消息,后又故意在刊物上登了一个《漏海道尹乃瓠海道尹之误》的更正消息,因此触怒了他,被他派兵搜查了一番,把东西拿走查封了。幸而陈仲陶等闻风逃走,没有受他迫害。

从这刊物的内容、情况看来,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是支持这刊物的。这刊物的宣传国货与抵制日货对他们很有利,刊物上广告之多就说明了这问题。当时还有李观甫、沙仁川、陈志茅等 10 人组织了一个国货经售处,亲自经售国货。

五四运动时期 成都的进步刊物《半月刊》

舒君实

读成都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双月刊载匡珊吉君的一篇文章，谈到成都当时的进步刊物，据云：当时四川青年学生在政治上、思想上异常活跃，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影响较大的刊物有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李劫人等于1919年7月创刊的《星期日》；四川省学生联合会于1920年初创办的《四川学生潮》；外国语专门学校讲演会于1920年初创办的《威克烈》；袁诗尧和巴金等人于1920年创办的《半月刊》等。这些刊物在冲击封建的礼教道德和制度，激励青年努力奋斗，勇敢地同一切黑暗势力作斗争方面，均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以上所引的匡君谈五四时代成都进步刊物的概况和评价，大致与当时的实况相合，但我是《半月刊》中的人，觉得匡君说得太简单了，应该补充一下。我现在谈谈半月的主要人物以及他的一切内容与后来所遭受的摧残，《半月刊》主要人物只有九人，就是吴先优、袁诗尧、李芾甘（巴金）、何又涵、刘砚僧、来希宗、舒君实、张拾遗、沈若仙。又有两位女同志就是陈竹影与秦德君。都是当时反封建的小将。竹影曾为《半月刊》写文章，可能也是加入为社员的。当时我们九个人轮流担任编辑并撰文，送报经常是何又涵同志，经费是各人节省下的零用钱。办报的宗旨是提倡“无政府主

义”，行动是反政府、反家庭、反一切封建势力，具体事实是倡议男女同校及女子剪发。宣传方面是另设无政府主义的书报流通处。记得有《告少年》、《去士兵》、《极乐地》、《味爽轩一夕谈》、等刊物。并由吴先忧同志办世界语讲习班，后来被当时的军阀刘成勋（禹九）所查封，认为我们是煽动军队造反。同时，也把我们的书报流通处查封，刊物也没收了。在这里我要将当时我们为什么要提倡无政府主义的动机说一下。先谈当时的时代背景，那时就全国看，是北洋军阀执政，政治腐败，对外投降，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卖国求荣；对内反对一切进步思想，提倡封建礼教，镇压学生运动。就四川来看，是地方军阀反动党团执政与所谓“中央政府”一脉相通，互相勾结，开历史倒车，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时我们是一批青少年，即接受了传统文化，同时，也感染了外来思想。一种朴素的爱国心，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怎么能不反对？对军阀政府怎么能不愤恨？至于说到家庭都是腐败透顶，以礼教吃人，我们目睹耳闻，又怎能不想改造革新呢？所以我们的向往无政府主义，在那时是有反封建的内容的。那时，这一学说是同马克思主义同时输入的新东西。我们也研究了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理论，结合我们家庭和社会的实况，做出我们从事运动的计划。我当时曾向社友建议，想把“无政府主义”这一词改为“无治主义”，理由是只说无政府是狭隘的，不能包括全义，无治者，旨在不但不要政府也不要国家，人人自治，反对人治、法治，认为这样社会就会安全了。我们这些想法确是太天真了，太简单了，我后来读了列宁《法兰西内战》以及《斯大林全集》等书，才知道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性和危害性。当时吴先忧对我说：要消除国家首先就要推行“世界语”，国家尊严的标志，即在各有语文，所以我们提倡世界语，也是旨在打破国界，既无国家，哪有政府，甚至我们还想彻底破坏家庭，既不认祖宗，也不必用什么姓氏，最好每人取一笔名好了，这个想法很

简单,但是都无法办到。后来袁诗尧觉得这个主义大有问题,行不通,所以他终于走上马克思主义的大道。我在《半月刊》上发表了一些论文,记得有一篇叫《死的问题》,是想先打破生死关,但我回忆这篇内容,谈到一些有关生死问题的哲理,引了许多古籍,还是经院哲学的一套,可见当时大家的想法是既有“民主与科学”的共同认识,也存在“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与信心,但是局限于时代和个人水平,都有一些“先入为主”的东西,并不十分成熟。我的结论是:在当时,《半月刊》确是进步的刊物,但在今日看,还是幼稚,有些说法是空想的社会主义,是我国传统的大同思想。